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帮会大揭秘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 中国帮会大揭秘

## 一、洪门春秋

——提到帮会组织，人们都会谈虎色变，认为帮会是一种无恶不作，作的黑组织，帮会成员也一定是一群吸人血、刮人肉、吮人骨髓的恶魔。的确，帮会之所以被称为“黑组织”、“黑社会”，说明帮会中不乏恃恶横行之徒，帮会里也不乏作恶多端、流氓逞凶的血腥故事，所以人们常说“江湖险恶”，“黑社会里黑吃黑”。不过，帮会组织像许多事物一样，也有它的两重性。其一，由于帮会是旧社会的产物，在统治阶级横行无忌、残害百姓的情况下，帮会中也的确出现过一些杀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江湖好汉。他们以恶制恶，反抗强征暴敛、草菅人命的官吏，对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奸臣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其二，中国历史上有些帮会往往产生于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如内患外忧之时。这时，帮会大多具有为国捐躯、舍生取义的爱国宗旨。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帮会组织不仅谈不上“黑”，而且是十分进步的。我们下面所讲的洪门帮会，在它的初创阶段就是一个反清救国的群众组织。洪门已有30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近代帮会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帮会。青帮、理帮、蜀中袍哥等许多帮会都是从洪门“源头”上“流出”的。现在香港帮会中的资深帮主在谈及中国近代帮会时，都认为主要有“青”、“洪”、“理”三大帮系。其中洪门影响巨大，为众帮之源。现代帮会中常说的“红花”、“白藕”、“青荷叶”，指的就是“洪”、“青”、“理”三大帮系。这个比喻对讲清三大帮系之间的关系十分恰当。在这个比喻中，“洪门”是红花，处于中心位置，荷叶和白藕均是陪衬。

洪门在中国近代帮会史上影响巨大，还有一个原因是洪门中出了不少声名显赫的民族英雄。洪门的先祖郑成功、史可法都是正气凛然的民族英雄。蜚声中外的孙中山先生为了争取中国帮会支持他的反清事业，曾一度成为洪门的“龙头大哥”。此外，洪门中还有许多惊心动魄、神秘诱人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使得洪门帮会更为人们所关注。

### 1. 洪门的起源

有关洪门的起源，民间一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虽有不同，但在人物、时间、事件的讲述上却大体一致。笔者认为，在洪门起源的各种传说之中，台湾的刘联珂先生的讲述较为权威。刘联珂先生为洪门人士。他后半生一直潜心于洪门历史的研究。他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对洪门历史作了系统和完整的记述，书中材料详实，称得上是中国帮会史中的权威巨著，因此，本章有关洪门源流的描述大体上引用了刘先生的说法。

洪门起源于明朝末年。当时，朝廷腐败，社会动乱，流寇横行，农民揭竿而起。其中陕北的李自成义军攻破了北京城，崇祯帝吓得缢死煤山。明朝官员见大势已去，纷纷向李自成投降。驻扎在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本来打算向李自成投降，可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掳走了，这使他勃然大怒。他一改初衷，决定借关外的清兵来讨伐农民军。

吴三桂冲天一怒为红颜，可他引狼入室使得清军乘机入关，无数无辜百姓遭受清军的屠杀和凌辱。清兵占领北方后，又挥师南下，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清兵在扬州和嘉定大肆屠城，造成了劣迹昭彰的“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在这种情况下，众多仁人义士，包括江湖上的英雄纷纷起来反抗清廷。他们力图“反清复明”，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洪门帮会就是在这种

历史条件下创立的。洪门的先祖拱英、郑成功、史可法等人都是些精神不死的反清义士。

要想知道洪门的起源，首先要弄清“汉留”的起源。“汉留”这个组织，顾名思义，就是要反清兴汉，不让汉民族的江山亡于清军之手。自清兵入关，明朝的余将虽苦苦抵抗，但清兵兵强马壮，来势凶猛，抵抗都成不了气候。顺治二年（1645），清兵打进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顺治三年，又攻入福建。这时，镇守福建的正是明朝大将郑芝龙，也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年轻时是福建海上有名的海盗，人称“海上阎王”。不过郑芝龙还有些侠义，一般不劫百姓。后来他被明朝招安，明朝任命他为福建参将。郑芝龙虽然受朝廷官爵，但仍然暗自称王，雄踞海上，为一方势力。

清兵打进福建后，他和清兵通了气，按兵不动。郑成功对父亲十分气愤。一日傍晚，郑芝龙正在与部下饮酒作乐，郑成功忽然破门而入，怒气满面。郑成功冲着郑芝龙说：“父亲，你受了朝廷的爵禄，就要为国家出力，清兵已攻入福建，你为何按兵不动？”郑芝龙说：“混小子，你连‘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训都不懂，还配来劝老子？你不看，现在清兵一路南下，兵强马壮，如何抵挡？去，读你的书，练你的功吧！”郑成功听了不但不走，反而提高嗓门说：“父亲，你这话是什么道理？在国难当头之时你竟然按兵不动，你难道想向清人求取高官厚禄吗？”郑芝龙这一下发了怒，他站起来发狂似地说：“闭上你的狗嘴，你凭什么来管教老子？你这不孝的畜生，给老子滚！”郑成功一听也发了怒：“滚？滚就滚！我有什么权力来管教父亲？我就是有这个权力！你敢降清，我还要杀你哩！”郑芝龙一下子暴跳如雷，冲上去要打儿子，众将连忙拉住他，郑成功这才愤而离去。后来，郑成功听说父亲果然降清了，他气得血往上冒，晕了过去。醒来后他一路疾跑，来到孔庙大堂里，脱下一身儒服对孔子塑像说：“先师以孝教于万世，今国难当头，忠孝势难两全，我脱下儒服还给先师，从此我要督率将士，力图恢复我汉室江山。我不当孝子了！”说完他点起一把火当着孔子塑像烧掉了儒服。从此，郑成功率领父亲部下有血气的男儿与清军开始了斗争。他成了民族英雄和洪门的创始人。

明朝永历帝很佩服郑成功的忠义行为。这时，清世祖派出大军三路从汉中、四川等地进逼云南。永历帝大惊，他立刻封郑成功为招讨大将军进军长江流域，以绝南侵清兵的粮道。郑成功率领大军船进长江，取崇明、过江阴，战无不胜。清军当然打不过这支忠义之师。提督管效忠带了训练有素的四千精兵来敌郑成功的大军，结果被砍杀得只剩下140人。他狼狈地逃回南京，大声叹息：“我率清兵入关，大战十七次，还从来没有遇见郑成功这样勇敢的军队。”后来，明永历帝在广东站不住脚，不得不逃入缅甸，而郑成功也难以在大陆立脚，便回师台湾，赶走荷兰人，占领台湾以图反清复明。与此同时，缅甸人惧怕清军，把逃亡的永历帝和皇后、妃子等绑献给了吴三桂。吴三桂军中的将士见了永历帝，仍然以帝王的礼节对待他。一日，吴三桂来见永历帝，永历帝见他直立不跪，就问他姓名，吴三桂惭愧得很，不自觉地跪下了，一时连自己的姓名都说不出来。但是，吴三桂没过几日就把永历帝和太子抬到城外的一个荒坡上绞死了。这样，明朝就彻底灭亡了。

郑成功在台湾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交加，大病一场。病好后，日夜招兵买马，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郑成功觉得必须创建一个强悍不屈的严密组织才能使兵将团结一心。于是，他开金台山创立“汉留”组织。和部下结成兄

弟，饮血为誓，决心反清复明，恢复汉室江山。一些仁人义士纷纷投奔，金台山的势力渐渐大起来。不过，郑成功知道只在金台山活动是不行的，还要向大陆发展。于是他派了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李武开和胡德帝五人潜入内地开展反清复明的活动，后来这五人便成了洪门的前五祖。

洪门和“汉留”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知道洪门的人要比知道“汉留”的多。这是因为，洪门前五祖都是洪门始祖洪英先生的门生。他们在没有来台湾以前在洪英门下都是英雄好汉，被郑成功派往大陆后又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样，他们便使洪门的名字响起来了。

洪门始祖洪英，是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也是明末崇祯时期的进士，一直在扬州史可法手下当幕僚。他忠义爱国、文武双全，与王船山、黄宗羲等人交往很深。一天，洪英与史可法二人一边饮酒，一边谈国家大事。史可法说：“清人残暴，我大明江山竟落到如此田地，可怜众多百姓，他们让清军害得太苦了！嘉定死了多少人呵！太惨了！唉！”洪英说：“能不能想一个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万全之策呢？”史可法长叹了一口气说：“谈何容易啊！”洪英先生对史可法耳语道：“我听说吴三桂虽投降清军，但现在遭万人唾骂，他也有后悔之心。近来，据我手下人探知，多尔袞对吴三桂已有怀疑，把他软禁了，我们能不能乘这个机会去游说吴三桂，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劝他乘机反清？”史可法一听，沉默了片刻说：“有可能吗？我看吴三桂这人本性难改，恐怕是说不动的。”洪英又说：“试一试嘛！”史可法看了洪英一眼，认真地说：“那么，这件事只有洪先生亲自去最好，别人我不放心。”洪英立刻站起来双手一拱说：“为了民族大义，吾洪某愿北上游说吴三桂，万死不辞。”说完后即刻告别，回去打点行装准备北上了。

洪英回到家中，立刻叫来蔡德英、马超兴等五门生。五门生执意要与他一同北上。洪英大发雷霆。他说：“人生在世，以国家为重。你们要与我一同北上，是担心我个人的安危，这简直是弃公就私，儿女情长！史先生是忠义乏人，很讲五伦八德，我走后你们要在他手下尽心尽责，准备力量将来报仇！”这样，五门生只好留在史可法手下，洪英第二天便启程北上了。

洪英来到北京城，眼看着国破山河在，看着城里的居民都被清军强迫剃了半边头发，毫无尊严，任其凌辱，不禁流下了泪。他机智地混进城后，住在了一家小客栈里，洪英住了几日后，发现客栈的余老板身披重孝，整日愁容满面，丝毫无心提说房钱，觉得此事很奇怪。一日夜晚，洪英主动买来酒肉请余老板共饮，洪英问：“余老板有何心事？此时已夜深人静，但讲无妨。”余老板说：“我看你也不是清军的密探，老实对你说，现在国破人亡，我戴的是国孝。你看这北京城，自清兵入城之后，根本不拿我汉人当人，杀起我们的同胞简直像杀狗一样。唉！这亡国的痛苦何日才能结束呵！”说完余老板老泪纵横，哭了起来。洪英听了后激愤地说：“清军厉害，可是你们难道就不敢反抗吗？”余老板呜咽着说，“清军兵强马壮，满手箭炮，老百姓赤手空拳的，如何去反抗呵！”说完，余老板猛喝了几口白酒，振了振精神，说：“大明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复兴的一天，现在若有哪一位忠义之士敢于站出来带头反抗，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余某也会跟他干的。”洪英听了这番话，心想：“若大家都像余老板这样，明朝就不会亡了！”他俩又默默地喝了一阵闷酒，洪英觉得酒气直冲脑门，站起来说：“余老板，已是千夜了，咱们各自安歇吧。”

洪英摇摇晃晃地回到客房里躺在炕上，忽然觉得疲倦万分，一下子就进

入了梦乡……。他觉得眼前金星闪烁，烟雾腾腾。只见一道红光划破夜空，窗外仙气飘飘。一位身着红色僧衣的仙家从夜空中降了下来。这位仙家好像是达摩神仙，神仙深夜降临必有要事。洪英连忙起床跪下，聆听指教。神仙对着洪英念念有词地说：“洪英洪英快努力，眼下时局救不及。人心死不尽，光复总有望。”洪英听后连忙请教救国之法。神仙微笑道：“大树风吹倒，何必内心焦。种下小树去，日久一样高。”说罢，神仙用手掌在洪英头上点了几下，忽然又升腾起来，飘飘而去。洪英还有许多事情要向神仙讨教，他见神仙要走，站起来追上去，脚下一滑摔了一跤，猛地醒来竟是南柯一梦。

洪英从梦中醒来后，天色已经渐亮，他轻步走出门外，在晨曦中慢慢回想：“种下小树去，日久一样高。”这肯定是神仙托梦于我，让我召集一批有志之士光复中华。对！一定是这样。想到这里，他斗志更高了。这时，余老板也从睡房中走出，神秘地对洪英说：“昨夜酒后我回家入睡，不久便做奇梦一个，说你此次来京是想游说吴三桂，可有此事？对老哥从实讲来。”洪英一听惊喜参半，说：“正为此来！”余老板马上把洪英拉到屋里去，附在洪英的耳边说：“吴三桂很信看相点星之道，你若见他就装扮成算命先生，此计如何？”洪英听后欣喜万分，连忙称好。

不几日，京城多了个算命的道士。洪先生坐在店前的八仙桌边，后面的三尺白布上醒目地写着“麻衣神相”四个大字。由于洪英原本懂些占卜之道，加上会故作神秘，每算必准，他的名气一下子在京城响起来了。过了半月，吴三桂府中的丫环逛京城，碰巧让洪英看了相，而且很准，这些丫环为了得宠于吴三桂，在他面前提起此事。吴三桂十分相信算命，就让人把洪英请来了。

洪英来到吴府，一句话没说先哭了起来。吴三桂一看很扫兴地说：“这道人，我三桂又不吃你，哭为何理？”洪英连忙说：“我一见王爷便看出你是盖世之材，可惜明朝竟不重用，我为此伤心。”吴三桂一听大喜，他说：“道士讲得极是，明朝当权的都是些无用的东西，朝主昏庸，不重用三桂，难怪明朝有今日了！”这时，洪英大胆地说：“小道已看清了王爷的相，不过要王爷恕了小道的斗胆妄言之罪，才敢开口。”吴三桂听洪英这一说有点不耐烦了，把手一挥：“唉！你这道士，怎么像个女人，不必忸怩！快快讲来！我三桂一向快人快语。”洪英这才滔滔不绝他讲了起来。他说，吴三桂本来是上吉之命，大福大贵，无奈一时做错了事，将清人引进中原，而鞑子非我族类，两族必克，这样祸星必冲撞三桂等等。接着，他又讲了些爱国救民之道，希望三桂能于大错中猛醒，万不可得个骂名百世的下场。吴三桂听后先是一怔，反应不过来，当他弄清了洪英讲的大道理之后，勃然大怒地跳起来，像公牛一样地咆哮：“噢，原来你这个妖道是到我这来耍嘴皮子，游说我谋反？老子得个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与你有个屁事！”吴三桂被说着了疼处，咆哮完后一下子坐在椅子上竟说不出话来，面色钦青地瞪着洪英。洪英见状知道大事不好，呆下去说不定还要被杀掉，便乘吴三桂气得忘了如何处置他时溜了出来。也许是吴三桂气晕了，也许是吴三桂觉得对道人应放他一马，他见洪英溜走了，也没有下令追杀他。

洪英回到客栈，与余老板道了别。这样，他便直出京城，披星戴月地往南方赶路。等到了江南一看，这里完全被清兵控制了。他走进扬州城门，发现有清兵把守。他暗地里找了一位老乡一问，才知扬州城几日前刚被清人攻破。史可法曾率领军民奋勇保卫扬州，但寡不敌众，史可法最后想拔刀自刎，

被清兵冲进城来用乱箭将他射死。听了老乡一述，洪英先生可真是悲愤交加。他立刻四处活动，召集了蔡德英等五门生和史可法的一些余部去与清军拼命。虽然洪英和五门生这一支人马十分英勇，杀死了成百的清兵，但清军兵多势大，在一次苦战中，洪英牺牲于安徽芜湖西南六十多里的三义河。临死时，他把蔡德英等人叫到身边说：“我死了算不了什么，但大仇未报，你们五人一定要反清到底！直到光复。你们五人势单力薄，我看你们去投郑成功吧！他乃一代忠义之人，去投他，我可放心了！”最后，洪英又用微弱的声音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在燕京做的奇梦。让他们把梦中神仙所托的抗清一事发扬光大。

洪英死后，五门生悲痛无比，他们在洪先生的遗体边发誓要发扬洪门精神，与清廷斗争到底。后来，五门生遵从洪英的遗训，乘船过海到台湾投了民族英雄郑成功，成了郑成功手下的得力将领，与郑成功一同创“汉留”组织，开金台山根据地，不断推进反清的革命活动。由于这段洪门历史，洪门中的人都把洪英先生看成是洪门始祖。洪门的“洪”字就是从洪英的姓而来。向时，洪门中的人士还把郑成功尊为洪门武宗，把史可法尊为洪门文宗。

## 2. 少林寺传奇

洪英的五门生继承了洪英的遗愿，投郑成胁反清复明，而且做出了一系列英雄业绩，把洪英的精神发扬光大了。所以，他们五人被洪门的后人尊为“前五祖”。

蔡德英等人投奔台湾郑成功后，由于他们忠义爱国和武功高强，被郑成功派回到福建、广东、江西和广西一带从事反清活动。一天，他们来到福建省莆田县九连山的少林寺。这里古刹钟声、绿瓦红墙、翠峰起伏、仙气十足。五人推开了少林寺的大门，寺中方丈迎上前来，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一双剑眉像白雪一样醒目。方丈见这五人气宇轩昂，就把他们迎进大堂。大家坐稳后互相通了姓名。原来这方丈法名智通，是明朝大臣，因者不愤朝廷腐败，才到少林寺出家当了和尚。智通方丈问：“五后生今来少林寺有何贵干？”蔡德英回答说：“我们都是史可法部下洪英先生的门生。后来我们投了郑成功大无帅，现在是奉郑大无帅之命来内地活动的。”智通方丈听后说道：“原来五位后生竟是洪英先生的门生，我在朝廷做事的时候还与先师有交情，不知洪先生近况如何？”五门生听后禁不住放声痛哭，把洪先生殉难的经过原原本本他讲给了智通和尚。智通听后十分难过，大家又相互劝慰了一番。

晚上，智通方丈把五位门生叫到内屋里议事。智通方丈在烛光下肃然而坐，他带着爱护的语气说：“五位后生，你们侠肝义胆、勇于抗清精神可嘉，可眼下清人强盛，你们势单力薄地跑来跑去，恐怕难成大事呵！”五门生问：“以先生之见我们就不抗清了？”方丈笑道：“不！五位误解了。凡事需要仔细地筹划和准备，我看你们虽然个个满腔热血，但刚才我观你们的步子，虽步伐有力，但还达不到脚下生风的程度，就你们五人的武功而言不见得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如留下练习武艺，习得满身武功，等到时机成熟，你们可登高而招，举起义旗，必有万人响应，这样才能成就大事。这就叫：欲先救国而必先自强！”五门生听后觉得言之有理，答应下来，大家不觉谈了一夜。

旭日东升，染红了叠叠翠峰，只听山鸡啼叫，古刹钟响。智通方丈吹灭蜡烛，对大家说：“走，跟老夫到后院去看和尚习武。”

蔡德英等五人到后院一看，只见院子里 128 个生龙活虎的和尚，施刀的

施刀，舞棍的舞棍，个个气度不凡，都是英雄豪杰，不由得热血沸腾。傍晚吃完饭后，智通又来找蔡德英等五门生。智通说：“诸位觉得如何？在此落发出家，卧薪尝胆，一心习武，将来才能办成大事。”五人听后当即要拜智通为师。借着烛光，智通为五人剃了发。五人又信步来到少林寺外的山峰上。此时，星月当空，山风刁刁，蔡德英、马超兴、方大成、李式开和胡德帝这洪门前五祖郑重地跪在山巅之上，向着三义河的方向发誓道：“洪先师，请你放心，我们五人一定要把洪门精神发扬光大，一定要把反清复明的事业进行到底！”

一天清晨，蔡德英和方大成两人正在少林寺练武。一个自称姓郑的人忽然从山上下来要求拜访五门生。这人三十左右，气度不凡。交谈之后，才知道他是郑成功的侄儿，叫郑君达。他的祖父郑芝龙虽投降清廷，但由于郑成功雄踞金台山抗清，清军竟将郑芝龙问斩。加上郑君达的父亲郑书丹在广东经商已死，这郑君达便怀着深仇大恨来少林寺投奔蔡德英五人。他说，他的妻子郭秀英、妹妹郑玉兰和道德、道方两个儿子与他一同前来。蔡德英听罢十分高兴，连忙问道：“嫂嫂在那里呢？”方大成也说：“是呵！千里迢迢的多不容易，快将嫂嫂等人接进来。”郑君达说：“他们还在山下樱桃沟等我的消息呢。”蔡德英马上叫来了李式开和胡德帝等三位兄弟，随同郑君达一起跨上高头大马一溜风似地向山下奔去，来回两个时辰就将郭秀英等人接了上来。中午吃完饭后，郑君达问：“我们这么多人在什么地方安歇呢？”蔡德英答道：“让我们先去通报一下智通和尚再做商议吧。”随后便去向智通和尚通报。

智通方丈听了郑君达的来意后十分敬佩。立刻叫蔡德英把郑君达等家眷安排到少林寺后院的两间屋里住下。这房子坐南向北，十分宽敞，门前古松翠柏，还有一亩地的寺中菜园，空气清新，十分幽静。自从郑君达一家来到少林寺后，更给这里添了生机。郑君达眉清目秀，而郭秀英、郑玉兰生得天仙一般，明眸皓齿，美丽动人。他们每次在寺中走动都引得众僧人赞美不绝。可是，正是因为这两个美人引起了少林寺的一场悲剧。

话说少林寺有个叫马福仪的和尚，此人武功很好，在一百多个武僧里排行老七。此人武功虽好，但为人粗野，尤其是尘气未除、十分好色。有一次，山下两个村姑上山来烧香，下山时天色已晚。她俩走在山路上，恰巧遇见了上山的马福仪。这马福仪春心勃动，竟对两个村姑起了歹意。当他冲上去时，村姑急呼救命。这时，正好密林之中还有三四个武僧在夜色中练静功，他们听到叫声，立刻跑过来严厉地训斥马福仪，制止了他。当晚，几个武僧将马福仪的行为告诉了智通和尚，智通听后十分生气，准备将马福仪逐出少林寺，又念他武功超众，最后只是开导了一番，没有将他赶走。马福仪当时也表示愿意悔改，后来渐渐规矩起来。直到少林寺里忽然出现了两个他做梦也没见过的大美人，他再按捺不住欲火，决定把这两个美人弄到手。他多次跟踪她们，从大雄宝殿的门缝里窥视她们，寻找着机会。一天夜里，郑君达、蔡德英等人正在少林寺前院练功。郭秀英从后院来送茶水。等她经过大雄宝殿的时候，在里面等候已久的马福仪突然窜了出来，紧紫地抱住了郭秀英。郭秀英正要叫，马福仪一只大手捂住了她的嘴，淫笑着说：“好嫂子，别叫啊，跟我到大雄宝殿里去亲热一番，我求你了！”正在这时，马福仪听见前院有几个武僧说笑着走了过来，他只好一松手，一溜烟似地跑了。

第二天，马福仪又故伎重演，下午，郑玉兰看着天色还早，就抱着一大



堆众僧的衣服走出少林寺，到寺外的一条小山泉边去洗衣服。马福仪悄悄地跟在后面。等玉兰远离寺院后，马福仪突然从后面一把搂住了她。这一次马福仪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倒了大霉。原来智通方丈正与蔡德英几个心腹武僧在密林深处秘密商议反清大计。众人听到呼叫后立刻赶过来当场将马福仪拿获。

智通方丈见到这情景气得脸色发白，他举起拐杖当即打向马福仪。智通方丈边打边说：“你这畜生还劣迹不改，气煞我也！你既然尘气难脱、劣根未除，给我滚出少林守！”众人连忙拉住智通方丈。这时，郑玉兰委屈地哭了起来，众武僧愤怒地注视着马福仪。马福仪恼羞成怒地叫道：“老子就是劣根未除，怎么样？凭老子这一身武功到山下去投了清人，有的是美女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智通方丈一听七窍冒火，一脚把马福仪踢出了三丈远。马福仪爬起来慌张地向山下逃去。这样，智通方丈把这位“老七”赶出了少林寺。

话说清初，西藏曾发生武装叛敌，康熙皇帝命令发兵西藏武力征服。由于清兵十分轻视藏兵，结果在西康一带，被藏兵打得落花流水。康熙帝又派郭廷辉大将军率十万精兵前去镇压，无奈这一次又在西康被强悍的藏兵打得大败而归。康熙大怒，又无计可施，遂下令：“无论三教九流、军民僧道等人，只要有人能平定西藏之乱者，赏千企。”半日后，这条皇榜也贴到了福建莆田县。智通方丈闻听后马上召集少林寺众武僧训话说：“诸位，现夜清廷有西藏之乱，我们不如揭了皇榜进京应征，乘机混进清廷，取得康熙的信任。待来日我们在清兵中掌了军权。那时再举义旗倒戈反清，必杀得清人措手不及，大家以为如何？”蔡德英、郑君达和众僧听后觉得这真是反清的一个妙计，都十分高兴。这样，众僧共推郑君达和蔡德英等揭了皇榜，率众人下山进京应征。

康熙皇帝闻讯大喜，在紫禁城里大宴众僧，向郑君达颁发了印信宝剑。众僧谢过康熙，即日出征。大军经汉中、四川直扑西藏。1714年夏天，郑君达、洪门前五祖率领128名少林寺众僧在甘孜一带与藏兵5000人展开了激战。强悍的藏兵怪叫着扑上来，只见洪门前五祖、郑君达和众僧大显身手，以一敌百，将藏兵打得大败而逃。众僧又一路追杀；在清兵的配合下进军西藏，平定了西藏之乱。三个月后，即1714年秋天班师回朝。康熙十分高兴，要分封众僧以示奖赏，众僧不愿做官，仍回寺中修道。但郑君达接受分封。前往湖广走马上任。临行前他在京城与智通方丈密谋，逐步控制湖广清兵，等来年就倒戈反清，在鄂州一带举行起义。这样，洪门的反清大计眼看大有希望了。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再说马福仪下山投了清朝后，由于武功高强，被封为福建军校。马福仪除了教清兵练武外，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他听说郑君达、蔡德英等众僧居然大败藏兵，而且郑君达还接受分封，为清兵总领，处万人之上，他十分嫉妒，向朝中奸臣张连秋告密，说明了少林寺僧人反清的真相。张连秋立刻向康熙皇帝上奏：“藏兵兵强马壮，朝廷数十万军马，多员战将，劳师几年还常有败绩。今少林寺仅凭128人居然纵横西康、甘孜制服藏兵，可见其强悍异常。而且，据少林寺中老七和尚密报，这128人中领头的是郑成功从台湾派来谋反的叛匪，郑君达就是反清匪首郑成功的侄子。还有，蔡德英、方大成、李式开、胡德帝、马超兴这五人是扬州史可法部下洪英的五门生。他们一直在暗中密谋反清，企图推翻皇制，目前众贼居

于高位，一旦有反，江山难保啊！”康熙帝听此密奏大吃一惊，马上问计于张连秋。张连秋立刻献计：“以臣之汁，请皇上赐宴，众僧必不疑，畅饮后毙之。我再让老七带路，率精兵放火焚烧少林寺，以绝后患。”

康熙准奏，一面派人到湖北用酒将郑君达灌醉，然后用白绳将他勒死。一面派张连秋点 5000 名御林军，兵发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由熟悉地形的马福仪带路。清军开进九连山后，悄悄地把少林寺包围起来，把预备好的干柴和稻草点燃。一时间少林寺火光冲天、烟雾浓浓，少林寺中的众僧因喝了前一天清兵快骑送来的毒酒都神志不清，加上对清军的行动毫无所知，因此，寺中的众僧大多于醉昏昏中葬身于火海，能逃出的只有蔡德英，马超兴、方大成，胡德帝，李式开等 12 人。其余的一百多位僧众都惨死在少林寺中，智通方丈也被烧死。

蔡德英等 12 人逃出少林寺后，来到一个小山坡上，目睹着山脚下的熊熊大火，怒从心起。恰在这时，蔡德英向前一看，发现马福仪在清兵中指手划脚地一边叫清兵浇油添柴，一边嘴里还骂着：“狗娘们，秃驴，你们把我赶出少林寺，老子也不是吃素的，今天我送你们上西天！”马福仪这番话被不远处山坡上的蔡德英等人听得清清楚楚。蔡德英心想：原来如此！他抽出箭，拉满弓，对着马福仪一箭射去，只听马福仪“啊”的一声倒地，此箭正射中他的前额，顿时他的头盖骨被从中间射开。周围清兵一看大惊失色。张连秋赶快命令清兵到四周查看，唯恐再飞来一支冷箭要了自己的命。他得知，蔡德英的功夫是百步穿杨、箭无虚发的。他大声喊：“箭从何来？快！快！给我仔细查看。”这时，一个兵指着山下的大道，张连秋一看，只见蔡德英等人正一路疾行向南逃去。张连秋给自己壮壮胆大喊：“兵勇们，今天一定要斩草除根，给我追！”但是，来时有马福仪壮胆，现在马福仪死了，清兵一下子士气不振，他们又知道“穷寇莫追”的道理，大家你推我，我推你，不敢去追。张连秋一看这种情形只好派了 80 名精锐的清兵前去追杀。谁知这一队前去追杀的清兵也滑头，他们一路上骂骂咧咧地说：“你怕死我们就不怕死？你他妈的去升官发财，我们又没有份。”他们说着竟停下来在山下的一片林中草坪上休息起来。过了好久，他们佯装找不到蔡德英等人，败兴而归。

张连秋听清兵回报后，只好作罢。无奈忽见有十骑人马飞来，为首的是清兵提督陈文耀。此人习武于武当山，武艺超众，杀人不眨眼，人称“黑虎杀星”。陈文耀送来了康熙皇帝的一纸圣旨，要求务必把少林寺众僧一网打尽。

这样，“黑虎杀星”和张连秋等人又拼命去追杀。追杀到离九连山百里以外的山谷里时，又与蔡德英等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拚杀。这“黑虎杀星”的武功居然在马福仪之上，拳脚如闪电，出手十分凶险。从少林寺中逃出的十二名英雄好汉被杀死了七人，仅剩下蔡德英、马超兴、方大成、胡德帝、李式开洪门前五祖。他们五人边杀边退，在山谷里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甩掉了“黑虎杀星”等一队清兵，但他们自己也渐渐地迷了路。

后来，他们逃到一条大河边，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看来真是大难将临、九死一生了。洪门前五祖虽然武功不凡，但水性却不好。此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大河中一下子涨了潮。他们回头一看，只见黑虎杀星正远远与一路清兵杀来，大约只有两三里路的距离了。方大成、胡德帝在与清兵的混战中又受了伤，血流不止。李式开和马超兴也累得精疲力竭。情况万分紧急。蔡德英仰天长叹一声，落下泪来。他大喊道：“洪先师，弟子无能，竟不能将

你反清的遗愿发扬光大了！弟子无能啊！”正在这万分危难之时，雨雾里有一只小船漂来。蔡德英等五人马上求救。船老大把船摇了过来，蔡德英、李式开和马超兴赶快扶着方大成、胡德帝上了船。这时，“黑虎杀星”、张连秋和一队清兵还有百米远。只见船老大用竹竿向岸边一撑，船顺水势，一下子离河堤几丈远了。“黑虎杀星”破口大骂，又挥舞着剑威胁船老大把船划回去。船老大擦擦脸上的雨水笑着对蔡德英等人说：“众兄弟，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你们是死不了的。”说着船已到了河中心。“黑虎杀星”和张连秋气得暴跳如雷。

五人过了河，便叩谢这船老大的救命之恩，船老大请五人去家中一坐。蔡德英忙说：“恩公，日后再会。我恐清兵还会追杀上来。”船老大听后笑着说：“众世兄，放心吧！这大河正在涨水，而且河上无桥，也极少有船，五位壮士放心到寒舍中休息一夜，明日再上路不迟。即使万一清兵追杀上来也无防，我这里还有五位弟子，他们个个英武有力，都是反清复明的义士，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况这两世弟已身受刀伤，要尽快治疗，还是休息一夜再走吧！”五人一听，感情难却，又听说这儿还有五位英雄，心中好奇，就上了船老大。

他们走了半里地光景，忽地看到杨柳深处小溪潺潺，几间茅房正掩在桃林间。蔡德英五人叫好不迭。来到茅舍里坐定后，船老大立刻拿出好酒，杀鸡剖鱼，宴请五人。大家互相通了姓名，才知道船老大原来是明室遗老之后，叫谢邦恒，曾为举人，明亡后隐居此地，逃避清廷迫害。大家聊了一会儿，鱼肉已备好。先生让书童去请后院的五位弟子，书童速去。

五位弟子听说先生宴客，都手持酒壶高兴地跑过来。他们一个个生得英武不凡，先生向蔡德英等五位客人一一介绍，五位分别叫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林大江和杨仗佑。先生说他们都是明朝重臣之后，热血男儿，明亡后一直与谢先生隐居于此，读书习武以等来日反清。蔡德英五人听后十分欣喜。

谢先生举起酒杯说：“十位兄弟，来，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喝一杯，这才是真男儿哩！”十人听后果一齐举杯道：“来！干！”十位英雄一饮而尽。畅饮之间，众英雄用匕首划破手臂，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大家吃着喝着，蔡德英等人讲起了洪英先生在世的故事和郑成功在金台山抗清的业绩，吴士佑五人一听十分敬佩，都加入了洪门（这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杨仗佑、林大江五位后来被洪门尊为“中五祖”）。

当夜，十位英雄和谢先生同睡在用稻草打的大地铺上，谈得十分投机。夜里大家谈到了马福仪，个个痛骂。蔡德英说：“看今日歃血为盟之事非常好。这样才能防止马福仪之类的败类混入洪门，也好让后来参加洪门的兄弟口服心服。”说完蔡德英提议要把歃血为盟定为以后加入洪门的一个规矩，大家当即同意。话至三更，十人渐渐入睡。

次日，十位英雄上了路，向广东惠州方向而去。谢先生仍留在这里，在水路上招纳反清义士。

洪门十弟兄一路上披星戴月，于1715年的秋天来到广东19北部一带活动。一日，十兄弟来到韶关以北的山区。忽然看见山巅之上有一座宏伟的古庙。十兄弟走得十分疲乏，便上得山来，向寺中小僧讨些水喝。其间，十人听说寺庙之中有五位和尚，忠义爱国、武功高强，数月之前在佛山一带发动了小规模的反清暴动，杀死了不少清兵，现暂居于寺庙之中。十人一听很感

兴趣，想结识一下，把他们招纳来壮大反清力量。十人推开寺后院大门，见寺中五位和尚正在习武弄拳，一个个生得龙虎一般。

五个和尚一见十位陌生人径直闯进，十分警惕。为首的一位迎上前来一拱手说：“请问你们来此有何贵干？”蔡德英听说他们也是反清义士，就直言道：“我们是从福建少林寺而来，一为躲避清军追杀，二为来广东寻机发展反清事业。今天来到贵地闻听五位兄弟也在反清，故此，很愿与五位结交为友。”为首的和尚说：“既然列位是从少林寺而来，我就要请教各位的尊姓台甫。”蔡德英见对方渐渐和气起来，逐一把十人介绍给他们。为首的和尚马上上前向蔡德英等十人一躬到底说：“原来是十位英雄，蔡大哥等人我们早已听说了。得罪！得罪！”他一边说着，一边请十位英雄进堂屋休息。五人又一一自我介绍，才知道为首的叫吴天成，其他四位分别叫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和林永超。

对蔡德英等五位英雄的抗清壮举和少林寺出逃一事，他们都十分清楚，因为少林寺大火后清朝捕拿的文告早已发到各地。后来，他们仿效蔡德英等人杀进佛山县城，意欲反清，但敌人众多，他们在杀死了十几个清朝官员后，只得落荒而走，暂住在这寺庙里，想伺机投奔蔡德英等人。今天在广东地界巧遇，真乃天意！当夜，十五人一见如故，把酒论英雄，谈得十分投机。东方见晓的时刻，十五位又跪对洪英、郑成功和史可法三位列宗画像，刺血酒中，一饮而尽，结为兄弟。后来，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和林永超这五位广东地界入洪门的英雄，被尊为洪门后五祖。

这一夜，吴天成向蔡德英等人介绍了广东的时局。大家一致认为：清朝十分重视广东，在这里活动恐怕难以成功，应先进湖北襄阳一带清军势力薄弱的地方活动。这时，蔡德英又说，当郑成功派蔡德英、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和方大成向广东、广西和福建一带活动的时候，还派了另一位智勇双全、博学多才的陈近南向云南、四川和贵州一带发展，以图反清大计。现在听说陈近南入川后反清活动开展得很好，势力较大，在雅安一带有了稳固的根据地。这样，到襄阳一带开展反清工作，必要时还可以与陈近南会师四川。大家听蔡德英一说更有了信心。于是，天亮后十五人便匆匆扬鞭启程，一路轻骑向湖北方向奔去。

十五人一路来到襄阳，只见襄阳地界山青水秀，景色甚好。蔡德英等人走着走着触景生情、大家都默不出声，原来他们想起了郑君达惨死在这里。于是，他们一同到了襄阳丁山去给郑君达扫墓。这已是1716年的早春时节，十五人在丁山乱坟里走着，只见坟头上已开满了黄色的迎春花。蔡德英等人在乱坟之中寻找着郑君达的墓碑，回想起在福建九连山少林寺相处的日日夜夜，不觉得泪如泉涌。找了一会，还是不见郑君达的墓地，大家便坐在山坡上吃起了干粮。蔡德英感慨地对大家说：“可惜这大好河山落在了清人手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光复！我们这十几位虽然个个武艺高强，但眼下清廷强盛，一时又难以斗过他们，何日才能实现列宗的遗愿啊！”大家听后一时间都默不作声。

正在这时，大家听到坟头那边有女人的哭声。蔡德英听得像是郭秀英和郑玉兰的声音，便急忙向前奔去，果然是她们俩在此哭泣。前五祖大叫一声“嫂嫂！”众人相见，热泪奔涌。这时，郑君达的儿子道德和道方也从藏身的荒草中奔出来，大声呼叫“干爹”，真是悲喜交集。大家一番言语之后，一起祭奠了郑君达。事毕，决定先去投奔襄阳附近的另一位洪门人士万云龙。

下山时，忽然看见一队清兵骑着战马飞奔过来。细看是张近秋和“黑虎杀星”陈文耀又追杀过来。他们在江西被滚滚大河挡住后，便判断蔡德英等很可能会逃往湖北一带，于是，他们直接来到襄阳地界查寻。今晨他们得到密报，说有十几个可疑的人奔上襄阳丁山，他们知道郑君达就埋在这里，想必这十几个可疑之人是洪家兄弟来扫墓，便带领大队人马追杀而来。蔡德英看见大队清兵蜂拥上山，立刻让大家分三路人马突围出去。蔡德英、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方大成为一路护送道德、道方突围；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杨仗佑、林大江护送郑玉兰和郭秀英突围；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一路在后面掩护。大家约定于汉江上游的白河地界相会。

安排完毕，洪门五祖个个英勇无比，如猛虎下山，直扑清军。把清军兵勇杀得死伤无数。洪门三路英雄如洪水奔涌，势不可挡，冲撞敌阵。清兵见五位英雄武功高强，又都红了眼，不敢向前靠近。当他们看见有郭秀英和郑玉兰两个妇人时，拼命地把她们围住，山下的援军也不断潘上来。郭秀英、郑玉兰杀得精疲力尽，最后退到汉江边，吴士佑五人已多处受伤，想冲进来救她们。郭秀英、郑玉兰眼看后无退路，更不愿连累吴士佑五位兄弟，她俩对视了一下，冲上去杀了五六个清军兵勇，然后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浪奔涌的汉江……。吴士佑等五人痛不欲生，边杀着清军边退了回去。

“黑虎杀星”和张连秋要拿“匪首”，向蔡德英这一路人马冲杀过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蔡德英、方大成、胡德帝五人已把生死置之脑后，像五匹猛虎呐喊着冲了上来。“黑虎杀星”陈文耀不觉得心里一惊，蔡德英的剑已朝他头上砍杀过来，他用自己的剑去挡，霎时间火花四起震得他双手发麻。“黑虎杀星”飞起一脚向蔡德英踢去，蔡德英向旁一闪，陈文耀的铁脚便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圈。当他还没有收回脚时，方大成已杀到了面前，用剑向空中一划，陈文耀的一只脚就被砍向了空中，痛得嗷嗷直叫。胡德帝又赶上来，主砍在陈的脖子上，他的头顺着山势滚下去，落到了下面几丈远的一队清军脚下。清军吓得直往后退。张连秋一看这种情况，大声地对清兵喊：“上！上！”话音未落，李式开射来的一支箭正好射进了他的嘴巴，他应声倒地。众清兵顿时群龙无首，乱成一片，任凭山下的督战队如何挡杀，也阻挡不住他们的后退。

这一场恶战，洪门前、中、后五祖 15 人杀死了清兵 440 多人。洪门英雄除了郭秀英和郑玉兰投江自尽外，全部杀出重围。这件事一下子在襄阳和汉江一带传开，许多秘密反清的人士纷纷前来投奔。不到半年，洪门前、中、后五祖率领的反清义士已多达 1000 余人。

### 3. 聚义红花亭

《雪山飞狐》一书中，有一路武艺高超的人马自称为“红花会”。这“红花会”的历史再往前追溯，就到了洪门的红花亭，所以那“红花会”实质上是洪门的一支，“聚义红花亭”是洪门历史上一段真实感人的故事。

当郑成功派蔡德英等洪门前五祖到福建、江西、广东一带从事反清活动时，也派了文武双全的陈近南潜入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开展抗清事业。陈近南潜入四川后，在四川雅安开精忠山，一些热血男儿纷纷从各地赶来参加。他们隐藏在雅安附近的山区里积极筹备，以等待时机发动反清起义。

陈近南除组织大家练武外，时常对四川的父老乡亲们发表演说，激励、号召大家起来反清复明。陈近南这一系列活动，引起了雅安知府的注意。他们派出探子混入精忠山。当陈近南准备举行反清起义时，雅安知府提前知道

了消息，派大军包围精忠山进行围剿。雅安的洪门兄弟死伤无数，陈近南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洪门在四川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事变后，清政府又顺藤摸瓜，捕杀了不少洪门兄弟。

不过，陈近南在四川传播的反清复明思想已在人民中间扎下了根。后来四川的哥老会就是从陈近南精忠山的一支发展而来。到了近代，哥老会又进一步蜕变为一般的帮会组织——四川袍哥。但这时的袍哥组织已不像从前那般革命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打家劫舍的黑帮成员。

却说陈近南逃出四川后，来到了湖北地界的白鹤洞出家修道，人称“白鹤道人”。他来到白鹤洞后，仍旧从事反清活动，把白鹤洞变成了一个反清义士聚集的场所。白鹤洞位于湖北神农架，重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儿风光秀丽，白鹤翩翩，仙气很浓，故称“白鹤洞”。白鹤洞里面又有一洞，既深又宽，可容几百人。神奇的是洞里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亭子，里面有巨型红花开放，又称“红花亭”。陈近南经常组织各地的洪门义士在这里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反清大计。久而久之，陈近南便成了湖广一带的洪门主持人，这“红花亭”三字也成了洪门人士间“开会”两字的暗语。

蔡德英等洪门十五人在丁山汉江边杀出重围之后，一直向襄阳的西北方向奔去。目的是去万云山与洪门人士万云龙会合，然后再一同去找陈近南，以此来壮大洪门力量。这万云龙的俗名叫胡得起，浙江人氏。他从前是潞王手下的大将，武艺高强，有万夫莫敌之勇。清兵杀败潞王后，他孤立一人难成反清大业，便索性来湖北襄阳的万云寺出了家，在暗地里联络各方义士从事反清活动。万云龙到湖北后与白鹤洞中的陈近南关系甚好，依据洪门规矩喝了血酒，结为兄弟。因此万云龙便也成了湖北地界洪门的主持人之一。由于他武功盖世，又与白鹤道人云游于鄂西北的群山之间与清军周旋，所以万云龙的名气渐渐在洪门中大了起来。近日万云寺中的小和尚早已把下山探知的蔡德英等人在丁山血战清兵消息告诉了万云龙，他推算这十几位英雄一定要来万云寺的，便整日等候。

一日，云龙正在山上练习武功，忽见山下一路人马匆匆赶来。仔细一看正是蔡德英等洪门兄弟。万云龙万分欢喜，赶忙派小和尚去煮茶备饭，又派了四位洪门兄弟出去放哨，不一会儿，蔡德英一路人马来到，行过拜礼后，大家激动万分地簇拥

当夜，万云寺里烛光高照，喜气洋洋。万云龙大摆宴席为上山的十五位洪门兄弟接风洗尘。宴席上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谈洪门这些年来的奋斗史，万云龙站起来端着酒杯说：“诸位洪门兄弟，让我们与各位先烈同饮一杯酒！”众洪门兄弟一个个肃然而立，如棵棵青松，一同把酒举起喝了半杯，然后把剩下的半杯酒倒在各自的脚下，以祭奠洪门先烈。万云龙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地说：“诸位兄弟，这深仇大恨如不报非为人也！”大家齐声怒吼：“深仇大恨如不报非为人也！”洪门兄弟气壮山河的怒吼从红光闪烁的大堂里传出，在深夜的山谷中回荡着，好不威风！这时，夜已很深了。万云龙、蔡德英等又在烛光下讨论着下一步的反清大计。大家一致认为，拉上万云寺会合的所有兄弟去白鹤洞与陈近南的洪门队伍会合，然后一同下山向清廷挑战。

第二天清晨，红日东升，万云寺前的山谷里白云飘飘，山鹰旋飞。蔡德英与万云龙的各路洪门兄弟一共 200 多人，带上竹筒装的泉水和干粮，拿着弓箭大刀向着神农架方向的白鹤洞进发。

大家边说边走，边走边笑，冷不防从路边的草丛里串出了一条一丈长的青色巨蛇挡在路上。这巨蛇扬起身子，喷出红舌，双眼冒火般地盯着大家。众人一看忙停了下来。万云龙推开大家说：“闪开！闪开！让我来收拾它！”蔡德英连忙拉住万云龙说：“万大哥，让我来好了！这不是蛇，一定是清妖变化成蛇精企图挡道。”大家听了都七嘴八舌地议论：“对了！一定是清妖挡道。”青蛇旋舞了几圈，“嗖”的一声向蔡德英扑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蔡德英把明晃晃的长剑在空中一划，一瞬间那一丈长的巨蛇便被砍成了两半，身子那一半掉进了小道边的万丈深渊，青蛇头那一半掉在了路上。众兄弟上前一看，青蛇还眨着一双眼，大家一阵乱剑将这半条青蛇砍成了无数节。边砍边骂：“砍死清妖！砍死清妖！”那样子像在砍杀清军兵勇。中午时辰，大家终于来到了山崖上的白鹤仙洞。远远望去，只见山崖边白鹤飞翔，烟云缭绕，青松古柏，阳光灿烂。真是名不虚传。这陈近南原来在台湾与蔡德英是很要好的朋友，相见之后欢慰的情形真是难以言表。陈近南见群英毕集，十分高兴。他把各路洪门兄弟请进洞里的红花亭，让大家分别坐下。陈近南坐在红花亭的正中央，手里举着个火把向大家介绍川鄂一带的抗清形势。蔡德英又向大家介绍了去西藏平乱、混入清廷和少林寺被焚的经过，大家更是把清廷恨得刻骨铭心。正在开会之时，忽然看见亭后的三合水中烟雾腾腾，啧啧直响。大家都好奇地围上来看。只见三合水中浮出一只白玉石香炉，万云龙和蔡德英急忙把它从水中拣起。见此香炉两耳三足，玉光闪闪，炉身上有“反清复明”四个大字。众人想这真是无意难违，都认为是神明显灵。陈近南走上前来：“闪开！让我试试。”只见他用花碗掷于石上，连掷三次，其碗不破。大家都坚信这是天意了。于是众人一起将白玉香炉抬进红花亭中央，然后各路洪门兄弟在香炉面前以枯木为烛，各人拿出好酒，歃血证盟，一同结成异性兄弟。这就是洪门历史上有名的“红花亭大聚义”。时间是1734年7月25日凌晨。参加聚会的有，白鹤道人陈近南，万云寺主持人万云龙，蔡德英等洪门前中后五祖共15人，江西义士黄昌成、铃玉英夫妇，四川的吴迁贲、苏洪光等明朝遗臣，一共有2000多人。其中还有1734年夏初上山的13岁的英俊少年朱洪竹。他是西宫李贵妃之子。崇祯帝的孙子，众人拥他为正统盟主。推陈近南主香，先来者为拜兄，后到者为拜弟，以“洪”字为结盟之姓。以“三八二十一”作为同门接头暗号。这就是把“洪”字拆开，以“三”以“共”分为“八、二十一”，作为日后自家兄弟相识时的标记。同时，蔡德英还提议将这次大会叫“第一次洪门大会”。从此，“汉留”改名为“洪门”，对外称“天地会”。“天地会”的含义是：“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撮土为香，歃血证盟，结拜兄弟，共同反清。”

会议结束后作出的决议有：公推白鹤道人陈近南主香即主持洪门，公推万云龙掌握兵权，为全军之统帅，公推蔡德英等前五祖为先锋，吴士佑等中五祖为左翼，吴天成等后五祖为右翼，准备下山进军武昌。同时招兵买马，扩充军力。

经过两个月的全面准备后，洪门大军开下山来士气极旺地向武昌进攻。一路上战无不胜，连克大府小县十八座。清廷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眼看着洪门大军两万人逼近武昌。武昌若失，整个湖北就完了。这时，清廷忙派出一个五虎大将于成龙为武昌守将。战斗开始了，洪门英雄个个奋勇杀敌，起先洪门大军士气旺盛，军事上十分主动，但清朝不断从四川和湖广等地调集援军，守卫武昌的清兵猛增到20万人。于成龙又训练了三千精锐的清兵为敢

死队在洪门大军攻城时从背后杀来。这样，洪门大军寡不敌众，终于溃败。万云龙、朱洪竹等人在攻城中不幸牺牲。

三个月后，洪门兄弟在陈近南、蔡德英领导下再次攻城，进逼武昌，但这时清军早有准备，加上清朝正在兴盛时期，进攻又告惨败。方大成、张敬之、胡德帝等战死。蔡德英和陈近南依旧逃到神农白鹤洞，悲痛交加，相继去世。其他的洪门兄弟逃往湖北各地，去向不明。只有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和林永超五人一起逃到鄂西北的汉江上游一带，活动了数年之后也相继去世。到这时，洪门的力量已大大下降。剩下的一些洪门兄弟逃避到鄂西北和川陕交界的山区隐藏起来，暂时无法活动。因为清朝在武昌之役后正在大肆捕杀和追查各地的洪门人士。

#### 4. 天佑洪血战白虎山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武昌之役后，洪门的领袖们战死的战死，逃亡的逃亡，去世的去世，使洪门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可到了康熙五十二年，洪门中又出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杰出领袖，此人名叫苏洪光。

洪门兄弟在他的领导下逐渐强盛起来，声势浩大，威振七省，使得清廷闻风丧胆，由于苏洪光使衰落的洪门再振雄风，因此，他在洪门历史上被尊为洪门的“威宗”。

关于“威宗”苏洪光，在洪门人士中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们暂时不如议论，不过这个传说在洪门历史上一代代相传，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传说简要的介绍一下。

雍正元年，苏洪光在湖北与清军苦战七天七夜回到军中后突然大病去世了。消息传开，洪门兄弟像失去了主心骨，悲痛万分，伤心哭号。军中副将史可法的侄子史明下令将他的尸体抬到神农山寨洪门兄弟开会的“忠义堂”中央，准备设灵堂隆重祭奠他。夜晚，史明派了精明强干的十位洪门兄弟为苏洪光守灵。

这天夜里月色朦胧，秋风阵阵，落叶飞舞，凄惨万分。苏洪光的遗体就安放在灵堂中央，堂里烛光高照，遗体四周放满了洪门兄弟采来的山花。三更时分，十位洪门兄弟在痛哭后有点昏昏欲睡，忽然天色渐渐亮起来，诸位兄弟感到十分惊奇纷纷涌向山门前遥望天空，只见东方天上闪烁着一片红光，中间有一颗星星炽光闪闪，亮得出奇，众兄弟惊讶地望着天际，忽然那红光和星星又消失了。黑夜依然笼罩着山谷，山野里一片沉静。十位洪门兄弟从没见过这神奇的天象，便议论纷纷地回到大堂继续守灵。

大约在午夜3点3刻的时候，大家一日劳累十分疲倦，有几位已靠在大堂旁的稻草上开始打盹。其中有一位叫刘三的洪门兄弟对刚才的天象感到有些奇怪，不由地把眼光落在了苏洪光的尸体上。他发现这尸体在慢慢蠕动。他疑心自己花了眼，忙用手搓了搓惺松的双眼。一点没错，这尸体真的蠕动起来了。他吓得丧魂失魄，又不敢大叫，对旁边的兄弟说：“我上趟茅房。”说完他低着头溜了出去。刘三出“忠义堂”后立刻赶去向史明报告，史明半信半疑地想回来看个究竟。

这时，大堂中央苏洪光的尸体蠕动愈来愈厉害，忽然他用手把自己脸上盖的白纸拉掉，大笑起来。这一笑将其他九位洪门兄弟惊醒了。众人一看吓得大叫，动也不敢动地颤缩在那里。只见苏洪光说：“我到底活了！我到底活了！”更令众人惊奇的是苏洪光讲的不再是川腔，而是一口标准的京城口音。史明赶到后，他胆子大，凑上前去问：“苏大哥！你怎啦？”只见这尸



体坐起来说：“苏大哥？我不是苏大哥，我是明崇祯帝手下的王承恩。”“苏大哥，王承恩不是同崇祯帝一块吊死在煤山了吗？”“对了！我就是那个与先帝一块吊死的王承恩。我吊死已经多年了！”尸首操着京腔说。众兄弟和史明一听真不知再问什么好，也不知要说什么。这时尸体站了起来，大家一看都往后退。尸体见状说：“诸位洪门兄弟，请别惊恐。我死后去了丰都城，在城外阴魂不散，徘徊着不愿进去。后来；我遇见了达摩祖师。他看我精忠为国，忠魂难散，让我来苏大哥这儿借尸还阳，扶助洪门。”众人听后不再惊恐，上前紧紧地围住“苏大哥”问长问短。

从此，这复活的王承恩自愿领导洪门反清。他有苏洪光的外表和武功，又有比苏洪光更加精明的智谋，洪门兄弟个个对他十分敬佩，都服从他的领导和指挥。不过，这复活尸体既不叫苏洪光又不能叫王承恩。他自己改名为“天佑洪”，即上天要他扶助洪门的意思。自天佑洪主持洪门后，洪门势力大增。全国各地的三教九流纷纷前来投奔。天佑洪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洪门兄弟多次在湖北大败清军。这在清朝看来真是洪水猛兽，朝廷增兵 20 万来湖北镇压，又贴出告示，凡与洪门有联系的人统统格杀勿论。洪门兄弟受到极大威胁。天佑洪把洪门改名为“三合会，又叫天地会”，取“天时，地利，人和”之意。同时，天佑洪派出一批能干的兄弟假意下山向清廷投释，而实际上是作为洪门的间谍打入清廷，这批被派下山的洪门优秀分子中著名的有三人：翁严、钱坚和潘清。他们下山后打入清廷，成立了一个表面上帮助清廷的“清门”或叫“清帮”的组织。所以大家一般都说“清洪帮”。有关清帮的历史和奇闻本书后面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天佑洪创立了三合会（天地会）后，又从湖北和川东招了一批义士组成三合军。三合军的反清宗旨深得人心，各地义士纷纷投奔。三合军逐渐发展到 30 万人，声势浩大，士气旺盛。而且在三合军中还有像关玉英这样的巾帼女杰 4000 多人，一时间三合军让清军望风披靡。天佑洪看三合军日渐强大，命令三合军发兵蜀汉。三合军兵分三路，多次大败清军，很快就接近了四川边界。

这时的川督是王春美，他听说三合军大举犯川，立刻率领十万精兵迎战三合军，三合军勇不可挡，王春美的川军大败而归。王春美回到军中，恼羞成怒。这时，有人献计说，三合军初到四川，急于网罗本地人以便站住脚，何不派两个间谍混入三合军，里应外合对付他们。王春美一听大喜，立刻派了两位精明的部下前去诈降。

这两个人名叫田坚和符达，是王春美手下的得力干将，因王春美占据四川后一心想自立为王，训练了一些干将到各地，甚至混入清军中打探虚实。田坚和符达接到命令后立刻化装成农夫前来诈降。一日，三合军正进军到奉节地界，忽见两位农夫在河边痛哭，三合军的兄弟们好奇地上前询问。两位貌似朴实的农夫向三合军哭诉全家被清军所杀的经过，要求加入三合军。他们声称十分熟悉蜀道，愿亲自带路。三合军正需要熟悉四川情况的人来做向导。听他们一讲十分高兴，虽然对他们进行了一番盘问，但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就让他们参加了三合军。

田坚和符达加入三合军后，因为要取信于天佑洪，还真的让三合军在与川军的几次战斗中占了便宜，他们不断献计献策，三合军一路上进军更加顺利。天佑洪对他们二人深信不疑。于是天佑洪认为时机已到，命令大军进逼重庆，授命田坚、符达两人组成了一支五万人的先锋队伍提前启程。谁知这

五万精兵在田坚、符达两人指挥下一直开进了没有退路的巴山老林中，转来转去，走不出来。正在人疲马困之际，埋伏在巴山中的川军兵勇从四面八方冲下来把三合军的先锋队全都缴了械。另一支五万人的清军从汉江上游入川，南下巴山，把三合军的先锋队全都屠杀掉了。一时间，巴山遍野的竹林都染成了罕见的红竹，血流成河！当夜，巴山下了暴雨，从山谷里流出来的河水都变成了红色。川北的老百姓见了，无不对凶恶的清军切齿痛恨。田符二人用从三合军身上脱下的军装让清兵穿上，这支清兵佯装三合军先锋从巴山开出来。田符二人把这支五万人的清军带到了三合军的后方，两军接触后，三合军还以为清军是自家兄弟，个个不疑。正在这时，五万清兵杀将过来，把三合军的后方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进军重庆的天佑洪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刻下令十万三合军停止进军，退到附近的白虎山死守。天佑洪刚刚让十万大军在白虎山安营扎寨，田坚和符达二人便率领五万清兵和六万川军赶到，清兵和川军赶来后一方面做进攻三合军的准备，一方面派人回报清廷，要再派十五万援军一同围攻白虎山。王春美又从重庆赶来。白虎山的三合军有二十万之众，而山下围攻的清军和川军有十六万之众。三合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了上风，但劳师远征，孤立无援，而且，川陕和川鄂界的大批清军正在往这里赶，情况十分危急。

第二天清晨，田符二人带领八百名精锐的清军兵勇来山下挑战。天佑洪在山上远远看见田、符二人在山下笑骂挑战，气得火冒三丈！“大帅，让我来收拾他们！”话音未落，只见关玉英单枪匹马，闪电般冲下山去，指名要和田坚、符达会阵。符达知道关玉英武功非凡，不敢上阵。田坚却是好色之徒，仗着一身武功挥马迎上阵想把关玉英活捉过来。八百清兵见只有关玉英单枪匹马地前来应战，十分轻视。他们知道田坚满身武功，为川东一霸，定能活捉关玉英。这样，八百名清兵便散开阵，坐在地上笑观。田坚见关玉英挥马扬鞭向他冲来，双腿在马肚上一夹，迎上前去。刹时刀光剑影，马蹄阵阵，两人在马背上激战开来。关玉英飞马向前，向田坚闪电般连破三刀。田坚忙用双剑一舞，只见火花四冒，田坚的手臂被震得发麻。他心中一怔，知道轻视了对手。正在此时，关玉英用刀背轻击马背，冲下山坡，一瞬间又回过头来奔向田坚。田坚有点惊慌，只是被动招架，关玉英身子在马背上一闪，将田坚擒过来，飞马上山了。在地上围观的清兵还没有明白过来，关玉英就已生擒田坚飞马而归了。

清军失去田坚，再也没有来山前挑战，只是等援军赶来。当天夜里，在白虎山上的忠义堂里，田坚被推入大堂。大堂里火光闪闪，群情激愤。天佑洪一声令下，两位三合军兄弟手持尖刀走上来。田坚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壮着胆子喊：“三合叛匪，要杀就杀，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一位三合军兄弟手持火把要烧田坚的脸，田坚不敢再喊。天佑洪说：“兄弟们，动手吧！我们要用他的心肝来祭在巴山殉难的兄弟。”田坚一听要开膛破肚，不能一死了之，神经质地大叫起来。只见尖刀在他前胸上慢慢划开，几分钟后，他的心肝给三合军挖了出来。田坚瞪着眼，鼻孔里还出着最后一点气息。

田坚虽死，符达还活着，这是三合军不能允许的。天佑洪一面下令 20 万大军准备突围，一面派关玉英率 20 名精干的洪门兄弟下山去杀符达。符达知道三合军要来报仇，向川督王春美辞职隐居在川北大竹县境内，改名换姓，叫作邱川菜。关玉英等 20 人下山后立即从生擒的清军首领那知道了这一情况。于是，关玉英一路人化装后前往大竹县，夜入县府生擒大竹县令，得知

符达隐居在大竹县石河荡。21位洪门兄弟来到这山青水秀的石河荡一看，原来符达由于帮助川督王春美剿杀三合军有功，得了不少赏金，在这里已置了田产。他兴修宅院，妻妾成群，正隐居于此安享余年，好不风光。

第二天，关玉英化装成乞婆来到“邱川荣”的宅院前讨饭。符达的家人给了她一碗米饭吃，关玉英吃完后又讨一斗米，家人不肯，吵起来。符达从书房中走出，听家人讲过争吵的原因后大骂：“大胆刁民，我已给你白米饭一碗，你还在这里肆意胡为，看老子来教训教训你。”说完他用手杖向关玉英打来，这只手却给关玉英握住了。关玉英一手拖住他，一手打了一个口哨，埋伏在宅院旁竹林间的三合军兄弟蜂拥而来，用洪门中惩罚内奸的一百零八刀将符达剁成了肉酱。

洪门经过田坚和符达之变后对吸收外人十分谨慎。为了防止歹人混入洪门破坏，天佑洪亲自制定了洪门会章。定下了三十六步半升官图，三十六誓，二十一则，七十二款，十条，十禁，十刑，虽然如此，天佑洪还是痛恨自己用错了人，给洪门反清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为此，天佑洪竟一病不起，病逝于四川白虎山。天佑洪死后，洪门大军由洪宇、林烈二人统领。经过半个月的休整，洪门大军在洪宇、林烈的率领下奋力突围。在恶战中，洪门兄弟死伤无数，关玉英也不幸阵亡。其他的兄弟四处逃散。因此，从雍正四年四川白虎山之役后，由天佑洪一度重振雄威的洪门组织进入了中落时期。不过，三合会虽然衰落了，但作为洪门支流的哥老会又在华中、华北和华南兴起。由庚子年间直到光绪末年，洪门在各地一直活动频繁，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哥老会将洪门的精神发扬光大了。此外，洪门还与太平天国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虽不能把太平天国说成是洪门的一支，但洪秀全、冯云山原来都是天地会中的洪门分子。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众多首领都是天地会和三合会的成员，洪秀全一直靠拜上帝教成员和洪门兄弟给他撑腰。洪秀全为了不使人们忘记天地会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才定国名为“太平天国”。后来的义和团也是洪门的一支。它是由洪门后五祖之一洪太岁的后裔洪彪、洪毓等主持的。

#### 5. 海外洪门与司徒美堂

洪门与青帮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洪门重视兄弟之谊，强调重义轻利，横向联系。即使洪门中某能人另立山头，仍同洪门保持联系。彼此之间不强调上下关系，大家平等往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青门则不同，他们强调纵向关系，君臣父子；48字辈等级分明，如有越“爬香头”之举要被处以酷刑。青帮的组织特点使它的势力盘踞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而不能广泛发展，而洪门的势力则十分广泛。洪门的活动不仅遍布国内，而且发展到海外。这里有一个因素，即华侨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国弱民穷，许多破了产的手工业者、小市民以及走投无路的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逃命海外，成了“海外游子”。由于旧中国积弱已久，清政府在国际上毫无地位，海外华侨在移居国倍受洋人凌辱，又不能指望清政府在海外的外交机构来保护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洪门“忠义救国，兄弟提携”的宗旨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华侨们为了生存自卫，纷纷参加了洪门属下的“堂口”，即“帮会组织”。这样，一下子使洪门的势力发展到海外，几乎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帮会组织。据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记载，洪门在美国的“堂口”竟达几十家之多。光是洪门人士在美洲主持的大报就有20多家。如美国的《五洲公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古巴的《开明公报》，秘鲁的《公言报》等。在世界各地的

洪门组织中都涌现了一批“义侠心肠”的洪门头人。其中，美洲华侨中的司徒美堂就是这样一位洪门头人。透过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洪门在海外的影响和作用。

司徒美堂，洪门人士尊称他为“五叔”，他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家。由于早年丧父，常受人欺，他发愤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他14岁赴美国，17岁入洪门，由于他侠肝义胆，打抱不平，在每次堂斗中好狠斗勇、拳脚很快，成了华人堂口中的实力派。司徒美堂非常看不惯洋人欺辱华人。当时，辛亥革命前的海外华人因为留有长辫，白人常以此侮辱、取笑华人，称长辫为Pigtail（猪尾巴）。华侨身受其辱，只得忍气吞声，因此，大多数华人就将辫子剃短些、藏在帽子里，以免被洋人借故侮辱。

一次，几个人高马大的洋人得意洋洋地在唐人街横冲直撞。这时，他们看到有一梳辫的中国华侨，便上前取笑，将这位华侨的帽子抛向空中，用力紧抓住他的短辫拉来拉去，并大叫着：“pigtail！Pigtail！”还说：“Allchinesearepigs！”（中国人都是猪猡！）这位华侨恐惹不起几个美国流氓，只得忍气陪笑，头皮出血也不敢吱声。司徒美堂这时在唐人街上的“会仙楼”

当厨子，当他从二楼看到此种情景时，勃然大怒，“唿”地一声从楼上径直跳下，飞起一脚将一个洋人踢翻在地。另几个洋人见此情景，忙摆出散打和拳击状，分两路扑向司徒美堂，只见司徒美堂腾空而起，双脚在空中一划同时踢在了两个洋人的脸上。顿时两个洋人脸上血流如注，滚倒在唐人街边。其他两个洋人惊得目瞪口呆，转身就逃。司徒美堂为中国人、为华侨出了气，华人个个喝彩，那位被辱华侨也上前来谢司徒美堂的搭救之恩。

司徒美堂这一出手惊动了唐人街附近一个美国黑社会社团。因为被打的洋人伤势不轻，他们属于这个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回去后立刻将被中国人打的消息告诉给他们的组织。第二天一早，十几个美国流氓气势汹汹地来到“会仙楼”，他们先是叫了十几道上乘的中国菜，要了几瓶中国好酒大吃一顿，然后大打出手，打烂盘碗和柜台，还要动手打“会仙楼”的老板，这些华侨有点怕事，像惊恐的兔子一样缩在墙角。正在这些流氓发狂之际，司徒美堂出现在门外。他手持一刀一棍，左右开弓，使十几个洋人难以接近。在激烈格斗之中，司徒美堂扔掉刀棍，赤手空拳冲上前去，将为首的洋人当腰提起，抛向空中，只见这个洋人的身躯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重重地摔在地上，当即七窍流血重伤致死。后来，警察赶来将司徒提去坐牢，他被判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疏通警方，募款营救，使他10个月就恢复了自由。

司徒美堂其人其事，在华侨中传诵开来，从此声名大振，在洪门中地位直线上升。1894年冬，他感到洪门致公堂组织涣散，就在致公堂内另立“山头”，与阮本万等人一同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视死如归”之徒组成了安良堂。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口号，由小到大，渐渐团结了一帮好打抱不平，敢于亡命的洪门兄弟，这是司徒美堂重振美洲洪门的第一步。

在司徒美堂创建的洪门组织“安良堂”内，供奉春洪门“反清复朗”的“始祖”洪英，还供奉着洪门“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的神牌。香堂里日夜灯火不绝，美国华侨欲加入安良堂，必须亲手在正堂里斩鸡头，破手指敌血酒，长跪在洪门先烈神位之前，发誓不辱祖训，义气团结，义侠锄奸，爱我同胞。由于安良堂组织严密，成员血气方刚，勇于格斗，很快就成

了洪门中的“龙子”，对洪门致公堂的一切事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势力很大，就连国民党对它也无可奈何。被国民政府迫害的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到达美国后受到洪门人士和司徒美堂的庇护，国民政府明知此情也毫无办法。

由于洪门致公堂在司徒美堂的主持下敢作敢为，大胆保护在美华人利益，对美国地方当局也敢“不吃那一套”，洪门成了美国当局的“眼中钉”。为此，他们玩弄“以华制华”的伎俩，千方百计利用美国众多堂口之间的矛盾，挑动互相仇杀，以防止华人抱成一团，由于这些堂口具有一定封建性和“独占山头”的思想，使得他们在美国当局的挑动下相互猜疑，后来发展成大规模的堂斗和仇杀。宗派斗争渐渐代替了兄弟义气，堂与堂之间的恶斗不断闹出一桩桩血腥的命案来。

1913年间在美洲洪门中就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堂斗”。1913年，广东海军将领程璧光来美国访问，这件事在美国洪门中轰动一时。因为程璧光的外甥邓少云也是堂口的人，他是留美学生，有点武功，又有后台，因此在洪门中十分骄狂。他还讨了一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娇艳女人为太太，更是洋洋自得，不可一世。在程璧光访美期间邓少云狗仗人势，为非作歹、十分猖狂。洪门人士中有人对邓看不惯，认为他的所为有辱洪门。一天夜里，当邓少云这个恶少正挽着一个美国女人漫步唐人街之时，忽然有人从后面飞起一斧头，把邓劈成两半，头臂分开，暴尸于唐人街。邓少云属洪门中一堂口，这个堂口的头人虽然对邓的所为有看法，但认为本堂兄弟被杀有伤体面，于是向他们认为是肇事一方的堂口提出挑战，这个堂口也不示弱，双方都游说各堂，加紧布阵，洪门众多堂口都卷进去了，司徒美堂的堂口也不例外。这样，一场惨烈的唐人街堂斗开始了。堂斗之前，美国当局早已得知，但他们不动声色，坐山观虎斗，以实现他们“以华制华”的阴谋。他们还暗中唆使美国流氓来唐人街兜售手枪、左轮枪和手榴弹，以图加剧死亡人数。堂斗开始后，一堂口的人和另一堂口的人手持斧头冲向对方，拚命厮杀。一时间，唐人街喊声、刀斧声响成一片。许多胆小的唐人街店主关上商店的门窗。只听窗外枪声卜卜，斧声呼呼。受伤者四处逃亡，追杀者大声呐喊。一时间，唐人街血流成河，死伤者不计其数，其状惨烈目不忍睹。而美国的警探躲在高楼里目望远镜看着这场少有的恶斗，不断发出舒心的狞笑。回忆起这些往事，晚年的司徒美堂常叹息说：“唉！那时洪门各堂口的人士好像一对给美国佬玩弄的蟋蟀，只要美帝的小竹丝动一动，挑一挑，两只蟋蟀就打得你死我活，而美帝在一边狞笑，真是痛心呵！中国人何时能停止这种窝里斗？我们再不能上他人的当啊！”

辛亥革命期间，由于洪门参加了反清活动，堂斗渐渐少了。同期，旧金山洪门人士召开了“和平会”，各堂相见，开怀畅饮，大家抱头痛哭，言归于好。司徒美堂十分支持各堂的和解，为此，他奔走于各堂之间，消除误会，协调不和，用自己的威望为美洲洪门的团结一致尽了很大的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以洪门大哥的身份组织“华侨筹饷会”，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为国内的抗日运动积极募捐。1941年冬，司徒美堂从美国返回香港，这时的香港已陷于日本之手。日本特务头子矢崎企图胁迫司徒美堂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日军的统治。这时的司徒美堂已75岁。他拒绝了日本方面的要求，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在香港爱国洪门的帮助下安抵重庆。蒋介石又想利用司徒美堂来为自己服务，叫他加入国民党，以“国府委

员”作诱饵，司徒坚决不干。他只答应为蒋在海外进行抗日宣传。直到 1946 年冬、国民党国民大会开幕前夕，蒋介石又叫杜月笙等人前往劝驾。杜月笙用英语威吓司徒先生说：“老蒋的脾气你还不知？他是翻脸不认人的，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吃眼前亏。”司徒美堂听后勃然大怒，结果闹得不欢而散。司徒美堂不愿介入国民党的政治，他是一个有坚强个性“吃软不吃硬”的人，任何威逼反而会引起他的反感。

司徒美堂对洪门的重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曾多次推动洪门的改组和革新，力图使洪门一直保持它早期的革命传统，防止它蜕变为普通的帮会组织。为此，1946 年 7 月，他曾在上海发起召开了著名的全球洪门恳亲大会。虽然这次大会收效甚微，但司徒美堂力图重振洪门的努力引人注目。当然，这次大会还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如洪门恳亲大会的开幕式挂有“义气待兄弟，忠心报国家”的对联。场内正中高悬象征仁、义、礼、智、信的洪门旗帜。但这次会议仍不失为洪门历史上的一次表面振兴。因为恳亲大会代表的名单中，有美国的洪门头人吕超然，加拿大的志如，檀香山的张鹏一，澳大利亚的赵文藻，印度的周可劲，非洲的麦群玉以及国内各大区的代表，因此这次会议象征了中国洪门的广泛影响。洪门恳亲大会还成立了“中国洪门民治党”。会议大大影响了美洲的洪门组织，有的洪门侨报还发表社论以示庆贺。洪门不仅影响五洲，并且改组立党，这在中国帮会史上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后来，由于该党介入国民党的政治，司徒美堂声明脱离该党。

司徒美堂先生早年致力于支持辛亥革命，他一生为了洪门的团结而奔走，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7 年后，他渐渐开始对国民党失望，以为中共是未来中国中兴的新生力量。1948 年，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同年 8 月 12 日，司徒美堂在香港用美洲洪门致公堂元老的身份公开发言。他说：“国内形势大变化，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已经了然。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私，必须给人民以自由。”此后，他准备返美参加美洲洪门恳亲大会。返美前夕，中共代表为他饯行。酒席上，司徒情绪很高，他即兴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0 月 30 日，他的声明在香港各报发表。他言：“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美堂于 1946 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只因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仇寇。今中共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烈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将洪门忠义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

司徒美堂回美后又声明；美洲洪门当务之急有三件事。第一，促进中国洪门之团结。第二，洪人必须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第三，支持祖国建设。洪人须以远大之眼光，准备贤能，挑选人才，领导我美洲洪人回国参加祖国之建设。司徒美堂这些声明和言论对于解放前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国民党在洪门中的活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人民政协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选为美洲华侨代表，即将返回祖国。消息传来，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逃到美国的孔祥熙特意来劝司徒美堂先生，请他赴宴，席上劝他说：“老先生，千万不要受人利用，你年事已高，在美国享清福不好，何必要跑来跑去。”司徒严肃地对他讲：“我未受任何人利

用，我回去是出于爱国之心！”他们的谈话不欢而散。事后，司徒老人恐夜长梦多，于8月9日乘飞机离开美国转道香港回到了北京。

从1949年9月到1955年5月，司徒美堂这位洪门老人一直生活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的一座幽静的四合院里。他虽然年事已高，却老当益壮，不仅参与人民政府的工作，而且怀着深深的爱国之情去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司徒美堂这个传奇人物一生的活动在洪门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 6. 洪门大观 1. 洪门祖先：

始祖：洪英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洪门前五祖：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洪门中五祖：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林大江、杨杖佑。洪门后五祖：吴天成、李式地、洪太岁、姚必达、林永超。洪门威宗：天佑洪 2. 洪门的演变及支流：汉留、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小刀会、红花会、哥老会、义和团等。

#### 3. 洪门势力影响范围：

五湖：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江苏太湖，浙江西湖，安徽巢湖。

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九江：钱塘江、长江、楚江、湘江、荆江、汉江、珠江、吴江、松江。

八河：乌江河、大渡河、渭河、黄河、西港河、青溪河、武陵河、琉球河。

十八省：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

#### 4. 洪门的义气：

洪帮最重义气，有事彼此帮助，十分讲究“哥们义气”。比如：一群洪帮的人去庙里看戏，其中一个洪门中人被人殴打，这个人只要举起手来做一个暗号，所有在场的洪帮成员都会一拥而上，大打出手，绝不让自家兄弟吃亏。这个暗号叫“三把半香”，洪门中恐怕无人不知。这个暗号是，将大指与食指靠拢，做成一个圈子，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三个指头伸直，在空中摇晃一下，帮会其他人一看就知道是自家兄弟，虽然不相识也一定会跑过来帮忙。这个手势的意义是：圈圈就是指圈子里面的人，是自家兄弟。那三个伸直的指头是指“桃园三结义”，要像刘备、关羽、张飞那样讲义气。重义轻利，看轻钱财也是洪门帮会里的一种义气。谁有钱就拿出来用，兄弟共享。如一个帮会的成员到另一个地方去后，身上没有了钱，这时，他不必着急，因为：“四海之内有洪门。”他只要在街上走路时，将手做暗号，在头上、脸上抓两下，洪帮中的成员只要一看见就会走过来“对实”，即查问明白，是否真无钱用了。并且由这个人引到当地的大哥那里去见面，一经证实确实无钱，不需半天，这个地方的其他洪帮成员都知道本地来了一个新的洪门兄弟，大家自然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加以帮助，而且他的吃住还由当地洪门中的专人招待，走时还要送他以适当的路费。

#### 5. 洪门的礼节：

这要从“三请教”说起：两个不相识的洪门成员在见面后要证实是不是自家兄弟，第一个人先说一句“请教”，那人回答：“转请教”，又回一句“再请教”，这才回答各自姓名，开始深谈。这在洪门里叫做“三请教”。对大哥行礼时，左手做成暗号，右手做成拳头直伸向前。大哥的答礼，只用左手或右手做成暗号，放在胸左或胸右。

#### 6. 洪门的等级：

洪帮里的等级由本地的洪门主持人即大哥决定。凡是武功好，办事可靠，

对待同帮兄弟义气热忱的，可按其成绩提升，而且等级要逐步上升，不能一步登天和越级提升。这是洪门威宗天佑洪制定的帮规。他在错用了田坚、符达之后强调新入洪门的任何人都要从老么做起，一步步提升。本地区帮里最高的一级叫龙头。升到了龙头就可以开山头、收徒弟了。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可以同时开两个山头，开过两个山头的叫双龙头。凡是开过山头的，也可叫内八堂先生，普通在帮的都是外八堂兄弟。

#### 7. 帮会成员的来源：

参加洪帮的人各种行业的都有。各种商店和茶酒馆的老板、伙计，小学教员、农夫、屠夫、刻字的匠人、打铁的、做铜匠的、做漆匠的，水手、脚夫、船户，衙门里的三班六房，无业游民，出家和尚，道人等等。总之，洪帮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正所谓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各种人物都有。

#### 8. 洪门纪律：

洪门纪律是十分严酷的。但后来各山堂的兄弟不管犯了什么规章制度，都没有开除的制度。因为洪门是一个秘密组织，龙头怕开除手下后会泄露内部秘密。洪门对于违反纪律的兄弟处理的方式最常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轻刑——“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第二种是死刑——“自绑自杀”。

在帮的人如果犯了错误，由大哥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理。如果犯的错误较轻，仅仅是违犯了洪门纪律，就不必受死，但是要受三刀六眼之苦。那就是自己动手，用锋利的刀子在自己的大腿上戳三刀，再戳六个眼。这便是洪门中的“好汉犯法，自办自杀”。可在用刀子向自己的大腿上戳三刀六眼的时候，一是要当众戳，二是绝对不准叫出声和喊痛。如果在自戳时不作声的，旁边的洪门兄弟认为你是好汉，会同情你，替你在大哥那里说情。还会用准备好的刀伤药来替你包扎。如果在用刀戳自己腿时怕痛，甚至喊“哎哟”的，大家都不会同情你，更不认为你是好汉，没有人来替你包伤口。一个人在洪门是否被认为是好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认为你是好汉，即使犯了错误，以后同样有提升的机会。如果你被认为不是好汉，问题就大了。比如说，一个人在用刀戳自己时，大喊“哎哟”，旁边的兄弟一下子会反感起来，认为他不是好汉，这样，大哥一声令下，几位兄弟就会过来把他弄到荒僻的地方，结果了他的性命，或用绳子勒死于荒野。

严重违犯帮规的要受死刑——“自绑自杀”。下面是引自《帮会奇观》一书中的例子。1904年，黄兴、彭希明、陈少芝、曹亚伯等为在长江准备起义，公推万武与刘道一这两位洪门大爷前往湘潭策动哥老会会首马富益共图大业。马富益有个叫马龙标的结义兄弟，少年英俊，精明能干。因为他生得十分英俊漂亮，在开会议事时与一个洪门兄弟的妻子勾搭上了。按照洪门纪律，对于穿红鞋即和会中弟兄妻子通奸是要诛杀的。事情败露后，马富益很生气，可还是忍痛割爱地把马龙标交给了刑堂提讯。审问明白后，判了死刑。到了执刑那一天，马龙标当面托马富益日后照顾他的母亲，然后慷慨自赴刑场。那天晚上，夜雨霏霏，洪门中送马龙标去刑场的有六七个兄弟。一路上，马富益依依不舍地对他说：“我的好兄弟，我们兄弟你恩我义有许多年了，可你不该生得太体面了，这送了你的性命呵！”马龙标说：“大哥，谢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我死后老母亲就麻烦你多费心了。”这时天空中的雨一下子大起来，忽闻马龙标用极悲惨的声调叫了一声：“大哥，地下滑得很，前面又有一条小水沟，你留心一点啊！”大家听了都不觉泪下，尤其是马福



益忍不住泪流满面，叫了一声：“兄弟，谢谢你，祝你十八年后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说话之间大家已经到了刑场，原来所谓刑场只是一片荒野，前无去路，只有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江。这时只听马龙标高叫一声：“各位洪门兄弟们，一齐少陪！”说完只听得“呼”的一声，人已不见了，只见夜色中一江水波向东流去。这便是洪门历史上“自绑自杀”的一段真实纪录。

除了上面这两种惩罚办法外，洪门还有严格的二十一则、十禁和十刑。洪门的二十一则主要有：第一则，犯罪波及其他洪门成员者，捕之处以死刑，轻者割其双耳。第二则，奸淫兄弟妻室，或与兄弟子女私通者，处死刑，决不宽恕。第三则，诱拐兄弟至国外者，割其双耳。第四则，因图悬赏出卖兄弟者，处以死刑。第五则，称香主，篡取权力者，处以死刑。第六则，示外人以仪式书及会员证者，割其双耳，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七则，新会员有越轨行为者，割其一只。第八则，泄露洪门机密者，割其双耳。第九则，恶言攻击父母者，割其双耳。第十则，以强欺弱者割其双耳。第十一则，破坏香主之名者割其双耳。第十二则，在兄弟起义之时胆小不参加者割其双耳……等等。洪门的十禁主要有：一禁，兄弟之妻室必须端正，兄弟本人不得好色。凡妻室不务正业者，割其双耳。兄弟贪色处以死刑。二禁，兄弟之父母死后，无力埋葬告于有钱的其他兄弟，无论何人不能拒绝，否则割其双耳。三禁，兄弟诉说穷于有钱者，不能拒绝。有侮辱者或拒绝者，割其双耳。四禁，兄弟至赌场，不可故意使他输财和设法骗取之，否则鞭打一百八十下。五禁，兄弟在自己这里寄存钱财后不可私用之，否则割其双耳。六禁，自入洪门后贫富不分，有恃强凌弱者割其双耳……等等。洪门的十刑有：第一刑，凡不孝敬父母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二刑，泄露要紧事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三刑，无事生非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四刑，愚弄兄弟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五刑，利用外人侮辱兄弟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六刑，经营兄弟钱财而私用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七刑，酒后闹事者鞭打七十二下。第八刑，隐藏兄弟寄托之钱财者鞭打二百下。第九刑，违反兄弟之情，与其争斗者鞭打七十二下。第十刑，为欺人而赌博者，鞭打七十二下。

#### 9. 洪门誓词：

自入洪门之后，兄弟之父母即是我父母。兄弟之姐妹乃是我姐妹。兄弟之妻乃是我嫂。兄弟之子侄乃是我子侄，如有不念此情者，五雷诛杀。若有兄弟父母百年归寿，无银埋葬通知于我，必要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否则五雷诛杀。若有外地兄弟上门，不论士农工商，江湖九流，必要留其一宿两餐。如有不念此情者，把兄弟当外人相看者，死在万刀之下。洪门之事，父不能传子，子不能传父，兄不得传弟，弟不得传兄，否则死在万刀之下。凡洪家兄弟，不得做线人出卖他人，若有旧恨，当众决断，不得永恨在心，否则五雷诛杀。兄弟患难之时必要相帮，若有不念此情者，死于万刀之下。谋害堂主，行刺兄弟者，死于万刀之下。奸淫兄弟妻女者，五雷诛杀。兄弟寄妻托子或有要事相托，做不到者，五雷诛杀。兄弟钱财物件，有借有还，不念情义者五雷诛杀。有抢兄弟财物者，火速送归，如有欺心不送者，死于万刀之下。若有乱供兄弟，不讲结义之情者，死于万刀之下。兄弟被官捉去或因事外出日久，不得回家，留下妻室儿女无人依靠，必要留心帮助，使之长大成人，若有不帮者，五雷诛杀。各省及外洋兄弟有官追杀，要及时通知他火速逃走，知情不报，怀有异心者，死于万刀之下。不得捏造是非，增言减话，离间兄弟，有犯者，死于万刀之下。有兄弟因事致富不得眼红，有妒嫉图谋

分利者，五雷诛杀。若有恃众欺人者，天地难容，死于万刀之下。……士农工商，各执一艺，自入洪门，必要以忠心义气为先，交结各省洪家兄弟，如同手足之情，不得妄分你我。遇有兄弟起义，务必支持军火粮草，同心协力，消灭满清恢复明室，以报五祖火烧之仇，以表结义兄弟之情，若有二心不尽力者死于万刀之下。

齐声念：立誓传来有奸忠，四海兄弟一般同。

忠心义气公侯位，

奸臣反骨刀下终。

10. 洪门对白例句：

初次结交：我兄弟来得鲁莽，望大哥抬一膀，我闻哥哥有仁有义，侠肝义胆交英雄，栽下桃李树，结下万年红。兄弟请安不到，拜会不周，还望大哥多包涵。

听者回：好说好说，不知你仁兄驾到，接驾来迟莫见怪，你兄弟交结胜过瓦岗寨，交结胜过及时雨。老贤才，满园花开迎哥来，早知你哥哥驾到，自当三十里铺毡，四十里结彩，五里排茶亭，十里摆香案，早早迎接哥哥才是安排。或说：好说好说，不知贤弟旱路边来，水路边来。听者可问：旱路多少湾，水路多少滩？来者回：雾气腾腾不见湾，大水茫茫不见滩。听者问：有何为证？回：大哥赐我一首诗，牢牢稳稳记心间。又问：何诗？回道：八月中秋桂花开，远路来会众英才，曾记兄弟三结义，桃花盛开恩义在。又问：得罪，得罪，三天不问名，四天不问姓，敢问兄弟高姓大名？回答姓名后又问：你哥哥金山银山哪座名山？金堂银堂哪座名堂？还望哥哥指教愚弟。回答……

又可以说：久闻哥哥大名不见大贵人，今日一见果不凡，大哥远站峨眉山，望得见汉川，高山打鼓名声大，金盆栽花是名家。兄弟久居山野事不晓，五岳三山未走到，还望哥哥指教。回答：贤弟来临，万事好说，西风东风难比我贤弟的威风，砍柴遇到沉香木，挑水见到东海王。或说：哪里，哪里，你哥哥上走河南河北，下走广东广西，飘五湖，游四海，过九江，走八河，兄弟走的路哪有你哥过的桥多，请讲请讲。

送钱时说：

东方一朵祥云开，西边一朵紫云飘。祥云开，紫云飘，恩兄令我送宝来。桃园遇友共享用、金银满库用不了。用不了，吃不了，众家兄弟来花宝，义气胜过秦叔宝，关公夸咱义气高。

出山访友：

日出东方万丈红，关公挥马下山东，五湖四海访仁兄，文王渭水访大公，张良背剑访英雄。刘备关张访卧龙，天下英雄访英雄。今日幸遇众仁兄，义兄之恩比天高。兄弟初来乍到，山门不清，海涵海涵。兄弟见面，你老哥不看芙蓉看牡丹，不看恩义看愚弟，不看僧面看佛面。

赠人哥：

久闻大哥威震江湖，义气万千，今日得见，果然仁义双全。真是三山豪侠，四海能人。大哥久走江湖长在外，三教九流皆知晓，五阴六阳分得清，猛虎蛟龙初出洞，英雄义气胜桃园。你大哥有义有仁，我兄弟不知不识，结交不到，望大哥指点。

见山主：

我兄弟久闻大名，如雷灌耳。你先生主持山寨，五岳皆知，开金山，立

银堂，龙目观看天下事，义气光照四海人。三山五岳海内海外能人无不投奔堂前，闻经听法。烦望老先生开我茅塞，不弃菲才。

祭山旗：

红旗高展进香堂，威风凛凛四海飘。众家兄弟到此来，今日龙山把会开。大哥命我把旗祭，红旗高照忠义堂。洪门五祖把名扬，九州英豪入香堂。跪在圣前烧好香，风卷红旗过大江。

赠二爷：久闻老二哥明月高照，义气万千，胜过当年关圣人。你哥哥五伦八德、三纲五常，有天才，有地才，是全才。你二哥桃园拜结刘张兄、威振中华染宝刀。收尽了海内英雄，众愚弟保二哥梁山一统。取义兵、斩清妖，千秋大功万古颂。今愚弟过门不清，交结不到，礼义不全，少读圣书，望哥哥海涵。

## 二、青帮奇闻

### 1. 罗祖师妙算兴青门

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帮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帮会组织。从清末开始，它几经变故，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到本世纪20年代达到它的鼎盛时期。20年代，活跃在政治舞上的各党各派，以及发生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与青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说起青帮的起源，有多种传说，且其间往往相互矛盾，漏洞百出，皆因帮会成员口头相传，缺乏原始真实记录所致。因帮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隐秘之中，最多是半公开活动状态，外界很难知晓其内幕。帮中成员又普遍不擅文字，只有少数能写几笔的帮中成员根据从不同渠道得来的传说和记录，编了不少各有特色的“秘笈”。通过这类东西再加上清廷史录，我们可粗知青帮历史的大致起源。

青帮之产生晚于洪门和白莲教，因此关于青帮的历史传说经常与后两者搅在一起。中国历史上的帮会，甚至一些农民起义，都喜欢给自己找些古代圣人作始祖，祖师越多越出名越好，以证明自己是源出正路，而非左道旁门。青帮史集甚至把自己的渊源追到当年一苇渡江、嵩山面壁九年的僧人达摩那里。经过禅宗五祖神光、僧璨、道信、弘忍、慧能而到金碧峰，这才正式和青帮接上了头。

青帮有所谓的“前三祖”和“后三祖”之说。前三祖打头的就是金祖，即金碧峰（名幼孜），他祖居南京（那时叫应天府），系麒麟门外金家村人氏。生于元末，是明朝初年进士，明成祖永乐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因见世之无道，官场险恶，辞官隐居栖霞山紫云洞，参悟佛法，深有所得，后又去五台山拜禅宗临济派三十六传鹅头禅师，取法号“清源”，最后死于五台山紫霞洞。

前三祖的第二位是罗清，号静清，甘肃兰州人。此人传人最多，也最有神秘色彩。他道法不凡，妙算玄机，是进士出身。嘉靖年间，把持朝政的是奸人严嵩，要想做官非有厚礼送他不可。一时朝纲败坏，有血气的正直之士不愿与之伍，为避奸臣陷害纷纷自谋出路。这罗祖当年曾官至监察御史户部侍郎。因其不但读得书本，也能舞枪弄棒，曾以都督职务领兵征讨吐鲁番。一次曾陷于绝境，被番兵围困在两狼山下，粮尽三日。忽有一和尚来告，寺后石崖下有清源禅师在明成祖北征辽东时所储存的粮草，结果发现果如其言。全军饱餐后重振声威，大败番兵，番主臣服。罗清班师回朝途经五台山，访金碧峰之遗迹，承其衣钵。然后由恨修引到金祖舍利塔下跪拜，成为金碧峰徒弟。后来这种在师父死后拜师的做法被称为“灵前孝祖”，青帮徒辈多有仿效。灵前孝祖是有要求的，一是拜的师父要有名气，二是进行灵前孝祖的徒弟要有势力有名气，三是要经过青帮辈份较高的首领一致赞同。话说罗祖拜师后，仍去作官，为政清廉，谨慎小心，可后来仍未逃过严嵩父子之手，入狱十二年。只因万历年间边关吃紧，方才复出，并再立战功。但他已看破红尘，不愿受禄，径去栖霞山紫云洞他师父修炼过的地方隐修，了此残生。

前三祖第三位是陆逵，号道元，江苏镇江丹徒人。精于武艺，曾出任江右总兵，明亡后隐居茅山。因慕罗祖师功德，并认准罗祖承接禅宗正传，故往五台山求道，拜罗祖为师，然后四海云游。他曾到新疆、甘肃回民地区，针对回汉宗教纠纷，屡起事端，即向朝廷提出感化之策，为康熙帝赞许，授

以西北宣化法师名号。他赴任西北，订“回汉约法”，规定民族之间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康熙因其功绩，曾许之以官，他因不恋尘世，乞归佛门。后被封为“靖国尊人”，其师罗清被封为“一清佛祖”。晚年陆逵在杭州武林门外宝华山讲经说法，听者甚众……青帮前三祖可说均为佛门中人，这使青帮后来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青帮后三祖的说法较复杂，但人物不外是翁岩、钱坚、潘清三位，说到三人事迹有些出入。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从张岳这个人开始。张岳是淮安人，生于清康熙年间。他自小臂力过人，武艺不凡，生得又有些气派，青年时颇有进取之志。雍正初年他随年羹尧大将军平定青海，因功升为千总，但终为一介武夫，官场混得不行，不得发达。解甲归田后，以教授拳棒为业，手下有徒弟五百多人，在当地很有势力，且人又豪爽义气，深得信任。乾隆十二年间，他的拜把兄弟林锦开设的盐局被一恶霸何义抢去。这何义也算得是当地一个蒋门神、郑屠户一类人物，决不是等闲之辈。林锦斗他不过，遂求张岳为他出气。张岳闻言大怒，心想：一个无赖抢地盘竟抢到我兄弟头上，我张岳还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张岳虽武勇，毕竟官场混了多年，有些头脑。他先请林锦告知详情，知何义是本县捕快泥身金刚李得的结拜兄弟，而李得是新任孙知县的亲信，想此事私下和平了结最妥。遂一人会李得，请李劝何义还了盐局。李得说，他当初不知林锦与张将军的关系。只因何义初来此地，求他帮忙占据林锦的盐局，就答应了。现在已到县衙备案，许何义开业，主米煮熟饭，要变过来实无办法。张岳起身道：“我们一起去劝他。”就约了李得一起来到盐局门口。见里面一帮人正在大呼小叫地喝酒，张岳与李得找到何义，由李得介绍了张岳。张岳见何义是个粗汉，不用拐弯抹角，马上开言道：“林锦是我兄弟，他的盐局现在你占了，他当然不情愿，但你已经占了，要你让出来也不好办。我出个主意，我和李得担保，帮你在镇上选个好位置再开一所，各自营业，互不相扰，不知尊意如何。”

何义不晓得张岳厉害，加之又喝了点酒，根本没把张岳这个老头放在眼里，二话没说，就要叫手下把张岳赶出盐局。张岳忍无可忍，只两拳便送何义上了西天。张岳原准备为双方说和，这回一时性起，打死了人，就准备好汉做事好汉当，去县里自首，可又被他的高徒翁岩当即劝住。翁岩说：“本县如此昏官，为了此事吃官司万不可行，不如找个地方避一下。”说话间官军已来到门外，别无出路，张岳带领林锦和翁岩，依仗一身武艺，趁夜杀出，逃到徐州绿林人物陈园那里。

陈园生得与宋江一般，黑矮肥胖，是个讲义气有胆识的黑道人物，平时聚众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现见来了诸位英雄，十分欢喜，马上请各位英雄作了头领。张岳本是个天地会头领，他的徒儿翁岩当然也是他的部下。来到陈园这里后，张很快又结纳了天地会的人物钱坚。几位头领商议要联合天地会，作番事业。一次翁岩与钱坚二人负命下山，在安徽安庆巧遇另一天地会道友潘清。三人一见，意气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即结下金兰之契。

有一天，三人正在闲谈，仆人跑进来急报：“有个和尚不待通报，直闯进来。？”三人来到中堂，只见一僧相貌古怪，形态龙钟，一见三人，便双手合十为礼道：“恭喜三位，尔等大富大贵的机会到了。”三人莫名其妙，请和尚上坐，这才问来者何人。一听老和尚是大名远扬的罗清佛祖，便一起跪拜，请高僧指点迷津。祖师说：“当今皇上悬挂黄榜，征求天下奇才押运粮米。若能肃清运河匪患，保证粮船安全进京，便有重赏。你们与白水村陈园

那里的好汉多有关系，若去揭了黄榜，招安了白水村大寨，其余小盗自然不在话下。”三人还未反应过来，罗祖又说：“你们所为之事，贫僧尽知。我知过去未来，依吾言去揭黄榜，定是富贵双全。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三人崇拜罗祖，不敢不信其言。遂拜罗祖为师，遵师命去揭黄榜。自此开始有了真正的青帮历史。

青帮后三祖如何揭黄榜，还有另一种说法。还是翁、钱、潘等三人。这翁岩字福亭，江苏常熟人。秀才出身，后弃文习武，在嵩山少林寺拜师学艺，为一豪侠之士。钱坚字福斋，江苏武进人，幼时从父经商，后改习拳术，为人精明，武艺高强。潘清字清字，号德林，浙江杭州人。承继父母遗产，颇有家资。幼年读书习武，吟诗作画，无有不能，是一个文武全才，且喜交天下好汉，地方上称为“小孟尝”。传说有一天，罗祖在打坐，忽然有异样感觉，掐指一算，断定浙江方向尚有一段未了佛缘。便与陆祖腾云驾雾到杭州良山门外一桥边落地，在那里住下，施展佛法为人治病，普渡众生。时翁岩与钱坚已是至交，形影不离。一日两人正游青龙山，忽见山下有一茅棚边人来人往，热闹非常。两人心下大异，入内一看。只见罗陆两位祖师仙风道骨，为人看病，手到病除。翁岩五体投地。罗祖知佛缘已到，召二人入内宣讲佛法。翁深为所感，跪求拜师出家。罗祖指陆祖收徒。钱坚开始不愿出家，后见到缘份如此，不能不遵天意，也拜师陆祖。四人一起又到嘉兴，收潘清为二徒弟。三人均不剃度，带发修行，随罗陆二祖去五台山参佛。一日，二祖召三人到洞中，说道：“你们还有一段尘缘未了。现朝廷正张榜招贤，护漕粮入京。你三兄弟可当此大任，从速下山揭榜。”言毕，一阵清风，二祖已无影无踪。三人只好遵师命下山揭榜。

漕运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制度，即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一部分田赋，经运河运到北京，供统治者和军队所需。青帮后三祖应招护粮后，沿运粮河道的大码头，建立起完整的组织。漕运之量巨大，清代每年所运之粮超过四百万石。从事这个行业的有几十万水手和上万艘粮船。朝廷为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特设立一个“漕运总督”。他是一个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角色。带的兵叫“漕标”，也称“卫军”。然后卫下设所，所下有联，联下是帮。一般是卫帮合在一起叫，如“江安卫五十二帮”；或径称帮名，如“光武六帮”等等。但这一套统治组织欺下瞒上，压榨船民，使下层水手生活濒于绝境。因此，秘密结社，保证生存是当时最可行的选择。这种结社还是利用官方旧有的粮帮结构，故一切名称不变。其中势力大，且对青帮日后发展最有影响者是所谓“安庆帮”，青帮历史的早期传说多与此帮有关。这青帮后三祖揭榜护粮后，一时间匪盗不兴，风平浪静，直到乾隆年间，其所运漕粮，从未误过钦限。漕督奏明皇上，准其开帮收徒，直受漕督节制。

翁、钱、潘三人首先联络旧有粮帮组织，组成一个“道友会”。供奉达摩为始祖，金幼孜为第一代祖师，罗清为第二代祖师，陆逵为第三代祖师。翁岩等三人又请教陆祖扩大帮众之事，陆祖以祖传二十四字的字派相授。此二十四字就是：“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这里面“清静道”三家已为清源、静清和道元三位祖师所用，正好三辈。真正的帮会用字是从“德”字开始。后来帮中人所称的小祖师王德降，怕徒众日多，二十四字不够用，又续订二十四字，即“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明乾坤”。实际上，解放前的上海青帮，主要是“大通悟学”四辈，青帮依此形成严密的纵向承启关系。

一切就绪，翁岩、钱坚和潘安三位决定正式立帮，定名为江淮四帮，奉罗清为祖师爷。翁、钱、潘各立一帮，将来看情况再立一帮。当下三人定了三堂、六部，并宣布了二十四字辈。钱坚对着众人把它们解释了一番：“什么叫作三堂？就是我与潘、翁三人每人兴立一堂。若拜潘清为师，就用潘清堂票布作为入帮之证；拜翁岩为师，就用翁岩堂票布；拜我为师，就用钱坚堂票布。那六部职司也有区别。引见部专司接待帮外之人；传道部是劝导人家入帮，掌布部专管票布；用印部专司打印；司礼部执掌一切入帮典礼；监察部查究同帮兄弟有无不法的事情。那二十四字辈就相当于家谱辈份，代代相承，不能乱了顺序。”钱坚说完，陈园便在大厅上点起两支大红蜡烛，中间放了三把交椅，请翁、钱、潘三人坐了，叩了三个头，陈园于是做了江淮四帮的开山徒弟，当下，三人又各自收了几名徒弟。张岳、林锦因为资格老，没有拜人为师，做了军师。不久，陈园禀明三位师傅，也开始收徒。以后帮会发展日见强大，潘就建议趁陈园收徒之时订立帮规，以便管理，众头领都表示赞成。

到了那一天，罗祖神像前点起抱头香五支。潘清吩咐林锦做引见师，引进五个小喽罗，先向罗祖像叩了三个头，又向三位大头领各叩三个头，然后向自己师傅陈园叩三个头。完了之后，引见师林锦指挥各徒弟，一律向里直立。要每人手执一支香。潘清又请张岳做司礼。张岳随即参赞，喝一声“跪”，那五个新徒弟急忙跪在庙檐下，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执着烟香，不敢稍有声息，一会儿，又有执事人手捧一盆清水出来，自左而右，叫各徒弟各呷了一口，一一漱口，这叫净口。净口完了之后，陈园忽地站了起来，对五个徒弟问道：“你们今天入帮，是有人教你们，还是有人逼你们，还是自己情愿？入帮并没有好处，不但要遵守十大帮规，还要严于律己，你们一定要知道，做到！”那五个徒弟齐声回答说：“我们入帮是出于自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决不违背祖训。”话音刚落，张岳便高声读出了十条帮规：一不欺师灭祖，二不扰乱帮规，三不藐视前人，四不江湖乱道，五不扒灰放笼，六不引水带线，七不奸盗邪淫，八须有福同享，九须有难同当，十须仁义礼智信。张岳读完后，陈园又对徒弟们说：“入帮之后，若有违反帮规，定当家法处置，绝不饶恕。”五个徒弟又齐声答应：“徒弟牢记。”说罢，张岳将十大帮规和票布发给他们。

后来，江淮四帮又与活跃于皖东的一个道友会及活跃于浙北的嘉海卫帮合流，势力更大了，潘清提议将三帮结合起来，成立一总帮，定名为青帮（也叫清帮）。潘清很会笼络人，无论上中下三等，他都乐于结交。不出数年，他的徒弟便遍布长城以南各地。后来，翁岩、钱坚去青海、蒙古等地朝佛，去而不返，帮务实际上由潘清一人主持。因此，青帮的徒子徒孙大多持“潘清堂”票布。雍正十三年，潘清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帮务由祖师王德降接管。

又过了几十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青帮发生巨变。当起义发展到东南地区时，受战争影响，漕运停止。战后虽有短暂恢复，又因洋务运动兴起，运粮改走海道，漕运很快终结。青帮水手出身者居多，一下没了饭碗，纷纷另寻出路。苏北等地青帮，因靠近海盐产地，多以贩私盐为生，其头领成为盐枭。

青帮历史传说的另一种，涉及洪门，在此也简略一提。红（洪）帮据说历史更早于青帮，它以“反清扶汉”为其宗旨。而青帮护粮是在为清廷做事。两者应为敌人才合常理。早年洪门也确实仇视青帮，痛斥其为“投靠满清”。

但青帮后期那些写历史的特别宣传青帮原为反清组织的“真相”，此说虽难有实据可考，但也不能说都是胡说八道。

青帮标榜它的反清宗旨，是以“内应”一说做文章。即将其“安清”口号和替清廷做事说成是“打入敌人内部”，以为将来举事做准备。此一说要追溯到天佑洪这个人。相传康熙五十

二年，洪门后五祖相继去世。此时洪门领导人叫苏洪光，传说他曾死而复生，托名与崇祯皇帝一起吊死的王承恩，受神灵之佑，再生转世，名唤天佑洪。天佑洪领导洪门已成大势引起满朝震惊，故全力镇压，洪门活动开始困难，天佑洪想出两招要使洪门摆脱困境，一是给洪门改名为天地会、三合会等等，二是派一部分兄弟假装投靠清廷、作为内应，发展会众，这一部分负有特殊使命的洪门兄弟成了一个单独的组织——清门。

而青帮后三祖的三个人都是奉了天佑洪的密令，假意投靠清廷的。这就又接上了前面此三人揭黄榜那一茬。故帮会中人有“红花”（洪门）、“白藕”（理门）、“青荷叶”（青帮）之说，是谓三教源出一体。

## 2. 盐梟巨头徐宝山

徐宝山是清末民初两淮及长江流域著名的青帮首领和盐

梟头目。上海青帮的兴起，同此人有着非同小可的关系。在民国初期，上海的青帮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李徵武领导的湖州帮，一个是徐宝山为首的江北帮。从时间的先后看，最早进入上海经营地盘的是湖州帮，因清末漕运停止后，江北粮帮原在海盐产地，尚有盐业可作，江南粮帮无此便利只好进军当时正进入繁荣期的上海，以求生存。只是由于清末民初时运不

佳，迭遭败绩，才被江北帮后来居上，不得不作了二流角色。实际上，上海青帮全盛时最有势力的队伍基本上都与江北徐宝山系统有渊源关系。

徐宝山是丹徒南门人，生于1866年，其父是一个竹店的老板。徐宝山少年时曾在其父所开的竹店里做生意。15岁时父亲病逝，宝山与母亲及弟弟宝珍一起度日。徐宝山生性放荡，既不愿经商，更不思务农，无人管束后愈是无所顾忌，常游食四方，结交各路豪杰。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精于剑术，更擅枪法，双手发枪，百发百中，能够在黑暗中击灭香火。因此，年纪轻轻已在镇江、扬州一带帮会、盐梟中以豪侠闻名，大家都知道他为了“朋友”，不怕得罪官府，不怕触犯法律。可以“两肋插刀”，绰号“徐老虎”。

徐宝山一出道不久，偶遇京口（今镇江市）驻防旗兵拦路奸污妇女，徐路见不平，拔刀除害。1893年，徐宝山又同顾某等联手抢劫江都县东乡仙女庙。案发后，徐潜回镇江，躲到宝盖山下，被丹徒县主簿张焕文发现擒获。后被县衙惩办，发配甘肃充军。在押解途经山东时，徐宝山瞅准机会，趁夜盗得驿站中骏马逃脱。回来后，藏匿在私盐贩子陶龙雨家中。那时的徐宝山远不像后来那样神气，整日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吃住无着。有时实在无法就睡在土地庙、麦田或芦苇丛中，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躺在棺材里与死人作伴。为防止官府掌握他的行踪，他想出一个很实用的办法，就是在每次睡觉前，都点着一根香缚在手上，待其烧到手指，爬起来就走。如此折腾，总算没被抓住。熬了几年，最后投奔了盐梟头目孙七。

徐宝山自从投了孙七，慢慢恢复了元气。整日价又想着做点大事；至少也能为孙七的山头立个大功，一来是个进山之礼，二来也显示一下“徐老虎”的本领。当时与孙七为敌的还有另一伙梟匪，以柏某为首领，势力很大，孙



七自觉不敌，常避让之。徐宝山觉得就从柏某这里下手最为合适。因此，早已在等待时机。恰巧，这一日，徐宝山在路上与柏某的两个儿子相遇，见这两个恶棍正在掳掠妇女，怒不可遏，上去教训柏某二子，打斗中，柏匪 300 余人闻讯赶来将徐宝山围住。正在危难之时，孙七率众赶到。已感不支准备败走的徐宝山，陡然胆力倍增、再抖精神返身杀入敌阵，力劈柏氏二子。经此一战，“徐老虎”重新又成为江湖中声名远播的人物。各地闻其声名者纷纷来投，徐宝山开始有了培植自己势力的资本。最后，他干脆脱离孙七，另树一帜，以武力抢了匪首朱福胜的地盘，占据十二圩和七濠口一带，初步有了自己的队伍和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由此起家。

徐在自己的队伍逐渐壮大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心满意足。与普通小匪不同的是，徐宝山是一个深谋远虑、野心很大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叫有战略眼光。使他始终忧心忡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周围的大小盐枭头目对这个暴发户颇为猜忌和敌视，大家都感到他的威胁，这种感觉的可怕之处在于四邻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他，叫他徐宝山对所有敌人同时开战，那真是吉凶难卜；二是徐宝山的势力已在当地首屈一指，所谓树大招风，官府一旦派兵来剿，胜负也难预料。徐宝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出要与官军和众匪抗衡并要得到不断发展，不能简单地招兵买马，兵要招好兵，马要找骏马。他深知自己部下全是一勇之夫，只见眼前小利，并无大志。且自己的手下，组织松散，更非大队官军敌手。他们农忙时回家种田，农闲时结伙贩盐。一旦官兵大队来袭，便四散回家，官兵去后，则又啸聚如故，对官府而言，此是匪患难除。但对徐宝山的“宏伟目标”来说，则实在是个不利因素。因此，他与谋士们反复商讨，权衡利弊，深觉只有联络当时势力强大的洪门，才能利用洪门组织搞起一支层次更高的武装。

徐宝山本来应算是正宗的青帮首领，属于比“大”字辈高一辈的“礼”字辈。他听说泰州城内有个洪门首领任春山，便立即带领其心腹，秘密赶到泰州去同任结交，要与其合作，共图大业。时逢任春山正在泰州相机发展组织，以算命为公开职业，联络会众。两人一拍即合，结为异姓兄弟。结果是任春山介绍徐宝山加入洪门，徐宝山介绍任春山加入青帮。两人决定合开洪门山头，以两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山名曰之“春宝山”。两人为并列山主，徐的部下自然就成了洪门兄弟。

徐宝山此举可谓一箭三雕。首先，他实现了“整军经武”提高自己队伍素质的愿意。洪门纪律原来就较青帮严明，一经加入洪门，用洪门纪律约束队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整个队伍的组级性就得到了提高。另外，促成战斗力提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时清政府对帮会的镇压政策，凡加入帮会者，均一律处死。但由于青帮一直标榜“安清”，官府对青帮分子一般并不深究。而洪门一直以“反满”为旗帜，清政府对其成员是务必要从严惩处。故徐一进洪门，其手下便没了退路，只有听徐的指挥冲锋陷阵，否则被开革，便只剩下死路一条。

其次，任春山同徐宝山结拜，徐的跨帮地位，使青洪两帮兄弟都聚集门下。另外洪门大旗更招引四方豪杰，加之工于心计的徐宝山善于经营，很快形成以徐宝山为中心的核心集团。这就是徐后来发达的资本。

再次，青洪联合，减少了过去相互之间的相互仇杀，避免了两败俱伤，本身也为帮会中人所欢迎。这样的“善举”当然功劳也主要记在首倡联合的徐宝山头上。同时，徐宝山还不断制定一些深得人心的新举措，以博得好感。

徐宝山的方法是恩威并施，既要有宋江式的义气，又要有“大义灭亲”的决断。平时他出手大方，不斤斤计较而伤了兄弟之情。徒众有难，无论尊卑定然全力相救，使会众均感他义气深重，可为其效犬马之劳而不悔。另一方面，他利用洪门帮规严办对帮会不忠之人，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比如，一次任春山派帮中几个小头目去几个码头接运私盐。当各处盐船集中通过关卡时，因这几个人大意，未事先与官兵联络，买通关节，结果动了真刀真枪。往常贩盐，虽也有防卫准备，但并没想真的动手。这次玩真格的，这几位当然不是对手，逃了性命也都是老天保佑，哪里还顾得上盐船，他们知道失风逃走有犯帮规，如果回去，必然要被治罪。几个人当下一合计，决定干脆流落江湖，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偷鸡摸狗的营生混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山头上发现这几个人迟迟不归，也无一消息，忙派人下山打探，方知其详。宝山听得，怒不可遏，定要抓这几个违反帮规者回山严办。终于，有一天几个人正在长江轮上搞他们的“生意”，被下山巡风的同帮兄弟当场拿住，押解回山。

这一日，徐宝山脸色铁青，端坐堂前。他开口问道：“帮规的第三条，你们还记得吗？”几位知道今日不能善了，话已说不拢，但还答道：“第三条是临阵脱逃者斩。”徐冷笑一声道：“帮规第六条也没忘吧？”这帮规第六条是：吞没水头者斩。这几个哪还敢说。徐怒道：“既然你们知道帮规，办何临阵脱逃，又在长江轮私做差使，吞没水头，如今已被拿来，更有何说？”因其中一人是徐故交，徐怕众人出来求情，不待众人说话，徐宝山即叫手下人动手。次日，徐将此事通告全帮兄弟，并称今后一律以帮规为准，违者按律处罚。自此以后，徐的手下见他执法严厉，不论亲疏，知其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不敢轻易搞些小动作。因此徐在帮中地位直线上升，实际上已掌握了全权。

徐宝山扩大影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用帮会的经济实力，努力改变盐梟的匪盗形象，形成有利的影响和群众基础。当时，徐宝山提议，把所贩私盐每船抽两包或四包，储为赈济之资。然后，用这笔资金，冬天给穷人散发衣粥，大灾年景，救灾济民。这样一来，徐在当地及苏北一带颇著声名，造成一种救世济民而又有实力的一方之主的形象，吸引了一批很有才干的人来投奔他。

盐城当时有个武秀才，叫杨瑞文，是个人物。他既精武艺，也颇有儒雅之风，粗通文墨。后来有一次结伴进省赶考，按惯例可携带免税批盐作为旅资。后当三江营缉私官兵查问时，发现其所携超过规定限度。双方冲突，杨依仗习武出身，发起狠来，一怒打死两名官兵，闯下大祸，逼上梁山，投到徐宝山门下。那时，类似情况投来的还有后面要提到的张仁奎等人。这些人比起普通青帮徒众，确实高出一截。无论是知识水平、武功、军事素养还是看问题的眼光等都是徐的老班底所不能比的。这些人既能出谋划策，本身又是独当一面的干将，不少人后来成为上海青帮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徐宝山派系进入全盛时期，徒众达数万，并拥有一支包括700多艘走私船的船队。其活动范围从江阴往西到汉口、大通、芜湖乃至江西等地的长江两岸，三江口、西马大桥、七濠、十二圩等地的两淮线也是徐部的势力范围。这时的徐宝山已是这一广大地区帮会的总头目。徐宝山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很有些政治头脑。他的眼光已超出苏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全国政局也有独到见解。比如，他在戊戌变法兴起时，曾说过“光绪皇帝太怕洋人，是个庸弱的人”这样的话。此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间，有两个自称是康有为同党的人，到七濠口与徐密谈。声称听说徐宝山是个做大事业的英雄，所以前来相邀，如有此意，可即随他们去广东面见康有为，那边提供经费和军火。徐宝山当然不能随便行动，他不拒绝，也不急于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虚张声势。因此，他马上打发心腹干将郑大发随二人前去广东探听虚实。郑大发等人还在广东，徐宝山便又作出姿态。他给江苏巡抚鹿传霖寄去一封信和一纸告示。信中指责鹿坐视荣禄、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不知主忧臣辱之义。声称“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椎，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果好宄。”那张告示写得更是气势汹汹，自称“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徐”，“奉光绪皇帝密诏”，要号召两湖两江豪杰之士，遵旨行事。并告“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

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此处大有文章。第一点徐宝山现为洪门山主，不提“反清”口号，开口“囚我圣皇”，闭口“救我圣主”，并且全部行动是由光绪密诏而所为，俨然一副忠臣义士之形。第二点是更有深意的，徐声言的出兵日期在半年之后，这是演给朝廷看的，既是打招呼，又是要挟。

清朝的官员们有许多人已看出些苗头，当徐宝山表露“蠢蠢欲动之意”后，镇江及苏北地区士绅、官僚纷纷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力陈招抚徐宝山的必要性。光绪二十六年5月2日，张謇向刘坤一上“招抚徐老虎策”，并建议招安徐部后，专令其镇缉沿江诸匪。经刘坤一授意，当地一知名绅士陈重庆约徐的代表密谈，徐接受招安，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赦罪，二是赏官，三是收编其部下。接着，刘坤一等人举行正式仪式，招抚徐宝山，并命令他将部众编为新胜缉私营，由徐亲任管带，驻守扬州。

清廷此举实际上帮了徐宝山大忙，因为清朝官吏们并不知帮会内情。因“春宝山”自创立起，一直打着洪门旗号，但实权握在徐宝山手上。洪门兄弟一直把“春宝山”认作洪门，按洪门规矩行事。由于历史上两派仇见甚深，时间一长，矛盾重又暴露出来。虽然洪门旧部仍尊任春山为首领，但头领中以蔡金标最有威望，在帮中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据说蔡与革命党有联系，思想倾向革命，有组织能力，也有一些见识。故他虽也尊徐宝山为大哥，实际上对徐内心不服，加上徐为私利、不择手段的小人作风，这样，“春宝山”已自分成两股势力：一是洪门旧人，自号“清水光棍”；另一股是徐的势力“浑水光棍”。徐宝山认为蔡是他独霸山头的主要威胁，早想除之。最后用刺杀手段杀蔡金标，接着又杀刺客以灭口，但这类事一般是包不住的，慢慢帮中人都知道了事情真相。蔡手下有一批心腹和忠于他的兄弟，当然不能放过徐宝山，要杀徐为蔡报仇。徐宝山虽已有些力量，但终日要防范势力广大的洪门徒众，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正在苦思之间，清廷的招安让他得到解脱，甚至还扩大了他的影响。

故此，徐宝山“归标”后，自然对清廷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当时任春山幸好事先得到徐降清的消息，悄然离去，躲过此难后不知所终。“春宝山”之外洪门各部因徐宝山降清，并风闻徐逼杀任春山及其他种种危及洪门兄弟的行径，便严令帮众不准与徐宝山及其手下来往，并宣布永远不许再提起“春宝山”这三个字，否则以背叛洪门论处。青洪两帮有了这段事由，一下子又回到敌对状态。徐宝山也一心投靠清廷，替清王朝出力，镇压异帮，与盐枭匪盗为敌。徐宝山自小在帮会和盐枭中活动，亲历其间，当然对江淮

一带地理民情、帮会内幕、匪盗行踪等了如指掌，他本人手上又握有江淮地区最大的一支土匪武装，如今反戈一击，自然比官军追剿有效得多。几年之间，连破大案，连诛巨凶。他降清不久，立的第一件大功便是设计擒住了他的旧日相好、著名女匪白寡妇。接着，又进兵剿灭当年他落魄时曾救过他的陶龙雨的亲属陶龙翔匪部。到1910年他又消灭专劫官盐船的土匪王正国部和著名匪首王狮子匪部。几年下来，盐泉、土匪遍地的江淮一带被他整治得服服贴贴，民间士绅一片赞扬之声。官府因此提升徐宝山为帮统，并作了清军统领王有宏的副手。

这时候，清政府已摇摇欲坠，全国反清浪潮不断高涨。徐宝山又开始为将来筹划。善于投机的徐宝山首先同驻守镇江的新军管带林述庆（同盟会员）拉上关系，并与驻扎在清浦的江北督练蒋雁行打招呼。辛亥革命一爆发，1911年11月3日，徐找同盟会员林述庆和李竟成谈判，经过一番交涉，李竟成发现徐宝山是他的远房亲戚，就约徐起义，徐立即答应。但称等时局稍定，不愿为官，需稍沾利益。双方条件谈妥，徐即表示愿派兵保护起义领导机关。他还利用革命之机，扩编队伍，把自己手下的队伍从1000多人一下扩到20000多人。凭这些资本，徐军被南京政府编为扬州第二军，徐充任军长。他手下的帮会头领，成为其军中骨干。这样，徐的军队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颇有特色的、以帮会联系为主体的军队。

投机革命成功，使徐宝山的政治势力、社会影响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其野心也随之膨胀，进而要过问全国政局。1912年3月，南北议和，本来极力主张建都南京的徐宝山，突然又改口为袁世凯帮腔，支持建都北京。为了靠拢袁世凯，他极力迎合袁的“统一治权”的主张。4月19日他致电袁世凯，称大局已定，全国统一，他徐宝山愿意率先取消扬州军政分府，以为统一倡。徐宝山的这个全国“首倡之举”，正是袁氏所求之不得的，袁自然对此深为赞许。1913年春，袁世凯同革命党人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已不可避免。扬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发动讨袁，必先取扬州。得了扬州。便可北上进取徐州，若出师不利，尚有退守长江一路可走。故扬州不可失，失财败局立定。为此，宋教仁案发生以后，国民党人在最后关头仍极力争取徐宝山，使人劝徐归袁，但徐自恃拥兵两万，雄踞江淮，不想办不保险的事，因此对来人不理不睬，照旧按他的保袁方针行事。甚至接受袁的贿赂25万元。为使袁相信其诚意，徐将儿子送到北京作人质，并公开表示必要时武力保袁。如此，除掉徐宝山，是国民党人的唯一选择。

主持刺杀徐宝山的据说是陈其美。当时徐本人还蒙在鼓里。有人告诉消息时，他自信手下亲随众多，本人又武艺高强，故对此一笑置之，毫不在意。他垄断商淮盐场，又经多年为官搜刮，财大气粗，到处求购古玩。当时，他派两名古董商携5万元巨款去沪觅购名瓷“美人霁”古瓶，该古董商二人打听到某商保存此瓶，便写信给徐。不料此信为陈其美手下截得，当即将一枚炸弹装入一精美木盒内，派人将信及木盒送到扬州。1913年5月23日晚，东西送到，因徐睡下，便放在书桌上。次日晨，徐与其两手下同来欣赏他的“宝贝”。他的手下怕弄坏花瓶，不敢用力，徐恼了，推开他人，自己亲自下手，结果一声巨响，徐宝山双手折断，血肉模糊，待众人赶到时，徐命已归天。话说这徐宝山一死，群龙无首，军心动摇，众人推宝山之弟宝珍继任。但帮会组织是以首领个人威望和权势来维系的，压台人物一死，便没有了当年的战斗力。另外，袁世凯也不愿让地方土皇帝过分膨胀势力。徐宝山死后，

袁世凯将其队伍一再缩编。徐部在“二次革命”中最后溃散，其手下精华人物转而去上海混世界，是为江北帮大规模进入上海的开始。

### 3. 湖州帮刺杀宋教仁

宋教仁案是民国初期震惊中外的一桩大案，也是青帮参与的几桩最重大的政治性行动之一。刺杀宋教仁的主使者是袁世凯，而执行的杀手是上海的著名青帮分子应桂馨和其结拜兄弟武士英。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后表现出的独裁野心，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觉得必须有所行动。宋教仁意欲建立“责任内阁”，以约束袁世凯。当时宋教仁对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很有信心，他首先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接着领导国民党争取国会的多数席位，由于同盟会在革命中表现的政治影响，结果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得近半数票。宋教仁大有出马组阁，当国务总理的势头。袁世凯也知道，宋教仁是国民党核心人物，所以早已准备下手，欲除宋教仁。

宋教仁以理事长身份周游江中下游各省后，踌躇满志，决心登程北上一展宏图。宋在杭州发表了竞选演说，到上海与诸位同仁协商后，就准备出发。当时有人头脑比较清醒，劝其要注意安全。宋当时心绪正佳，听不进去，哈哈一笑说道：“吾此行为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陈其美甚至已对他明言：“小心他们用暗杀手段来对付你。”宋的回答就更豪迈了：“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搞暗杀，哪里还怕他们来搞暗杀。”他不听于佑任劝告，不走海道，坚持乘火车北上。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半左右，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佑任、吴铁城等陪同下，来到上海沪宁车站检票口。突然，宋身后窜出一条汉子向其连发三枪，转眼间刺客即逃走。枪声响过，宋大叫“我中枪矣”，仆倒在前面的栏杆上。众人急上前送他去铁路医院急救。虽经多方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不幸身亡。陈其美抱尸恸哭，连呼：“此事真不甘心！”国民党人更是痛感“斯人如此死，吾党复何言”。孙中山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

人。”

陈其美之不甘心，是有实际行动的。他首先与黄兴一起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请求他们破案，并宣布若彻清全案，则赏银一万元。陈分析此案必有政治背景，指使最可能是北京方面。他通过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陈派支做情报工作的），找出北京方面与上海可疑人物往来电报，有了初步线索。

实际上，在案发的次日上午，两个四川籍学生向国民党上海总部报告，他们所住的五马路宝善街鹿野旅馆一名叫武士英的客人行踪诡秘，十分可疑。特别是最近，这个自称是无业退伍军官的人，突然暴富，扬言事成后还有千元可得。20日晚此人未回旅馆，21日晨匆匆结帐离去。国民党即派人往查，结果一无所获。

直到23日下午，一自称为古董商的王阿法到工部局巡捕房报告：一星期前他售字画到小西门外应桂馨家，应出示照片说要干掉一人，说若能办到，酬洋1000元，他未答应。现在发现各报所登宋教仁照片正与应所持照片相同，故特来报告。开始租界方面以证据不足，不同意马上逮捕应桂馨。但国民党方面一再要求，加之此案已为社会各界所注意，出些差错，不好收拾，于是与国民党特派代表一起，将正在湖北路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中饮酒

作乐的应桂馨抓获，关押在英租界捕房。

第二天，押解应桂馨去其家中搜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查出关键证据，当场搜出两箱文件和电报，证明应受袁世凯和赵秉钧指使，谋杀宋教仁。同时还找到一支白朗宁手枪，枪内剩下的两发子弹，验明与刺杀宋所用于弹属同一类型。当时在应家一下拘捕 27 人，其中一个黑矮的男人，神色不对，巡捕当即找人前来指认，正是刺杀宋的凶手武士英，武在证据面前完全崩溃，供认不讳，此案真相大白。这件总统杀议员的奇闻一下子轰动全国。

刺杀案是民国第一大案，此事之所以帮会卷入如此之深，与帮会的性质和帮会当时的现状有关。帮会原本是一种反社会的力量，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一点早期洪门也许是个例外。因此，帮会根据其受到危害或保护的情势，决定其暂时倾向于哪一边，故极易成为受人利用的政治工具。青帮分子在刺杀案中，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的表现，就是明证。

在辛亥革命中，帮会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曾帮助革命党进行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政治活动。但新政权建立后，在一个较稳定的时期，帮会的消极方面无法为革命党所接受，因此许多地方对帮会采取了镇压措施。这引起帮中人物的不满，认为简直是过河拆桥。这种情绪极易为袁世凯方面所利用。所以北京方面找帮会分子作杀手不是没有道理的。

刺杀宋教仁，青帮这头的联络人和主持者主要是应桂馨。他是浙江宁波人，事件发生那年他正好 50 岁。此人父亲是个商人，发迹以后，转而经营地产。后与洋人做生意，不久成为当地一个大富翁。应桂馨从小长在这样的人家，明白不少“作人的道理”，如巧取豪夺，勾结官府，狂嫖滥赌等等。他年龄不大，在当地已颇有名气。他父亲由于经常以不正当手段夺取别人土地，害怕别人找麻烦，因此出万元，让儿子认上海县道台作了干爹。从此应桂馨更是无恶不作。

清末上海帮会最出名的人物中，数得着范高头。此人原名赵阿室，原是个撑船的苦力。他自恃人高马大，最爱帮人打架。洋人的铁甲火轮当时很神气，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有一回，一外轮在黄浦江中撞沉一艘满载驳船，外轮竟不当回事，开足马力就要走。当时许多中国小船靠上去，要找外轮算帐，但外轮是铁甲，马力又大，根本拦不住。正当外轮由于速度太快，就要撞上另一艘中国船时，赵大叫一声，举起碗口粗的竹篙，死命一撑，外轮船身一歪，中国船避过此难。这时外轮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撑而慌了手脚，连忙停了下来。中国船工趁机上船与洋人交涉，终于使洋人认输赔偿。此事传开后，“范高头”之名开始叫响，他的原名反而被人忘了。

范高头成名后，不再满足于靠撑船吃饭。当时沿江一带许多人都靠偷盗洋人船上的货物发财。范利用自己的名气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把小偷小摸变成整批整船的“大偷大摸”。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将给外国货轮装货卸货的中国船故意弄沉，再利用黑夜把货物捞上来。然后拿出去倒卖。当然，那时赚钱的买卖是鸦片，故运鸦片的船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后来范的生意发展到从偷鸦片，到贩鸦片，再到开烟馆卖鸦片的一个大的集团。手下有数千人，成为威震上海滩的一霸。

应桂馨与帮会搭上关系，以认识范高头开始。当时有个祥园烟馆是范所开。应整天泡在那里，因此与范结识，很快就成了范高头最得力的助手，两人一起走私贩毒，大发横财。后来，应桂馨为扩大势力，出重金作了洪门的一个首领，又拜湖州帮李徵五为师，排“大”字辈。

时间不长，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开战，杀死丁勇被官府通缉。开始范依靠党羽掩护，躲过一段时间。后来官府用重金买通同党林得胜，设计将范拿获正法。范做下大案后，其党羽均为官府捉拿对象。应因为发了财，不愿出外流亡，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投到江苏督练公所总办袁树勋门下。应很会办事，又相貌堂堂，特别难得的是他还能说几句英语，很为袁赏识。不料，应不久就暴露出一个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使袁极为失望。那时袁为帮助他，破格委任他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并批给 5000 两官银作为开办费。谁知他等钱一到，立即花天酒地，整日不务正业，待银子花完，觉得无法交待，竟一走了之。

说到应桂馨后来如何参加了革命，还有一段趣事。应桂馨从袁树勋那里跑出来之后，先到河南，最后被迫逃到乡间暂避，其父怕他再到外面胡闹，给了他 5 万银元，叫他在宁波办个学堂。但应这种人实在也不是办教育的料，不久有 3000 族人告他强夺族祠公产。正闹得不可收拾时，该校教务主任因事来上海，碰到好友陈其美谈到此事。陈其美那时正在发展革命组织，对帮会人员极为注意。陈得知应在会党中有影响，便有意结识，遂出面为之调解。应由此十分感激，一时两人相交甚密。

应跟随陈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卖力。他利用自己身在帮会，手里有些得力干将的优势，具体参与了一些重要活动，光复上海之战中，他亲自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特委应桂馨为谍报科长。后来孙中山来上海，应直接负责接待，由于应会办事，也很机灵，孙中山印象不错，任临时大总统时，特任命应为卫队司令，并令其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尽管应桂馨已混迹官场，但多年在黑社会中养成的流氓习气一时难改。他经常为一些小事寻衅闹事，甚至动刀动枪，所以虽几次做官，但每次都官运不畅。这回又是如此，本来他已取得孙中山信任，前途有望，可时间一长，便忍不住把江湖上的那一套又拿了出来。开始，他对孙中山由广东来访的亲朋故友还较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他时常恶语相向。孙中山对此并未深究，又因其为陈其美介绍，也不便说就让他回家，仅将其改调下关兵站任职。谁料应桂馨竟不买账，无理取闹要将他从上海带来的卫士带走。卫士的直接上司（时应已改任政府庶务长）侍从队长郭汉章不愿回上海，应桂馨竟找了几个亲信，让他们杀害郭汉章。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孙中山只好打发他回了上海。

应回到上海后竭力投机钻营，抓住新老政权交替时的机会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希望能成为与他党抗衡的政治势力。应自然要依靠帮会的力量，因为在这方面他最有根底。当时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正酝酿联合建立一个政党，应积极促成，终于在 1912 年 7 月由三家联合组成了“中华民国共进会”。这是上海帮会的第一个联合政团，也是由帮会组织到公开性团体的开始。应桂馨因名声大，又号称在临时政府中任过要职，并为新团体出了一笔开办费，很自然地当上了会长。

应桂馨搞了共进会，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一种招兵买马的手段，他也并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料。他到处串连，扩大会众，主要兴趣就是搞暗杀。湖北张振武被黎元洪所害，张妻曾出价 2 万元，找杀手为夫报仇。应桂馨想干，还没得手，就被黎元洪得知，遂下令通缉。应慌忙逃回上海后，又组织了一个暗杀队。这个暗杀队被袁世凯听说了，袁打好主意，首先招呼

各方，取消通缉令，然后由内阁总理赵秉钧派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出面，召应桂馨北上进京。对应桂馨的接待应该说规格很高，甚至大总统袁世凯和总理赵秉钧都亲自召见了。洪述祖是青帮“大”字辈，为人颇有心计，他说通了应桂馨后，立即与应共同南下。首先，让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应桂馨为驻沪巡查长，给大洋5万元作经费，并答应每月再给3000元。最后谈判结果是：袁世凯、赵秉钧允诺“毁宋酬勋位”，并答应以当时发行的公债350万元优惠价卖给应桂馨，使其可净得200万元。谈妥以后，应允诺尽快履行刺宋诺言。应桂馨马上物色武士英做杀手，策划杀宋，这就是刺宋案的背景。

只可惜宋教仁至死也没明白谁是杀他的凶手，仍对“大总统”抱有希望。他在医院抢救中还向黄兴口授一封给袁世凯的信，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午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启。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被奸人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致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力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竟力保障民权，使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被刺案真相大白后，孙中山先生对当时中国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次在陈其美家里，他说：“他（指宋教仁）实际死在袁世凯手中。今后的斗争，是官僚与民党的斗争。过去我看错了袁世凯，是我的过错。现在袁世凯想使专制死灰复燃，辜负国民付托，必须起兵反袁，将他除去。”

关于刺宋内幕还有一种说法不能不在此一提。据说当年袁世凯派洪述祖来沪时，首先是找了上海青帮湖州帮的巨头李徵五。李当时的两个高徒，一个是应桂馨，一个是张宗昌。当下李就选择了他认为最合适的应桂馨，介绍给洪述祖。同时，因李徵五已得知宋教仁与陈其美因权利之争而矛盾激化，他想到还可用刺宋一事再作一笔交易，就又跑到陈其美那里拍胸脯担保他将刺宋拥戴，代价是50万元和一支手枪。陈答应条件，很快将钱、枪送到。案发后，陈先布置手下设法取回枪支，然后将应桂馨捉拿归案。李徵五原想方一事情败露还可把陈其美推出，现在眼看就要弄到他的头上，赶紧将武士英杀了灭口。据史料载，武士英暴死狱中，死因是偶感风寒，殊为可疑。应桂馨越狱逃走，后为袁世凯雇人刺杀。从此，刺宋案证据确凿之真凶均已身亡，袁大总统又无法捉拿归案，只能了结此案。几年后，李徵五为报一箭之仇，派其另一高徒刺杀了陈其美，这位高徒正是后来的大军阀张宗昌。

这种传说并无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没有真凭实据，完全根据一些表面现象和政坛传闻，又加上陈其美也是青帮李徵五系统中的人物，与李有深交，于是此事似乎颇为可信。人们一联想到陈其美曾使人刺杀光复会巨子陶成章，就觉得此一说法也有可能。但如果我们纵观陈其美的政治生涯和其革命活动，并考察当时国民党内矛盾的真实情况，就不能不对此说法提出疑问。

#### 4. 张仁奎了断风流案

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产生了一批被称为“大亨”的帮会分子。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党政要人”、“社会名流”，参与并控制社会政治生活，甚至利用帮会势力左右政局，制造经济风潮。当时无论文人政客还是工商巨子都不能不借助青帮的势力。旧上海青帮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然首推“三大亨”，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可以说，从20年代开始，上海青帮的历史就是此三人的历史，因为几乎



所有重大的事件都与他们有紧密的联系，或者说他们三人就是这些事件的总导演。故本书辟专章“沪上闻人”，此不赘述。

但这个时期确实是青帮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可说是“人才辈出”，成名人物还有不少，奇闻轶事无可计数。限于篇幅，本章仅择其一二而概述之。

除“三大亨”之外，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要首推张仁奎。张的名气不在于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由他在帮中的辈份、他的历史以及他的那些“出色”的徒弟造成的。张仁奎是山东大汉，号锦湖，是上海青帮中少有的几个“大”字辈之一。来上海之前，他曾在徐宝山手下担任过扬州第二军步兵二十四旅旅长，后来还做了大官，任通海镇守使。1927年，他的部队被打垮，向北伐军投降，他本人丢了兵权，便逃到上海去做寓公。青帮的早期组织中，响马匪盗、毒贩盐枭之类人物占绝大多数，普通帮会成员多是下层贫民或农民、水手等，头领则多是所谓黑道出身。像张仁奎这样当过旅长，又曾镇守一境地方的“大人物”，在帮会中可说是凤毛麟角。所以帮会徒众心中对张仁奎的尊重远超过对“三大亨”的尊重。当各帮会头面人物之间、帮会与军人与政客集团之间发生矛盾时，几乎总是要找“张老太爷”（帮中人对他的称呼）出面调解。他的角色有点像大家族中的族长，凭德高望重解决家族内外的纠纷。张仁奎也不是完全凭老资格吃饭的，因为在青帮中，光靠资格是不行的。要想站住脚，还得有实力。张仁奎对实力有另一番独特的看法，就是重收徒的“质量”，可能这一点是从他过去的上司徐宝山那儿学来的。张有地位，决不屑于与社会上的“小混混”以及地痞流氓之类为伍。故虽然张收徒数量可观，据说有三万人之多，但其层次也颇高，这些徒子徒孙给他撑足了门面。下面我们列举张的几位“高徒”，就可看出张之收徒的规格是很“讲究的”，大军阀韩复榘，蒋鼎文，朱绍良；大资本家、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陈光甫，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大买办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陈香涛；以及政客、文人、交通部次长韦以，汪伪政权外交部长夏奇峰，宣传部长林柏生。军统分子淞沪警备区稽查处长陶一珊，《时事新报》总经理张竹平等。甚至青帮大亨杜月笙也只能“屈尊”做了他的徒孙。杜月笙的师傅叫陈世昌，是青帮“通”字辈，他的老师也姓陈，为苏州大字辈陈彪。陈彪除辈份高外，一无所有，收的徒弟也都没什么大出息。早年陈世昌拜帅后，自己在上海闯江湖，以制作兜售鸦片烟杆子谋生。后来在街头玩点小本钱赌博的把戏，骗些小钱糊口。后生晚辈杜月笙等出名后，师傅也叫响了。陈世昌觉得陈彪与他现在的名头不配，又改拜张仁奎为师，这样杜月笙就成了张仁奎的徒孙。

张仁奎收的徒弟看起来似乎比他更有名、更有势、更有钱，可这些人为什么会拜他作头子呢？这里有多种原因，像军阀韩复榘这样的人，主要想利用帮会特有的内聚力控制部队，更重要的，士兵为龙头大哥打仗和为长官打仗其勇敢精神差别很大，所以军阀多喜与帮会结缘得到好处。当年韩复榘由葛光庭介绍准备拜张仁奎为师，有人问葛：“韩将军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现已无权无势的张仁奎为师？”葛的回答颇有深意，他说，加入帮会很要紧。当年大帅左宗棠出兵新疆，军至平凉，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左忙问何故，众军答曰要暂住一日迎接大龙头。左帅治军之严，威望之高是出了名的，官兵甘冒军法，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大龙头之要紧。左帅从此深知利害，很快也拜了老头子，将士们与其关系则更进一层。韩是冯玉祥的部下，连冯玉祥也玩这一套，韩有何说，等一旦拜了张老太爷为师，韩就可以自开香堂，

自立门户了。

拜张仁奎为师者有各色人等，目的也不一样，有钱的多是因怕人抢劫或敲竹杠，拜张作为保护神。还有一种人财大气粗，终日在风月场中鬼混，惹出风流韵事又怕流氓敲诈，就找张作为靠山。张仁奎在上海滩出面了结了几起这类事件，一下子更提高了他的名声，青帮内外部知道张老太爷确实极有能量，下面几件事是张仁奎扬名上海滩的几件“得意之作”。

当年上海银行金融业有个极著名的大亨叫朱成章，是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国货银行是上海数得着的大银行，而上海又是当时全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这朱总经理腰里的硬通货当然少不了。人一有钱，就容易招来麻烦。朱成章虽是混世界的大人物，知道各方土地不可轻易得罪，但财大气粗，胆子也就大了。他自认有钱，关系多、名气大，谁也不敢随便找他的麻烦。对于帮会之类，他常对手下人说，你们不要听他们瞎传，没有那么厉害。真是像传说的那样有办法，为什么不也来当总总经理，靠几个小瘪三能成什么大气候。朱成章万万没有想到日后他的命会丧在这些“小瘪三”手下。

1929年，朱成章想建些房子出租，但找不到合适的地皮盖房。后来有人介绍他认识了静安寺主持，他就打上了庙产的主意。开始，朱成章怕不好说，找人代为传话给老和尚，希望他能让出这块宝地。谁知当家和尚竟一口应允，经过讨价还价，事情就敲定了。也是朱成章命该如此，正当他办好一切手续并向地政局登记时，半路杀出个张啸林，也看中了这块宝地。张是在别人家里的一次宴会上听说静安寺有地，位置不错，价钱也好。他马上派人去静安寺。不料当家和尚告诉来人地已卖出。张啸林觉得这块地特别理想，听说别人已买走，立即就想法子要把它弄回来。当时张啸林和黄金荣、杜月笙已结拜兄弟，在上海滩可说是路路通，没有办不到的事。他当即向寺里管事的表示，我多出点钱，只要你答应把地皮让给我，朱成章那边我去说。

出家人是有些规矩的，完全靠钱在这里不见得可行。老和尚看到张啸林很霸道，根本不想与他沾上边，就推辞说：“出家之人，办事要凭良心、信义。地皮已答应给朱成章，实在不能另许他人。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张啸林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但见老和尚如此说，也不好再坚持，叙谈一会，即告辞出来。现在剩下来的办法只有直接找朱成章，叫他出个价钱把地让出来。

第二天，张啸林亲自到朱成章家里拜访，很客气地对朱说他特别喜欢朱总经理已买下的这块地，反复说他愿意出个好价钱，决不让朱总经理白忙活一场。朱成章当时哪里想到帮会中人如何厉害，又见张啸林举止粗俗，全无“高等华人”气派，更加看他不起。但张啸林毕竟是在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家里，又确实想要这块地，忍住气没发作。朱成章心下也不想得罪黑道人物，只是以银行董事会已经商定，他个人无权私自更改为由，婉言拒绝了张的要求。张啸林虽是帮会头领，有无数不怕死的徒弟，但一直不想来硬的，因为总是公开买下来省事些，面子上也好看。没想到朱成章就是不让步。张啸林见软的不行，只好使出看家本领，桌子一拍道：“请依朱总经理去打打听打听，我姓张的在上海滩谈生意，就是阎王爷也得让我三分，你今天不卖我这个面子，好！改日有你的好果子吃。”说罢拂袖而去。

朱成章想，看这小子能有什么大本事，只不过说几句大话出出气罢了，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朱成章已计划在静安寺破土动工，前面那些事也早已淡忘。由于工程刚开始，诸事繁多，朱成章身体有

些顶不住。一天早晨起来，他略感身体不适。娇妻劝他卧床休息，同时派人去请洋医生。可朱总经理事先已安排了公事，要去银行与某大人物谈一笔生意，不去不行。夫妻俩商量一阵，决定让私人护士邓小姐陪同，先去医院检查一下，拿点好药，然后再去银行办事。有护士小姐陪同，凡事也有个照应。再说护士小姐也确实有些本事，虽然年龄跟朱大经理的女儿相似，但社交场上是个人物。青春少女，豆蔻年华，又会迷人，自是万种风情。虽然到朱家才几个月，但已成实际上的总经理秘书，整天与总经理形影不离，虽说还没有将朱妻取而代之，但朱家人上下很多事都要看她的眼色。这护士小姐每日给朱总经理推拿、按摩，推到什么程度，按出什么结果，连府下人心里都一清二楚。

话说朱成章的汽车从愚园路朱公馆开出后，朱大经理忽然声称他感到腹部胀痛，边捂肚子边把身子趁势靠在护士小姐身上，头也正好枕在这位小姐玉面与粉颈之间。护士小姐开始为朱成章治疗，无非是推拿按摩之类，当然效果非常之好，朱总经理已渐入梦境。

汽车里正在做着好梦，外面却有惊人的事件发生。汽车在飞速行驶间，突然路边窜出两名大汉，拦住轿车的去路。司机一见拦车的手里拿着枪，就知来者不善，准备加大油门硬冲，把截车人吓退，使主人免遭绑架。绑匪知道有钱人的司机都是学过两下子的，不先治住，就无法对后面的朱成章下手。所以一见司机开车想逃，便连发数枪。不料因车速太高“歪打正着，子弹钻进了朱总经理的肚子，护士小姐一声尖叫顿时晕了过去。司机一慌，车速就慢下来了，两大汉手拉车门逼司机停车，一边一个把浑身是血的朱成章架下车来，推推搡搡地把朱成章架到一辆事先准备好的轿车上，一溜烟儿没了踪影。

司机虽是有些武功，但还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半晌才回过神来，连忙关了车门，调转车头，开往朱府报信。朱太太一听开始倒还能沉住气，当了这么多年总经理的夫人，总还有些见识。当下通知银行中朱的亲信来府商议对策，并叫下人将护士小姐送到医院，因护士小姐也不幸为经理大人挡了一颗子弹。朱夫人正想向警察局报案，突然客厅中电话铃声喇了。朱太太刚拿起电话，就听一人粗声命令：“叫朱太太听电话。”朱太太一听就明白这是绑票的来要价了，忙应道：“我是呀，你是哪一位？”

对方传过来的声音又急又狠：“朱太太，你想明白点，如果你不打算做寡妇的话，立即准备50万来赎你先生。交钱的时间地点我们到时通知国货银行。要是你拖延时间，不肯交钱，那你就等着收尸吧！”

朱太太一听这话，腿也软了，胸口直跳，一时没了主意，一帮家人也跟着大呼小叫，乱作一团。还是朱成章的几个心腹接到朱夫人的电话，及时赶到，急忙布置人去筹款，并派专人在银行守电话。一直到晚饭时间，银行守电话的才接到通知，叫携款前去赎人。朱家文即派车去了指定地点。到了一片荒郊野地，对方来人点验钱款后，准备上车，车已发动时，才扔下一张纸条，上写“由此向南500米稻田中”。手下人抬着担架、医疗用品往南直奔过去，见总经理躺在地上，满身血污，早已不省人事。朱太太算松了一口气，朱太太虽说对破财也有点心痛，然而钱财身外之物总可以再赚回来，只要总经理有救，钱不在话下。但朱太太万万没想到，丈夫已经奄奄一息，真是连留遗言也没有能力了。她原来听司机说，总经理被架走尚能说话，伤并不太重，没想到人已经成了这样。大概是司机当时已吓呆了，看别人架着总经理，

还以为总经理尚可以走路，故以为伤不重。实际上，事后经医院检查，朱成章虽腹部中弹，但伤不至死。只要及时抢救，原无大碍。只是张啸林手下一整天根本没有采取有效的救护措施，失血太多。以朱太太的想法，他丈夫本来伤不太重，匪徒只为要钱，肯定不愿意弄出人命，只要适当抢救，不至危及生命。谁想会是这种情形。朱成章被送往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抢救，上海医界外科专家数名亲往手术，但终因时间耽误过久，当晚便气绝身亡。

总经理一死，国货银行整个笼罩着一片不祥气氛。大小职员、经理们倒不是悲痛，而是害怕，真悲痛的也许只有朱成章的女儿和太太。手下人只是担心他们总经理手上的那张威胁的纸条，如果黑道人物真要把纸条上的话当真，他们就将小命难保。朱太太悲痛一阵之后，也开始着手接管银行业务，因人心惶惶，总经理又突然死去，银行业务已出现危机。朱太太原来并不知道张啸林与丈夫的那段过节，因为当时朱成章根本没把那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向夫人汇报。朱太太只是觉得这事可疑，不像是一般的敲诈钱财。她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专门与朱成章的那些亲信谈及此事，想看看朱家到底跟谁结了仇。别人就谈起了一个多月前张啸林要买地这件事，朱太太一听就明白了，花钱雇人一打听，果然是张啸林手下干的。

朱太太一想，招惹了这个魔头，银行别想好好办下去了。如果他一会儿绑了这个，一会儿杀了那个，谁还敢在国货银行做事，银行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便决心找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她的心腹中有人熟悉黑道人物，就提议说，要想把国货银行办下去，就只能采取黑吃黑的对策，也拉拢上一个黑道人物做靠山，按时进贡，张啸林的手下就不敢随便来找麻烦了。

主意有了，下面就是找谁做靠山的问题，知情者就告诉说现在上海青帮中辈份最高、影响最大的就是张仁奎“张老太爷”。拜此人为师，即可为“通”字辈，辈份较高，且身份也不低，因张为官多年，从前是大人物，故拜他最为理想。因此，国货银行的高级职员纷纷托人去找张仁奎，拜张为徒。其他金融界的大亨，因有了朱成章的前车之鉴，也纷纷投到张仁奎门下，张仁奎有了越来越多的有名的徒弟，声望日高，在上海滩说话更加有份量。这样一来，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拜其为师。

1935年春天，张的徒众在新利查饭店聚餐，很多人提议组织上海“仁社俱乐部”，以谋团结互助，并使团体有正式的社会法人地位。“仁社”是取张仁奎的一个“仁”字，且这字本身意思不错，最后张仁奎表示同意。过了些日子，张的几位徒弟张罗，在福煦路383号买了一所房子。此房原是孙科一帮广东同乡的俱乐部，里边的家俱一应俱全，连房子一起一同被“仁社”出价买下，共花几十两黄金，都由几位有钱的徒弟支付了。这一点体现了青帮义气互助的传统精神。“仁社”在社会局备案，并很快得到市长吴铁城批准。吴也是张仁奎的门生。可见当时青帮在上海的势力之大。“仁社”成立后，发展迅速，与黄金荣的“荣社”，社月笙的“恒社”，鼎足而立，成为上海帮会中最有势力的三个团体之一。

张仁奎的总经理一级的徒弟还有很多，其加入青帮的过程也与朱成章的部属们类似，总是因为自己或与己有关的别人惹了事，找到张老太爷那里要求保护，然后投帖入帮。如上海银行业第一号大亨商业银行总经理兼上海银行业公会会长陈光甫也是惹了麻烦后，投到张仁奎门下的。不过他的麻烦是风流韵事，与朱成章买卖上的事有些不同。有钱的大银行家，终日鼓捣票子，绞尽脑汁，空闲下来就总想跑到花街柳巷去鬼混。他们虽然钱财万贯，可钱

只能买些虚情假意，光去风月场中寻开心，也觉得太没意思。他们想换换层次，于是办公室里就出现了花枝招展的女秘书，家里就请艳丽风流的女护士。陈老板经过严格挑选，也聘用一名私人女护士，当然声称此为贵体健康之所需。陈总经理这位护士也姓陈。陈小姐之父为一小商，为人精明，很会筹算，其女自然也聪明过人，一般男人无论如何挣扎也难离其股掌之间。自从进入陈府以后，颇有大将风度，指挥若定。陈总经理很自然地上了轨道，接受她的科学护理。她一到陈府，便按照科学方法制定一张时间表，每天要对她的病人进行两次全面检查，一会儿吃药，一会儿量血压，出现在总经理办公室和卧室的频率决不少于每十分钟一次。每天早晨陈小姐要根据气温决定总经理今天的穿着，而且是必须执行。陈总经理稍有异议，她小嘴一噘便道：“将来谁来看你！”俨然一位未来夫人的口气。陈总经理一听，哪里还能抗辩，只有言听计从。

时光如飞，转眼几个月过去了。那位整天在外打麻将、经常深夜不归的陈夫人还蒙在鼓里，这边她的地盘已被一位小姐占了。护士小姐晚上也不下班，变成全日制工作。现在轮到陈小姐“病”了，慢慢地病状在外部显露出来，陈先生可治不了这种“病”。然而不治又不行，陈大总经理整天愁眉不展，苦无良方。护士小姐到底更专业一点，为解燃眉之急，开出很有水平的两张“药方”：一是与陈总经理公开结婚，明媒正娶，并且陈必须与原妻离婚，二是传统方式——堕胎。陈总经理当然对后一药方完全赞成，而且陈小姐也答应可从此一刀两断。可是药价太高，要10万元，没这些钱此药决不可行。

陈总经理毕竟是个商人，凡事讲究经济效益。收入支出需得相抵才能保本。他略一盘算，深觉这桩生意亏本太大，有种在商业场上被人骗了的味道。他从前有过不下数十个这种女人，总共也没花到这价钱。这个小护士一张口就要10万，以为我陈某人没见过世面，竟班门弄斧来敲竹杠。他决定先给女护士一笔小钱，再到公司安排了闲职，一来可继续相好，二来也花费不高，经济上划算。他想一个小护士一定好哄，给点甜头，再许上几个愿，比如将来如何如何，此事即可了结。退一步想万一那小丫头不干，闹将起来，我陈光甫这等人物找个关系反告她个乱敲竹杠，花点钱，一混也能过关。

一日中午，陈总经理把护士小姐叫到楼上卧室。他原以为陈小姐会哭哭啼啼，然后他甜言蜜语一灌，便大功告成。哪知这位平时娇滴滴的小姐，不待他把话说完，就踢翻了椅子，指着陈光甫的鼻子说道：“陈大经理，你张开眼珠子看清楚，老娘是什么人。老实告诉我，高鑫宝是我师父，今朝依要是不痛快交出10万元赔偿费，看我老头子勿摆平你才怪呢！”

陈总经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比朱成章要识相。虽不知这高鑫宝是何方人士，但起码知道招徒弟的人肯定不是善主，明白这回一关不是轻易过得了的。陈光甫一盘算，先探探虚实再说，不能贸然行事。女护士一走，他就派人去打听高鑫宝是个什么人物。还没等手下人回报，女护士的师傅就找上门来了。高没有亲自出马，派了个小头目来到陈府。进门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发话道：“喂！陈老板，我师傅叫我传话给你，两条件你自己考虑，三天后若不满足我师姐条件，就给你点颜色看看！”颜色当然是红色，这意思是要放点血，这陈总经理钱是不少，血可并不比别人多，如何舍得随便让别人放。他终日坐卧不安，不想对策三天后可不得了。好在有朱成章走在前面，他也听说朱的高级职员现在都是张仁奎的徒弟，猛然想起这是一条路。于是

找人引见，并备了厚礼，往见张老太爷。张仁奎听了陈光甫一番述说，朗声笑道：“小事一桩，你不必担心，我去跟高鑫宝打招呼，你现在入了帮，没人再敢来找你的麻烦。”

张仁奎是个有身份的人，他一般不用恐吓的办法对付小字辈，也不是动不动就要给谁三刀六洞。张知道高鑫宝是杜月笙的同乡，又是杜手下的得力干将，如果找到杜月笙说一下，高肯定也就不能说什么了。但张仁奎干事总是有板有眼，他不能光凭一面之词，就去压服另一方。如果他总是靠权威去压人，而不是合理地解决问题，那他在帮中的形象就不会那么好。再说张仁奎也还赏识高鑫宝。虽说高是个粗人，但天不怕地不怕，敢为自己的徒弟出头，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所以张仁奎想此事最好能公平地解决，既使陈光甫过关，又使高鑫宝有面子，另外也能给陈小姐一点补偿。

张仁奎于是叫人喊高鑫宝来见他。高是通字辈，见了师叔把此事来龙去脉一讲，张就明白了事情原委。所以说服高不要再闹，他已知理在高的一方，此事由他作主解决。他叫陈亲送 10000 块钱到他家里，当面把钱转交陈小姐，并为双方说和，就这样顺利地了断了一桩风流案。

张仁奎办事公道，有风度、有气派。他从不随意向其门生要这要那，不像黄金荣他们那样以做寿为名向徒弟收礼。门生孝敬他，以“自愿”为准，有钱的就多送些，没钱的就少送些，他从不计较。蒋介石对张仁奎也很尊重。1936年，在“八·一三”日军侵华前，蒋介石据军统密报，得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有反蒋企图，如反击，则将是一场内战。蒋虽早有打垮韩复榘的想法，但不愿武力解决，且当时蒋正与红军作战，又有日本人大举侵华的苗头，不想四面出击。蒋介石早年与青帮关系很深，因此知韩复榘和他手下的几位高级军官都是张仁奎的徒弟，遂托张的门生当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交通银行董事长、张的好友钱新之请张仁奎去南京见面，商讨如何解决山东问题。张仁奎先生觉得此事与己关系重大，而且对国家也是关系重大，便决定去南京见蒋。蒋得到消息，非常高兴，派专列去上海接张，并亲自在中山陵官邸门口迎接。蒋按照青帮规矩，称张仁奎“张老太爷”。蒋介石与张谈了近三个小时，谈当时中国形势，谈解决山东问题各种方法的利弊，最后亲请张仁奎去山东，说服韩复榘放弃反蒋意图，以免战祸，对国家和双方都有益。蒋还答应如果韩听从劝告，将为韩拨款以示诚意。张仁奎认为这样解决可行，答应去山东劝说韩复榘，蒋又派专车送张去山东。

山东将领多为张仁奎门徒，听说老太爷到来，齐集车站迎接张仁奎。韩复榘已知张的来意，但他自恃拥兵十万，又有整个山东作为依托，有力量与蒋对抗一阵。他想蒋之重兵仍在“剿共”前线，一时无力调兵山东，现在反蒋正是时机，所以在内心不赞成张仁奎的意见。然而，青帮讲究尊师重道，又不便直接反对，所以请了他手下的师长们相议此事。这些师长都是张的徒弟，对张很尊重。同时也觉得张仁奎分析得有道理，一起来劝韩谨慎从事。这时，张又找韩，以利害说之。让其明白以十万之师对百万之众，以一省之物力财力对全国之政权，则必败无疑。韩见还未动作，手下干将已无信心，此事难成。只好听从张仁奎的劝告。为张仁奎山东之行的功劳，蒋介石一直十分感激。抗战开始后，蒋劝张仁奎一同西迁，张因年老未去。在敌占区他拒绝敌伪劝诱，托病不出。抗战末期，他病死上海。蒋特以重庆政府名义下令表扬。

## 5. 苏北大亨发家史

人有时候真想不到哪天能碰上好运，碰上一回，也许让你终生受用无穷。说起顾竹轩这人，当年只是个拉黄包车的，没啥大出息，除力气大点，别无所长，他鼻子稍大，人称“顾大鼻子”。顾竹轩自小没过什么好日子，小小年纪就到上海混饭吃。

有一年英租界巡捕房招考华人巡捕，要求只有一项，就是要块头大。顾竹轩正合适。没多久，顾竹轩因工作卖力，被提拔当了小头头。他最恨别人欺负苏北人，遇到苏北同乡有困难，他都要拼死相助。正是由于他总是护着同乡，一次正宗上海人与他的老乡械斗，他利用职权帮忙，被人告到他的上司那里，很快他就丢了饭碗。后经同乡介绍，拉起了黄包车，当时他未曾想到日后有一天能时来运转，成为上海滩威震四方的帮会巨头。

那一年夏天，天热得出奇。顾竹轩拉了一位客人去一家剧院，放下车，就在树荫下坐着打瞌睡，听到旁边乱哄哄一群人不知在干什么，揉揉眼睛一看，见路边人行道上躺着一个老头，老头脸色很不好，看来可能是天热走远路中暑了。老人在跟周围人述说着什么，表情很绝望。顾竹轩还要拉车挣钱，没有时间多管闲事。他正准备再去剧院，突然听到老人说的是苏北话，这一下顾竹轩来了情绪，放下车跑过去看个究竟。

他拍拍老人的肩膀说：“你遇到什么事，仔细说给我们听听，看我们大家能不能帮你。”老人一听顾竹轩也是苏北口音，一下子眼泪就淌了下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起他如何千辛万苦从苏北到上海，原来老家有人在上海，答应来接他去找他大儿子顾祝同。但不知带信的人出了什么差错，下船没碰到一个熟人。他又不知道地方，也不知儿子住在哪儿，瞎摸瞎撞，钱和儿子地址装在包里，包也给人偷了。从下船到现在快一天了，饭也没吃上，请大伙帮帮忙。说着又哭起来。

顾竹轩当然知道顾祝同是谁，但开始也没当真，因为眼前这老头无论如何也难跟顾祝同拉到一起，他想可能是同名同姓。顾竹轩有点侠义心肠，他答应帮忙就得有个结果，不能撇下老人就走。他对身边的几个年轻人说：“大伙帮忙把老爹爹扶到我的车上。”又转身对老人说：“老爹爹，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找到儿子。你现在身体弱，先到我那里住下，我再帮你去打听。”

顾竹轩把车子拉得飞快，回到家就搀老人进屋坐下。他光棍一个，家里只有一张破床，两把椅子。顾竹轩赶紧去隔壁邻居要了一碗开水让老人喝。看老人精神好点了，就扶老人躺下，然后跑到外面小饭馆买了一些吃的，让老人先吃着，他自己连忙去找他的那些小兄弟，让他们分头在苏北人居住区打听有没有叫顾祝同的。顾竹轩那时已加入了青帮，拜刘登阶为师。刘登阶牌子不响，却是一个“大”字辈人物，所以顾竹轩有一帮小兄弟。两天过去了，没打听到一点眉目。老人急，顾竹轩也急。他想，如果没有一点线索瞎找，好比大海捞针，终究不是个办法。这天下午，顾竹轩没出去拉车，在外面买了一瓶酒，又买了些熟食凉菜，摆在门外树荫下，与老人一块谈天拉家常。平时顾要挣钱，早出晚归，没有多少时间同老人聊天，这酒一喝，俩人话匣子都打开了。老人把自己的家世和儿子的情况都给顾竹轩说了，顾竹轩这才明白老人的儿子正是那个大人物顾祝同。一拍脑袋连说：“糊涂，糊涂。”其实老人平时也说了不少他儿子的事，只是顾竹轩没敢往高处想，因此这耳进那耳出。明白了老人是何许人，问题就简单了。顾竹轩马上就打听到顾祝同的住址，回来后他准备了一些菜，又请老人喝酒，说他的一朋友已打听到他儿子的住处，明天他先去看看，设法找人通报进去，再回来送他过去。老

人一听很高兴，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安排有道理，因为就这样直接去，看门的不知底细，不一定会让他们进去。

第二天，顾请了一个稍有点身份的朋友，也是帮会中兄弟，他自己扮作亲随，来到顾公馆。见到顾的副官，没说什么递上一封信，请他转交顾长官。信中只简单提到顾长官父亲已到上海，现暂住同乡家中，并写了详细地址。顾竹轩有个计较，他不愿日后那人觉得他想巴结高官，迫不急待。而且在江湖上，帮别人一点小忙，就想别人报答是很不义的行为。他与朋友去送完信，就自己拉车去干活了，此后几天都一直住在另一个朋友家。

顾祝同接到信，立即派人去接他老爹来府，不在话下。第二天，老人给儿子详细谈了此次来上海经过，当然顾竹轩的名字也输进了顾长官的脑袋。顾祝同觉得此人讲义气，颇有好感，有心帮助他，老人也一再要他派人去找顾竹轩一起来府一叙。可是派人去了几次均未找到，问邻居，都说好多天未见回来，这更增加了顾祝同对他的好感。顾祝同这样的人物，平时有多少人像苍蝇一样往上沾，而眼下这人不但不上靠，反而躲，所以顾祝同更要找到顾竹轩。顾祝同派人打听，终于找到顾竹轩。由他爹带着侍卫副官亲自来请顾竹轩。顾竹轩那天坐在屋里眼皮直跳，正不知是福是祸，看见外面那么气派的一辆小汽车开到，心想大福大贵的日子要开始了。遂穿戴整齐，随车前往顾府。

到了顾家，顾竹轩于席间表现还算得体。他到上海时间不短了，已有些见识，谈吐很有分寸。顾祝同想帮他在军中谋个差事，可顾竹轩考虑自己混社会这么长时间了，受不了军中约束，想依靠顾长官支持搞点自己熟悉的行业，赚钱挣点资本，再干大事。所以当顾祝同的老爹问他将来打算时，他就说想开一个车行，做个小老板，出租黄包车。这当然是小意思，不久顾竹轩的车行就开业了，包车行也就成了日后顾竹轩干大事业的资本。现在他终于有了点身份，就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拜了青帮另一支派的有名望的首领曹焕智为师，后开香堂，广收门徒，渐渐地成了上海青帮中仅次于三大亨的、能控制各种黑道买卖的大头目。抗战胜利后，“苏北大亨”顾竹轩在上海滩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连黄金荣和杜月笙这些人也不敢随便碰他。

顾竹轩的车行因有人支持，发展很快。他觉得光做一种生意难成大事，就是上海的所有黄包车都归了他，也算不上真正的大亨。他一直打主意要开辟另一块天地。一天下午，他去利达饭店会客，与客人同在饭店餐厅吃饭。当顾出去接个电话回来，发现桌旁多了一个女人，约二十六七岁，年轻少妇颇有风度。客人介绍说这是他一个朋友的前妻，在此巧遇。顾竹轩虽认识不少女人，可这少妇的风度还是把他镇住了。倒是这位女士老练成熟，几句话把顾竹轩抬得轻飘飘，然后一声“拜拜”，少妇迈着颇艺术的步点，咯噔咯噔走了。顾竹轩待少妇一走，回过神来，忙问客人这少妇究是何人。客人当然要讨好顾老板，把此女身世描述一番。顾竹轩当晚便鼓足勇气找上门去，如此一来二去，两人成了相好。这是顾竹轩一生中第二次好运气。

这少妇是个有钱有貌有本事的人物。她对顾竹轩敢打敢冲的好汉风格很欣赏，自己又有经营产业的经验，很快使车行生意扩大到整个上海。她一直劝顾竹轩眼光放远些，要做大生意。顾也赞同，只是一时还无机会进入其他行业。

这一天，顾竹轩遇到一个朋友，此人是个巡警，专管南京路一带茶楼、戏院。两人多日未见，提议找个地方喝两杯。两人边饮边谈，顾谈了他有再



干其他行业的意思，那巡警当时就说：“兄弟，你别急，我帮你想个好主意。你看黄金荣他们开戏馆很来钱，你为什么不能开一个。”顾竹轩听了当即摇头道：“你别说胡话了，南京路这一带是寸土万金，买地造房要好多万，我开个车行，到哪儿弄这么多钱。”他的朋友挡住他的话头，胸脯一拍说道：“对朋友我决不胡说，现在丹桂斜对面有块地，是公董局圈了的，现在他们想卖。我想办法保证几千块就能买下来，你放心。”

朋友看出他是因缺钱为难，所以犹犹豫豫，就干脆径直找到顾的相好，即那个少妇，那女人完全赞成，拿出积蓄，把地买下了。不久，一座很有气派的大剧院盖了起来，顾请人给剧院起了个名叫“天蟾舞台”。

戏院一开张，因为地段好，经营也不错，一下子发了财。正当顾竹轩财运亨通，准备要大干一场的时候，黄金荣派人请他去，开口就对他说：“你那个天蟾舞台恐怕保不住了。”开始顾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料黄金荣接着说道：“你们剧院附近有个永安公司，对吧？他们想要你这块地方盖大楼。这公司在英国注册，公董局准备出价收回这块地皮。租界是洋人作主，我们也无力帮你。”

顾竹轩一听就凉了，心想好不容易有点大搞头了，又碰上这等倒霉事。满面愁容来到他的相好那里，一迭声地说：“完了，完了。”谁知他的相好样子倒满开心。她在顾竹轩额戳了一指头开导他道：“你这人可真没见过世面，地是你的，别人要买就买？”顾很沮丧地说：“永安公司后台是英国总领事，我跟他们斗，还不是个输。”那位少妇很有主意，说道：“理在你这一边，大不了上法庭打官司。洋人的法庭是认理不认人，就是伦敦市长没理也不一定打赢官司。”这一下顾竹轩来了勇气，当场表示要拼老本打赢这场官司，争这口气。决心已定，俩人商议去请上海滩与洋人最有关系、又最不怕洋人的虞洽卿老先生出面为他们请几位洋律师，准备就绪后，一状告到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

领事馆这批人原是永安公司后台，当然向着公董局。几天后批文下来，说什么该地原系公董局产业，现在应由双方协议备价赎回。顾请问他的洋律师穆安素，这是什么意思。洋律师告诉他，他如果愿意接受此项裁决，公董局将赔偿他的地皮价款，但不能包括地上建筑，上面建筑由顾先生自行处理。顾竹轩一听就火了：“不管地上建筑，难道我能把房子搬走？真是欺人太甚！”不过这一回倒逼得顾竹轩背水一战非得把官司打下去。穆安素是职业律师，他希望顾竹轩把官司打赢，一是可得一笔可观的酬金，再则也可提高自己的名望。因为中国人与洋人打官司，历来总是洋人胜诉，他若打赢这场官司，就开了一个先例。他告诉顾竹轩，总领事无权最终裁决，他的裁决要有大使或公使一级批示，才能生效。若公使裁决结果你仍不服，还可告到伦敦大法院，那里才是最终裁决的地方。不过他补充说：“如果官司打到伦敦，将只能用外币付费，花费很大。您若决心把官司打到底，我愿意为您效劳，请您考虑一下告诉我。”

顾竹轩能在上海滩立住脚根，靠的就是一种狠劲，他已经横了心，倾家荡产也要把官司打到底。从穆安素那里出来，他直奔阿德哥虞洽卿家里请教。虞洽卿鼓励他道：“竹轩，这官司到这份儿上，只能进不能退，一退连你的地皮钱也拿不着了。这次你敢把状告到北京，告到伦敦，已是租界中轰动的大事，涉及国际视听，英国人现在不能乱来。这件事我仔细想过，你合理合法。外国人司法不受行政指挥，我帮你造舆论，这官司很大可能会赢。”

顾竹轩随即正式向北京英国公使上诉。公使早已听说了这桩案子。他觉得真要闹到伦敦去，舆论上对英国人太不利，不如派人私下调解为好，况且此事英国人不占理，闹得越大越没什么好处。他电告上海领事馆，要求他们派人与顾竹轩协商，争取劝顾谦让，给予一定的补偿。领事馆与公董局商议后，派了一个洋董事来找顾竹轩，还想强词夺理为公董局开脱。顾竹轩有了些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胆气越来越壮，他明确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不让，也不要任何赔偿；二是若一定要让，必须在市中心建一座三层楼的大戏院作为赔偿。此两条若不接受，就要把官司继续打下去。洋董事一看顾竹轩不好对付，就想吓唬他一下，“据我的经验，将来的裁决恐怕很难满足你的要求，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顾竹轩吃软不吃硬，一听这话火就上来了，大声道：“我顾某不在乎倾家荡产，大不了再做个穷光蛋。这场官司我要打到底，决不退让！”

一下子状纸又飞到伦敦。这些天顾竹轩在心里七上八下，在等待命运的裁决，因为只要一败诉，顾就一无所有，多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一连几个月过去，杳无音讯。这一天他已不抱任何希望，准备另找出路。请了帮他买地的那个巡警在家中吃饭，商议将来的去向。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是他相好的声音：“竹轩，好消息，你快到我这来。”说完就把电话放了。顾竹轩摸不着头脑，驱车来到她家，进门见他的心上人眼里含着泪，手里拿着一张纸，吓了一跳，搞不清是福是祸。这当口儿，标准的仿宋体映入他的眼帘：“顾竹轩先生，您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公董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10万元，由您另择新址，重新修建天蟾舞台。”顾竹轩一下子把他的相好抱起来，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原来他的相好出身世家，上面有人，正式通知未到，已托人搞到了裁决书的中文副本。这场前所未有的洋官司终于打赢了，顾竹轩在上海一下子家喻户晓。

晓。

顾竹轩并不总是有好运气，他也有倒霉的时候。他一生中最不露脸的一次是栽在了黄金荣手里，蹲了半年大狱。

原来在上海滩演京剧的场所，就数黄金荣的共舞台和黄金大戏院有名，黄金荣在黄楚九死后还接管了“大世界”游艺场，成为上海娱乐行业的霸主。后来杀出个顾竹轩，搞了天蟾舞台等几处戏院，都很红火，且顾竹轩占码头根本也不看黄金荣脸色，黄早就想找机会收拾这个“苏北大亨”了。

顾竹轩早年创业时，有个好朋友苏北同乡唐嘉鹏，顾与唐还多少有点亲戚关系。他们都是青帮兄弟，顾竹轩开设天蟾舞台时，唐嘉鹏为他到处奔走，出力不少。戏院建成后，顾觉得唐虽能干，但搞戏院经营不适合，仅给唐当了个稽查，唐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又投拜到黄金荣门下为徒。唐在黄金荣手下干得卖力，他为黄金荣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绑架尹启忱的儿子。尹是苏北人，同顾竹轩家有姻亲关系，其时在上海做寓公。顾竹轩在此事发生后与唐嘉鹏矛盾更深。

唐嘉鹏因干了几件漂亮活，很得黄金荣器重，后来黄金荣委任他做了“大世界”游乐场的经理。唐当上经理后，不可一世，利益独吞，目中无人，引起了帮中其他人的嫉恨。当时黄金荣的徒弟分两帮，一帮以唐嘉鹏为首，另一帮以陈荣生为首。黄把大世界经理职位交给唐嘉鹏，陈很恼火，就跑到老板黄金荣那里打小报告，说唐嘉鹏对师傅的儿媳妇李志清有不良企图。不料此事被唐嘉鹏听说了，一怒之下，派人将陈荣生暗杀在天蟾舞台后门。陈荣

生的师弟许福保为陈荣生报仇，也将唐嘉鹏暗杀，地点也是天蟾舞台，不过这次是前门。

事情发生后，黄金荣并不为唐之死惋惜，因唐当了经理后太得意，得罪人太多，又风闻与李志清有染，黄金荣早就想把他给撤了。黄金荣几位谋士出主意可用唐之死治一下顾竹轩，黄金荣觉得也是个机会，就通过租界巡捕房抓了顾竹轩拘留审查，理由有三点：一是唐嘉鹏死在顾竹轩的天蟾舞台门口，且两人过去矛盾很深；二是许福保杀唐前曾去找过顾竹轩；三是杀人凶手也是苏北人。开始，法院判顾竹轩入狱一年后，顾的家人和徒弟纷纷上诉，告初审判决证据不足，最后，国民党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定无罪释放，所以顾竹轩只蹲了半年班房，黄金荣在初审后这段时间，也觉得事情有点做得太过分，又收了顾竹轩徒弟的厚礼，在上边进行疏通，终审判决才免了顾竹轩半年牢狱之苦。

#### 6. 老太爷收徒开香堂

青帮的规矩不像洪门那样严格，对外也不像洪门那样防范森严。这是因为青帮早期就不是一种被严格查禁的政治组织，其帮会的基本宗旨没有很强的政治性。青帮的基本宗旨是：“义气团结，互帮互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青帮组织中有所谓“十大帮规”和“十戒条”之类，若人人真能遵守这些帮规，那真成为大善人了。实际上，青帮在早期阶段，对帮规还看得较重。后来，在上海青帮大发展时期，由于帮会成员的成分复杂，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严格执行帮规已经不可能了，大家也就看得淡了。比如黄金荣，连是否加入过青帮都没有搞清，就大收徒弟，真使人啼笑皆非。青帮历史上，有许多江湖黑话、暗语、“切口”，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用帮中特有的语言相互询问，例如家中来了客人，只要来客把帽子朝上（代表船），用手绢（代表锚）往帽子上搭便知是否要求在此吃住。如果手绢全搭进帽内，这就告诉对方，不必准备吃住，坐一会就走；若将手绢一端搭在帽檐上，另一端搭在桌面上，表示“下锚”，即今天不走了。

青帮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收徒仪式，即所谓上“香堂”。投奔青帮。有两道手续。第一步是上小香堂，拜师父做门生，算是预备考察阶段，这一阶段大约三到五年。青帮后期对考核不太看重了，自然这个阶段就大大缩短，又有些高官或文化人加入青帮都各有目的，一直就只是门生，故更无所谓考察。要做门生较简单，若你要拜某人为师，只需找该师傅两位徒弟做介绍人，由他们向师父推荐，师父同意后，就择时机搞一个小小的仪式，这就是上小香堂。在上小香堂前，要先写一个拜门帖子，帖子格式固定。大致如下：

门生×××，××岁，由××、××介绍，自愿拜在×××公麾下为徒，终身聆训，听候驱策。

帖子写好后，备上一份礼物，由介绍人领到师父家拜门。面见师父要一跪三叩首。然后入座由师父问几个问题，无非是家庭、个人背景之类。这时司仪在佛堂上燃烛焚香，拜师者要上佛堂向祖师爷行大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接着由司仪带领，向引见的师兄行大礼，仪式就算完成。最后，作为礼节，新入门的徒弟将由司仪领着去拜见师母，也是行一跪三叩的大礼。

上过小香堂的人，才刚刚入门，叫作“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这时的师父还不传授帮规海底，初入门者对帮会内部还了解不深。但只要上过小香堂，就被帮中其他人认做自家人，帮中称“家里人”。同一个师父的徒

弟之间称为“同参兄弟”，对帮外人则称之为“空子”。

一个门生，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师父认为门生可靠，考察合格，便准许门生上大香堂，正式履行收徒仪式，这时才算是真正的青帮弟子，可以称“徒弟”了。但开大香堂正式收徒，这入帮的第二步程序较复杂，花费也很高，不能经常举行，只是有了合适机会，并同时有一批门生正式入帮时才举行。

开香堂不是公开庆典，不论在清代还是民国时期，一般都不公开举行，总是选择较僻静之处和夜深人静之时。

开香堂招收徒弟时，必须有三个师父，一是“本门师”，也就是徒弟要拜的老头子，另一个是“引进师”，即介绍人，还有一个叫“传教师”，负责主持整个仪式，并传授帮规。上香堂有一个规定，就是上述三个师父所谓“帮口”必须有所不同，换句话说，三个师父要属于不同的帮口。帮口的涵义是这样的：早期粮帮，按归口分为三十六帮半，每帮拥有自己的船队，象征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帮名再按“江淮”、“兴武”等各由一排到十二，形成所谓“江淮四”、“光武六”各帮口。在开香堂时，有一项仪式是三个师父分别交待自己的帮口和三代姓名籍贯，因三个师父不属同帮，故称“三帮九代”。这“三帮九代”加上“十大帮规”是徒弟们必须熟记在心的。

为了清楚说明上大香堂的过程，这里根据史料，大致描述 1935 年张仁奎办的一次大香堂。大约是 1935 年春天，张仁奎决定搞一次上大香堂的仪式。提前一个月，张的门徒已着手准备。开大香堂前十天左右，张老大爷在各省的徒弟和门生都陆续赶到上海来参加盛会。所有的门生和徒弟自然不能空着手，都备有贺礼，按通例一律送钱。按能力大小，多者千元，少的十元。这些礼物，都充做开大香堂的费用。

大香堂就在张府举行，来参加的有徒众数百人，像韩复榘、黄琪翔等外省大人物均委托同参兄弟代表送礼参加。上海青帮名人黄金荣、陈世昌、杨虎等于晚八时都来到范园张府。一般说，开香堂时，除了三位师父和投师的人外，其他人若参加，都称做“赶香堂”。来者多属于前往捧场道贺，即所谓“帮场架势”的，大多数是开香堂老头子的故交；或虽无交情，但因某种考虑特别邀请来的，也有不请自来想拉关系的。所以，上海青帮巨头开香堂往往各色人物云集。

香堂正中悬挂着罗祖画像，供桌上从左到右依次是钱祖、翁祖、潘祖之神位，神位前供干果四包，荤素菜八件。在门外设有“陈四小祖”神位，设香炉供四菜。这陈四就是本章开头说的陈园，可以说是青帮的第一个徒弟，后来因犯帮规被革出师门，但陈园于青帮有大功，且是整个青帮的开山弟子，所以给他供一份香火，以为纪念，但因已不算青帮中人故将神位放在门外。

那次的大香堂本命师（本门师）是张仁奎，属兴武六帮；传道师樊锦臣，属嘉海卫帮；引见师高士奎，属江淮四帮。三位师父入堂之后，由二位先进山门的老资格徒弟担任香堂执行兼司仪。他们燃点五束用红纸条裹着的香烛插在桌下的香炉内，名唤五指抱头香，香的安排象征帮中兄弟抱头团结。

然后司仪口称：“请本命师张师父孝祖。”张仁奎便在翁、钱、潘三祖师神位前三跪九叩首。依次樊、高二位师父依此办理。接着三位师父到门外陈四小祖神位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

三位师父回入香堂，在香案左边就座。司仪又宣布：“各兄弟孝祖。”站在堂前的百十位徒弟一起跪下行大礼。对三位祖师大礼毕，全体原地面向门外小祖神位行大礼，然后，全体起身立于堂前。这时司仪请三位师父移坐

在香案前正中位置，宣布：“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弟兄陪拜。”于是全体跪下，再行大礼。站起后，先进老大立于两旁，新上大香的立于正中。司仪又说：“各位新兄弟行拜师大礼。”诸新徒再行大礼。

礼毕，司仪宣布：“各位新兄弟跪下受训。”各位新兄弟又听命跪于堂前，由执事把桌下五指抱头香提起给每一位新上大香者各一支，用心执于面前受训示。三位师父每人讲几句，再由司仪每人发给一份油印的十大帮规和三帮九代的名单。张仁奎开言道：“这是我们门里绝密之宝；要妥为保存，不得对外泄露，上不可告诉父母，下不可告诉妻女。你们只要牢记三帮九代，腰中不带柴和米，走遍天下有饭吃，这就是你们的终身饭碗，切记切记。”

仪式的最后一步是新兄弟向三位师父的谢恩，再来一次三跪九叩首，再向各位先进老大行见面礼，接着各位先进老大一同向三位师父道喜，这时司仪焚纸马宣布礼毕。大伙由司仪领着，新兄弟在前，老兄弟在后，去拜见师母，全部过程结束。接下来是非正式的活动，因为时间已是午夜，司仪对大家宣布，师母已备好元宵，请大家入席团圆。第二天上午大家一起又在范园吃团圆酒，新老兄弟坐在一起亲若家人，气氛很有喜庆的味道，席间还有许多人出席前来捧场。最后与师父一起合影留念。在这之后，新徒弟集资设宴向各位师父谢恩，至此全部大香堂正式、非正式活动就圆满结束。

青帮开香堂的仪式是很能代表旧中国帮会特色，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又集中显示了帮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特点。

### 三、皇城理帮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中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了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军乘机大举入关，占领了中原。入关的清军十分残暴，屠杀汉人如草芥，扬州十

日，嘉定三屠，多少人血流成河，身首异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爱国人士起而抗清，使各种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帮会组织纷纷创立，皇城理帮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立的一个帮会组织。

#### 1. 理帮的诞生

下雪了，先是点点雪粒带来雪花，接着那一片片的雪花随风飘洒。刹那间，天空中便弥漫着银白的雪花。北方的雪下得猛也留得住，很快大地便披上了一层银装。地上的路越来越滑，天也很快地阴暗下来。“看来今天是赶不到北京城了！”走乡串户贩布头的刘四擦了擦脸上的雪，边走边想：“好在前边不远处就有一家客栈，先到那里住上一晚再说吧。”想到客栈里那温暖的火盆，老板娘那风情万种的秋波，以及那家客栈在京郊小有名气的白水煮羊头，刘四不由得加快了脚步。风急、雪猛、人更急，猛抬头，一盏风灯高挂，客栈到了。

这是一家不大的客栈，不但与京城里的燕云楼之类大店相差甚远，就连一般的小客店也比不上。平常客人并不多，客人大多是因怕到京城太晚进不了城而在此暂住一夜，也好次日赶早进城逛个早市。所以，店里也用不了帮工的小二，客栈夫妇二人独自经营，老板娘卖酒记帐，老板打杂下厨，倒也能勉强维持生计。今日老天作美，一场大雪为这不景气的小店留下了不少的客人，刘四的运气还好，住上了客栈最后一个铺位。

酒足饭饱，门外依然风急雪猛，冬天日短，长夜难熬。住店的客人大多是刘四这样的小贩，加上北京人爱侃，因此，不约而同，大家饭后都围坐在了火盆旁，天南海北地侃了起来，借此消磨时光，打发一天奔波的疲劳。从故乡风土到谋生之艰；从明朝显荣本城的豪门大户，到如今树倒猢狲散，以至许多权贵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的凄凉故事；从清兵如何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今后要在异族统治下过低人一等的日子等等。谈着谈着，大家心里不免沉甸甸的，不时有人发出长吁短叹。有人说：“听说南方还有郑王爷奉大明正朝，率军队抗清，打了几个大胜仗，使清兵胆丧。咱们燕赵之地，自古为豪杰之乡，就没人敢对清兵的淫威挺身而出么？”

“老哥，你大概最近没在京城里呆过吧？咱北京城里可出了好几件奇事呢。几个恶贯满盈，残害百姓的鞑子官都被好汉给杀了，北京城可出了几个大英雄呢。”一位中年客人道。“他是谁呀？敢杀了那些狗鞑子？”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那客人在众人的追问下，一时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刘四见状，高声叫道：“众位老哥，大家静一静，不要着急，听这位老哥慢慢给我们说说。”见大家静了下来，那位中年客人清了清嗓又说：“这位大英雄是谁？小弟也不太清楚，也没有和大英雄见面这个福份，所以他长什么样也就知道了。只是听说他好像是位道长，这事我也没亲见过，多是口传，众位不可全信。满清鞑子有位兵部侍郎叫多哈，大家可能听说过此人。据说他还是满清鞑子皇子的亲信，此人不学无术，特别横暴，专门欺压百姓。诸位

也许听说，有个鞑子将军带兵圈地，在晨利县把整个庄子的地都圈占了，说是要用来作牧场，把一庄的男人全杀了，妇女赏给部下取乐，然后回来向皇帝报功，说剿匪大胜，要求封赏。这人就是多哈。他在京城里也是作威作福，经常强抢财物。稍有姿色的民女，凡是被他看见就抢回府中作乐。连小弟这种小本生意他也不肯放过，要按月向他贡奉。提起此人，京人真是无不咬牙切齿。突然有一天，此人的首级被挂在万府前的旗杆上。清兵大肆搜捕，也未能抓到杀多哈的人。我的一个侄子为混口饭吃，在多哈府中做小厮，他和多哈五姨太的丫环红梅很熟，红梅对他说，多哈最宠五姨太，他是被杀死在五姨太房里的。那天晚上，多哈在五姨太房里饮酒取乐，红梅为他们暖酒回来，只见一条人影闪进了五姨太房里，红梅吓得不敢进去，只好趴在窗户上向里看。只见多哈喝问了一声：‘什么人？’拔剑就刺，来人将拂尘一挥，多哈就好像受了重伤，宝剑掉在地上，惊恐地退到墙角，五姨太也吓晕了过去。来人历数了多哈的劣迹，多哈跪求饶命，只见来人毫不理睬，拂尘再挥，多哈立刻惨死地上。来人用多哈的剑割掉他的首级，身影一闪，飘然而去。红梅看得清楚，来人仙风道骨，手挽拂尘，俨然是位道长。”客商说到这里，众人议论纷纷，说起户部主事阿刺的被杀，以及出外抢掠的清兵屡次被杀大约也与这位道长有关，不免嗟吁不已，心中实在神往，又自叹不能做英雄，拯民于危难之中，惩恶于满盈之际，只有靠叙说英雄故事来表达对这些侠义之士的敬慕。

想到自己回京城也就是回家看看，再办点货，用不着早进城，所以，刘四在天明时分又睡了回笼觉，直到午时晨光才往京城赶去。此时进城的客人已经走光了，雪地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寂寞的脚步声。一边走他一边回想着昨夜“侃大山”的余味。这几年兵荒马乱，自己亲眼目睹了清兵许多暴行，也吃过许多清兵的苦头和欺凌。就在上月，他在黄村卖布头的时候，仅卖得的几个大钱和布头就被清兵一抢而光，但自己敢怒而不敢言。想着想着，突然间，前边传来一阵凄厉的喊声：“救命啊！”刘四被昨夜的英雄故事所激起的一腔正气勃然而出，飞快地循声跑去……

原来是一伙清兵正在调戏一个女子，女子被压在雪地上，兵士野蛮地要解开姑娘的衣裤施轮奸。姑娘的苦苦哀求，只换来清兵的阵阵淫笑。见此情景，刘四怒不可遏，大喊一声：“朗朗乾坤，青天白日，怎容你等鞑子胡作非为？”猛扑上去，挥拳便打。怎奈刘四平时练拳不精，功夫太浅，那抵得过如狼似虎的清兵。清兵回过神来，几个人很快围住刘四，一阵狠揍，眼看刘四性命不保，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这时，刘四恍惚间只见一人飘然而到，拂尘连挥，清兵难以招架，非死即伤，其余的见状拔脚就逃。那人也不追赶，转身走向刘四，让他平稳地躺在地上，为他推拿治伤。刘四很快清醒了，只见此人原来是一位道长，刘四心中一动，想起昨夜客人所说的大英雄，莫非正是此人？他立即挣扎着起身便拜：“多谢师父救命之恩，请受弟子一拜！弟子尚有一件不情之请，求师父恩准。”道人微笑道：“施主不必拘礼，有什么要求贫道只要力所能及，绝不推辞。”刘四道：“弟子要拜您为师，学身功夫。”“干什么？你家里的人同意么？”刘四说：“弟子要学师父的功夫打鞑子，使百姓免遭鞑子欺负。弟子家里只有老母和弟弟，弟弟已成年，可以奉养母亲，所以弟子没什么牵挂，可以一心学艺。”道人微微颌首道：“贫道见你忠勇可嘉，不失豪侠本色，就收下你吧！为师姓杨，名来如，你先将那位女施主送回家，再到

家去稍作安排后，就到剑县岐山揽水洞来找为师就是了。”

刘四后来知道，他猜的没错，恩师杨来如就是人们所说的大英雄。

杨来如出身贫苦，后到北京白云观学道，由于聪明用功，颇得师父亲传，一身功夫出神入化。白云观为邱处机全真教下一大道观，对徒弟门人的道德品质督促很严。在这种气氛中，养成了杨来如为人正直、与人为善、嫉恶如仇的品格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清兵入关后，他始终奉明朝为正统一。他对清军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侮辱妇女，无恶不作深恶痛绝。对于作恶多端的清朝官兵，他多次给予惩罚。他已成为京城人口传中的大英雄，拜师学艺的人越来越多。

一日，被派出打探消息的弟子回来说，南明桂王已被清兵追杀。郑王爷也被迫退回台湾，清兵正调集军队，对台湾进行封锁和包围。杨来如听后沉默不语，挥退弟子沉思起来，他想起：原指望郑王爷和桂王能够一鼓作气，打回北京，驱走鞑子，复我大明，看来一时难以实现。清军残暴，无恶不作，自己虽屡次出山，杀了一些作恶多端的鞑官鞑兵，使清兵稍有戒收，可是要复我大明，却非一人之力所能奏效，只有另谋他途。身边这些弟子，经过多方考察，俱为忠勇有义之士，何不就地取“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扩展力量。为国报仇，反清复明呢？当然，要反清复明，仅靠弟子们也不行，还必须吸引更多的民众参加。另外，还要有一个公开的旗号，以免在力量不聚之前被清兵剿杀。用什么样的口号呢？中华自古为礼仪之邦，小民百姓多为读书人和方求之士，守信唐理。而清兵少教化，多凶暴，百姓痛恨，就干脆叫“理帮”吧。要驱逐鞑虏复我大明，非一朝一夕之事，这要求百姓有一强壮的体魄方能为国杀敌，而烟、酒最使人伤身失智，何不就以戒烟、戒酒为名，组织理帮呢？这样既可训练民众，为复兴大明积聚力量，又可掩清廷耳目，其可谓一举两得之计。

不久以后，杨来如就在洞内设香案，召集徒弟说道：“众位徒儿，自吴三桂引狼入室，我生灵涂炭，先皇蒙尘，大明江山沦于敌手，清兵如狼似虎，杀我百姓，无恶不作。寻常百姓，流离失所，难寻安生之地。我等热血男儿，居大明之都，食大明之粮，当思忠勇报国，反清复明，为国报仇。为师思之，复我大明，为今日之大计。这就需要组织帮会，以聚民众，待时机成熟，一鼓而起，赶走鞑子，复我大明江山。为了这个宗旨，为师把这个帮叫做‘理帮’。另外，为防清廷耳目，徒儿们可称理帮是为了戒烟、戒酒，但切不可忘兴复大明之事。从今之后，各位徒儿可四散传教，教人入帮，扩大力量。如是，则我复兴大明有望矣！你们意下如何？”众徒听完，无不热血沸腾，齐声答道：“愿遵师父号令，反清复明，为国报仇。”

理帮就从此诞生了，后来，正如洪帮被称作洪门一样，它也被称作“理门”。由于它创建于北京，又主要在北京活动，所以又称“皇城理帮”。上述理门小史是理帮领众的传说，当然不可全信，但杨来如确有其人，理帮也大致建于明末清初。关于理帮建后的传说很多，由于篇幅所限，理门的其他创建史，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另一种说法是，郑成功郑王爷在退守福建、台湾之后为兴复大明之计，创建了洪门、洪门弟兄为方便在城市里的活动，掩清廷的耳目，在各大城市设理门公馆，以联络弟兄，扩展势力，并以戒烟、戒酒相号召。后来，北京一带的理门公馆逐渐扩大，演化为理帮。此说的根据在于理帮和洪门的宗旨都一样，杨来如传授弟子的五字真言和洪门的口诀都是“反清复大明”。还有一种说法是，杨来如实际上是羊来如，他不是什



么道士，也不是北京人。他是山东即墨人，在明朝中了进士。明以后，他就创立了理帮，以不吸烟不喝酒为号召，宗旨是“反清复明”，在江湖上被称作“白”派。据说羊来如曾在济南大明湖历下亭题诗说：“三尺青锋开壮图，岂能俯首事羌胡。他年若得凌云志，敢教血染大明湖。”

理帮的历史历来由领众口传，其中因年代久远，因此对于理帮的诞生出现了多种的说法。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理帮建立于明末清初，其创始人是杨来如（或羊来如）。

杨来如一生忙于理门事务，为理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理门的许多帮规和仪式都是由他制定的。杨来如在去世前，对其徒弟传理门的五字真言为“反清复大明”，并立下了不传父母妻子的戒条，如有泄露，将有杀身灭门之祸，杨来如后来被理门尊奉为杨祖。他死后，其徒弟天津人氏尹来风继承其志，使理门继续发扬光大。

## 2. 发展与变异

天津城外有个小村庄，地方不大，也就方圆几十里大小。庄里都是一些穷苦的农人，因大多数人都姓尹，所以这庄也就被叫做尹家庄。庄里的地产属于明朝的一个大官，全庄的百姓都是他的佃户。据说这位官爷颇得明朝皇帝的宠信，赏给他的田庄有很多处，田地有好几百亩。既然有那么多的田庄，这位官爷当然是在京里享福了，高贵的脚步也懒得到这种地方停留，每年的租子都是由尹家庄的村长尹保禄给他代收好送去。由于有这种关系，这尹保禄也就发了点小财，成为尹家庄的唯一的富户。逢年过节也能到天津逛上一趟，听几出大戏，尹保禄也乐不可支。

尹保禄有个本家兄弟，叫尹保贵，此人年少时颇有些聪明天资。族人希望能由他来中兴门庭，因此由族中筹钱让他进了学堂，实指望他能从科场上博得一些功名，谋得一官半职，也好出人头地。这尹保贵确也有些不凡，十来岁进学堂，到了二十岁左右就中了秀才，眼看前程似锦，可一鸣惊人之后，就再无惊世之举，屡试不第，而且，还赔进不少盘缠与花销。族人渐渐有了烦言，尹保贵心下也是郁闷，终于一病不起，撒手离开人世，在阴世继续他的科场生涯去了。有道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骤遇顶头风”。这尹家嫂子见夫君绝尘而去，孩儿尚幼，且夫病时负下了一屁股的债，往后日子也难熬，便愁眉难解。她本来身体就弱，一口闷气老窝在心中无法发泄，没多久也随夫君去了，留下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独自品尝人世间的炎凉和辛酸。

这孩子父母在世时很疼爱他，久不得志的父亲对其期望尤高。因为降生的时候很巧，当他呱呱坠地之时，报子来报他父亲得中秀才，尹保贵很是高兴，即为之取名为“来风”。来风也挺招人喜欢，聪明伶俐，五六岁时，父亲教其识字，一个字教上两三遍也就记熟了。能读、能写。两三年功夫，多少也识了不少的字。可父亲大病在身，不能传授他更多的东西，也无钱让他进学堂深读。父母相继辞世，家中四壁皆空，连几间破房也早已典当他人，邻里和族人帮他张罗办完了他母亲的丧事，他家已是分钱无剩，颗粒无存。这孩子以后的生计怎么办呢？

中国的农人是颇富同情心的，对这孤苦无依的孩子尽力给予着照顾与关怀。可是尹家庄一般的邻里乡亲们都很穷，无法长期供养他，当然也不忍心看着他饿死或者流落他乡。于是，尹氏族人们进行了商议，在一片爱莫能助的叹息之后，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尹保禄。

实际上，尹保禄对于这位本家侄子是很喜欢的，对于他的处境也很同情。他知道，全庄里也只有他才有能力给尹来风提供一条生路，他也希望这样做。但他的夫人王氏却很尖刻，哪容他家白添一张吃饭的嘴呢？尹来风到了他家就得去干活，否则的话，王氏就会吵翻天，唠叨不休。真要这么小的孩子去干活，他心里不忍，也怕族人议论。可他又惧怕母老虎般的王氏，这使他两头为难。

见大家都盯着他，他再也不能沉默了，只得对大家说道：“各位前辈、兄弟，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既然想不出其他办法，就让来风到我家吧，我一定将他供养大。不过，我也得把丑话说在前头，来风到我家之后，可也不能什么都不干，我也不会让他干太重的活计，伤了他的身子骨，如各位同意，今天就让来风上我家去，如果不行，只好请大家另外设法了。”大家都姓尹，又同住一个庄子，谁家的底细大家都清楚。因此，族人们都明白尹保禄说的是实话，大家又商议了一阵子。最后提出就让来风放几头牛，其他的族人有空时顺便帮帮他。活儿也不是太重，尹保禄回去对王氏也好交待，就这样，来风就成了伯父家的牛倌。

虽然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乐趣，承受着接连失去双亲的巨大悲痛，但是在族人和邻里的关怀下，来风很快就从悲伤中恢复过来。他知道伯父收留自己不太容易，因此牛倌的职责干得实在，把牛养得油光水滑，膘肥体壮。闲时也练练父亲教的字，日子过得倒也不是很糟。一日，来风吃过早饭，早早地赶着牛出了庄子，来到庄子外靠大路的一座小山上。由于离庄子较远，平常来放牛、割草的人不多，所以这里的草长得特别肥，牛儿们欢快地吃着草。牛铃叮叮，阳光轻柔，照得人暖烘烘，懒洋洋的。来风用树枝在地上划了一会儿字，由于头一天晚上睡得不太好，又正是贪睡的年纪，所以，很快便在草地上睡着了。温柔的阳光拂在身上，多像母亲慈爱的手在抚摸着这失去母爱的孩子。来风睡得很甜，很香，做着美丽的梦。在梦里他又见到了慈爱的双亲，父亲手把手地教他认字，母亲在一旁做着针线，对着父子俩温柔地笑着。多么温暖的家啊！

在来风沉浸在梦中的时候，牛儿们吃饱了，在草地上追逐，渐渐地来到了大路上。此时，正有一队清兵经过，一见这群肥壮的牛，就像上天赐给的厚礼，不由分说，赶着牛就走了。

在梦中，父亲在对来风进行考试，抽考他前几天学的字，突然，有一个字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父亲的脸变得严肃了，母亲也没有了温柔的笑容，来风吃了一惊，一下子醒了过来，才明白那是在做梦。想起逝去的双亲，来风的心里变得沉甸甸的。这时，空气是那么的沉闷，没有一丝儿声音，迷迷糊糊的来风突然抬头回望，心下一沉，不好，牛都上哪儿去了？

来风慌了，在山上跑来跑去地寻找着牛的踪迹，他叫着一头头牛儿的名字。顺着牛践踏草地的痕迹，来风来到了大路上。大路上那纷乱的牛蹄印、马蹄迹及人的脚印，明白地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牛已被抢走了，来风一下子哭了起来。天地间一片凄凉，轻柔的风像这个世界发出的爱莫能助的叹息，把他的哭声传得很远、很远。哭声渐渐小了下去，来风在想今后怎么办。丢了牛，伯父家是回不去了，伯父在危难之际收留了自己，伯母虽有时表现得刻薄一些，但对自己也不算太坏。自己不但没能报答他们的恩情，反而把牛搞丢了，这牛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啊！自己实在没脸去见他们了。那又到哪里去呢？望着脚下的路，来风想到父亲曾说过这路很长，很长，一直通向京城，

京城里住着皇帝和许多王公大臣，这尹家庄的地主也住在京城里。京城是个很大的地方，也许会有很多求生的机会，眼下只有沿着这路到京城去，以后有了出息再回来报答伯父和乡亲们的大恩吧。想到这里，来风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对着庄子的方向磕了几个响头。说道：“伯父，侄儿对不起您，无颜再见您老人家。以后若有出息，侄儿一定会回来报答您老人家。”经过几十天的风餐露宿，沿路乞讨，来风终于来到了北京城。

此时的北京城，刚经过战火的洗礼，到处是残垣断壁，一派狼藉。街上随处可见被杀掉的人的尸体，老百姓不是被杀了，就是逃难走了。来风举目无亲，乞讨无门，拖着沉重的脚步希望能找到一点食物，他已有两三天没吃东西了。突然，他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上，虚弱的他一下子竟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见一位道长正微笑望着他。见他醒了，道长对他说：“孩子，你是饿坏了，怎么好几天没吃东西呀？你的父母在哪里？”听了道长的问话，来风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抽泣着向道长诉说了他的身世。听完他的诉说，道长沉默了一会儿，对他说：“孩子，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真不该一个人出来瞎闯。不过要你再回到天津去也是不行的，在北京这样下去，又不是个办法。如果你不怕吃苦的话，就跟着我吧。我叫杨来如，是白云观的道人。”听了道长的话，来风喜出望外，马上对道长磕头，拜认了师父。

从此，尹来风成了杨来如的徒弟。由于他聪明伶俐，又很能吃苦，而且还识字甚多，因此，他的功夫长进得很快，颇得师父的赏识。他为人很谦和，和师兄弟们相处得很好，从不恃宠而骄，故也深得师兄弟们的器重。他办事很果断，而且颇合师父的心意，杨来如就越发地喜欢、器重他，很多事都放手让他去办，其他的弟子们对他也很敬服。因此，在杨来如去世以后，大家就推举他继续领导理门。

尹来风接掌理门的时候，清朝在北方的统治已逐渐稳固，农业生产有所恢复，社会秩序开始安定下来。清朝统治者也开始改变残暴政策，用多种手段来加强统治。这样，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理帮在北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尹来风不得不想办法使理门的活动方式更适合当时的局势，使理门生存下来。

接掌理门的第二年，他回了趟天津，离别故乡 20 余年，他由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成为一位身怀绝技的中年人。由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胸怀大志的帮会领袖，但见到一路上故乡的土地，他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激动，直奔尹家庄而去。

二十余年沧海桑田，天灾人祸，尹家庄已物是人非。尹家庄的村民已大多不姓尹了。他离开尹家庄不久，清军来到了这里，大肆烧杀抢掠。他的伯父尹保禄及许多村民都死在清军的刀剑之下。这些是村民所能告诉他的一切。尹来风听后，热泪纵横，满腔悲愤，心中燃起复仇之火，更加坚定了他反清复明的决心。

这次天津之行，还使他发现，天津虽然离北京不远，但清王朝对天津的控制却比北京要松得多，这正是理门发展的大好之地。因此，他开始在天津建立组织。天津地处九河末梢，又是靠近北京的一大海港，航运繁忙。那时没有什么机械，货物的装卸全靠人力，在码头扛包成为天津人的一大谋生手段。这是一种强度很高的体力活，对体力程度要求极高。理门的戒烟、戒酒

主张，颇合码头工人的心意，因此，尹来风在天津很快便建立了一两个理门公所，使理门在天津有了发展基地。清朝统治者对于反清组织的镇压是十分严酷的，侦缉遍地、特务横行。一旦有所发现，必大兴狱，大肆杀。在这种形势下，尹来风为避其锋芒，加上他和杨来如本是道士出身，就在理帮中掺杂了许多道教色彩以掩清军耳目。对于理门的根本宗旨，对一般的理帮徒众也讳莫如深。同时，为了推动理门的迅速发展，尹来风对理帮收徒的条件和理门公所的建立也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如某一理门资深道亲如能取得当地有力绅商的支持援助，便可设立会所成为领众，开始点理传道、戒烟、戒酒、某地绅商为了倡导戒除烟酒，也可从有理门组织的地方接触领众，前来设立公所，点理传道，劝戒烟酒。对于理帮徒众的选择也十分宽松，不论各色人等，三教九流只要愿戒烟酒，参与理帮的各种活动并缴纳各种费用，经一两名道亲介绍，即可成为理帮的道亲。这样理帮的发展速度就很快了，理门公所到处开花，参加理帮的人数日益增多，使理帮成为众多帮会中的一个大家帮，几乎与青帮和红帮齐名。

理门的迅速发展，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冲击着理帮的原有信念，使理帮的性质迅速地发生着改变。在理的帮众来自不同的阶层，抱着复杂的动机和目的，理帮失去了初创时的纯洁性，它的根本宗旨“反清复明”更难于在帮众间传达和为帮众所接受。因此，理帮的反清色彩逐渐淡化，而作为遮掩耳目的口号“戒烟戒酒”取代了“反清复明”的根本宗旨成为理帮的实际口号与主张。由于理帮内部的这种演进和变化以及客观外在环境的变化，理帮也逐渐向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道门方向发展。

清朝康熙、乾隆以后，清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台湾的郑经集团投降了清朝。在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清朝镇压了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势力。在东北地区，康熙帝出兵雅克萨，打败了沙俄侵略军，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保障了东北边疆。这样，清朝的统治在全国巩固下来，达到了强盛时期。国内各种反清组织的活动逐渐进入低潮，许多反清帮会组织被清廷侦破，首领被捕杀，活动几乎停止。与此同时，理帮越来越松散，理帮的实权控制在各理门公所的领众手中，而各地理门公所的领众多结交官府绅商，并以此为生，而且有相当一部分领众本身就是富商、地主，理帮反清复明的宗旨已成为他们的障碍和威胁。因此，他们就将“反清复大明”的五字真言改为宗教迷信性的“观世音菩萨”五字，还加上许多似通不通、非驴非马的佛教、道教内容，并巧立名目为“八方道”，把理帮变成一种道门的形式。如理门各领众都对道众宣传理门是“三清道”，“三宝法”。所谓“三清道”，就是说根源于道教，是从道教传说中的“老子一气化三清”而来的（这一传说在民间流传很广，许仲琳将其纳入了我国古代寄书之一的《封神演义》中）。而“三宝法”则属于佛教，所敬之神为佛教的观音菩萨，所传法语亦多为佛经法语，如“转世轮回”、“因果报应”之类。清朝道光以后，鸦片的大量输入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尤其是对中国人民体质的残害越来越严重，中国人民要求禁烟的呼声越来越高。道光帝也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理帮的戒烟戒酒口号颇能吸引民众，又加上理门领众的各种迷信手段宣传，就吸引了大量的人加入理帮，使理帮的流传又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了。

佛教和道教在我国是两个独立的宗教，有不同的崇拜偶像、禁忌和仪式，而理帮却把它们混在一起，对道众胡说乱讲，施行欺骗。多少年来，竟能越传越广，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拥有众多的道众，是因为旧社会为各种封

建迷信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首先是人民所受教育甚少，民智未开，他们对佛教、道教的认识相当的肤浅，对领众的宣传无法进行判断，二是参加理门的道众大多数属于旧社会所谓“下九流”，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酷剥削和压迫及其长期欺骗宣传，其脑中本已有很浓厚的封建迷信，对理帮领众的宣传容易形成共鸣；三是劝戒烟酒在过去恶习多端的旧社会，确属一件客观需要的好事，对于广大人民有一定的吸引力。

### 3. 打击与复兴

到了清朝晚期，理帮反清复明的宗旨已完全消失，它已完完全全蜕化为一个纯粹的封建迷信组织，成为各理帮公所聚敛钱财的一种工具。务地理帮公所的领众成为当地的闻人，与官府绅商有密切的往来，理帮的活动得到了官府的默许与支持，理帮约影响正稳步扩大。但是祸起萧墙，理帮在光绪年间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差点使理门灭迹。

清朝晚期，多种社会矛盾严重激化，西方殖民者的大举入侵，已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清朝统治者对殖民者卑躬屈膝、妥协投降，对中国人民却残酷压榨与剥削。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贪污贿赂成风，官场严重腐败。中国人民面对殖民者的疯狂侵略和清朝的反动统治，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都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对西方殖民者和反动的清王朝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人民革命运动的打击下，统治者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加紧了对人民的控制与镇压，理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了厄运。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开始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为了加速清王朝的灭亡，赢得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先生决定利用团结各种反清组织，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因此，派了许多兴中会会员回国进行革命活动，联络各地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当时有一个人叫钱树德，家居湖南湘乡县，家道还算小康，所以能送他读书。他对读书很有兴趣，人又很聪明，因此到了省城的岳麓书院就学。在省城长沙，他接触了一些新思想，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到了国外，他的视野更宽阔了，对于清王朝的腐朽以及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有了较深的认识，产生了反清的思想，并和留学生中的革命者有了接触。在他们的介绍下，加入了兴中会。由于留学期满，他不得不回国谋职。兴中会根据他的情况，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要他回国后，联络会党，建立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回国后，他先呆了一段时间，和洪门有了一些接触。当地洪门的首领给他介绍了各地会党的一些传闻。他听说，在洪门创建之初就开始分化出礼门，原因是清廷对洪门的镇压。礼门也称理门（即理帮），礼门的形成就是因为清廷对洪门防范甚严，在城市里只好以借戒烟戒酒，戒嫖赌之名以图生存发展。礼门首领通常不告诉门徒真旨，到死前才把反清复明的宗旨告诉衣钵传人，所以清廷是允许礼门存在的。因此他决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联络理门之上，因为理门在北京的影响较大，人数较多，有一定势力。

进京以后，钱树德住在湖南会馆，并到吏部去报了到。按照清政府的规矩，吏部是分管全国官员的升降调配的，要想获得正式的任用，不花一大笔银子打通关节是不行的。钱树德刚从国外回来，对官场的情形不甚了解，吏部的任用命令久不下来，他虽觉奇怪，却也不知该如何活动，更何况，这种闲散的机会，正为他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因此，他也就更懒得去问了。

利用这段空闲，钱德树每天早出晚归，加紧工作，希望能与理门的道众和一些理门公所的领众有所接触。他急于加深对理门的认识与了解，以便使理门融入反清革命的洪流。然而，对于一个人地两疏的外地人来说，要寻找一个秘密的帮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打入其内部，与其共谋大举呢。这种事可不是随便可说的，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自己的生命固然在所不惜，但革命大业却不能有损。因此，他的活动又不得不十分小心，这就使工作的开展越发困难了。虽然他连日四处奔波，却连理门的一点线索也没能找到。尽管他奔走的兴致未减，心情却越来越沉重。茫茫人海，理帮何处寻觅？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机，钱树德结识了理门公所的领众孙福，便向他提出了加入理帮的请求。孙福见他是个官人，有心巴结，当下答应，不久就要池带上五吊入帮钱，为他举行了入帮仪式。

加入了理帮之后，钱树德对理帮有了更多的认识与了解，可是了解得越多，他就越失望。他很快地发现，理帮已完全堕落为一个封建迷信组织。非但没有丝毫的反清色彩，反而竭力靠拢清政府。由于他的官人身份，领众孙福并不将池看成一般的道众，对他很是客气和拉拢。经过多次接触，他发现孙福是一个贪婪的家伙，把理帮完全当做他谋财的工具与手段，虽有时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只是因为清廷爪牙对他的索捐多了点，钱树德多次向他暗示，用洪门的暗号与他联络，都没见有什么积极的反映。点理以后，钱与其他理门公所的领众也有所接触，可并没有什么收获。但他想，在清廷的心脏，自己还有一个清廷官员的身份，或许他们对自己不相信，当然无法谈机密大事。所以他依然抱有希望，努力地工作，却没想到一件意外的事却使他身陷监牢，给理帮带来一场飞来横祸。

一天，他正要离开会馆的时候，撞进了几个如狼似虎的捕头，将他带进了刑部衙门，并对他的住房进行了抄查。原来，兴中会派人来与钱树德联系，这位联络员在赴京途中被清廷抓获，在严刑拷打之下，他供出了赴京的原因及钱树德在北京的秘密使命。清廷大为恐慌，立即派出捕头把毫无准备的钱树德抓了起来。在搜查中，清廷的爪牙发现钱树德在京期间和理帮有很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搜出了钱的一本日记，上面记载了他与理帮联系的过程，以及理帮原为反清复明组织的传说。这使清政府大吃一惊，因为清政府也知道理帮在北京的影响很大，要是理帮在京城造反，可不是一件小事。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对此可不愿小视。此时虽是光绪帝在位，实权却操纵在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手中，这个女人虽让人称她为老佛爷，可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刑部的奏章上来后，她立即下令对理帮进行大搜捕。

如狼似虎的捕头、兵丁、差役在京城里对理帮道众进行大搜捕，一部分领众被抓进了监牢，另一些领众溜掉了。清廷对普通的道众也不敢放过。只要不嗜烟酒，即被认为是在理门徒，立即抓走。在理者为了性命安全，有的反了理，吸起烟、喝起酒来，不反理者，也都假装吸烟随手带着烟袋、烟荷包，荷包里装的却是茶叶。北京城里一片恐怖，被抓去的理帮道众有 1000 多人，后来，清政府在搜捕中并没有发现理帮有反清的直接证据，被捕的理帮道众和领众对于什么反清复明之类也的确一概不知。搞清了理帮仅是一个封建迷信组织，对清朝的统治不会有什么威胁。因此，对理帮的道众也就不再继续捕拿。对抓去的道众，在勒索了大笔钱财之后，陆续地放了出来。也有人受不了严刑拷打和牢内的恶劣条件而惨死的。钱树德被清廷杀害了。这

次打击，使理帮元气大伤，很长时间都未能恢复过来，到了清朝被推翻之后，理帮才有所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 4. 总会里的争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并没有完成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任务，中国没有从此走向人们梦寐以求的繁荣富强与统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军阀之间混战不休。由于北洋军阀的默许和支持，各种帮会势力纷纷从秘密状态逐渐走向公开，成为反动军阀聚敛钱财、培植势力、镇压和控制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皇城理帮也趁此机会，从光绪年间大打击的阴影中走出来，投靠北洋军阀，挂出了全国性机构的牌号。

在京城西部有个小村庄，叫桂甲屯，这个村子不大，住的都是清朝绿营兵丁的家属。村里有一户姓苑的人家，户主在绿营中挂着一个小官职，种着清政府发给的几亩薄地。这苑家的户主颇有些功夫，只是清军腐败，他又没钱去活动，所以一直得不到升迁。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使他十分消沉，除了按时到营里去应酬点卯外，就呆在家里喝点闷酒，教儿子们练武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比较忠厚老实，除了随父练武，也帮母亲耕种收获，为一家的生计而忙碌。小儿子文鉴却因父母宠爱而游手好闲，人也有几分聪明，惧着父亲的拳头与耳光在练武时还算认真，一旦父亲到营里去了，他就在外和一帮小痞子混，偷鸡摸狗，寻衅闹事，无所不为。他开始还有些害怕父亲的责打，年龄既长，连父亲也不放在眼里了。他父亲为人还算正直，对他多次规劝、责打，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可慢慢地看出他已无可救药，伤心失望之余，正好有个京城大户人家要找护院的家丁，就把苑文鉴送了去。

这苑文鉴到了京城之后，痞性不改，结果吃了几次亏，他认识到自己势单力薄，难以在京城立足。因此设法混进了理帮。他为人颇有些聪明，又有功夫在身，因此在理帮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清政府对理帮的大搜捕，也把他吓得半死。溜回家躲了一阵，风头以后，他回京发现原来理门公所的领众已经溜得不知去向。他抓住这个机会，召集本所的道亲，恢复公所，他自己也成为公所的领众。苑文鉴当了领众之后，便利用各种手段拉拢、欺骗人入帮，使它的公所很快成为北京几大公所之一。苑文鉴势力的迅速扩展，还和他的谋士、安徽人李毓如分不开。

李毓如是安徽一个小地主家庭出身的读书人，为人机敏，读书也颇用功。可惜科场不太如意，未能获得什么功名，而家道却渐渐败落下去，只得来京。到京后，他结交了一批狐朋狗友，并加入了理帮，成为苑文鉴的心腹谋士，二人一文一武，狼狈为奸，在理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野心越来越大。

民国以后，李毓如敏感地觉出了时局变化所带来的机会，便和苑文鉴商量成立全国性的理帮组织，苑文鉴对此也早有打算，二人一拍即合，便由李毓如出面，召来北京各理帮公所的领众，在苑文鉴的家里聚会。会上二人一唱一和，软硬兼施，迫使各公所的领众同意了他们成立“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的计划。然后，李毓如又通过他的一个朋友通过袁世凯的红人送了一大笔贿赂，以求得到支持。袁世凯正在图谋复辟帝制，需要一批所谓“在会团体”来装点门面，玩所谓“劝进”的把戏，李毓如的请求简直是上门的礼物。因此，内务部很快便备了案。

民国二年（1913年）6月，“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正式成立。李毓如、苑文鉴粉墨登场，拉来一帮所谓的“名流”来捧场，搞了一个颇有

点声势的成会仪式，并请来一批草台子，唱了几天大戏，还办了一次大斋，挑选各公所的角色，由于各领众面和心不和，对成立总会一事并不大热心，因此暗嘱手下故意拆台，在演“叫山”时，寻衅闹事，结果大打出手，场面一片混乱，呼爹叫娘，使所谓的成立仪式以闹剧收场。不过，“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总算成立了。奔走有功的李毓如被推为总会会长，苑文鉴为理事，总会会址设于京西挂甲屯，苑文鉴家所在地。此时他苑家已不是往日的穷门小户了，几年的搜刮，苑文鉴也在此盖起了一座苑家大院。李毓如虽为会长，总会内部事务完全把持于苑文鉴之手，李只管对外应付场面。

“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成立之后，苑文鉴即向全国各省市推广成立分支机构。在各省市分会成立过程中，分支机构的筹办人必须先向总会报请批准，在取得总会的委任状和领到法卷（即理帮历代宗派记载）、号牌以及理帮的宣传文件之后，才能成立。能否获得批准，主要看经手筹办人对总会报效的多少。钱花得多，很快就批准，否则就会以各种借口不批。那时成立一个公所至少得花150元。获得总会批准后，除发给上述各件外，还对各分会所在地行政机关发出“准予设立分会，请予协助”的公函。平时各公所办斋，也得向总会交钱。因此，“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实际上是一个对全国理帮分支机构控制和剥削的机关。总会的收支帐目，把持在苑家手中，总会也俨然与一些佛教会、同善社这类的封建迷信团体并列，积极参与一些所谓的“慈善救济”活动，各省市分支机构的主持者也如法炮制，企图挤到该地统治阶级之列。李毓如还办了一个名为《理铎》的刊物，其内容是宣传“行善”，吸烟、喝酒之害和戒除烟酒的道理及迷信传说，由全国各分支机构和理门道亲订阅，发行范围及于全国。总会还印行《理门所知》一书，发全国分支机构。上海、江苏、湖北、天津和东北各省的理帮分会规模较大，成为总会的主要财源。

1918年，李毓如离开北京，苑文鉴也已去世，总会事务把持在其子苑雨农手中，谢天民提任会长职务。谢天民不愿作苑家的傀儡，认为自己是会长，一切应听自己的支配；苑雨农认为总会是自己经手组成的，谢天民当个现成的会长已占了便宜，因而互不相让。1936年，苑雨农勾结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总会的会长制改为委员制，并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举行改选，依仗国民党的支持，挤掉谢天民，另选与他有交情的陈永科为总会主席。委员会由11位执行委员，5位监察委员组成。总会尽管改为委员制，但很少开委员会，主席陈永利不常到会办事，因之实权依旧是操纵在苑雨农和他儿子苑少农手中。

谢天民被挤掉后，并不甘心下台，时时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抽鸦片，虽极端秘密，但苑家父子都知之甚详。“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北京，谢天民认为时机已到，就辗转钻营和日伪方面拉扯关系，计划把“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改组为“中国理教总会”，把全国理帮的分支机构置于“中国理教总会”之下。活动结果，得到伪兴亚院的支持，他放胆向北京各理帮公所领众和理帮知名人士大肆吹嘘和拉拢，说他在日伪方面颇有办法。他攻击苑家祖孙三代把持总会的行为，提出理门非彻底改组不可。苑家对此也有所准备，苑少农秘密地向日伪方面找寻后台老板，结果得到伪新民会对他的支持，并暗中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1939年秋的一天，谢天民借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理帮大会。事前他在各报登载启事，宣布改组“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成立“中国理教总会”，



希各公所领众以下道亲参加。苑少农领他预先联络好的理门道亲也前往参加。当谢天民表演之后，苑少农即登台说：“咱理帮的宗旨是劝戒烟酒”谢天民担任‘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会长’多年，竟一直偷吸鸦片，破坏道规。现在还要进一步破坏我们总会会务，另外组织什么理教总会，大家说一个大烟鬼子来领导我们劝戒烟酒的理帮行不行？这样我们上怎对得起杨祖，下怎对得起全国道亲？道规何在？会章何在？”苑少农话音刚落，会场各处就有事先布置好的人大喊：“不行！不行！”也有的喊：“打倒大烟鬼子谢天民。”这样一闹，会场秩序大乱。谢天民见事不妙即叫预备好的伪警察逮捕苑少农。此时，就有几个特务跳上讲台，掏出“派司”对伪警说：“这是他们会里闹意见，你们不能偏向哪一边，更不应当抓人，让他们在理的人自己解决好了。”伪警一看惹不起，只好乖乖退去。与会者纷纷离开会场，气得谢天民一筹莫展。尽管成立大会被闹散了，但谢天民依仗伪兴亚院的支持，仍挂“中国理教总会”的牌子，自称会长，拉拢与他接近的理门公所作为它的下级机构。

1940年，“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的主席陈永利已死，苑少农怕总会没有形式上的合法领头人，自己年轻资浅，不敌谢天民的“中国理教总会”，便一面继续投靠伪新民会取得支持，一面又勾结他父亲苑雨农的把兄弟、在天桥卖虫子药发了财的坐地虎孙洪亮，改组总会，恢复会长制。1940年春，他们也借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理帮大会，改选孙洪亮为会长，重新整理各公所以与谢天民对抗。孙洪亮原在天桥下层社会中极有势力，当时天桥有四霸一虎，孙洪亮就是其中一虎。他是天桥的坐地虎，专以欺压、剥削天桥的生意人和艺人为生，在当了会长之后，就把总会由挂甲屯移到离天桥不远的城院庙街。以后各北京理帮会所的领众不敢得罪孙洪亮，又不敢得罪谢天民，只得两边都敷衍着。于是，各公所大门上都挂上“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公所”和“中国理教总会××公所”两块牌子，谢、苑在总会的争权夺利至此也算平息了。

谢天民、苑少农为争权夺利而追随日伪，廉鲜耻寡的丑行，把理帮推向了末路。

#### 5. 同是道亲动真刀

北京崇文门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算是旧北京50个公所中较大的一个。拥有道亲2008人，领众李元，年龄不足40岁，正是壮年成志之时。此人长得健壮，力气过人，但是胸无点墨，少年时在中学学堂里没有呆上几天。因为他在学堂里整日无理取闹，随意订同学，侮辱老师。学堂的老师知道李元的父亲是附近理门公所的领众，与官府多有来往，势力很大，因此不敢轻易管教李元，只好让同学躲着他。这样，见到李元，同学们都纷纷跑开，躲在远处。在教室里，李元一个人单独就坐，没有人敢和他说话，甚至连教书先生也尽量少与他接触，免得惹了麻烦，自己无法向领众交待。日子长了，李元在学堂里耐不住寂寞，就说什么也不再进学堂，整日在街头巷尾流浪，做一些游手好闲之事。李元的父亲见到这种状况，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李元带在身边，准备把领众之职传给儿子。只可惜李元是个不学无术之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与他交朋友的人多半是当地的流氓地痞。李元接替父亲担任领众时，就把这帮人纠集到自己周围，作为他的支柱。在这些人中，有个叫王阿四的人，此人虽然读书不多，但口齿伶俐，头脑灵活，本其善于灵机应变，能在三分钟内编出辞赞，让人感到满肚子学问。就凭这个特长，他得到

李元的器重，人人称之为“二领众”。别人有什么事要李元去做，总是先通过王阿四，否则什么也谈不成。就这样，李元和王阿四联合起来控制了崇文门的公所。

李元把持的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因拥有两千余位道亲，因此通过“办斋”收敛了很多钱财，势力很大，远近闻名。同时也遭到附近公所的嫉恨，人人都在寻找机会给李元拆台，砸的牌子，并怂恿道亲脱离李元的公所。因此李元与周围公所的领众关系都很僵，矛盾随时可能激化。

民国十五年秋天，李元和王阿四商量，趁秋收季节，加紧筹划，准备第三次“办斋”。这里的所谓办斋，就是公所领众定期召集本公所的道众在公所大吃一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会餐”。唯一的区别是，办斋还要举办其他一些活动，如设理坛，点收新理，并举办一些宣传理门的活动。前几天，李元亲自进城，向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申报办斋日期。由于李元这次所带钱财甚多，得到苑雨农老会长的热情接待，因此很快被批下来。他还一起带回几张书面公函，用于通知崇文门外警察分局，请求协助。虽是具有公函，但也得打点，这当然由王阿四来办。因为不仅需要送些钱财，重要的是用各种理由说服警察

局，这样举办的活动才具有合法性，一旦发生意外，还可请警察出面维持秩序。从公所办斋的情况来看，每次都是由王阿四

亲自去或挑选精明强干的人去。对于李元来说，事情办到这里尚未能称得上“准备就绪”。因为，每次办斋的主要目的是要收敛大量钱财，否则，公所的开支无法解决，下次办斋就会受限制。连续几次下去，办斋的规模会越来越小。对于一个道众来说，他花钱，送财物，目的是讲所派，以抬高自己在周围居民和其他道亲中的地位。一般来说，规模越大，参加的道亲就越多。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年李元的父亲，为了振兴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变卖祖宗财产，大宴宾客，扩大了该所的影响。以后的几次办斋，邻近的几个公所的道亲不请自来者不少，许多人都把参加公所办斋作为荣耀，似乎各公所之间也存在档次之别，因此北桥洼清静山房在附近小有名气。这年秋天办斋，李元多次与王阿四商量，准备邀请附近各公所的道亲都来参加，好乘机发财。因此，在办斋只的前几天，王阿四组织一批公所中所谓的“秀才”，给各道亲大发帖子。

王阿四还专门献上一计，准备邀请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袁玉德参加。袁玉德所在公所离李元的公所比较近，因为李元的办斋活动，四周钱财被李元收敛，袁玉德眼睁睁地看到肥水外流，当然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会来整李元，拆他的台，但奈于无机可乘。他虽曾想联合附近的西便门另一公所——安抚乐善公所的领众张子荣和建国门内吕祖洞修玄别境公所领众苏俊等共同去找李元，以便勒索一些钱财，谓之“分斋”，似寻求支助为名，请李元捐赠。但由于苏俊是道人，胆小怕事，中途退却，半途而废。一计不成，袁玉德又生一计，亲自到北京规模最大的公所——永定门外二郎庙司真堂公所的领众于来润那里求援。他首先承禀李元是如何的不讲信用和贪财，最后又讲李元专横跋扈，不顾及周围公所的死活，影响理门各公所之间的关系。于来润与袁玉德过去多少有点来往，也曾得到袁玉德的捧场，因此，不好当面谢绝，只答应如果双方发生纠纷，于来润会在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苑雨农会长面前替袁玉德说话。看来总算没有白跑一趟，出于无奈，袁玉德准备

亲自出马，好好会会李元。恰巧，9月9日，袁接到王阿四派人送来的请柬，于是他感到机会从天而降，决心好好组织公所资深的道亲前去参加，以乘机挑衅。他心中高兴，脸上眉飞色舞，对来送信之人世以礼相待，并说道：“感谢贵公所盛情相邀，天下理门是一家，更何况我们两家又是近邻，早该找个合适的时机去贵公所专门拜访李领众，请兄弟代我向李领众表示谢意。办斋之日，我定和公所陈子荣道人一起去贺，到时，再略表我们的敬意。”

李元接到回音，很高兴。虽然他对袁玉德居心不良有所觉

察，但自恃势力强大，且在本所办斋，想袁玉德也不敢乱来。况且袁玉德和宣传委员陈子荣道人亲自前来捧斋，可扩大宣传，远近道亲知晓此事，一定乐意前来，到时定会收敛更多钱财。于是，李元令王阿四赶快组织本所区代表张五塔，监察委员李玉成以及执行委员杜仙海、赵军荣等常设职员，分头派人到远公近邻下放通知贴子，只要是道亲，不论归属哪一公所，全部请来参加捧斋。因为按照规定，参加捧斋的道亲，都得适量办出斋份，少则几元，多则几十元不等，也可以几个道亲联合献出米面等物。尤其是遇到规模大和十分气派的办斋，各道亲首领是倾囊出斋，斋份多往往得到领众的热情接待，甚至有机会在吃斋席上列为专席人员。这就叫做“花钱买脸面”。在未成为领众之前，按照理门的道规，对那些热心于理门各项活动，有人缘的道亲，才能有资格继任公求公保进而继任领众之职。所谓公求公保，是理门推举领众的习惯手续。当公求公保的人，在道亲中最低需要有“帮众”或“八方催”的品级，称为公求师和公保师。应该说明，理门公所道亲除领众之外，也分等级。自下而上为：“小催众”、“陪座”、“八方催”、“挡众”和“帮众”。一个道亲如果平时热心公所的事务，在财力人力上对公所的贡献比较大，领众就可以提升他的品级。一般道亲也均以提到一个品级为殊荣。自然品级越高，在理门中面子就越大，因为在道亲中有品级的占少数。从“八方催”升到“挡众”就可以代领众点新理，升到了“帮众”就可以代理领众职务，平素在公所中说话也有力。这五等品级是挨级擢升，领众在授予道亲135品级对还教授某个等级的“法”，如小催众的“法”是“阿弥陀罗尼经”六字。

取得公求师和公保师资格后，当现任领众圆寂之前（病危时），向领众申请公求公保，将来方能任领众。就拿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的领众李元来说，虽然人骂他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但是，实际上他也必须通过公求公保手续继任领众，才算合法。在李元父亲死后，公所公布如下：“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前领众因病圆寂，现由本公所承为请出公求师、公保师在法师前公求公保，蒙恩放李元为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继任领众，特此公布。”当公求师公保师的人对新任领众可以在理坛上不下参（不行礼）”。在李元继任领众时，公求师公保师均由王阿四组织、现在王阿四得到重用，见李元自然也不必下参。

时间已到9月12日。这天，李元很早就起来，召集公所全体“公职人员”布置任务，李元和王阿四专门负责接待袁玉德等其他公所前来捧斋的头目，并主持领众坐坛活动。渐渐地，远亲近邻和本所所属道亲都先后到齐，他们三五结群，肩扛手提各种向办斋奉献的斋份，也有空手而来的，那大概是家中有钱之人，他们往往嫌自带东西太笨重，不太“雅观”，因此宁愿，带钱。这些人中，有些是熟人见面，话题更多，谈论的往往是各公所领众的情况等。有的人参加办斋的次数不少，因此，对每次捧斋的情况评头评足，他们还偶

尔说几句辞赞，显得有点资历。大约 10 点左右，袁玉德和院子荣几个道亲，抬着一个箱子大摇大摆地进入公所，递上公所送的请柬后，守门的道亲知道来人就是袁玉德领众，便按李元事先的安排，热情招挠。还专门派了一个道亲上前为他们带路。人群中有人认识袁玉德领众，便向旁边的人指手画脚，自语几句。大家觉得，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领众袁玉德和宣传委员陈子荣亲自来斋，还专门抬一箱子东西作为斋份，今天的办斋一定很气派。人群无意识地为袁玉德和陈子荣一行闪开一条道。看到这个情景，袁玉德心里虽感到不是滋味，总有败走之感。他心里暗暗下决心，这次一定利用李元领众坐坛之机，好好“会一会”李元，和他对上几句辞赞，非让他丢人现眼不可。

大约 11 点左右，饭菜准备就绪，各餐桌摆好，正在此时，人声一片，人们不约而同地朝门口望去，只见一群人前呼后拥，中间一位膀大腰圆之人，十分显眼。此人身着一件宽大的褂子和灰布坎肩，嘴边留着浓黑的小胡子，衣扣上挂着一串紫黄色小葫芦。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小葫芦体形周正古奇，与手里拿着的一双铜环浑然一体。经验丰富的道亲一看此人，便知是个了不起的领众，在今天这种场合，他一定是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领众李元了。等李元走到斋席中间，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人仰头相望，目不转睛地仰视着李元。李元看到时机已到，便小声咳一声，然后面对各位道亲说：“杨祖创理门，观世音菩萨，天下理门在一家。承蒙兄弟敬我祖，世音菩萨多造化，同心协力抢造化，抢造化！”话音刚落，众位道亲一齐站起，同声说道：“抢造化！”说完埋头大吃起来。这是理门吃斋时的习惯。道亲吃斋时，理门称之为“抢造化”而且北京各公所办斋，除了永定门外二郎庙一号公所是素席外，其他各公所差不多都是荤席，只是没有酒而已，曾经有个道亲作打油诗一首，描述理门吃斋的情况：“大肉大鱼偏说斋，无烟无酒亦开怀，争先恐后不须让，虎咽狼吞胃口开，遮盖巧言抢造化，人同此心何须猜，最是当家关心处，斋后能余多少财。”

按照通常的惯例，办斋三日除了大吃一顿之外，领众还摆设理坛点收新理和讲道，讲些理门须知或杨祖得道的传说，有时也讲些“观世音菩萨”五字真言“灵应”的故事。有些道亲为了表现他懂得理门的道理多，还到坛前给观世音菩萨像添香跪拜，当众念“辞赞”。这些活动在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一般都由王阿四出头露面。而今天，由于捧斋的人比较多，点收新理恐怕难以应付，因此，李元事前和王阿四商量好，决定改天专门点收新理，只是斋期领众坐坛的仪式必不可少。举行该项活动时，往往有别的公所前来捧斋的道亲在坛前念着向领众盘道式的辞赞，如领众当时答对不上来，是很难看的。因之在坛前，李元每次都请一个能说会道的道亲作为“挡众”来应付，除了几次规模较小的仪式外，这个角色毫无例外地都由王阿四来充当，这次更不例外。

下午 1 点左右，李元摆好了坐坛仪式，肚子吃得浑圆的各位道亲带着一股油腥味围在坛前，等着听辞赞，开开眼界。袁玉德和陈子荣抢完造化，也没有马上离去。他们一直等待时机。从这次办斋来看，李元尽量减少活动，可知他也十分胆怯，担心在众位高手面前丢脸，会从此砸了自己的牌子。这更加刺激了袁玉德，他决心抓住这个时机，出一口恶气。但袁玉德是一个富有心计之人，知道在这种场合，如果弄不好，也会使自己丢人。虽说自己对辞赞不是外行，但在这种场合，信口开河恐怕会露马脚。袁玉德决定还是让陈子荣出面，自己作为后台，负责组织道亲，以应付不测。

袁玉德正在思忖主意之时，李元已在王阿四的陪同下来到坛前，取一束香在手，点着后放在香炉里，然后向观音菩萨拜了几拜，再转身面向各位道亲，正襟危坐在坛前。他轻轻咳几声后，说道：“天地上下，人间求造化。今月坐坛请杨祖，世音菩萨来搭救。诸位仁兄献敬意，我祖保佑多造化。此际身后有杨祖，不能躬身随价走，有来尽管请祖家，阿四兄弟代解答。”说到这里，用手一扬，王阿四应声来到坛前，坐在李元前面，直接面向道亲（因此习惯上把这种人称为“挡众”）。说也奇怪，王阿四在前一坐，居然没有捧斋之人前去向领众念盘道式的辞赞。这下，可把袁玉德急坏了，“难道其他道亲都非常害怕正阿四不成？不管怎样，我们也不能让他安宁度过，没有人上，我们自己来”。主意已定。袁玉德朝陈子荣点了点头，陈子荣会意，几步上前，很熟练地点了几根香后，轻声说道：“三清道，三宝法，杨祖诚告送各家。勿吸烟，勿吃酒，清静无为尚为佳，不知师门何造化？”王阿四和李元几乎尚时睁开眼睛，只见面前的这位道人袍灰色，衣领上挂着一串葫芦之类的东西，手捧念珠，气宇非凡。知道此人非同一般，今天果然有来盘道之人，于是王阿四沉着冷静，冲着这位道人躬了躬身，答道：“天下在理是一家，师弟你问的是哪一家？”陈子荣的确不是好惹的，反唇相讥：“修道必先修其身，各位兄弟遵相祖训。上上下下摆阔气，非清非净是可急。天下理门是一家，相亲相助勿有假，师门所做算为佳？”很显然，陈子荣是针对李元每次办斋四处收罗道亲，虽发财有道，但周围公所受害不轻，有的几乎难以维持。王阿四对此也心里有数，深知周围公所对他们怀恨在心。于是他恶狠狠地说：“玉虚洞内找韦陀，七世间易修成佛。四六八句成造化，胡说乱闹实难答。师弟，你下山求造化去吧。”这实质上是公然对陈子荣进行贬低和戏弄。陈子荣再也忍不住，又窜步上前，大声与王阿四争吵起来。袁玉德见机会已到，命令随从道亲乘机在人群中大喊大叫，顿时人群乱成一团，互相推搡，动手打起来，而且越闹越凶，连坐坛后面的观世音菩萨像也被从远处投来的石块打倒。正在这里，几个被李元事朱请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冲了进来，他们在里面吃得正酣，听见院内大乱，一头撞进，分不清好坏，也大打出手，整个院子乱成一团，重伤十几人，轻伤也有几十人。这件事在京城内外影响颇大，理门办斋活动几乎被当局取消，直到后来总会会长出面，花钱疏通，方才无事。

#### 6. 北京各理门公所概况

理门是流传于北京、天津两地的民间秘密组织，起初以“反清复明”来号召人们，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和为了避免清政府的追剿，改为大力提倡戒烟戒酒，这在民间是颇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到民国初年，北京理门的势力发展到最高峰。那时在北京城除原有公所之外，又陆续设立了18处，共有50个公所。还有不设领众的分所20处。在总会没有成立之前，北京的理门公所，原来相互之间无隶属关系。自总会成立之后，这些公所便都直属于总会。登记在册的公所，除了上面提到的永定门外二郎庙的司真堂公所，崇文门外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和西便门的乐善同修公所外，旧北京城内还有：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领众王束有（道人）；南桥湾子巷四条志避堂公所，领众李文烦；沙土山志善广修公所，领众毕广义（道人）；城庙志善同修公所，领众连海；任儿路宝善堂公所，领众刘广顺；赵子胡同正善堂公所，领众刘子江；三庙街遇善堂公所，领众卢成瑞；广内大街洪洞馆福善同修公所，领众荣福；建国门内吕祖洞修玄别境公所；领众苏俊（道人）；西便门内安

抚乐善公所，领众张子荣；石头胡同继善堂公所，领众思贾宇。

1928年国民党势力控制北京后，理门公所作为一个民众团体亦受国民党的影响，各公所除领众外又增设许多职员名目，计有执行委员2人，监察委员1人，区代表1人，宣传委员1人，文牒1人，还有其他几个职员，总共12人。这些职员，都是由领众从在理的道亲中选派的，其选派的原则是平时对公所最热心和在财力人力方面贡献最大的，领众派定他一个职务作为鼓励和加强关系。这些职员全是义务职，不但不拿工资，而且遇事自己还要比普通道亲多出钱出力。他们之所以尽这种义务，是因为在理的道亲绝大多数都是社会阶谓下九流的人物，在任何场合都被人看不起，都没有地位，他们情愿花钱买面子。他们当上理门公所的一个职员，就觉着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在群众中有了面子。公所领众都是些深通旧社会人情世故的人，为了满足一般道亲“花钱买脸”和争名誉地位的需要，还做了各种职员证章给他们戴，以争敢他们对公所在人力财力上的重大帮助。公所当家的对道亲的“修炼得道凡人成佛”等许多信迷信宣传，也是使道亲们对所所作财力人力贡献的重要手段。

#### 7. 演“叫山”，众道亲大打出手

“叫山”是理门道亲最喜欢看的一种戏。各理门公所为了敛钱，往往进行“办斋”。为了招揽更多的道亲来“捧斋”，公所往往在斋期前演“叫山”给道亲们看。“叫山”的布置很简单，具体布置如下：中间坐一个人，充当观音菩萨，观音左前方陪坐二人，一充五台山文殊菩萨，一充善陀山准提菩萨。两个陪坐之前站二人，站左者充韦陀，站右者充天王。韦陀、天王之前再设佛像，像前放下个檀香炉，炉前站一人为“挡众”。演“叫山”的人（即叫山）告到“挡众”跟前，高声念道：“山高路远水又深，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里面是何人？”挡众回答道：“虽然不是亲兄弟，相逢俱是同道人。”“挡众”接着问道：“你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叫山回答说：“从来处来，上山朝佛。”于是“挡众”让开，叫山进门，在香炉里添一柱香然后对佛像参拜，再进至韦陀前。韦陀问：“你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姓甚名谁，何处修炼，哪年得道？”叫山不答韦陀之问，反问韦陀：“你且休问我，我先问你，你在何处修炼，何年得道？”韦陀回答说：“玉虚洞内修其性，七世音男修成站佛。”叫山通过韦陀之后，再依次向各山叫问，与菩萨问答，其问答所用词句全是些从旧小说中学来的关于修仙得道荒唐无稽的话。在问答中有时可以插入自己的新添词句，使对方一时答不上来，以博得道亲们的喝采。演“叫山”一举实际上是一种娱乐方式。尽管其内容和形式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其娱乐性是非常强的，因而当时理门的道亲们都喜欢看演“叫山”。当然，理门公所演“叫山”的目的在于敛钱，而“叫山”这种娱乐方式在公所的“办斋”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各公所往往不遗余力，尽可能扩大“叫山”的规模，以招来更多的道亲。除本公所的道亲外甚至还想方设法吸引附近公所的道亲来看，以敛聚到更多的钱。所以，要使“办斋”活动成功，就必须演好“叫山”，不演“叫山”或演得不成功，往往会使“捧斋”减少，甚至可能使整个“办斋”活动砸锅。从这一角度看，演“叫山”也可以说是理门公所的一种敛钱

#### 方法。

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北京的警察机关就不准公所办斋时演“叫山”了。主要原因是在演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冲突打架现象，轻则流血，重则死人，

严重地影响了北京的社会治安。流血冲突主要发生在公所之间和同一公所的道亲之间，有时也偶尔发生在道亲与非道亲之间。公所之间的冲突是由于邻近公所为吸引更多的道亲来“捧斋”而发生的。公所内部道亲之间的冲突则是在“叫山”过程中，由于发生口角而引起的。道亲与非道亲之间的冲突较少见。据统计，自民国成立至“叫山”被禁演的这十五六年间，共发生大小冲突事件500余次，死亡10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最大的而次流血冲突发生在民国十四年的春、夏两季“办斋”期间，其伤亡人数之多、影响之大，终于导致了“叫山”活动末日的到来。

民国十四年春天，农历二月十八日。这一天是个好日子。天空湛蓝，风和日丽。北风微微地吹着，这虽使人们意识到春天步履的蹒跚，但对于饱经风雪和沙尘袭拢的北京人来说，这样的天气已经是够中意的了。所以这一天北京城内城外的人们显得特别活跃，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特地选中了这个好日子来演“叫山”，预备第二天举办春斋。8点不到，公所前面的广场上已经人声鼎沸，黑压压的人群三五成堆，热烈地交谈着。由于天气好，这天来看“叫山”的人特别多。9时正，公所的大门开了，公所领众带着十多个人来到广场西边的高台上。两个道亲搬来一个较大的黑色的檀佛像，另两个道亲搬来了一个较大的黑色的檀香炉。忙乎了约20分钟，“叫山”的布置就完成了。一名道士打扮的道亲左手提着一面大铜锣，右手拿一把红绸裹头的槌子。领众向他打了个手势，道亲迅速举起铜锣，“咚咚咚”猛敲了十几下。台下道亲逐渐安静下来。领众跨步走到台子前沿儿，清了清嗓门，装神弄鬼地说了一大通荒唐的迷信话，然后宣布“叫山”开始。刚才安静的道亲们顿时活跃起来，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急切地等候着们“叫山”活动的开始。道亲们今天的兴致特别高，他们满以为今天时“叫山”节目会很精采，却没料到一场灾祸正在等待着他们。

铜锣连响九下后，“叫山”节目正式开始。今天充当“挡众”的是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清清瘦瘦的，面部较白，颇像一个书生，但实际上他是北京城里有名的混混儿。十多岁的时候跟公所一个武功很高的道亲学过几年，虽不能说深得其精髓，但这混混在拳脚上确实有几下，三五个粗汉未必是其对手。他的武功从不轻易示人，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显露。由于没有几个可以称得上“对手”的，所以他的功夫到底有多高、多深，一直是个谜。他凭着自己的这身功夫网罗了一大帮游手好闲的人，经过几番闯荡，在整个京城里已颇有名气了。他的本名叫王有贵，由于他那副长相，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白面书生”。在武侠小说里，“白面书生”往往是一些武功高而且怪异、心肠辣狠如毒蛇一样的江湖人。“白面书生”王有贵正是这样一种人。王有贵喜欢看“叫山”，但由他自己亲自来演“叫山”的次数并不多。如果哪一天他亲自来演，那就是告诉人们：他最近发了一笔横财。他确实发了一笔横财，而且是大大的一笔横财。至于财的来路，除了他本人及他的几个亲信以外，没有谁说得清。人逢喜事精神爽，王有贵一高兴就带着一大帮混混儿，一大早来到了公所广场。在混混们的怂恿下，王有贵决心在今天给大伙露几手。按理门公所规定，担任“挡众”的人是需要严格挑选的。但是“白面书生”这样的人容得你挑吗？所以王有贵手下的人一提出要求，公所领众就忙不迭地答应了，并且还说了大通令人肉麻的奉承话。

“挡众”是“叫山”要过的第一关，地位相当重要，公所挑选来充当“挡

众”的人，大都有几下。“白面书生”并非浪得虚名，武功自不用说，肚子里的墨水也不算少。他除精通“叫山”活动那一套陈词滥调外，往往在与“叫山”的对答中添枝加叶，不断翻弄着各种花样，把神佛成仙得道的事迹与市井混儿们偷鸡摸狗的勾当等相提并论，混杂在一起，使“叫山”无所适从，张口结合，答不上来。所以，遇到“白面书生”扮演“挡众”这一角色时，再老练的“叫山”也得小心谨慎，避免因对答不上而灰头土脸的被轰下台去。

不知是今天上台来“叫山”的人水平特别高，还是“白面书生”今天的兴致特别好，最初上台来“叫山”的几个人都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挡众”这一关。“白面书生”似乎没有一点要为难“叫山”的意思。但他手下的那些混混儿们却觉得不过瘾，不断地叫喊着“头儿，露几手”。第十个上来“叫山”的是一个粗黑大汉，足比“白面书生”高出整一头。大汉本来是不敢上台来“叫山”的，但看到前面几个叫山的都很顺利，胆气一壮，就跳上台来。“白面书生”在台下那帮混混“头儿，露几手”的催促下，决定就拿这个长得令他很不顺眼的大汉开开刀。大汉确实没喝过什么墨水，“白面书生”将那几句通用的签词稍加变化，大汉就满头出汗，脸涨得像猪肝，答不上来了。台下观众“哄”地大笑，有的高声叫喊：“蠢牛，下去，下去，蠢牛！”粗黑大汉容忍不了这种难堪的场面，因为他前两天才娶进门的媳妇和岳父岳母今天来了。他的父亲和三个弟弟五个妹妹来了，他这个家族（赵姓）的六百来口人绝大部分也都来了，都在台下看着他出丑。大汉受不了这种难堪，尤其受不了“白面书生”那半开着的眼睛里的那种冰冷刺骨的嘲笑。大汉的血脉沸腾了，抡起钵盂大的拳头，“呼”地向“白面书生”擂过去。“白面书生”轻移了一下脚步，避过了大汉的拳头。大汉的拳头再擂，“白面书生”又躲开了。大汉接着又连擂数拳，“白面书生”又躲又闪，一直没有还手。不仅不还手，脸上仍然挂着一丝毫不做作的微笑。出手连连落空的大汉恼怒得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他一把抓起佛像就朝“白面书生”砸过去，却又落空了。佛像断头少腿，碎成了七八块。大汉又双手端起檀香炉，猛地向“白面书生”扔过去。因为炉内有香火、香灰，“白面书生”躲闪时显得有些狼狈，粗黑大汉趁机猛扑过来，企图将“白面书生”撞下台去。“白面书生”灵活地移动了位置，并借机左脚突然一伸，右手顺势一推，将大汉掬下台去。

由于大汉来势过猛，“白面书生”又巧手施力，大汉被掬下台的时候，头下脚上，脑袋正撞在台下一块横放的大青石上，顿时鲜血迸涌，脑浆四溅。由于巨大的惯性和重量，大汉的脖子也折断了。倒在地上的大汉虽然双手乱抓，双脚乱蹬，但显然是活不成了。

事起仓促，开始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不知谁叫了几声“打死人啦”之后，大汉家族的一帮人拿起扁担、木棍，向“白面书生”围了过来。“白面书生”并不惊慌，用手一挥，他带来的那帮混混儿迅速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子和锉子等凶器朝大汉家族的人迎过去。双方二话不说，就你一扁担我一刀，成双捉对地厮杀起来。整个广场顿时乱成一锅粥，喊声、杀声、哭啼声响成一片。派来维持秩序的警察由于人数太少，根本制止不了双方的打杀，被迫撤离现场向警察局求援。当大队警察赶来以后，双方仍然你死我活地杀着。警察鸣枪示警，双方才逐渐停止了厮杀。由于人数太多而且混乱，警察没有逮捕任何人，只将众道亲驱散了事。

事后警察清理现场，共计有 25 人死亡，重伤倒地不起者 40 人。至于轻伤挂彩的人则无法统计。本以为是一个欢乐祥和的好日子，却不料演出了一



场空前的大惨案。然而这场惨案似乎并没有引起北京政界的多大关注，北京的各种报纸也只是简略地提到在北京西郊发生了一场打斗事件，并没有提到伤亡的人数。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刚刚在北京逝世，政界、报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件事上，而北京的军阀政权又因害怕遭到全国的谴责，竭力隐瞒这场流血惨案的真相。所以后人大都不清楚这场理门道亲之间的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经过这场浩劫后，已是元气大伤。这年的“办斋”活动自然告吹，以后虽然每年还进行一到两次“办斋”，但“叫山”是再也不演了。

在广善同修公所发生流血惨案之后的四个月，西便门附近的两个理门公所——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和西便门内安抚乐善公所之间，发生了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流血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道亲来“捧斋”，以敛聚更多的钱财。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是一个大公所，共有道亲近 3000 人。西便门内安抚乐善公所是个小公所，只有道亲 1200 余人。然而，安抚乐善公所却拥有一批水平特高的“叫山”队伍，其精采无匹的“叫山”演技吸引着附近公所，特别是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来观看。大批外来道亲在观看“叫山”节目完毕后，就留下来参加该所的“办斋”活动。这样，安抚乐善公所道亲人数虽少于乐善同修公所，但每次“办斋”所敛到的钱财却多出乐善同修公所很多。乐善同修公听对此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技不如人倒还好说，关键是理门章程并没有规定道亲不能参加其他公所的“捧斋”活动。乐善同修公所曾几次派人和安抚乐善公所谈判，要求安抚乐善公所照顾乐善同修公所的利益。安抚乐善公所不但坚决拒绝乐善同修公所的要求，而且对其谈判代表加以百般嘲弄。乐善同修公断对此恼怒万分，公所领众发誓要进行报复。但由于安抚乐善公所与全北京规模最大的公所——永定门外二郎庙的司真堂公所所有某种密切阶关系，所以就强忍着把这口怨气吞了下去。此后，乐善同修公所和安抚乐善公所的关系越闹越僵，双方已视对方为水火，都想设法破坏对方和保护自己的各种活动，最终导致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惨案。

惨案发生的时间是民国十四年阴历六月六日。当得知乐善同修公所是六月六日举办“叫山”活动时，安抚乐善公所决定也在同一天举办“叫山”。它知道凭自己精采的“叫山”节目，一定会使乐善同修公所的绝大部分道亲离开本所，前来观看。在“叫山”活动举办之前，安抚乐善公所就在乐善同修公所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说自己的“叫山”节目将会如何如何精采，热烈欢迎乐善同修公所的所有道亲前去观看。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时安抚乐善公所的“叫山”节目本来就推常地喜欢，而这一宣传使乐善同修公听的道亲们产生了一睹为快的渴望。所以，六月六日两个公所同时举办“叫山”活动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极不寻常的局面，从而导致了一种极不寻常的结果。

六月六日是个大热天，太阳还刚刚露出脸儿，道亲们就避开阳光，躲到树荫下去了。乐善同修公所和安抚乐善公所的“叫山”几乎是同时开演的，演出的地点相距并不远。铜锣响过之后，安抚乐善公所的领众就登台亮相了。他在照旧装神弄鬼地胡说八道一大通后，兴奋地向众道亲介绍了今天登台表演的几个著名“演员”，他保证今天的“叫山”节目一定“精采绝伦”。台下道亲欢声雷动，“叫山”活动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始了。安抚乐善公所只有道亲千余人，但今天来观看“叫山”的至少有 3000 人。那么这些“多出”

的道亲是从哪里来的呢？

绝大部分是从乐善同修公所来的。乐善同修公所拥有道众三千之多，然而其中的 2/3 却去了安抚同修公所，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去了其他公所，结果只剩下不到 1000 人。“叫山”活动虽然已经开始，但场面冷冷清清。台上扮演神仙菩萨的人没精打采，上台“叫山”的人也稀稀落落，对答之间语词干瘪乏味，毫无新鲜之感。演着演着，不长时间，台上台下的人都已没了兴趣，“叫山”活动被迫宣布结束。

“叫山”活动如此草草地收场，势必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办斋”活动。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和几个品级较高的道亲商量着，大家一致认为造成今天如此难堪局面的原因在于安抚乐善公所的横行无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直接与安抚乐善公所摊牌，讨回公道。向总会去告状或求情是不会有什结果的，所以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去安抚乐善公所，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时间就在今天，马上出发。

当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带着数百名道亲来到安抚乐善公所时，这里的“叫山”活动正高潮迭起，笑声、掌声、喝采声响成一片。台上“叫山”与神仙菩萨之间的对话机智灵巧，妙趣横生，台下道亲们看得如痴如醉，手舞足蹈。所有的人都陶醉在“叫山”带来的欢乐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乐善同修公所大批道亲的到来。他们大都手拿扁担、木棍和铁锹之类的东西，显然是来者不善。可惜安抚乐善公所的道亲没有看到这一点，维持秩序的警察虽然看到了突然到来的这一批人，却并没有想到这意味着什么。等到大家都明白过来的时候，台上的“叫山”和其他几个“演员”都已经倒在血泊里了。

安抚乐善公所领众本来对乐善同修公所的动向早有提防，对他们可能的报复都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今天来观看“叫山”的人实在太多、太杂，而今天的“叫山”又演得实在太精采、太令人着迷了。所以乐善同修公所的大队人马尽管是明目张胆的开过来，却仍然打了安抚乐善公所一个措手不及。

但安抚乐善公所毕竟有所准备。公所领众下达出击的命令后，护卫队员拿起各种武器，朝乐善同修公所的队伍猛扑过去。安抚乐善公所的护卫队员个个训练有素，他们敢打敢拚。武器装备又远比对方强，而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虽是报仇而来，却是乌合之众。所以双方一交手，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就被放倒了一大片，队伍也被冲得七零八乱。安抚乐善公所得势不饶人，不断追击着四散奔逃的乐善修公所的道亲，就像猎人追赶着受伤的兔子一样。

诸位也许忍不住要问：早先来到现场的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哪去了？为什么不帮本所道亲的忙？维持秩序的警察哪去了？为什么不出来干涉？不错，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安抚乐善公所。但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来观看“叫山”的，他们没有携带武器，加上他们喜欢安抚乐善公所举办的“叫山”，而对本所上层品级的无能与其内部的勾心斗角早就不满。当安抚乐善公所的护卫队以破竹之势进行反击的时候，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却在几个亲信的护卫下，在众目睽睽之中溜走了。试想这些旁观的道亲有谁还再有斗志？有谁还愿意为本公所的领众卖命？这些观看“叫山”的道亲中绝大部分人都作壁上观。至于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挤进拚杀的内圈时，战斗已基本结束了。安抚乐善公所的护卫队员正在“乘胜追击”。警察连去请求增援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只有驱散道亲，清理现场。

现场清理结果死亡 34 人，重伤者 100 余人，轻伤的人无法统计。这次冲

突伤亡的人数虽然比春天那次冲突伤亡的人数多不了很多。但其后果却比上一次要严重得多。因为，春天的冲突是发生在一个公所的内部，伤亡人数再多，却仍然是内部的问题。理门总会是懒得干预的，而北京的警察机关则更没有兴趣管这桩事，特别是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北京成为各界瞩目的中心，警察机关巴不得将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极力隐瞒。而夏天的这场血案就不同了。它发生在两个理门公所之间。这次冲突规模之大，伤亡人数之多却是空前的。理门总会不能不管，警察机关此次也不能不干预。理门总会对下属公所的约束向来松弛，但如果听任公所之间的矛盾发展，势必会威胁到理门的生存，所以不能不管。北京警察机关向来与理门公所相安无事，可是春天的流血冲突给警察机关带来了麻烦、差点出了大乱子。夏天的流血冲突使警察不能再对理门公所听之任之，否则北京的社会治安就会很成问题。正值此时，北京的军阀政权与南方的国民政权的谈判已经破裂了，南方革命政权正积极准备北伐。所以，加强北京的社会治安，巩固军阀政权的根基是十分重要的。北京政府的警察机关决定杀鸡儆猴，整治整治西便门的这两个理门公所。理门总会已经撤掉了两个公所的领众，任命了两个新的领众；公所其他领头的人大都被更换了。警察机关又逮捕了西便门两个公所的领众以及其他领头闹事的人，然后经过审讯，在菜市口将他们统统枭首示众。

尽管如此，北京军阀政权对警察机关的这些措施仍然不满。警察机关于是发出通告，宣布从民国十五年开始，禁止各公所“办斋”时演“叫山”，否则将严惩违反此令的公所领众，并取消其“办斋”活动。公所办斋的自的是为了敛钱，演“叫山”也是为了敛钱。禁止演“叫山”虽然会有损于财源，但总比禁止“办斋”的损失要少。因此各公所、特别是像西便门内安抚乐善这样的、靠演“叫山”大发横财的公所，虽然对警察机关的禁令颇有怨言，但“办斋”没有取消，财源仍在。所以民国十五年后，北京城内的各理门公所在“办斋”时都不再演出“叫山”了。然而北京城郊和较远一些地方的公所仍然偷偷演“叫山”，直到国民党势力控制北京后，“叫山”活动才完全停止。

## 8. 玩葫芦丢性命

玩葫芦是在理道亲的一个习尚。公所的领众自不必说，普通道亲家的桌子上也摆着大大小小的葫芦。葫芦的多少是根据道亲的品级来决定的。公所领众的葫芦当然是最多的。领众之下依次是：“帮众”——“挡众”——“八方催”——“陪座”——“小催众”，他们拥有的葫芦数可多可少，但一般不应超过领众。传说有一个公所的领众拥有大小葫芦 2850 个，人称“葫芦王”。

大葫芦一般放在家里，小葫芦可随身携带，吊挂在腰带上，更小的葫芦可以别在衣襟上。葫芦不可随便乱丢，必须保持干净整洁，所以每天都要用布擦试。久而久之，葫芦就变成了自然的紫红颜色。这样颜色的葫芦才能带在身上。不但道亲个人离不开葫芦，理门公所的陈设中，葫芦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佩带和摆设葫芦就成了理门特定的标志。

葫芦玩得久了，也就形成了规格和价值。一般以体形周正、古奇、有本（即葫芦上带有原有的蒂把）者为上选。如果葫芦的蒂把上还长有别枝，而别枝上又结有小葫芦，那就更加稀罕了。五个葫芦为一堂，大的有二三尺高，小的仅寸许。在 1921 年以前，道亲中玩弄葫芦之风最为盛行，大家竞相购买

一堂好葫芦摆在家中的佛桌上以为炫耀。当时一堂普通葫芦价值 10 元左右，一堂好的葫芦价值高达五六十元，最好的一堂葫芦曾卖到 200 元。因此，拥有一堂的好葫芦就成了道亲财富和地位的标志，成了道亲们竞相炫耀的资本。

理门这种玩葫芦的习尚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一种传说认为：当年杨祖修炼成道，到处显示神迹之时，身边常带着一个葫芦。葫芦里装的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因为杨祖玩葫芦，所以理门组织扩大后，就习尚玩葫芦。理门还有葫芦赞，云：“葫芦乾坤，奥妙内藏，道通天地，理协阴阳。”这就是说，理门的葫芦决非普通的葫芦，葫芦内奥妙无穷，其作用大得可以通天，这当然是胡说八道。理门借助葫芦这玩艺，装神弄鬼地吹嘘一番，使之神秘化，为的是让道亲们感受到理门的玄妙。玩葫芦的意义和作用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

民国八年八月，沙土山志善广修公所领众毕广义获得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名贵葫芦。葫芦的大小尺寸，高低方圆都无可挑剔，颜色完美。最重要的是，这个葫芦的“本”上长有一别枝，别枝上又给着一个小葫芦，而小葫芦的小“本”上居然又长出了一小别枝，小别枝上又结出了一更小的葫芦。长有一个小葫芦的已是极为罕见的了，而小葫芦之上再又长出一个更小的葫芦来，这恐怕是闻所未闻的奇迹。因此，毕广义所获得的这个葫芦至少价逾千金，名贵无比。毕广义因为拥有了这样一个葫芦，其身价地位顿时提高了不少。名贵的葫芦带给了毕广义意想不到的荣耀，同时也带给了他意料不到的灾难。

毕广义是个道人，又瘦又小；志善广修公所又是一个小公所，道众不到 1200 人。因此毕广义在北京理门的公所领众中，实在算不上是个人物，他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出人头地。八月八日他出去游玩，不经意地发现本公所道亲李小牛家中有这个极为罕见的葫芦，毕广义大喜之下问李小牛肯不肯出让这个葫芦。李小牛经不起毕广义的死缠烂磨，以 50 元的价格卖给了毕广义。毕广义带着葫芦回到公所后，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立即佩带着此葫芦到处炫耀张扬。整个北京城为之轰动，每个道亲以一睹该葫芦为荣耀，每个公所都争相邀请毕广义去作客。一时间，毕广义成了北京城里的风云人物，毕广义自己也慢慢地变得飘飘然，仿佛他就是京城里最富有、最高贵的人了。他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场杀身之祸正在等待着他。想置毕广义于死地的人，是建国门内吕祖洞修玄别境公所领众苏俊。苏俊也是道人，30 年前两人同师于峨嵋山仙鹤道人门下，因为一点小事闹翻了脸。几十年后，两人都成了理门公所的领众，虽都在北京，但从从来往。毕广义这次因为意外得到了一个稀世葫芦而大出风头，这对苏俊来说也并没有什么。可惜毕广义做了几件令苏俊咽不下饭的事情，其中包括拒绝让苏俊观赏那个葫芦，在理门总会说苏俊的丑话，揭苏俊当年在峨嵋山修道时的老底等等。苏俊大为愤慨，决心让毕广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尝尝他的厉害。苏俊派了两个颇有功夫的道亲去，准备教训教训毕广义。

民国九年六月十七日夜，苏俊派出的两个道亲来到了毕广义住的公所前。他们翻过公所围墙，轻轻地撬开了毕广义的门栓，溜进了他的房内。正在做着美梦的毕广义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被这两个道亲掐死了。两个道亲离开房间的时候，顺手把那个稀罕的葫芦也带走了。

第二天志善广修公所向警察机关报案。由于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力的线

索，警察机关也无可奈何，追查了一二个月后，此案就不了了之。至于那个稀世无比的葫芦，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不知苏俊把它弄到哪去了。

自从出了这桩谋杀案后，理门中玩葫芦的势情慢慢地下降。葫芦那东西慢慢地也就不值钱了。

#### 9. 害百姓自掘坟墓

理门本有八戒，由于自戒自犯，因此除了戒烟戒酒之外，理门其他戒条律令已荡然无存。到了民国以后，戒烟戒酒这个理门最主要的宗旨和戒律也遭到破坏，理门道亲也就再没有什么约束了。

民国以后，在理的道亲闻“闻烟”已不在禁止之列了。而且越是品级高的道亲，差不多越有闻“闻烟”的习惯。闻烟里也含有烟叶的成分，为什么不把它列在禁止之列呢？理门的公所领众分辩说，闻烟与鼻烟不同，是薄荷、荷叶等清凉性质的原料配制的，闻之可以清心明目。所以“闻烟”不是烟。因此，闻“闻烟”的习惯在理门中逐渐扩展开了。当时北京西四南大街万励麻店所卖的闻烟最为理门所采用。因为该店所卖的“闻烟”中含的烟叶成分最高，质量也最好。有意思的是，理门一度控告过万励麻店，说他们闻烟的配制有烟叶成分，是有意破坏理门道规。万励麻店申诉说，他店所卖的闻烟又名“明目散”，不是专对理门发卖。理门的人要买着闻，不是本店的责任。理门自毁戒律，却把责任归咎于别人，实在是蛮横无礼。结果麻店胜诉，仍旧卖他的闻烟，在理的道亲也仍照旧买着闻。后来有些道亲闻“闻烟”不过瘾了，干脆买鼻烟当“闻烟”闻。理门的闻人长春堂经理张子余也制造了一种名叫“避瘟散”的“闻药”，原料也同万励麻店的差不多，行销全国，因而发了大财，据说他赚的银元多达300余万，成为北京数得着的大富翁。后来外国的纸烟传入中国，理门道亲也紧跟潮流吸起了卷烟。这样，理门戒烟的这条律令算是彻底被破坏了。

戒烟那条禁令被破坏的同时，戒酒这一条也同遭厄运。民国以后，外国啤酒逐渐输入我国。在交际应酬场合，非理门的人往往以啤酒对理门道亲相劝，说啤酒不是酒。于是理门道亲也借此说啤酒不是酒，于是饮啤酒在理门便被默认为不算犯道规了。

闻烟不算烟，啤酒不算酒，理门道亲以各种堂皇而巧妙的方法和借口将理门戒律化解为无形。道规的败坏，必然导致组织的涣散。普通百姓对理门的兴趣也日渐削弱，许多道亲目睹理门的善善恶恶，也渐渐醒悟，最后毅然退出。因此，当作为清规戒律的烟酒已不在严禁之列时，以戒烟戒酒为宗旨的理门实际上也就名存实亡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北京。谢天民与苑少农为争夺理门大权，纷纷投降日伪，成为民族败类。谢天民辗转钻营，得到了伪兴亚院（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的支持；苑少农则获得了伪新民会的支持。为了夺取理门的最高权力，击败对方，谢天民和苑少农服从日伪主子的指令，干出了不少危害百姓的坏事。1940年春，在天桥卖虫药发了财的坐地虎孙洪亮被选为“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戒酒总会”会长。这个混混出身的孙洪亮在被选为总会会长之后，立即露出了其混混的本性和坐地虎的凶横，更使许多市民和小商人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向他贡献钱财，乞求他的“保护”。在孙洪亮的“带头作用”影响下，各公所的领众也横行无忌，为非作歹。这样，理门组织完全腐败、堕落了。解放后，孙洪亮被人民政府镇压，理门组织也就销声匿迹了。

总之，理门创始于清初，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因而不断遭到清政府的搜捕追杀。清道光以后，理门一改过去的反清性质，吸收道家思想和封建宗教迷信使其成了一个宣传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由于纪律松弛，理门不断蜕化堕落，从搜刮百姓钱财发展到投降日伪，危害百姓，成为民族败类。理门成了一个反动的帮会组织。解放后，这个反动组织就被人民政府取缔了。

#### 四、沪上闻人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滩的名流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沪上闻人”的大亨。他们出则前呼后拥，入则保镖成群，并常以“工商巨子”自居，实乃黑社会的首领，帮会中的超级流氓。他们的出现不仅说明上海帮会力量的增强，而且也使帮会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成为反动当局的重要构件。当年，能称得上“沪上闻人”的帮会大亨首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三位各具特色，自成势力，且互相勾结，明争暗斗，他们的浮沉直接反映了上海帮会势力的兴衰。

##### 1. 流氓大亨：黄金荣

###### “小和尚”发迹

黄金荣是上海滩资历最老的青帮“闻人”，生于186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祖籍浙江余姚。其父黄炳泉曾在苏州衙门当过捕快，后举家迁往上海，黄炳泉仍操旧业。黄金荣爬出娘胎后不久便患了天花症，病愈后落下了一脸麻皮，故被称为“麻皮金荣”。他的父母被麻皮搞得心烦意乱，恐怕破了相的黄金荣会遇上个一灾半祸的，于是就带他到城隍庙旁的算命摊去看相。相面人对黄金荣的麻脸端详了一番后，摇头晃脑地说：“你这儿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难得一脸福相，只是皮肉单薄，加上麻皮破相，难免要多灾多难；不过，如果养大成人，倒是能成大器。”黄母听了这些，且喜且忧，忧的是这个麻儿会遇灾夭折，喜的是麻儿可能大福大贵。后来，黄炳泉听说小儿出家可以免灾，便赶紧将儿子送到一个庙中，寄名给一个和尚，并让儿子在庙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此，黄家周围的人都称麻儿为“小和尚”。黄母为了让麻儿改变皮肉单薄的形象，便千方百计地给儿子滋补身体，顿顿鱼肉，连粥里也常加上一二匙猪油，把个“小和尚”吃得肥肥胖胖、又粗又壮，这个“小和尚”常常因吃得过多而肚子痛。为了让“小和尚”长大后能“黄金满堂、荣宗耀祖”，黄炳泉给“小和尚”取名“金荣”。

转眼间，黄金荣混到了17岁，因为吃得好，睡得着，长得结实矮胖。黄炳泉为了让儿子能有一技之长，将来能出人头地，便把黄金荣送到他姐夫的裱画店去当学徒。但是，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和尚”根本不想从事这种清苦的小生意，他要赚大钱，要出人头地，可一时又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好常常寻衅打架以解内心的烦闷。

黄金荣最常去的地方是得意茶楼，在这里既可以听到无数的逸闻趣事，还可看到流氓相互厮杀的场面。每当他看到别人打得血肉横飞时就高兴得满脸通红，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胜利者似的。在这里，他还常看到别人大吃大喝、一掷千金，更使他幼小的心灵孕育着难以遏制的欲望。他发现，干捕快差役不错，油水很大，还可能有所升迁、受人奉承，比当个小小店员有出息多了。黄炳泉很赞成儿子的想法，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为黄金荣打点门路。经过多方奔走和请客送礼，黄金荣终于在上海府衙谋到了一个差役之职，不久又当上了捕快。他原以为进了衙门就可以终日在外游荡，吆五喝六，捞到不少油水，没想到当上捕快要常年在外奔跑办案，常常风餐露宿，虽可仗势欺人、弄些外快，但过于辛苦，没几个月就干得泄了气。黄金荣深知，上海是个人吃人的地方，“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百姓怕官吏，官吏怕洋人”。1900年，法国为了扩充上海法租界，开始招收华人充当巡捕。黄金荣得到这一消息后，如获至宝，当即就去报名应考，结果没有考上。但黄金荣并不死心，

到处托人送礼，后经向主管官员行贿，才被录取为一名三等华捕。当上了租界巡捕，黄金荣觉得自己也成了洋人，对当地居民总是横眉立目，对那些敢于抗争的中国人更是大打出手，深得洋人的欣赏，不久便领到了一张令所有巡捕羡慕的包探卡，每月凭卡可领得30多两银子。此刻的黄金荣踌躇满志，名利双收，权势炙手，决心在十里洋场一显身手。

黄炳泉一生虽只作过捕快头目，但深谙衙门真情。他告诫麻儿，要想闯出前程，除了要博取主子的欢心外，还要有自己的一帮势力，尤其是要和那些盗匪搞好关系。官与匪名为冤家，实是一家，官是匪的靠山，匪是官的升迁帮手。黄金荣平时很少肯听老父的陈词滥调，但却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心中，并付诸行动。

黄金荣早就听说洋泾浜郑家木桥有一群瘪三闹事生祸，搞得当地居民苦不堪言。他决定采取“黑吃黑”的手段制服这群流氓并为他所用。一日，他和外勤股打了招呼，提前埋伏在这群瘪三常常出没的地方，待他们正要动手抢劫时，外勤股的便衣突然出现，欲将这伙瘪三送到巡捕房。这时，黄金荣出面从中调解。瘪三头目知道对方乃外国捕房的便衣包探，不由得惊惧万分，连请黄氏高抬贵手。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最后敲定：这群瘪三可以为非作歹，但必须听黄金荣的指派。自此之后，黄金荣便成了他们的新首领。这个黑团伙在黄金荣的指使下对当地商店、摊位、居民及富户大肆骚扰，收取所谓“保护费”，把租界搞得鸡犬不宁，而黄金荣自己则当好人，亲手消除这种纷乱现象。比如，黄金荣每次出巡，若碰到流氓滋事必严惩不怠，那帮受到惩戒的流氓对黄服服贴贴，使旁人看了觉得黄金荣确实是个人物。一次，有个大商场准备次日开张，挂在门口的那块金字招牌在夜里突然不见了。老板一时急得团团乱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一个身着长衫的人过来对老板说：“这事只要托巡捕房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原物奉还。”商场老板只好差人请黄金荣出场。结果，那些摘牌的瘪三敲锣打鼓，把招牌送了回来，并端端正正挂在商场门口。正是通过这种两面三刀的手法，黄金荣博得了附近居民的“好评”。“黄老板”俨然成了救世主。

黄金荣为了表现自己的侦缉才能高人一筹，换取法国主子的赏识，他还依靠其爪牙充当“眼线”、“耳目”帮助他破获治安案件，特别是那些社会影响较大而又直接侵犯法国人的案子。他或是利用一批惯偷惯盗去破获另一批盗贼犯下的案子；或是指使爪牙先在辖区内作案，然后由黄带人将其一网打尽；或是令其喽罗冒名自首，以欺骗舆论。

在黄金荣的办案生涯中，有两件案子对他的升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法国神甫失踪案；二是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遭劫案。

先说失踪案。法国天主教神甫自上海乘火车前往天津。不料，火车刚刚行至山东界内就被山东督军张宗昌所部截住，神甫被绑走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这一事件一时轰动国内外。法国领事馆连连下令，限期破案。黄金荣自告奋勇，亲率几名探员潜往山东，经过多方打探，得知神甫被关在一个深山的破庙中，于是找了两个老乡作向导，一行八人，分作前后两队，随身带武器干粮和抬人长棍，按标记潜到距古庙不远处的丛林中暗伏下来，夜至三更，黄金荣率队突然闯入古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掉了看守的四名士兵，找到了神甫，并连夜将其护送回沪。法国领事馆十分高兴，当下便赏给黄氏万元，并提升他为督察长。



另外再说遭劫案。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范尔迪携其新婚夫人到太湖游览，被湖匪看中绑走并向法领事馆勒索。法租界当局要求黄金荣全力营救。黄金荣接案后立即召集门徒商讨营救之计，门徒高鑫宝声称他与太湖帮的老大吴世魁颇有往来，可以前往一试。次日，高鑫宝便单枪匹马亲赴太湖烟波寨拜山。吴世魁见旧友来到，非常高兴，大摆酒筵，热烈欢迎，并把范尔迪夫妇从囚牢里请出来，奉为座上宾，最后列队送高鑫宝及范尔迪夫妇下山。范尔迪夫妇有惊无险，平安归来，令法国总领事馆深感意外，也更对黄金荣另眼相看。黄金荣因此获得了“破案如神”的夸赞，被聘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

终于成“大亨”

黄金荣在法捕房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在上海黑帮组织中也崭露头角，但这仍然无法满足他要成为上海滩“大亨”的欲望。他深知，要真正成为上海滩的霸主，目前这点人马和势力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招兵买马。不过，要达到这一目的，他还有两个障碍：一是捕房里有人作梗；另外就是财力单薄。当时，捕房中最令他头痛的是徐阿东。此人心狠手辣，而且背后有帮会撑腰。不过，机会很快就来了。黄当上公董局顾问后，捕房中的所有华捕均须由黄提名升级；徐阿东本不买黄的帐，但此刻却在黄的控制之下，无奈只好请黄能高抬贵手。黄当即满口答应，并约其在聚宝茶楼与黄的门徒杜月笙等见面。他声称，提名一事由杜全权负责。待徐阿东按约来到聚宝茶楼后，杜月笙担保徐的升职，同时要求徐对“白相人”（帮会流氓）多加照顾。徐只好一口应允。从此，徐在捕房中再难以和黄金荣作对。

消除了捕房中的拦路石，黄金荣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招兵买马了。当时，私贩鸦片最能赚钱，黄金荣自然不会忘掉这一财路。他一方面利用租界禁烟之机，一批又一批地没收烟土，转手倒卖；一方面采取“硬爬”的方法，以血淋淋的厮杀抢劫各地贩到上海的烟上。一次次明夺暗抢，一批批毒品脏货，使黄金荣的地下仓库堆满了金银财宝。有了财力就不乏人力，黄金荣很快便成为上海滩黑势力的巨头。由于贩烟利润奇高，帮会流氓为争夺地盘和烟源常常斗得不可开交，黄金荣虽然从中获取巨利，但毕竟仍是暗中行动，限制太多。于是，他就向法租界建议使贩烟公开化，法租界既可以从“烟土税”中捞取厚利，还可杜绝那一起起惨烈的械斗。更主要的是，黄金荣打算利用职权赚取更多的利润。经过协商，法租界考虑到自身收入的增加，于1925年5月，同意黄金荣成立“三鑫公司”负责法租界的烟上公卖并预先付给法租界当局14万元。后来，法租界的“土捐”、“烟枪捐”统归该公司收取，法租界则坐享其成，每月向公司收取税款，一年可向公司收得1000万元以上。三鑫公司在外国主子的支持下，以各种流氓头目为骨干，拥有数百名职业打手，控制了上海数万家烟馆、赌场、妓院，势力伸展到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年利润高达5600万元。

腰缠万贯的黄金荣一方面广置产业，满足他的私欲，一方面广收门徒，扩展他的恶势力。虽然黄金荣是个从未拜过青帮师傅的“空子”，却要以青帮名义次徒，因其权倾上海滩，青帮之中也无人敢指出他的非份之举。而且，黄金荣收徒并不按青帮已有的排行，特意编造出一套“荣记”独有的24字排行来。这24字是：文行忠信，孝悌树人，礼人廉明，正心吉祥，松柏长青，永葆德成。黄氏门徒主要是些游手好闲的白相人、为非作歹的流氓和无恶不作的帮徒，也有大量的军、警、工商、艺人等各色人物。由于门生过多，黄

自己都叫不出许多门生的名字。与黄联系最为密切的约有二三十人，其中有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连奎、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卢英等，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杜月笙、张啸林。此外，不少正当人物为了在上海滩求生存、求发展也不得不附在黄的门下。当时，有位戏剧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天蟾舞台演出，因见卖座很盛，提出增加包银，顾不应允，常提出罢演，结果被顾的门徒活活打死。此后不久，顾又请名演员周信芳到天蟾演出，周深知顾氏手段毒辣，不敢硬性拒绝，可又不愿受顾氏苛扣，一年的演出合同期满后不肯续定，引起顾氏的不满，他声言要给周点颜色看看。周只好托

人拜黄金荣为师，求其保护，顾竹轩忍气作罢。

黄金荣的声势越来越大，他的门徒也就越来越飞扬跋扈，霸人钱财。某日，黄金荣率领其徒子徒孙到聚室茶楼吃茶，见茶楼既有雅座，又有幽室，是享乐的宝地，不由得起了凯觎之

心，想把它搞到手。几天过后，聚宝茶楼刚开门营业，突然间，一大批横眉立目的家伙闯了进来。这批流氓边往楼上走边互

相对骂，还未等上到楼上便早已大打出手，一时桌飞凳舞，杯盘乱飞，随后斧头、片刀、匕首、铁棍都掏将出来，直杀得惨叫声声，鲜血横飞。待到厮杀声绝时，活着的流氓早已逃之夭夭，剩下的只是六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和几个半死不活的断臂缺腿

人。这种飞来横祸把个茶楼老板搞得魂飞天外，损失倒在其次，这六条人命叫这个小小的老板如何吃得消？如果再重演一

次，他非得把命赔进去不可！他左思右想，觉得这个茶楼不能再经营下去了。就在这时，一个熟人建议他把茶楼卖给黄金荣，说：“你若不把茶楼奉送给麻皮金荣，他早晚会把你连肉带骨吞掉。”茶楼老板觉得此言有理，只好忍痛割舍，以低廉的价格把茶楼卖给了黄金荣。

黄金荣就靠这种流氓手段，由一个贩运烟土的黑帮头领变成许多家银行、公司、工厂、舞厅、旅馆、酒楼的老板，从而成为上海滩知名的“社会闻人”。

一个多面派

黄金荣深知，尽管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但只有与政治巨头勾结、与政治党派联结，才能鸿运长久。他的信条是：尽量与任何强大的政治势力保持关系，见风使舵。他首先看中的是直接与自己势力发展有关系的浙江军阀。为此，他设法与当时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结为异姓兄弟，又与淞沪警察局长徐国梁打得火热，后又被浙江督军卢永祥聘为上校督察。浙江军阀失势后，黄又对实力日盛的奉系军阀大献殷勤。奉系头目张宗昌、毕庶澄到达上海时，黄金荣阿谀奉承，竭力讨其欢心。黄金荣在与各派政治势力交往中练就了一套随机应变的本领，对当权者曲意逢迎，对在野者也示以仁厚，以备日后之用或赢得好名声。

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为了使国民党人在上海便于活动，曾亲自到黄府拜访，要求黄对国民党要多加照顾，后又多次写信给黄金荣，要他联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并在人力、财力上予以帮助。黄金荣满口答应，但并不行动。不过，后来国民党人来沪活动，多少也得到黄金荣及其手下的照顾和资助。袁世凯当政时曾要求上海法捕房协助逮捕国民党分子汪精卫和陈公博。黄金荣在带领巡捕出发前早已派人去通风报信，使汪、陈二人逃脱险境。以致后来

黄金荣到处吹嘘：“我一生之中最讲义气、重友情，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不过，他一生中最得意的还是和蒋介石的结交。蒋介石原属陈英士部下，陈死后，蒋在政治上失去靠山，混迹于上海滩，与陈果夫、戴季陶合伙做投机生意，不久因投机失败而狼狈不堪。蒋决定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但债务缠身而又身无分文，最后在虞洽卿的引荐下去投靠黄金荣。自此之后，蒋的处境大为改观，在虞、黄等的资助下，重新干起炒卖股票的勾当，尽管亏蚀惨重，黄金荣却毫无怨言，不仅出面代他还清债务，还资助他大洋200元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1926年，蒋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黄金荣感到异常荣耀。他为了保持蒋的面子，私下遣人将蒋投递于他的门生帖子送还，不再以“师父”自居，从而使蒋、黄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黄金荣正是依靠自己编织的一张张保护网，才能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不仅未受时局变动的影响，反而一步步发展起来。

能够说明以黄金荣为首的青帮之真实面目的莫过于他们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表现了。当时，法租界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命令黄金荣组织纠察队，以备镇压。黄遂以法捕房督察长的名义成立了一支二三千人的流氓武装，随时准备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蒋介石来到上海后，不仅对黄金荣礼遇有加以表先前救困之恩，而且打算借助于黄氏集团打击上海的工人运动，并派杨虎、陈群前往黄府游说。起初，黄金荣还有点犹豫，因为当时工人运动势力强大，何况还有共产党人的支持和领导。杨虎意识到黄的心态，便火上加油道：“共产党口口声声要‘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现在他们占了上海，和租界对抗，把军阀赶跑，说不定几天后，就会把那些与军阀、洋人有关系的统统杀掉，像黄先生这样的大亨更是难逃一死！那年共产党在上海开代表大会，你曾亲自带人去抓他们，他们会轻饶了你吗？”这几句话把黄金荣激得脸色铁青，麻皮泛红，当下便犹如王八吃了秤砣，誓与蒋介石共存亡。他大肆招兵买马，亲自出面组织了“中华共进会”，纠集地痞流氓，分发武器，充当蒋氏政权的反革命急先锋。“四·一二”政变期间，黄金荣亲自指挥数千名流氓到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屠杀工人群众。事件之后，黄金荣受到蒋介石的表彰，说明黄金荣已沦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

### 跌霸与衰落

20年代中后期是黄金荣黑道生涯下跌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他的势力仍举足轻重，但已失去了上海帮会第一把交椅的位子。

黄金荣第一次跌霸是因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争夺露兰春而发生的冲突。露兰春是名坤角，姿色艳丽、技艺超群，早已被黄金荣霸占为妾。这天，共舞台来了位不速之客，身着白纺绸衫裤，后随两名仆从。台上，露兰春正演她的拿手戏《镇潭州》，不料一时疏忽，在唱“哭板”时竟走了调。场内观众大多没有听出，听出的也未苛求。而刚刚入场的那位不速之客却毫不客气地喝了一声倒彩，登时全场噪动。出尽风头的露兰春自登台以来哪受过如此侮辱，掩面下台，正在后台为露兰春“把场”的黄金荣见状大怒，喝令爪牙马上把那个该死的“捣蛋鬼”抓来。几个凶神恶煞的爪牙横冲直撞地闯到不速之客面前，点着鼻子问道：“是你喝倒彩？”哪知这位不速之客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手里的折扇一摆，转身便走。站在前面的一个爪牙拦住去路，上去就是两耳光，并把这位不速之客连推带搡地抓到后台。黄金荣正准备好好整治整治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猛然发现此人原是认识的，顿时

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你道这是何人？他是上海权势最大的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宠子卢小嘉。卢小嘉可不是一般人物，号称当年中华“四大公子”之一。四大公子都是豪门之后，第一位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第二位是奉系首脑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第三位是大实业家张謇的大公子张孝若，最小的一位就是卢小嘉。卢小嘉虽居“四大公子”的末位，但自以为风流倜傥，平时浪荡逍遥，依仗父亲权势，在上海滩横行无忌，从未吃过今日这样的亏。卢小嘉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眼前的黄金荣一口吞掉，但他知自己目前势孤力单，好汉不吃眼前亏，故未发作。黄金荣此时心中犹如倒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难受至极。明知得罪不起卢永祥，又不愿在徒子徒孙前丢脸，过了好半天才冷冷吩咐：“让他走吧！”

卢小嘉回府后将此事哭诉于卢永祥。卢永祥闻言大怒，即命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将黄拘捕，并准备置黄于死地。黄知闯下大祸，命系于一旦，忙请地方豪绅出面说合。几经斡旋，卢永祥答应留下黄的性命，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赔偿人体损伤费银元 10 万块，二是要黄亲自写下认罪书，否则，立杀无赦。

黄金荣自然保命要紧，忍痛答应下来。这一事件虽未使黄大亨丧命，但已丢尽了面子，大大的“塌台”。此后不久，黄与原配林桂生离婚，欲强娶露兰春为妻。露兰春婉言拒绝，并下嫁给唱老生的安舒元。黄金荣无可奈何。

· 黄的这一系列挫折被帮会分子视为奇耻大辱，一些帮会分子纷纷指责黄是个“空子”，这恰恰戳到了他的痛处。实际上，不少青帮分子早就对黄身为“空子”却自视大辈的行为颇有微词，但在黄权势显赫之时，谁也不敢指斥他的悖谬。此刻见黄金荣台面已塌，便大加起哄，要求黄澄清是非。黄自知心虚，忙请张仁奎出面调解，又四处散布流言，说他曾在镇江入过帮。他还准备通过拉拢袁克定，以 2000 两银子取得“大”字辈身份。哪知此事风声走漏，“通”字辈大哗，扬言要他请 100 桌客，否则将兴师问罪。黄金荣被搞得焦头烂额、黔驴技穷，又托人向张仁奎交付 2 万元大洋，请求张仁奎收他为徒，但张仁奎退还了贴子。结果，折腾了半天；黄金荣的帮会身份仍然悬而未清。后来，虽不了了之，但黄金荣的声望已远不如前，再不敢像以往那样在帮中横行了。

蒋介石的升迁如给黄金荣注射了兴奋剂，他力图依靠蒋的力量东山再起。“四·一二”事件以后，黄虽受蒋嘉奖，但只有杜月笙得到蒋的单独召见。黄金荣、张啸林自叹弗如。不觉心存嫉妒，与杜的矛盾日益加剧。后来，张啸林主持的“共进会”活动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禁止，因而归咎于黄并断绝了与黄的来往。黄金荣更觉大势已去，意气消沉，不久辞去法捕房督察长一职，回到漕河泾黄家花园，退休闲居。

此时的杜月笙已取代黄坐上了上海滩帮会势力的第一把交椅，但杜仍伺机削弱黄门势力，表面上却对黄金荣毕恭毕敬。“九·一八”前夕，杜的门生、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陆京生秉承杜的旨意，决定煞煞黄门子弟、英美烟厂工会主席陈培德的威风，指责陈有共产党嫌疑，将其关押在牢。黄金荣只好亲自出马，直接向司令杨虎说情，陈才得以获释。陈出狱后直向黄哭诉陆的种种不是，并说陆在审讯他时一口一个“杜先生”，根本不知有“黄老太爷”。一席话把个黄金荣气得手足乱抖，当即给杜公馆打电话质问此事，杜却假装不知，连忙答应好好管教门下。为了专门对付气焰嚣张的杜党及其组织“恒社”，黄于 1936 年夏准许其门生秘密组织“忠信社”，由黄任会长，

目的是采取各种手段搞垮杜氏“恒社”。该社起先在黄家花园聚会，每星期日以聚餐为名，密谋搞垮“恒社”之策。黄发现，杜党势力已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依靠自身密谋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又与杨虎的“兴中社”结成同盟，并订下了初步策略：第一步，拉拢“恒社”骨干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同门师生矛盾；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然后由黄密告蒋介石。结果，秘密会议举行了六七次，计划制订了一个又一个，仍无法搞垮“恒社”。不久，“八·一三”战事爆发，该组织便无形中解体了。

#### 夹缝中的变色龙

“八·一三”战火燃起后，黄金荣表现得倒很慷慨，即令共舞台、黄金大戏院和大世界游乐场停止营业以收容难民，两天就收容了约6000多难民。黄又拨出1000万担大米供应难民。后上海守军撤退，上海遂成为孤岛，黄金荣不愿逃离，也不肯公开“下水”当汉奸，只与日伪保持密切关系，以求明哲保身。日本特务机关早已知道，黄金荣乃名贯全沪的闻人，门徒众多，让他出任市长是再合适不过了。1938年春的一天，日本特务佐藤来到黄府，邀请黄出面组织上海伪政府，黄以身染重疾推辞不见。佐藤并不罢休，再次拜访黄金荣，并身着戎装，随带众多宪兵，声称必见到黄金荣方可复命。黄金荣只好出门迎接，但他事先已伪装瘫痪，由家人扶他出来相见。佐藤先问了问黄的病情，然后问道：“你们中国人对日本皇军印象如何？”黄金荣故作有气无力地答道：“皇军初来中国，彼此了解不够，日子久了，自会消除敌意。”佐藤点头称是，接着说道：“本人来府造访，是请阁下助皇军一臂之力，出任上海大道市市长之职，不知意下如何？”黄金荣面露难色，道：“鄙人承蒙皇军关照，不胜荣幸，只是染病在身，力不从心，无法为皇军效力。”佐藤见黄身体僵硬，口中常有涎水流出而不自知，也只好作罢。不过，他要求黄金荣答应下列条件：一是黄必须全力支持伪政府并派弟子参加汉奸组织；二是黄必须负责为日军运销烟土充作军饷，黄金荣一一答应。佐藤辞行时，黄金荣拿出两件珍贵礼物相赠，一是碧绿翡翠雕成的观世音菩萨，一是纯白玉雕成的弥勒佛。

黄金荣坚辞伪市长的消息传出后，他的许多门徒感到疑惑不解，纷纷前来劝说他就任此职，以便能在他的庇佑下青云直上。黄金荣讲出了他的一番道理：在中国，作大奸大恶可享一世富贵，要做汉奸就要短命了，因为中国人最恨汉奸。为了避免担上汉奸的名份，黄还想方设法为国民党政府效力。1940年后，他多次派家人弟子同国民党方面联络，他的儿子黄源焘、门徒秦炎兴被国民党委任为特别行动队大队长、支队长之职，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地下工作者”。黄氏本人则以“年老体弱、大病缠身”为名，谢绝一切社会活动，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浴室洗澡，有时也到其弟子组织的各种社团走走。与此同时，黄金荣又竭力与日伪方面和睦相处、曲意逢迎。他自己虽未就伪职，他的弟子则在他的授意或默许下纷纷出任伪职，他的得意门生郝鹏举当上了伪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出任伪淞沪铁路护路团司令，弟子李长江出任伪和平军集团军司令，而其中最为恶名昭著的要算他的得意门生卢英了。卢英在抗战前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后出任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军委会参军长，成为显耀的“新贵”。黄金荣不仅不对他加以劝止，反而十分宠待，并以此炫耀黄门威风。从黄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脱脱的中国式“变色龙”。

#### 无可奈何花落去

1945年日寇投降，杜月笙以“抗战英雄”身份回到上海，恢复了“恒社”的活动。黄金荣这个苟生于沦陷区的大亨显得更加暗淡无光，但他不甘于落在杜氏之后，也决定恢复已停顿8年的“忠信社”，不久改名“荣社”，以与“恒社”相抗衡。1945年11月荣社成立时，社员2万多人，声势浩大，但因内部骨干分子各有山头、内讧不已，致使“荣社”远不如“恒社”活跃。

尽管如此，黄金荣还想以“第一闻人”的身份横行沪上，可惜好多人已不买他的帐，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敢在“黄老虎”头上动土了。1946年秋，国际饭店为庆祝上海市长生日而大摆宴席，黄金荣自然是席上贵宾，周围的宾客对他极力奉迎，他狂妄地说：“黄某承各位抬举，才撑到这个市面，不敢夸口在上海滩没人敢和我作对，但若哪一个敢敲我一次‘竹杠’，我就真服了他。”众人连连称是。可是一位国民党元老对黄不大买帐，冷冷地说道：“你黄老板身带手枪，出入有保镖，当然没有人敢动你。”话中带刺，把黄金荣呛得直喘粗气，当下拔出手枪，离座出门，扔下满场保镖，独自乘车回府。当车开到霞飞路时，司机突然拔出手枪顶住黄的脑袋，要他把钻戒、手表摘下。这一下把黄金荣真搞懵了，他万万没想到他自己的司机会劫他。司机拿到钻戒、手表后并不离去，而是说：“这次不会要你命，今晚12点，必须把20年前勒索的那尊金佛放到愚园第十八根电杆下的垃圾箱内，否则后果自负。”说完跳车离去。黄金荣气得半天没转过向来，没想到大话还没吹完就有了报应。他回府后立即召集爪牙前往愚园，把金佛放在指定位置，然后埋伏好，只等取物者来后格杀勿论。直等到夜里3点钟、放金佛的垃圾箱里突然窜出一只狗来，嘴里叼着一个布包。众爪牙一顿乱枪，那只狗顿时一命呜呼。等一个爪牙打开布包一看，金佛早已换成了石头，石头下还压着张纸条，上写：“原物归主，前事两讫。”原来是黄当年的勒索对象的后代设计取回了金佛。爪牙们再去看那个垃圾箱，箱底有一深洞，狗就是从洞中窜出来的，取物人也是从洞中溜走的。黄金荣听到汇报后暴跳如雷，可又无奈何，吃了个哑巴亏。

1948年8月，蒋经国出任上海区经济督导，立志整顿上海经济秩序，声称要打几只大老虎。黄金荣的亲信黄振世被蒋太子聘为评价委员。黄金荣认为时机已到，决心要煞煞杜月笙的气势，长长自己的威风。他授意黄振世调查杜的各种投机活动。黄振世几经周折，打探到杜暗中策动抢购物资以排挤蒋经国，连忙报知黄金荣。黄金荣大喜过望，于是邀请蒋太子赴宴，准备在席间告诉他有关杜的事情。蒋太子答应得倒挺痛快，可酒宴那天，他仅派了两名属下赴宴，黄的倒杜计划成了泡影。此后不久，杜月笙次子杜维屏被蒋经国和押，终使黄稍稍出了一口气，当时杜已风闻黄曾宴请蒋太子，认为肯定是黄老头在背后捣鬼，更加忌恨于黄。

解放前夕的上海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浮动。青帮大亨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或出于自愿，纷纷与中共接触。黄金荣在这方面显得比较消极，直到1949年4月解放军攻克南京后才同中共人士建立联系。当时，在北平的章士钊托人给黄带来口信，称中共中央某首长已向章士钊表示，只要黄金荣拥护共产党，不再与人民为敌，一定既往不咎，希望他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陈毅也让上海地下党转达希望黄金荣留下的意见。此时，杜月笙、金廷荪等超级大亨均已逃往香港并捎回话来，劝黄离沪赴港。黄沉思再三，还是没去香港。他说：“我已年过八十，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毛病，岂不要死在半途中。”故而坚持不动，并向解放军献上三件“礼物”：

一是在国民党出逃前的大屠杀中，他掩护了一批中共党员；二是向地下党交出一份国民党财产表；三是交出 400 多名青帮头目名单。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的寡媳李志清席卷黄家贵重财物逃往香港并多次电催黄赴港。黄还是未动，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1951 年 5 月 21 日，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压力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白书》说：“我今年已 84 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 60 年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然后，他又对上海帮会分子说：“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的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生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隐瞒。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致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以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表示：“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规，我一定切实遵行。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的懊悔、惭愧与感谢的心是真诚的，绝不是虚伪的。”自从发表《自白书》后，黄金荣闭门不出，常常独自一人沉思默想，于 1953 年发病身亡。

## 2. 强盗书生：杜月笙

“沪上闻人”之中，杜月笙最富传奇色彩，被外国报刊誉为“最有趣的人物”。他虽出于黄金荣门下，但其势力和影响在旧社会的上海滩无疑已超过了“黄老太爷”。可以说，杜月笙的名字已成为上海帮会的同义词和上海黑社会势力的象征。

### 江湖野子闯天下

杜月笙，名镛，1888 年阴历八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因他生于中秋节月圆上夜，故取名为“月笙”。杜月笙自幼父母双亡，随继母张氏生活，小月笙聪明、顽皮，不仅甚受继母疼爱还得私塾老师之宠。无奈家境过于贫寒，一个妇道人家实在无法供他读书，只好忍痛辍学。从此，小月笙便以乞讨方式赡养继母。那知“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日，小月笙自外乞讨归来后，只见房门大开，继母不知去了何处。事后得知，继母是被一帮贩卖人口的流氓拐骗走了。年仅 8 岁的杜月笙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亲人的抚爱，后虽为外婆收留，但外婆家也很穷，杜月笙就整天和一帮街头流浪儿混在一起。一混就是五年。这种坎坷的童年经历不仅使杜月笙尝尽了人间的苦难，而且练就了一副好勇斗狠、察言观色的性格，也激起了他向上爬的欲望。

杜月笙 14 岁那年，因偷他舅父的钱财而被痛打一顿，随后被送到上海十六铺水果店当学徒。舅舅是想一来让他学点手艺好谋生，二来借以约束性格，以免再堕落下去。哪知此时的杜月笙已变得放荡不羁、难以收敛了。杜根本无心于生意经，常常和街头上的小瘪三混在一起。遇到以强凌弱的，他就打抱不平，为此他常和别人打架。他被别人打伤，从不叫一声；他打伤了别人，受伤者就找水果店老板纠缠。老板一气之下，把他从店里赶了出去。

杜月笙虽在店里没学到什么生意经，但却学会了削果皮独特本领。他可以在谈笑之间，用很短的时间削下一圈圈均匀不断的果皮，人称“水果月笙”。被老板炒了“鱿鱼”后，杜月笙一时生计无着落，但他又不愿整天靠扒窃过活，于是他摆了个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他便得了个“莱阳梨”的绰号。当初，他非常喜欢这一诨号，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再也没有人敢当面这样叫他。不过，当年曾和他在一起混过的一些小流氓在要钱不遂意时也当面叫他“莱阳梨”。碰到如此场合，他倒也不怒，吩咐手下加点钱了事。

杜月笙比较注重江湖义气，常把卖水果得来的钱分给与他共患难的小兄弟们，加上他在这帮小流氓中处事果断，敢于出头排难解纷，也因而深得这些人的爱戴，在当地竟有了一些小名气。一次，有位锡箔商人从杭州运来一批锡箔，要在十六铺码头卸货上岸。他打算找个流氓头儿保护货物，结果找到了杜月笙。杜见得钱不少，强过暗地扒窃，便答应了商人的要求。锡箔卸上码头那天，其他帮派的流氓蜂拥而至，动手抢劫，杜月笙懂得拿人钱就得为人卖命的道理，当即出手阻拦，双方立刻打起来。杜月笙这帮人不多，而且没见过大阵仗，不一会儿便被打得抱头鼠窜，最后只剩下杜月笙一人。他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冒，但仍在拼命厮杀，直被打得趴在地上，充法动弹，对方才扬长而去。多亏他的姑表弟万墨林来把他抬走，否则早已暴尸街头。万墨林为他请医、煮药，尽心服侍。杜月笙对他十分感谢，含泪说道：“有朝一日我交了好运，一定不会忘记你今天对我的好处。”这位小表弟说了几句安慰话，内心里却根本不相信杜月笙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经过这一番打斗，杜月笙的“狠劲”出了名，成为流氓地界无人不晓的人物。杜月笙自己则在盘算着以后的出路。他深深感到若靠码头吃黑饭，非得找个有名望的靠山不可，否则再凶再狠也不会有立足之地。虽有找靠山的想法，可谁又接纳小小的流氓头儿呢？杜月笙感到十分绝望。他把心事告诉了帮内叔爷、老相识黄振忆。黄振忆是黄金荣的亲信，动了恻隐之心，见帮内小辈沦落到穷途末路的地步，答应帮他，荐他到黄金荣家当差。黄金荣见他生得个头不高、清癯瘦削，手无缚鸡之力，对他不甚满意，但因是黄振忆荐来的，只好暂留府中。杜不仅好勇斗狠，而且工于心计，在流氓中有“诸葛亮”之称，尤其擅长揣摩别人心思。他深知难以巴结上黄老板，故尽心尽力去讨好黄夫人。他整天站在老板娘林桂生的房门口，轻易不离开一步，也不敢踏进房门一步。每逢丫头给林桂生送茶送饭，他总是把亲手削好的水果托丫头送进去。奴仆的忠实和殷勤打动了人人畏惧的“白相人”桂生姐那骄横的心。她开始让他收盘子钱，他总是速去速归，如数交上；让他去收她用私房钱放债的利息，他更是不漏风声，按时完成。经过一次次考验，林桂生知道这个瘦小个子是个头脑灵活、忠心耿耿的帮手。不过，林桂生是个极挑剔的女人，她不仅要看杜的忠心，还要看他有没有胆量和本事，于是向黄金荣提议，让杜带人去抢新开河、陆家嘴两个新建码头，既可扩充地盘，也可借此掂出杜的斤两。霸占新开河、陆家嘴两码头的地头流氓，约有100多人，他们的头领是以凶狠著称的“独眼龙阿财”和“惠根和尚”。杜月笙起初还真有些胆怯，他早就听说过这两个人是远近闻名的地头蛇。不过，他转念一想，这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刀山火海也得闯。第二天晚上，杜月笙带着一帮喽罗埋伏在新开河码头的暗处。等独眼龙和惠根和尚一伙人一到，杜月笙便一声吆喝，手持锋利的三角小斧，带头冲出去，惠根和尚闹不清发生了什



么事就被杜月笙一斧劈中，顿时脑浆崩裂，倒地毙命。新开河流氓见首领被对方劈死、都手持利刃向杜袭来。杜月笙身陷重围，越斗越狠，接连又劈倒几个，自己身上也被砍了几刀，浑身血迹斑斑。双方有的被打落水中，有的被刀劈倒，但依然喊声冲天，搏斗不止。就在这时，十六铺巡捕房的巡捕赶到，与杜月笙一起殴打新开河流氓。这群流氓见状不妙，纷纷逃窜。

经过这场械斗，杜月笙赢得了黄公馆上下的称赞，渐渐成为黄府的红人。但他并不满足于一个小角色，一边作黄金荣的“军师”、“打手”，一边暗中蓄势，准备有一天“自立门户”。因此，他充分利用黄的地位多方交结、拉拢各种关系，培植私党。征得“黄老头子”同意，网罗了顾嘉棠、叶焯三、高鑫宝、芮庆荣、杨锦堂等人组成以自己为首的“小八股党”，名义上是为黄争夺烟土生意，实乃杜氏的私人爪牙。这批人全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而且对杜忠心耿耿。其中高鑫宝常常随身携带利斧，人称“斧头党”。有一次，高鑫宝要强行与某赌场老板分成，该老板拒不答应，高二话不说，拔出斧头，顺手将赌客砍翻，扬言要“摆平赌场”，老板只好屈服，杜正是利用这一批黑手恶棍，通过几次凶狠的拼杀，从沈杏山的“大八股党”手中夺得了鸦片贸易的保护权、批发转运权。这样，不仅财源滚滚，而且树起了“小八股党”的牌子，杜一下子名声鹊起，成为黑帮中的响当当人物。黄老板妒心遂起，杜也借机离开黄府，自立门户。

广为结交的“小孟尝”

杜离开黄府时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虽有了一定势力，但目前仍没有超过黄金荣。不过，他有决心夺得黄金荣的上海第一把交椅的宝座。他与黄金荣的明显不同在于，黄氏乃流氓闯荡江湖的气派，喜欢蛮干，一副强硬作风。杜月笙则善于智取，他的所作所为无不留下这种风格。

在与帮中元老、社会名流打交道时，杜月笙吸取了黄金荣跌倒后的教训，轻易不得罪人。别人有事找他帮忙，只要他认为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总是痛快地答应下来，暂时吃些亏他也不在乎。他常说：“花一文钱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他首先结交的是宋子文。宋曾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从此视上海为畏途。杜主动提出由他安排大批人马暗中保护。1933年，宋子文发行“航空奖券”，杜月笙指使金廷荪组织了大达公司，不仅为宋子文大赚金钱，自己也发了不少横财。

应当承认，杜月笙捧人的手法确实高明，他捧人捧得不露声色，使被捧之人十分高兴。有人替他总结经验，大致有“烧冷灶”、“趋势门”、“捧场面”、“行贿赂”、“讲义气”等诸般手法。他所捧过的人中最识其捧的莫过于孔祥熙了。杜深知孔是位难

得的财神爷，他也了解到，孔祥熙是位爱出风头又不愿干事的主儿，必须投其所好。一次，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抵沪募捐，先我市长吴国祯，吴对此毫无兴

趣。向、何二人又找到杜，杜听了后满口答应帮忙，并在几天内把这件事办得有声有色。本来他完全可以把募得的钱直接交

给向、何了事，但他欲借此机会捧孔祥熙。他找到孔，先向孔述说了吴市长不肯帮忙而由他代办的事，然后请孔出面，一切具体事情由杜来办。孔当然愿意插手这种只有名利而又不干实

事的事情。结果，孔既大大出了风头，杜也因此得以与孔结交。

自此之后，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凡是出风头的事杜都尽量让给孔，自己

则退居幕后，并从中得到无数赚钱的机会。

他与戴笠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

时，戴笠在上海很是狼狈。杜慷慨解囊，先后借给他100银元，以致若干年后，戴笠仍不忘怀，二人结成异姓兄弟。人道戴笠残酷无情，六亲不认，但却最买杜的帐。杜氏在政界的交往并不仅限于几位国民党要人，无论南北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名人，只要来到上海，他都要联络应酬一番。李顿调查团到沪后，杜就曾设盛宴款待。以至于在上海，杜成了“路路通”，所谓“杜先生一句话，人人都要买他的面子”。

除了结交权贵，他也注重收买人心。即使有时某一事情缺乏实用价值，只要有利于提高他的声望，他都肯干。

一次，几个法国士兵喝醉酒后在街上胡作非为，坐黄包车不给钱。车夫争辩了几句，竟被一法国士兵当场用刀刺死。车夫家中还有一妻三子，一时衣食无靠、状告无门。上海华人报纸纷纷谴责法国人的强盗行径，而法国领事馆对此则置若罔闻，杜月笙闻讯后，异常气愤，觉得法国人欺人太甚，决定管一管，于是率人前往拜见法国驻沪领事。你道这位法国领事是谁？原来是那位曾被太湖帮绑架过的范尔迪。范尔迪获释虽是由黄金荣直接出面的结果，但实际上却是杜为黄出的主意。事后，范尔迪知道真相后，对杜一直感激万分，两人交情甚笃。范尔迪见杜登门造访，自然是一番热情款待。杜月笙讲了几句客气话后，单刀直入地说：“今天，杜某非为私事而是为贵国士兵杀人之事而来，还望领事先生能秉公办理，交出凶犯。”范尔迪低头沉思了半晌，作为难状：“那位士兵已经回国，恐怕难以照办。我也无权把他召回。”杜月笙微微一笑：“我已得到确切情况，他就在领事馆中。”范尔迪知道杜机警过人，眼线很多，心知是个难斗的主儿，但又不甘心将凶手交出，便正色道：“不是我不给杜先生面子，按法律，我国士兵犯法，应有我国执法机关处理。我一定将该事件调查清楚，严惩凶手。”杜见范尔迪执意推脱，也毫不相让，软中带硬地说：“贵国士兵在我们中国杀人，应由我国政府处理。如果领事先生不交出凶犯，那以后恐怕我们之间很难相处了！”范尔迪深知杜在上海的势力，知道此人得罪不起，口气软了许多。两人谈判的结果，法方同意付给被害人家属4000元银洋作为抚恤金，并保证法国士兵不再滋事胡为。杜也未再坚持要法方交出凶犯。他想，人死不能复生，关键是要法方拿出钱来，保证不再生事；如果总要法方交人，恐怕也会大大地得罪洋人。杜月笙回府后，派人将4000元送给被害人家属，并又加上4000元自己的钱。杜一再嘱咐送钱人，不要讲是他向法国人要的钱。受害人一家正愁日后生计没有着落，这8000元犹如雪中送炭，可一时又不知恩人是谁。过了几日，受害人之妻几经周折，打听到恩人原来是杜月笙，忙带一家老小到杜府叩头谢恩。这件事一时被上海滩传为美谈，杜月笙的名声更响了。

除此之外，杜月笙还有许多“义举”。据说，在杜月笙极盛时，每天早晨都有不少人在杜公馆等杜起床。杜在床前放置一个装满钞票的箱子，他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门口等候者散发钞票，直至箱内钞票发完为止。所以，上海滩的帮会分子都把杜月笙比作“及时雨宋江”或“当代春申君”、“小孟尝”等。

凶狠残毒的黑社会头领

杜月笙有其隐忍、宽容、慷慨的一面，也有凶残、狠毒的一面。这首先表现在他的铁心反共上。他自己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正是由

于在“四·一二”政变中的突出表现，他才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密谋反共策略，并请杜帮忙。杜当即答应，他先去劝说张啸林，张同意后，杜又去说服黄金荣。之后，以杜、黄、张三大亨为首纠集了一批流氓恶棍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当时，蒋密令杜必须首先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谋害，以便使工人纠察队群龙元首。杜马上请来张啸林、顾嘉棠等密谋对策，最后决定由杜出面送给总工会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顺便带一请帖，请汪寿华当晚到杜公馆来，称有要事相商。等汪寿华一到，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立即从暗中扑出，用铁棍朝汪寿华头上猛击，汪寿华及随行人员人少势单，很快就被击昏倒地。这几个凶手七手八脚地将汪等人装进几只大麻袋，搬到大门外的车上，拉到西郊的黄地上活埋了。杜等杀害了汪寿华，就开始对工人纠察队进行血腥大屠杀。他在上海滩滥杀仍嫌不过瘾，4月下旬，杜又亲率200多名打手与杨虎、陈群一道前往宁波协助蒋鼎文清党，屠杀三天之久。回沪之后，他又命高鑫宝等杀往松江、青浦。经过此番“杰出”的反革命表演，杜博得蒋政府的青睐，乘机取代黄金荣，坐稳了上海帮会的第一把交椅。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同样也心狠手毒。有一次，听说他的大老婆与他的堂侄杜小宝有暧昧关系，立即指使其爪牙把杜小宝抓来，亲手将杜小宝双脚砍去，后来才知完全是谗言，又把杜小宝接到家中同住。不久，杜小宝得病归天，杜月笙的大老婆也因不堪虐待而死。

1931年，一家小报登了知名作家宋某一篇评论著名影星胡蝶的小品文《杂谈》，文中略略涉及杜的私生活，杜马上将宋和报纸主编抓来痛打一顿，并打断了主编手臂以示惩戒。后虽经多方周旋，二人获释，但主编神经受到极大刺激，从此疯疯癫癫，宋某不久也忧愤而死，年仅30岁。

#### 争霸工商界

杜月笙最初的主要财源是三鑫公司。杜曾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把握公司的实权。正是从三鑫公司的活动中，他深知毒品买卖和赌业的诱人厚利。从此，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争夺毒品买卖和赌场。不过，他也明白，在这方面以及娱乐行业，他无法与黄金荣竞争，只有向工商业发展才能广开财路。因为黄固步

自封，从来不肯投资工商界。1921年，杜月笙开办了中江银行。杜办银行只是入了“干股”，即白手起家，银行主要由大英银行买办徐懋棠和另一富豪投资。中江银行很快就成为一家资金雄厚、信誉良好、获利甚丰的著名银行了。杜因此在金融界站稳了脚跟，后被吸收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不久又当上了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和浦东、国信两家银行的董事长。

在金融界得手后的杜月笙又把手伸向实业界，扩大地盘。他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充分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他先以投机方式控制了面粉业，后又觊觎全国闻名的申新纱厂。一天傍晚，杜的几名爪牙驱车来到纱厂老板荣德生的住宅，守门人刚要问话，早已被车上跳下来的人击倒捆了起来。此时荣老板正在吃晚饭，发觉外面有异，想从后门逃走。几名歹徒窜将进来，把他按倒，嘴里塞上棉布，装进麻袋，放进汽车疾驰而去。

杜月笙对这位“肉票”倒也优待，将其密藏，然后逼交赎银60万元，不得付价还价。荣家几次请警方破案都无下落，只好

按对方要求卖掉工厂的动产以赎回老板。荣德生大半生经营

的血汗钱被杜氏敲去，再也无心经营工厂，卖掉厂房设备回无锡老家去了。

杜以这种流氓手段霸占了申新纱厂，又开始打纱布交易所的主意。一次，纱布交易所理事操纵市场，促使行情不断看涨，杜月笙受到一些损失。他得知内情后，认为时机已到，便让经纪人顾永园率大批打手闯到交易所大吵大闹，要求调查此事，搞得交易所一片混乱。交易所只好求救于巡捕房，巡捕房早已得到杜氏的招呼，不予置理。交易所负责人袁履登、闻兰亭被迫登门拜访杜月笙，请他出面调解。杜大摆“闻人”架子，指责袁、闻无理取闹，要他们让行情下跌，一直跌到大家都不吃亏为止。袁、闻唯唯诺诺，最后只得请杜出任交易所理事长。航运业是个利润丰厚、影响广泛的行业，杜月笙自然馋涎欲滴。不过，航运业的骨干大达轮船公司历史悠久、实力庞大，是块硬骨头。杜耐心等待、寻求时机，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战略。30年代初期，该公司因变故迭出而处于困境之中。杜趁机大量收买大达的股票，成为公司大股东，然后又指使公司董事会内外的同党到处造舆论，要杜出任董事长。这一提议遭到了大达一批旧人的强烈反对。杜又指使一批年轻股东向上海社会局呈交要求改选大达公司董事会的报告。早已得到杜的好处的社会局指令大达召开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同时，杜又派出大批打手涌入大达码头。双方发生激烈械斗，以致惊动上海警察局封锁交通，使大达公司轮船多日无法装卸开航。董事会的强硬派只得让步，亲自上门请杜月笙出任董事长，后杜又当上了上海轮船公会理事长和全国轮船公会理事长。

好一副大亨的“气派”

杜月笙在实业界的频频得手，标志着他已成为上海滩的头号“闻人”。成名后的杜月笙与黄金荣不同，很是关心自己的形象。为了与各种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不得不放弃过去那种歪戴帽子、高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竭力装出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说话尽量文雅，举止力求稳重。对他的手下，杜也一改以往帮会流氓身穿密排扣黑色拷绸短衫裤、翘大拇指的习惯，要求他们在一切公共场合，甚至在家中重要场合，都要穿长衫马褂，他念的书不多，字也写得极差，于是他就天天练习写自己的名字以便签名，以致许多局外人看了他的签名，真以为他读过几年书似的。而且，杜不愿别人像对黄金荣一样称呼自己为“老板”、“老头子”，而喜欢别人称他为“先生”。杜的这些举止连他的手下也颇不以为然，戏称他是“冷气间里出来的”，外界称他为“强盗扮的书生”。

1927—1937年是杜月笙势力发展的极盛时期。杜身兼数职，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头衔外，他还是上海《申报》的董事长、《新闻报》的董事、《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的副总会长、上海商会常务监事、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世界书局董事长等等。头衔多达100个，有时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

这一时期最能说明杜的势力和影响的是1931年6月他在浦东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这次活动自6月8日起历时3天，筹备工作主持者皆为“沪上闻人”。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副总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第一天是将杜氏宗祠的总神主牌位从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送往新建的占地50亩的宗祠中，整个护送队伍达5000余人，由英国、印度巡捕组成的骑兵队开路。法国巡捕、安南巡捕组成的自行车队护卫两侧，殿后的是中国陆军第五师一个连的步兵。中

间还有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军乐队、保卫团、童子军、缉私队、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护卫着蒋介石手书“孝思不匮”的金匾及何应钦、熊式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新旧军阀政客送来的无数匾亭。杜氏的祖宗牌位用特制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的儿子跟在轿后。一路鞭炮齐鸣。引得途中数万人围观，交通为之中断，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第二天是神主“奉安”典礼。由陆、海军及警察局西乐队等组成的联合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 21 响。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参军杨虎宣读国民政府贺电和蒋介石的祝词。法国、日本总领事及领事等到场致贺。

从 10 日到 12 日是三天连台好戏，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马连良等几乎所有著名京剧演员全被请来。这几天中，宾客达 8 万人，每餐开饭 2000 桌，几乎整天都在开饭。明星电影公司全体出动，将如此盛况拍成记录电影。从各方送礼之多、堂会戏目之精采、排场之阔绰来看，在上海都是空前的。即使后来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佛，也没有杜家宗祠落成时的排场。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死去时，他虽为沪上最有钱的大地主，也只能望杜之项背。杜每当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得意非常。

#### 抗战时期的流亡生涯

“七·七”事变爆发后，杜月笙对抗日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他在上海大声疾呼，要那些还正在花天酒地的人不要再醉生梦死，并着手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捐献飞机“月文”、“月辉”号各一架。“八·一三”事件后，上海燃起战火，他根据戴笠的意图组织帮会抗日武装——上海别动队。同时组织抗战后援会，向工商界摊派和征募了巨额物资和资金，为数在 4 万元左右，全部由他支配。上海沦陷后，这笔钱大部分成了他自己的囊中物。

一日，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和关东军要员板西利八郎突然上门拜访杜月笙。板西笑咪咪地说道：“杜先生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上海不能没有你。如果杜先生愿与皇军合作，一定会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利益。”杜虽是一位八面玲珑的人物，但为日本人做事他是最讨厌的，又不愿公开得罪，只是笑着摇摇头。绰号为“亚洲的劳伦斯”的土肥原窥穿了杜的心思，把脸一虎，道：“我们大日本皇军是帮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你们不应与皇军为敌。如果你对抗到底，将受到惩罚。而且，你也不会逃出皇军的手掌！”宾主不欢而散。本来杜不愿离开上海，还想利用租界作保护，但发现日本人如此咄咄逼人，留在上海只能成为日本人的鹰犬。同时，蒋介石也电催上海“闻人”离沪，戴笠则亲自来沪活动，于是，杜于 1937 年 11 月 26 日赴港。

杜月笙到达香港后，人生地不熟，觉得十分不自在。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与日伪勾勾搭搭的同时，又接受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指示，遥控上海徒众开展抗日工作。1938 年 1 月，杜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分管第九救济区事务。杜在香港挂出“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及“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牌子，帮助一些著名人士逃到香港。

当时，身为汪伪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次长的原国民党政客高崇武、陶希圣对汪精卫所作所为不满，可一时又难以逃脱。杜得悉后，决定将二人救

至香港，打击一下汪精卫的气焰，并要求手下务必获得那份日汪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密约。杜门弟子先是把高崇武趁夜偷运出上海港，又掩护陶希圣搭乘美国客轮逃走。高崇武亲手把密约副本交给杜月笙。次日，香港《大公报》就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刊载，举世为之震惊。这份密约，内容庞杂，核心是由日本完全控制中国的一切。密约的公布，使日本人和汪精卫狼狈不堪，完全剥下了汪精卫“和运使者”的画皮。杜月笙因此也成为全国闻名的大人物。

除此之外，杜还配合戴笠在上海进行除奸活动。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傅筱庵就是杜直接收买傅的佣人杀死的，张啸林的死也与杜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除奸活动引起了日伪“76号”特工总部的大肆报复，上海滩陷入腥风血雨的恐怖之中。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和黄国栋先后为“76号”捕去。杜闻讯，焦急万分。他深知，一旦万、黄泄露机密，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杜一面派人去疏通关系，营救万墨林等，一面邀“76号”头目吴世宝赴港面谈。吴世宝曾当过杜府司机，但连杜公馆的大门也不曾踏进去。他虽然凶神一般，对杜还是敬畏三分。此刻见杜亲自邀请，感到受宠若惊，一面叫人放掉万、黄，一面悄悄离沪抵港。杜月笙予以盛宴款待。席间，杜月笙对吴说，中国人不应该杀中国人，尤其是青帮兄弟更不应该互相仇杀。吴世宝一口答应。后来，双方果然不再大打出手，蒋汪的特工都暂停活动。上海的武装恶斗就这样被杜月笙轻而易举的“摆平”了，杜由此再次显示了大亨的手腕和势力。

尽管如此，杜始终觉得有寄人篱下之感。为此，他力图在大后方建立经济基地，扩充自己的经济势力。1938年，他到武汉找到孔祥熙，后又去昆明、重庆，准备重新做鸦片生意。几经奔波，他在戴笠的支持下，成立了港济公司，专门进行鸦片贸易，至于什么“赈济委员会常委”和赈济一事早已抛到了脑后。1959年，他接洽了3000多万元的定额，可拖了一年仍无法交货，心中十分焦急，忙前往重庆找戴笠，催促戴履行合同，否则他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杜侥幸未成为俘虏。但他在重庆更感到处处掣肘，昔日的许多狐朋狗友也不再趋奉于他，只有孔祥熙、戴笠等少数人和他处得还可以，最使他伤心的还是蒋介石对他的冷淡。一天，孔祥熙私下告诉杜，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青洪帮头子压一压。孔说，他曾问蒋，别人拥护你，你为什么还要杀？蒋不置可否。杜吃惊不小，对蒋翻脸无情的作风大不以为然。后来，蒋果真借故杀了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大爷程泽润，引起几十万四川袍哥的愤恨，准备大闹一场。杜得知蒋准备大开杀戒的消息后，便出面劝阻袍哥的行动。他说，如果大家闹了起来，蒋会借口杀更多的人，因此不能莽撞。许多袍哥头子比较信任杜，也考虑到闹起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得罢休。从此，杜对蒋的看法有了明显改变。1941年，杜曾与杨虎、黄琪翔、章伯钧等密谋倒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杜在表面上仍对蒋十分忠心，为蒋干了不少事情，最主要的是他主持的上海统一委员会。这是蒋为保住上海这块阵地、加强和统一沦陷区工作而设立的。该委员会成立初得到的任务是稳住上海工商界、打击汪伪汉奸，但很快夭折。此外，杜还帮助蒋在上海沦陷区推销了几十万元的战时爱国公债。

#### 政界争雄遇挫

抗战胜利后，杜以“抗战功臣”身份重返上海，一路浩浩荡荡，不减当年威风。不少人去车站迎接。此时的杜月笙大有上海帮会唯我独尊的气势。

昔日三大亨中的老大黄金荣已年老体弱无力称雄，老二张啸林早已一命呜呼。作为老三的杜月笙自然有独霸天下之想。为了重振帮会，他竭力庇护一大批投靠日伪的汉奸帮会分子，为日后的东山再起蓄势。他经过多年的苦斗，得出结论，只有向政界发展才能使帮会有真正的靠山。因此，杜氏在抗战胜利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力图涉足政界。不过，蒋介石一直不愿公开重用他。而杜的野心又非常之大，一般的官职他还看不上。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杜月笙看中了上海市市长一职。他想老蒋会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为蒋卖命的功劳，一定会把职务给他。尤其是宋子文、孔祥熙等政界巨头也支持他，他更觉得上海市市长一职非他莫属。可是，最终蒋却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为此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1946年底，上海市参议会成立，杜又觊觎参议长之职。CC系得知消息后，公开扬言，蒋已明确表示希望潘公展出任议长。杜哪肯服输，动员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打算使自己全票当选议长，然后“让贤”，这样既可保持老蒋的情面还可显示自己的实力。谁知投票结果公布后，选票中1/4是空白票，他虽获得多数，但距全票差得太远，最后职务还是给了潘公展，杜仅捞到个参议员。两次政界争雄遇挫给杜震动很大。他清楚老蒋并不想在政治上重用他。同时也表明，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杜还不是CC系的对手。他只好自我解嘲道：“推进社会力量、扶持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乃个人生平夙愿。”

不过，杜从内心深处仍不肯就此罢休。1947年，国民党选举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杜决定再与CC进行较量。于是，他参加了上海市的“国大”竞选，以抢全市票数第一为目的。他一面要CC派分子吴开先领头提名，造成他靠拢CC的假象：一面则让恒社出面通知全体社员，让他们再转达所属组织及其有关人员都投他的票。但是，他的把戏早已给政坛老手CC系看穿，于是集中力量进行反击。结果，开票那天，市参议长潘公展得票最多，名列第一，在上海毫无基础的方治获得第二，他仅获得第三。这使满怀信心的杜大大地跌了价，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输得这样惨。

次年，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一直未得到政治满足的杜又想进入主席团神气一番。他原以为南京方面的许多老朋友会支持他。他在选举主席团前两天摸了一下底，才发现可靠的选票少得可怜。他又气又急，气的是昔日老朋友大多已背他而去，急的是一旦进不了主席团，他感到丢脸。他连忙找到挚友、四川袍哥首领范绍增帮忙。范乃杜女儿的干父，两人私交甚密。范当即答应帮忙，杜才转忧为喜，告诉范他还差四票。范为了防备万一，给了杜六票。结果在开票时，范给的六票中只有四票投给杜，使杜刚刚够当选的票。事后杜出了一身的冷汗，对范感激万分。回到上海后，他把后来投他票的几个人好好招待了一番。

杜月笙在政治上的连连受挫既与帮会内讧日趋激烈有关，又与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帮会的反感日渐强烈有关。但当时朝中有戴与杜勾结，杜在政界还算吃得开。1946年，戴的暴亡给杜以毁灭性打击。此后，国民党高层人士遂渐削弱帮会势力，而且戴死后的“军统”秉承蒋的旨意也开始疏远杜，杜因此明显地走下坡路。

#### 凄凉的下场

或许是预感末日即将来临，或许是故意向外界显示威风，1947年8月27日，杜要在60岁生日之际大办庆典。他专门请狐朋狗友组成了所谓“祝寿委员会筹备处”，并利用一切关系进行宣传 and 联络。蒋为了表示祝贺，亲笔写

下“嘉乐宜年”镜框匾额并派专机送来。此外，蒋专派吴鼎昌代表祝寿，蒋纬国夫妇出席了寿典。南京政府要员宋子文、王宠惠、吴铁诚等也专程从南京赴沪祝贺，各省也都派代表参加。祝寿当天，去杜府的汽车有1000多辆，宾客达8000人以上。中央电影制片厂把这一热闹场面摄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放映。不过，杜既然以“书生”自居，也就随时忘不了充当善人。他60大寿之时正值南方水灾横行，他在穷奢极欲之余提出搞祝寿赈灾的京剧义演。10天义演共得20亿元，这些钱全部存入中江银行，名义上他一文不沾，可是等他把钱摆脱出时，米价已由30多万元一石涨至50多万元一石了。这种因钱币贬值所得的巨额利润自然全部装进了杜的腰包。他捞了个名利双收。

无论如何，他的好景已过。他的60大寿似乎是一个预兆。CC派分子为了把持上海的权力，时时不忘拿他开刀，不过，他万万没想到，上海滩首行向他发难的竟是他的得意门生、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吴曾是恒社社员，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杜刚刚回到上海，他就派人到上海北站书写反杜标语，致使杜的专车临时改停西站，并在他主办的《诚报》上大肆披露杜的私事丑闻。杜又伤心又恼怒，这是30年来上海报纸第一次敢这样搞他，而且搞他的还是他的旧属。他决心报复，一面派人搜集吴的部下“劫收”的贪污劣迹，通过戴笠向南京方面告御状，一面指使手下在上海制造事端。吴遭到上下夹击，终以“办事不力”被撤职。杜仍不肯罢手，在利用报纸极尽咒骂、嘲讽吴之能事的同时，还派门徒暗杀吴，以斩尽杀绝而后快。毛人凤知悉后，赶紧派沈醉到上海制止此事，吴侥幸捡了一条性命。

这一事件过后，杜更引起了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的反感。尤其是当时身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的太子蒋经国和上海警察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更是不满。他们认定杜不是个甘心受国民党政权约束的角色，决心用铁腕遏制杜权势的膨胀。1947年7月，法币贬值，物资奇缺，米价飞涨。杜的亲信管家万墨林（时任上海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农会理事长）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引起上海人民公愤，人送绰号“米蛀虫”。宣铁吾见时机已到，决定杀鸡儆猴，下令逮捕万墨林，并向外界发表强硬谈话：“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矛头直指杜月笙。杜怎能意识不到这一点，知道硬敌不过，不敢公开出面袒护，但也极力招架，一方面大造舆论，称米价上涨是由共产党封锁造成的，与万无关；一方面亲自出马用巨款贿赂有关人员假造万的病危证明，把万保外就医，宣铁吾知道内情后，大骂杜氏“流氓”，但考虑上海帮会势力盘根错节，不可能彻底击溃，而逮捕万也只是敲山震虎，给杜一点颜色，因此并未深究。

经过这一番折腾，杜的勃勃雄心已减去大半，只要不让他过于难堪，他也不想惹是生非。但他的反对派却不肯放过他。1948年秋，他的三子杜维屏以“非法交易，投机倒把”的罪名被蒋经国关押，这真好似晴天霹雳，当时杜正大病缠身，一连好几天起不了床，可又不敢公开反抗，只好表示：“这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查办，我决不保他。”背后却大骂蒋介石无情：“我捧老蒋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竟然连我的儿子也抓了！”接着又哀叹：“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客观地说，这一件事纯属杜氏倒霉，因为上海的股票投机是人人皆知。蒋经国要到上海“打虎”，一时又找不到对象，恰好碰上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杜维屏（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自恃父亲的势力，非要去撞蒋



太子的枪口，在交易所外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 2800 股，在他看来，此乃小事一柱。没料到蒋太子偏要在这件“小事”上做大文章。不过，还算杜氏的运气不错，蒋太子碰上了硬钉子。同年 9 月，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和二小姐孔令俊所办的扬子公司囤积案发，蒋太子要严办这只“大老虎”，可孔少爷直飞南京，向宋美龄哭诉，宋出面调解，无效后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闻讯大怒，指责蒋经国蛮干，致使蒋太子的“打虎”行动虎头蛇尾，自己也悄然离去。社维屏因此只判 8 个月徒刑，后被保释，但杜从此威风扫地。

此刻的上海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而对末日的来临，身为“沪上闻人”的青帮大亨纷纷寻求出路，其中不少人与中共加强了联系。狐狸般精明的杜月笙自然不会放弃这条途经。早在抗战初期，他了解到八路军缺乏防毒面具，马上调拨上海抗战后援会募捐款 1.6 万元购买从荷兰进口的新式防毒面具赠给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他在避居香港后也表示要约束他的属下不防碍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活动。回到上海后，杜又与蒋介石勾结，从事反共勾当，但杜维屏被抓一事对他打击很大。此后，他虽曾参与由蒋炮制的上海“国际化”阴谋，但已丧失了早年的反革命热情，对于是否离开上海显得犹豫不决。然而，一件小小的插曲终于使他决心离沪抵港。

一天，杜府来了位不速之客，送来礼盒。杜打开一看，里面一封信赫然写着：“老杜，兄弟如今手头紧，特向你借 5 万元美金，明天来取。”杜未看完贴子就已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出天，当下就把贴子撕得粉碎。他一面与警察局联系，一面布置人马，准备抓住敲诈者后狠狠整一整，让他尝尝杜某人的滋味。尽管布下天罗地网，次日还是有五个人硬是来到杜公馆，他们每人身上缠满手榴弹。杜氏一看，一旦打起来，将会同归于尽，只得忍气吞声把钱拿出来。这伙人见钞票到手，道：“多谢老杜慷慨，兄弟们还得麻烦杜兄送我们一程。”到了这个份上，杜氏早已无大亨的威风，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车。车开了很远后，他们才把杜扔下，扬长而去。

杜又惊又怒，惊的是以后难免有第二次，怒的是成名以来第一次在阴沟中翻船。他越想越后怕，觉得上海确是是非之地，还是走为上策。所以，杜于 1949 年 1 月以 45 万美金的低价把他杜美路 70 号的房子卖给美国领事馆，下定了逃亡的决心。4 月，蒋介石在上海会见杜月笙，威胁他说：“‘四·一二’清党，你在上海是出了大力的，还亲自派人处决了汪寿华，所以你不能留！”接着，他为蒋经国扣押杜维屏一事向杜道了歉。杜心中对留下更怀恐惧之感，于 4 月底便举家迁往香港。

上海解放后，章士钊亲赴香港，劝杜回沪，杜子维翰、老友杨虎也写信要他返回，他都婉言拒绝，但表示：他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并要求他在上海的门徒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1951 年 8 月 16 日，杜月笙病逝，潘汉年代表政府同意其家属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刊登讣告。而他本人的遗体被他的老婆和旧友顾嘉棠运往台湾，停在寄柩所内。显赫一时的杜月笙落得个凄凉下场。

### 3. “闻人”汉奸：张啸林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八拜之交，并称上海滩“三大闻人”。实际上，他的实力和声势远不能与黄、杜相比，而且他还是一个短命闻人。

#### 阿虎

张啸林，1877 年生于浙江慈溪，原名小林。因他从小顽皮，不受约束，

又长得虎头虎脑，取乳名阿虎，到上海后改为现名，取“猛虎啸于林”之意。张本生于穷人家，父亲不幸早亡，他就整日在外游荡、寻衅打架。后因实在难以在乡里混下去，全家迁往杭州府拱宸桥。拱宸桥一带是流氓地痞出没之地，张啸林如鱼得水，很快就和当地流氓混成一团，专似打架行凶、豪赌敲诈为生。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张觉得这样混终不是出路，他认为自己是个干大事业的，于是就硬着头皮报考了浙江武备学堂并被录取。这家学堂专门训练武官，半天练武、半天习文，还可自由自在地练枪打拳，张虽无心读书，但却写得一手好字，所以这种学堂正合张的心意，将来还可以有朝一日登台拜将。不过，他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武备学堂被撤销，他不得不重新回到杭州街头。

张啸林在流浪期间，结识了一个唱滩簧的陈效岐。此人专演浪荡货角色，人称“马浪荡”。两人臭味相投，一见如故，很快就结拜为异姓兄弟。他俩常常走在花轿前，或者是跟在送殡的行列后面，吹吹打打，混口饭吃。一次，张啸林正跟着一支送殡队伍前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日本妇人身上。日本人以为中国人故意挑衅，三四个人抓住张啸林便打，张啸林刚要还手，被马浪荡拉住，又作揖又赔礼地才算了事。张啸林哪吃过这样的亏，等棺材到了坟地后扔下乐器，掉头就走。他一路走，一路纠集浪迹街头的流氓乞丐，还拉拢了不少平时受日本人气体的工人、平民，一路浩浩荡荡，冲向日本人经商的聚集地，不分是非好坏，把几家日本商店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扬长而去。日本人怎肯罢休，告到县衙门，要求缉拿带头闹事的凶犯。张只好逃到老家慈溪躲了起来。

虽说是避祸，但张实在耐不住寂寞，整日喝得醉醺醺的，寻衅滋事。后在老家实在呆不下去了，才逃往上海闯天下。

“张大帅”

到了上海滩，张啸林首先投拜青帮元老曹幼珊，后经曹引荐，他又拜樊瑾成为师，成为青帮兴武六帮的“通字辈”。张啸林胆大果断，凶顽异常，讲究江湖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孤身女子不欺侮，他认为“好男不和女斗，从弱女子身上敲竹杠没有本事”。他专拣硬的碰，械斗起来，手持铁棍，上下飞舞，大有李逵入阵之势，人送外号“张大帅”——因为他常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

当新开河码头建成后，外省船商因不堪上海稽征吏的勒索，纷纷求张啸林等青帮流氓帮忙。张手拍胸膛，满口答应，让船商到别处卸货，并说：“出了事，我顶着。”稽征吏得知张啸林暗中捣鬼，不由怒火胸中烧，决定结果他的性命。一日傍晚，张啸林正在南码头联系事务，十余个稽征巡警涌上前来，不问情由，劈头盖脸一顿臭打，张拼命抵抗才得以逃脱，但已被打得皮开肉绽，休养了数日才得以康复。他咽不下这口气，派人打听这件事起因，当他得知率众打他的是巡警头目“金狮狗”时，发誓要报仇雪恨。可他又听说金狮狗是一个手段非常残忍的家伙，而且有官府后台。于是他就请三十六股帮流氓头子“吊眼阿定”助他一臂之力。吊眼阿定也曾吃过金狮狗的亏，当即答应帮忙。一天上午，金狮狗正独身一人巡查商船时，张啸林、吊眼阿定等十余人突然窜出来，铁棍刀棒一起上，把个金狮狗打得鬼哭狼嚎，然后这些人又把他拖到江边，抛到停泊在江边的大粪船中。金狮狗虽保住了性命，但它饱尝了大粪滋味儿，再也不敢在码头露面了。正是靠这种凶顽，张啸林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就趁势在沪、杭一带广招门徒，发展自己的势力。

不过，张啸林和官府搭上关系却颇富戏剧性。一天，他开的旅店里来了位客人，穿着讲究，举止大方，手拿公文包，俨然官府中人。奇怪的是，这客人一住就是 20 多天，房钱却一文也不交。张啸林火气上升，准备给这位客人点颜色看看，便闯进客房，粗声粗气地说道：“朋友，白吃白住总不是个办法吧！我这里可不是救济院。”哪知这位客人并不惊慌，问道：“张老板，你难道怕我赖帐吗？”张被问得有些尴尬，觉得此人有来头，便道：“先生，您错了，我只是看看先生出了什么事，我是个粗人，讲话没有分寸，还请包涵。不过，我这人喜欢交朋友，您有什么难事，但说无妨。”这位客人见张如是说，倒也不客气，说：“张老板，既然如此，我也就直言相告。我的一位朋友在北京段祺瑞手下做事，我想托他谋个差事，现已有了回音，我想在上海买些礼品，可我又没那么多钱。我写信向家中要钱，至今无回信。钱一汇到，贵店的费用一文不会短少。”张啸林觉得此人进京谋官，日后必会大有前途，应该交这个朋友，于是就显出一副豪侠心肠：“先生，你需要钱，尽管开口，只要我拿得出，我必给你凑齐，以免耽搁先生的前程。”这位客人好像也并不难为情，说只有 200 元就够了。张啸林真不含糊，当即拿出二百大洋相送。

时间过了两个多月，走了的客人一点消息也没有，张啸林不免有点受骗的感觉，眼看二百大洋“放了白鸽”。过了许多天，店里来了两个身穿警服的人要面见张啸林，其中一位双手递上一份公文，说：“我们是淞沪护军使衙门的副官，奉命给你送这件公文，上司一定要我等面交张老板。”张啸林犹在云里雾里，不知何时与政界有了瓜葛，心中真有些忐忑不安。他打开信封一看，原来是张“淞沪水上缉私总队长”的委任状。他一打听才知那位曾受恩惠的客人现已成为淞沪护军使的总文案，为了报恩，他送给了张这个肥缺。

### 大亨

张啸林意外收获，穿上了缉私队的警服，变得更加颐指气使、横行无忌，财源也滚滚而来。因为缉私队名为水上缉私，实乃上海衙门对水上船只敲竹杠的机关，尤其是对那些本小利大的鸦片贩运之船，他更是雁过拔毛，为此不惜大杀大砍，搞得许多鸦片贩子纷纷求保于张。有一次，张截住一艘鸦片船，与前来抢土的杜月笙大打出手。不打不相识。杜月笙听说这只老虎原来也是青帮兄弟，比自己大一辈，和自己一样“亨”，开始注意与之结交。双方臭味相投，很快就达成合伙走私鸦片的协议。时隔不久，黄金荣因卢小嘉之事与卢永祥发生冲突，而张啸林曾与卢永祥在浙江武备学堂是同学，关系较深，因此张亲自出面调解，卢黄之争才得以平息，黄对张也愈加信任。随后，黄、杜、张结成八拜之交，三人中以黄为长、张次之、杜居三。黄金荣把法租界华格臬路两亩地基赠与张、杜。从此，三人互相勾结，横行上海滩，成为沪上三大“闻人”。他们上可影响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气焰十分嚣张。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张伙同黄、杜充当反革命打手，并亲自出马鼓气，亲率帮会流氓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但事后只有杜月笙获得蒋的召见，张妒火上升，对杜心生不满。不久，以张为首的“中华共进会”遭到法租界禁止，他又对黄大表不满，两人一度避免见面。三大亨的间隙由此出现。不过，由于“四·一二”中的反共表演，张仍然成为国民党的大红人，声势更壮、威风更大。他托黄金荣从蒋介石那里给自己的长子张贵显买到了一个国民党内政部次长的官职。他做上海闻人，儿子在南京

为官，张家俨然成了上海的显贵门第。张依靠自己的权、财、势在上海滩逞尽威风。

1929年，上海静安寺路变得日趋繁荣起来，张看中静安寺旁一片空地，想用其为公司之基，可是已被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租去，于是就派爪牙俞叶封去见静安寺方丈，要求买下这块地皮，方丈拒绝，俞又提出租用，方丈说已租予朱总经理，让他去找朱谈。张于是亲自出马来到了朱的寓所，说他愿以高价从朱手中转租那块地皮。朱深知张的心毒手狠，心中不快却未直接拒绝，提出将吴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块地皮租给张作为交换。张则非要静安寺那块地皮不可，朱也上了火，执意不肯，两人争执不下，张愤然离去，走时甩下一句话：“那就走着瞧吧！”

几天后，朱携护士乘车出外，刚刚出了弄堂口，一伙蒙面大汉突然冲出，向汽车连连开枪，令车停下。等车停下后，朱已中弹昏死过去，护士小姐手上也中了一弹，吓得昏了过去。两个蒙面人过来打开车门把朱拖上自己的汽车扬长而去。朱家立即报了案。案子出在英租界，英捕房根据调查怀疑是张啸林所为，可无人证物证，而张又是上海滩的显赫人物，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朱家见公办无效，只好托人面见黄、杜，黄、杜两人早知是张所为，只好敷衍了朱家一番。朱家无奈，直接求情于张啸林，而张则闭门不见。朱家转而又请青帮元老张仁奎出面。张仁奎早年曾与朱有一段交情，便一口答应下来。张啸林在张仁奎的压力下，同意放人，但要求大笔赎金。朱家只好破财免灾。结果，人是放回来了，可是朱因伤势过重，很快死去。由此可见张啸林的凶残之一斑。

30年代以后，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已远远超过了黄、张。张啸林更觉得难以忍受。1935年，蒋实行“法币”政策，杜事前闻讯后大捞一把，却没有告诉张，气得张大骂杜氏全无交情。张的门徒见杜的力量日盛而张脾气暴躁，便纷纷改投杜门，张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张的次子张清尧从法国留学归来，张很想让老蒋栽培他一下，于是尽弃前嫌，托杜向蒋疏通。蒋在接见张公子时听说他在法国读书一年要花十几万元，心想这肯定是个花花公子，便不肯重用。张大骂蒋氏无情，又抱怨杜不尽心帮忙，杜听了很不高兴。张、杜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张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大大改变。

#### 汉奸

“八·一三”后，上海沦陷，张躲到莫干山张公馆中避难。蒋劝他离沪赴港，他充耳不闻，一是不愿再与蒋合作下去；二是认为这是他独霸上海的大好时机。恰在此时，占领上海的日本人要扶植汉奸政府。他们首先收买的汉奸是傅筱庵。傅正准备成立伪“大道市政府”时被人刺杀了。日本人又急匆匆地再次物色对象。这次他们选中了张啸林，因为他是上海的“闻人”大亨，在上海势力雄厚，可以一呼百应。于是，日本人就派人到莫干山与张密谈。张看到以往三分天下的局面现已只有他自己在独撑市面，不由得野心勃起，欲将原三人势力统一起来，由他独霸上海，因而一口答应帮助日本人治理上海，

张得意扬扬地回到上海，大有上海滩唯我独尊的架势，随即他组成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办日本侵略者采购急需的物资，而他自己则大发国难之财，把个汉奸嘴脸表演得淋漓尽致。远在香港的杜月笙觉得张已走得太远，念其旧交，来信劝张谨慎从事，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张对此嗤

之以鼻，仍我行我素。1939年冬，张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准备成立浙江省伪政府，自任省长。国民党军统得到这一消息后，决定除去张啸林。为此，戴笠通知杜月笙，要杜“大义灭亲”，帮助行动。杜则以有手足之情为由，不忍下手。不过，杜的许多门下早已加入军统机关，大搞“铁血除奸”的恐怖活动。军统决定瞒着杜下手。杜的门生、军统特务于松乔奉命刺杀张啸林。等张的汽车开近时，于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胡乱放了几枪就赶紧溜走了。张不仅皮毛无损，而且还认出了杀手是于松乔，当下张口大骂杜的黑心无情。

这次刺杀并未给张造成多大的精神压力，张反而变本加厉地与日本特务勾结。军统吸取第一次失利的教训，决定先从张的爪牙下手，第一个目标就是张的儿女亲家俞叶封。俞是张的左膀右臂，杀掉他就等于杀去了张的一半性命。一天晚上，俞叶封像往常一样来到更新舞台为一女伶捧场，俞正得意忘形地击手拍掌、大声喝彩时，突然枪声大作，俞本能地趴在地上。枪声过后，俞睁眼一看，自己倒无任何伤害，而他身旁的老友吴某却满身枪眼，当了替死鬼。对俞的遇刺未遂引起了张的警戒，他开始想到有一天会遭到暗杀。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扩充势力为自己壮胆，张开始大肆招兵买马。也就在此时，他招到一个得意的保镖——林怀部。张与林怀部的父亲曾有私交，林枪法奇准、臂力过人，毛遂自荐替张当保镖，张自然大为高兴，哪知这却是他的索魂人。

不久，俞叶封被刺身死，张大有兔死狐悲之痛，预感到末日将至，从此足不出户，戒备重重。时间久了，这种囚犯式的生活他怎能熬得住！张终于胆子又大起来，每天晚上带着保镖外出，10名保镖分乘三部汽车为他保驾。一天晚上，当张的车队开到善钏路（今常熟路）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交叉处，突然前面亮起红灯，张的车队只好停下。就在此时，周围一片机关枪声。张的司机王文亮见状，本能地一踩油门，汽车猛地窜了出去，张才侥幸免于死在乱弹之下。

从此之后，张犹如惊弓之鸟，几乎每晚都恶梦缠绕，常常睁着眼睛到天亮。晚上睡不着，只好白天补，所以张的午睡时间特别长。1940年8月14日中午，张吃过午饭刚刚睡下，忽然外面传来阵阵吵闹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他侧耳细听，原来是保镖林怀部同司机王文亮在吵架，而且就在自己的卧室窗口下面。张大怒，穿上拖鞋，奔上阳台，连连大声呵斥，骂他们不知好歹。林怀部从腰间掏出手枪，骂道：“老子受了委屈，还用你这个老汉奸来教训，送你上西天算了！”边说边向张连发数枪，几乎每颗子弹都命中要害，一颗子弹从喉部穿入自眼部而出……正好在此作客的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出门想看个究竟，也被林怀部当场击毙。

张被杀后，林怀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杜月笙、军统都纷纷否认与己有关，但林怀部曾是杜的亲信万墨林的密友这一线索就很值得注意。后来，万也私下承认，他与此事有关，只是杜不愿担当谋杀同门兄弟的罪名而不公开承认而已。

## 五、蜀中袍哥

### 1. 源流、袍规、历史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在大陆上的抗清斗争失败，退守台湾，招兵买马，试图反攻。清朝睿亲王多尔袞反间破坏，散布“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舆论。郑成功帐下文士集议，创设“汉留”，开山立堂，定名“金台山”、“明伦堂”。军营之中，一律兄弟称呼，共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

为了联络志士，建立反清力量，郑成功派大将陈近南赴珠江流域，万云龙往黄河流域，蔡德英等五人到长江流域，从事地下工作。其中陈近南因语言不通，地方不熟，将珠江流域的工作交付蔡德英等五人，自己远走四川，在雅安开精忠山，召集志士，共筹大举。据说这就是四川袍哥的开始。因此，可以将袍哥看成是洪门的一支。不过由于地域以及长期分散活动的原因，袍哥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与川外的洪门又不完全相同。

袍哥组织以堂为单位。各堂的尊卑以仁、义、礼、智、信、威、德、福、志、宣等十个旗号相区别，“仁”字旗最尊贵，“义”字旗就要差一些，以下类推。不过常见的堂口只有仁、义、礼三堂。参加“仁”字旗袍哥的以士绅为主要成分，参加“义”、“礼”两旗的以商贾挑夫及其他没有正当职业的人为主要成分。当时人们有个说法：“‘仁’字旗上谷子多，‘义’字旗上银子多，‘礼’字旗上定子（即拳头）多。”形象他说明了这一情况。一般说来，各堂口是互不统属的，但也有例外。像民国初年在荣经、雅安、天全一带横行的“荣宾合”就是一支袍哥组织的托拉斯。

每一堂口的兄弟伙分为十排。一排为大哥，一般称为大爷，或称为舵把子。大爷当中又分当家的主事大爷和不管事的闲大爷。

二排又称为圣贤二爷，一般堂口这个位置都空着、没有人愿意嗨这一排。听说嗨了二爷要倒霉的，因为关云长是老二，神威太大。

三排为当家三爷，每一堂口有很多三爷，但只有一个执法的。一切内外事务，包括人事、经济、组织发展，三爷都要过问，是袍哥的第二把交椅。

四排、七排没有人嗨。相传郑成功曾将他组织明伦堂时的法令规章写下来封在铁匣子里，其孙郑克爽抗清失败，在投降清朝以前将铁匣子沉入海底。后来“海底”被发现时才知道当时的钱四、胡七曾经出卖过洪门的秘密，是叛徒。所以就没有再设四排、七排。

五排是管事，嗨的人多。但只有正的管事，称为“红旗大管事”，简称“正五”，其他称为“闲五”。

六、八、九、十排称为小老么，但也有区别。初“进步”的袍哥一开始都只能当十排，过了一定时间，出了一定的力，与拜兄跑得有力的，就得到提升，由九向八、六排升级，一般六排可以提升闲五，至于正五，那要舵把子信得过的人才行。

参加袍哥要由老袍哥介绍，并经红旗管事征得主事大爷同意。一般要有恩、保、引三个拜兄：恩兄一定要是当家大爷，保举、引进一般闲大爷都可以。由于袍哥表面上是兄弟相称，故父子不能同堂。如父子同进一个堂口，则儿子只能嗨小么，父死后才能得到提升，所谓提升，名义上讲要看这人有没有德行，但是要想提升大爷，就得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在年龄上要岁数比较大的，起码是中年人；在政治上起码在一个场镇有号召力，说话有人相

信；在经济上要大方，不能吝啬，对过往袍哥要应酬接待。

袍哥组织一开始是很严密的。加入袍哥时讲究“身家清，己事明”。所谓身家清，是要三代人无丑事，男的不偷不抢，女的不娼不淫。所谓己事明，除了不偷不抢，还不能干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有些地方很严格，三代祖宗干过下贱职业的都不能当袍哥。所谓下贱职业，包括推车、抬轿、当吹鼓手、剃头匠、擦背、修脚、衙门差人、娼、优、戏、卒等等。

一旦加入袍哥，就要严格遵守很多戒条。这些戒条除了像什么义效桃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劫富济贫等很抽象的条目外，主要是下面的四不准：一不准穿人卖人（装桶子出卖袍哥）；二不准卡拿灭股（分钱财不公平）；三不准进门参灶（看内财，与袍哥的妻女搞关系）；四不准红面肆凶（吃了酒发疯，乱出言语，不认黄）。

袍哥对违反袍规的兄弟伙也自有一套惩罚办法。袍哥犯了错，起码的处分是“矮起说”。所谓“矮起”，就是跪着。由管事点名后叫“各找地位”，犯者立即跪下认罪。其犯罪情节由管事“报盘”后请示拜兄处分。如犯事情节较轻，由犯事者当众认过赔礼，即可了事；重一点的就要吃“红棍”，即用一根染红的棍子打屁股；“矮起说”中最重的一档是吃“黑棍”，用一条染黑的棍子打屁股，挨了黑棍的都要挂黑牌开除。经过挂黑牌的袍哥是一辈子不能再嗨袍哥的；既不能在本堂口开复，其他堂口也不会再收他。“矮起说”算是轻罚，最重的处分是“要脚给脚，要手给手”或者“三刀六个眼”。所谓三刀六个眼，就是把三把尖刀埋在地里，刀尖向上，犯了戒条的人，自己赤身扑上去，在身上进出戳穿六个眼。不用说，这种处分是非常残忍和野蛮

的。

拜兄决定的事，兄弟伙是不能有异议的。袍哥不能说拜兄的坏话，否则称为“出言语”、“不认黄”。拜兄对于出了他的言语不认黄的袍哥，可以随便叫个兄弟伙去把他“做了（杀了）”。

外人有冲撞、侵犯袍哥的行为，也要受到惩罚，如发现外人奸淫袍哥兄弟伙的妻子，则由大爷指派袍哥兄弟将奸夫淫妇一齐杀掉。杀人者事后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一是提着两个人头亲自投官自首，一是逃向外地。大爷对投官自首者将运用袍哥组织力量向官府斡旋，减轻其判罪，保全其性命。如杀人者不愿投官自首，大爷即介绍他到外地，外地的大爷和袍哥兄弟伙都看得起他，并在生活上给予他妥善的照顾。

袍哥人家是“义效桃园”的，因此他们在阴历五月十三日，即关羽生日那天，都宴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盛会，称为“单刀会”，又称“武堂子”或“踩堂子”，会上要接纳新入堂口的兄弟，处分不守袍规的兄弟，但主要目的却是袍哥力量的大检阅。

开会那天，会场四周安起警戒，各地袍哥陆续到达，都是带了全部“棍子——兄弟伙”来的。来人一律进入警戒，因为有些敌对的堂口听到某些袍哥要踩堂子就常常会到时来破坏，称为“爆堂子”，为了防止爆堂子，所以警戒是非常认真的。

外码头的客拜兄一到，就派出管事拿了堂口片子，亲候各堂口的大爷，这些大爷有些还只是慕名来会过面的。中午时分各地客人就差不多到齐，但由于很多人是吸鸦片烟的瘾哥，要摆出大烟盘子过瘾，所以要等到下午2时左右才开始坐席，席是九盘九碗，也有酒可喝。饭后是一阵休息，有瘾的人继

续过瘾。又过一阵，只听有人在喊“进山了”。于是几百人鸦雀无声地进入会场。会场当中是用黄纸写的“汉寿亭侯关羽”的牌位，点燃香烛，公举一位拜兄坐堂，其余拜兄分坐两旁，照例是五排以上才有座位，以下依次站立，人人严阵以待，如临大敌。这时，只见一个管事出来跪在坐堂拜兄前请令。坐堂拜兄说声会出原堂。管事折转身来面向大家大叫一声：“盛会开始！”接着就是所谓“一百零八堂法式”。但其实并役有一百零八堂法式，只有四五堂。

第一堂为“访山”。由一个大管事出来用编成“四言八语”的话讲一番历代讲义气的“英雄”故事。

第二堂为“团江”。由一个对各方面都熟识的人出来用袍哥的一套术语介绍五排以上的袍哥彼此认识，称为“对识”。这一堂的场面完全与川剧《巴九寨》的情形一样。由于要介绍的人很多，比起唱戏更为热闹。

第三堂为“过江”。事前已把所有参加的几百人的姓名写在纸上，摆在会场当中，每个名字上压一个小钱。又端出一大盆酒摆在牌位前，然后管事拿一支“长冠（雄鸡）”在牌位前宰了，把鸡血滴一些在酒内搅匀，然后又把还在滴血的鸡在名单上绕三圈，看血滴在哪些人的名字上，据说从这些滴血可以预卜吉凶祸福。滴完后就由一位有经验的大爷，根据滴上血的名字一一吩咐，叫他们注意应当如何避凶就吉。

第四堂为“吃咒”。先由坐堂拜兄端了一杯酒跪在牌位前赌咒说：“上坐关圣贤，下跪弟子×××在面前，今后如敢上不认兄、下不认弟，死于非命，乱枪打死。”咒后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其他参加的人依次上前发誓，有说乱刀砍死的，有说乱枪打死的，有说死无葬身的，有说不得好死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所有的人经过“吃咒”，喝过这杯血酒，发过誓，以后就同生死，共患难。张三有事带个信与李四，李四不能不来，李四有事，带个信与张三，张三不得不到。

吃咒完后就是“出山——散会”。“出山”时每个由会场出来的人都要放几响炮仗，称为打威武炮。响声乒乒乓乓，山鸣谷应。闹了一个通夜，出山时已经是天光大亮了，会后，当地主人设宴办酒，招待远方来客。

除了在单刀会上，不同堂口的兄弟可以互相认识外，就是在平时袍哥与袍哥“会首”或“对识”也有一套暗语。外地袍哥首先到茶馆，茶馆里经常有袍哥兄弟接待客人。在接触时彼此双手捧着茶碗，由招待者先问客人贵姓，客人即答说，我姓××。再问“有站无站？”或“在不在园？”客人即答说“有站”或“在园。”再问：“你在哪牌？”客人即答说：“我在某字号上。”经过初步的对话，招待者即去请大爷出来见面。当大爷来到时，招待者即向客人说：“某大哥来了。”回头又向大爷说：“大哥，有客人来了。”大爷即说：“打个请字。”客人接着说：“请大哥首座。”大哥就很客气地拉着客人一起坐下。招待者向客人介绍，大哥姓什么，本地码头，嗨大爷等等。客人即向大爷说：“大哥名扬四海，兄弟少来拜望，今天特来拜候请安。”至此，双方就算认

识了。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袍哥的组织系统及规章制度是很严密的，至少在初期是这样，这一点与整个洪门组织的宗旨有关系。有清一代，洪门一直标榜“反清复明”，被清朝官方视为非法组织，一直处于半公开活动状态，这使洪门不得不注意它组织形式上的严密性和活动方式上的隐秘性。事实



上，四川袍哥在清朝统治期间一直坚持反清斗争，在洋教由沿海深入内地及四川时进行过有效的抵制，打出过“反清灭洋”的旗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袍哥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

1905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随即又转卖给洋人，引起国人共愤，遂成为保路运动的导火线，各地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四川的保路同志会的首脑就是袍哥，其骨干力量也多是袍哥徒众。一开始保路运动还只是和平抗议，但后来清政府竟实行镇压，于是转为武装斗争。在这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十分注意发挥各地会党的革命作用，许多同盟会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还加入了袍哥组织。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四川的同盟会组织也闻风而动，其基本群众仍是袍哥。应该说，袍哥的弟兄伙中穷苦大众占多数，他们受清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苦大仇深，即使大爷中也有不少开明的人，加之同盟会人的策动，有的个人参加了同盟会，有的集体行动和同盟会共同组织了同盟军。同时袍哥组织遍及城乡各个角落，到处打击清军。特别是袍哥兄弟中的农民，平时都散在田间，从事耕作，一遇清军，即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满山遍野地同清军战斗，声势极为浩大。从四川革命史看，袍哥在各次起义中，对打击清军以至驱逐四川总督赵尔丰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缺点是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又缺乏联合军事行动，往往仅凭一己之勇，各自为战，因之在战斗中伤亡很大。还有一些地方豪绅出身的大爷，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脚踏两只船，甚至出卖袍哥组织，依附清朝，同清军勾结，阻挠和破坏革命运动，接受清军贿赂，掩护清军败退，使革命受到损失。总之，袍哥在历次起义中的作用是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

## 2. 雅安县长喋血记

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是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两面性和软弱性，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下，各地军阀势力异军突起，唐王朝中后期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不期又以一种改换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大地上。这种各自为政、地方不靖的局面，实在是帮会势力滋生、发展和蔓延的绝好温床。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曾经作为帮会组织精神支柱的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逐渐失去其地位。拿袍哥来说，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各种清规戒律早已被它的徒子徒孙们忘得一干二净，从而其固有的投机性和流氓性更加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来。有些野心勃勃的袍哥大爷，开始利用袍哥势力，网罗当地流氓地痞无赖，拼凑自己的武装力量，占据要津，打家劫舍，征收贷税，贩运烟土，甚至扩张地盘，占据一县数县，称王称霸，公开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1921年，原为刘湘部下的杨森在四川各路军阀的混战中崭露头角。杨森这个人野心很大，一心想统一四川。他拚命招降纳叛，网罗党羽，也很注意发挥笔杆子的作用，借以在他的军事占领区内建立政权，扩大影响。就在这一年，他派部下金良佐带一个步兵团开到雅安，同时还加委了一个名叫谢克熙的年轻人为雅安县长。

这位谢克熙说来也是一个人物。他出生于江西赣州一个地方乡绅家庭，家道殷实。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当时北大的校长是蔡元培先生，他积极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一时纷至沓来，其中影响较大的当首推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谢克熙原来接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但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由于得风气之先，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也俨然以新人自居，言必称“德先生”、“赛先生”。1919

年，爆发了以北大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可以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实际运作。谢克熙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在游行、集会、演讲队伍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但是，他的名利思想很严重。他曾想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捞上一官半职，但没有如愿，甚至就连参加大会的资格也没有获得，这使他感到很失望。加之不久蔡元培先生被迫离校出走，反动政府加紧对北大的控制、迫害和摧残，气氛一时显得很压抑，沉闷。谢克熙原本是个投机分子，革命思想的功底并不深厚，因此面对日非所是的形势，他渐渐地动摇和变节了。这时他开口闭口不再是“德先生”、“赛先生”了，而是“学业至上”、“莫论国事”这样的陈词滥调。他看到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一个个漂洋过海，到国外追求锦绣前程，很是艳羡。一度他也曾想走某位名教授的路子，希望能得到他的提携。但无奈他不是块搞文学的料子，没有人赏识他做的歪诗陋文。洋道不成走官道，一时间他的社交活动多了起来。不久，他利用和杨森在北京的心腹谭文灵的同乡关系，应杨森的邀请翩然入川。杨森看他一表人才，口若悬河，当时就很欣赏，有心栽培这个后生仔子。但是他根底太浅了，立即予以重用可能会引起旧人的疑虑，于是他决定先让他到雅安去干一阵子，一则看看他的实际能力，二则也好日后顺理成章地提拔他。

谢克熙对杨森的这个安排非常满意，选择了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带着一行随从兴致冲冲地踏上了通往雅安的道路。他出生在江西，后来又在北平念了几年书，原可说是见过世面的，但他还是不禁为巴蜀境内那秀丽险峻错落有致的山川景色深深地吸引住了。第三天，不知不觉已到了雅安地界。这时迎面过来一支送亲队伍，吹吹打打，从前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鸣锣开道，场面显得既热闹又气派。谢克熙见有人示意他们让道，根本就不理会。旁边几个随员劝他新来乍到，不妨忍着点。谢克熙听了不由得火气直冒，板着脸孔说：“四川穷山恶水，民风一向凶顽，兄弟在北大时就有所闻。现在杨总司会委任我做县长，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整肃纲纪，绝不允许刁民肆意胡为。”他将手一挥，示意随员径直行。那几个汉子这时才看清迎面走在中间的是一位洋里洋气的青年，又有一帮人手跟着，断定他就是不久前已传开的本县新任县长，想着本由得有几分惧怕，忙上前主动招呼：“长官，这儿路窄，请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谢克熙见自己的气势征服了他们，不由得有几分得意，便和颜悦色地问：“你们是那个乡的？给谁办喜事呢？本官也好贺喜。”其中一个满脸堆笑，连称不敢。转眼间，花轿到了跟前，谢克熙皱一皱眉，轻蔑地说：“兄弟在北大的时候，都讲破除旧道德。如今什么时代了？做新娘还要羞羞答答，用轿子抬着，红布裹着。来来来，本官今天给你们开开风气。”说着就掀起了轿帘。轿子内的新娘听到外面一直乱哄哄的，本来就几分害怕，这时再也不能自己，惊叫一声，掀起了脸上罩着的红布巾，眼神正好与谢克熙碰个正着。这一对视不要紧，把两人都弄怔住了。那谢克熙原来是个书生，过去脑子里想的一直是革命、文学、做官这些玩艺，心思从没放在女人身上，眼前这个倾国倾城的绝色女子，不由得唤醒了在他心里沉睡了多年的青春意识，他简直有点不能自己了。再说那女子，自小长得如花似玉，人称一枝梅，但哪里见过谢克熙这样洋气海派、风流倜傥的摩登青年，因此见了他怎能不春情荡漾，血如潮涌？不由得给了他一个秋波。谢克熙恨不得一把将她抱将过来，但是大庭广众之下，他不敢再行造次，就冲着新娘含情脉脉地笑了笑，放下轿帘，与那几个汉子搭讪了几句继续赶路了。

谢克熙到了县署后，倒也尽心尽职，一有空就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有一天他又独自一人出访到本县观化镇。观化是个小镇，却是雅安的西南门户，从此可以南下岷江，西往大渡 217 河，商贾、挑夫、妓女、走卒、盗匪经常出没于此，可算得上是川西的繁华之地、富贵之乡。谢克熙挑了一个座落在闹市区的茶馆坐着正歇息呢，老板娘捧上茶来，说声：“客官，有请！”还是谢克熙眼快，一下认出了她就是那天在路上遇到的新娘，真是大喜过望，便情不自禁地要用手扯她的衣襟。老板娘招呼间也认出了对方，不禁心摇神荡，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嗔了他一眼，就去招呼别的顾客了。到了晚上，谢克熙就在这茶馆内设的旅店里住下了。不一刻功夫，老板娘浓妆艳服，走了进来。这一对男女原是男有情，女有爱的，现在独处一块，多日的情思再也按捺不住了，也用不着什么寒暄，便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正搂抱间，突然传来一枝梅的呜咽声，谢克熙忙惊问其故。原来一枝梅也是个苦命的女子，虽说长得姿色出众，但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幸福。川西一带抢亲习俗盛行。观化镇有个叫刘观云的大地主，一日在县城闲逛中看中了她。他把心思告诉了他姑父、雅安县仁字旗堂口主事大爷杨敏山，杨敏山一口答应帮忙。次日就派了几个打手把她先抢到杨府，过了几天又送到刘家。新婚之夜一枝梅发现她“丈夫”不会干那事，气得当即昏厥过去。后来又好几次要寻死觅活，但无奈人斗不过命，只好自叹红颜薄命，对刘观云的折磨忍气吞声。谢克熙听了一枝梅的哭诉，不禁义愤填膺，把她搂得更紧了：“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对摧残女性的包办婚姻、抢亲等陈规陋习最是痛恨。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救出火坑！”两人计议了一番，当晚谢克熙就带着一枝梅，星夜赶回县城。

再说刘观云见一枝梅招呼旅客迟迟还不回房，急忙和一个管事查找，发现今晚刚住下的那位旅客不见了，就判断出一枝梅准是和他逃走了。他向管事问明那位旅客的模样，心中想起一个月前杨府送亲的人说起过路上新娘曾被新县长调戏，立即明白了八九分。第二天他急速赶往县城，把这事告诉了杨敏山。杨敏山原来就对这位谢县长不满；上任以来一次也没有拜访过，简直是目中无人。他立即派人到县公署查明事实，想证据一经落实就立即教训谢克熙。

谢克熙把一枝梅弄到县城后，自以为理直气壮，又兼自己是县长，哪个敢放个屁？因此他并不避嫌疑，只管带着一枝梅出入于稠人广众之中。因此杨敏山的调查完全是多此一举。

杨敏山得到汇报后，当时就要带领他手下的一班袍哥兄弟闯到县署，把谢克熙和一枝梅给杀了，但被旁边一个人止住了，示意杨敏山让其他人退出去。此人名叫葛灵，人称智多星，杨敏山的军师。葛灵对杨敏山说：“大爷，我看这事不宜太着急。一则我们有好多弟兄还在乡下，手边的这些人不一定能敌得过守护县城的金良佐的一个团的兵力。二则姓谢的念过洋学堂，据说很有来头，杨总司令还想在日后委以重用，恐怕我们不好轻易得罪他。依小的看，我们不妨先礼后兵。如果他听了我们的规劝，我们就既有了面子，他也会从此尊重我们。如果他要胡来，那时乡下的弟兄也到了，再打也不迟。”杨敏山见他说得有理，夸奖了他几句，就准备过几天到公署拜访谢克熙，同时暗中作动武的准备。

谢克熙在干些什么呢？他正因杨敏川参与抢夺一枝梅的事，痛恨着杨敏山呢。他想教训一下杨敏山，也好借此打击一下其他袍哥大爷的威风。有了！金良佐这家伙不是三番五次在我跟前诉说军饷不足吗，何不向这些袍哥们

要？

第二天，他一反常态，在公署内大摆酒席，请地方上的士绅吃饭。这些士绅大多是袍哥的舵把子，杨敏山自然也在邀请之列。酒过三巡之后，谢克熙先讲了一些大道理后就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们出款筹饷，酒席上一时沉默了下来，谁也不开口说话。谢克熙一见他们都不愿意出，就叫杨敏山先表态。杨敏山还是一言不发，谢克熙话中带怒地说：“你是地方首户，你都不带头出，谁还愿意出？”这活可把杨敏山惹火了：你谢克熙是个什么东西？到任后既不孝敬大爷，还把大爷的表侄媳妇抢走了，这些大爷还没有和你算帐呢，如今你一步一步地上来了，竟敢跟老子要钱！“哼！”杨敏山把桌子一拍说：“老子就不出，看你能把老子怎样？”说完随即忿然离席而去，一时宴席上秩序大乱，不欢而散。

杨敏山出得城来，即率领早已组织起来的袍哥兄弟把县城团团围住。谢克熙闻讯后即命令金良佐带领全团人马严阵以待。双方激战了几天几夜，互有伤亡，不分高低。这时葛灵又献计了。“现在他们困在城里，总有弹尽粮竭的时候。我们人员粮草都不必发愁，只消和他们相持下去。同时，我听说姓谢的一向狂妄自大，看不起姓金的，我们不妨派人游说姓金的，进一步离间他们的关系，这样敌人就不攻自破了。”杨敏山连称高见，就派葛灵进城去和金良佐接洽。金良佐看到袍哥势众，正担心长久下去会力不能支，葛灵的到来使他很高兴。他原来对谢克熙就有怨恨：这家伙开口闭口“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动不动就嘲笑、挖苦我是个土包子。他心里也早想不替他卖命了，但一则照顾杨总司令的面子，二则这次事件又是由于筹备军饷引起的，因此只好忍耐些，极力支撑着。现在经葛灵的一番游说，还真给说活了心，再说葛灵代表杨敏山答应赠送他一笔银钱，并可以把他的军队护送到邻近的天全县，就不再犹豫，立即把军队撤到了城外。

金良佐撤兵后，杨敏山率领众袍哥轻而易举地打进城内。谢克熙这时还蒙在鼓里呢，根本不知道金良佐叛变的事。杨敏山带着一班打手进入县署后院时，他正和一枝梅男欢女爱呢。杨敏山喝令手下人将谢克熙绑上，对他说：“你不是跟我要钱吗？大爷今天可要你的命！”谢克熙直到此时才如梦初醒，自己是一介书生，不懂政治手腕，根本就不是地方恶势力的对手。他“扑”的一声跪在地上向杨敏山求饶：“杨大爷，兄弟我才二十几岁，年轻不懂事，得罪了您老人家，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杨敏山戏弄地问：“大爷饶你不难，可你拿什么报答我呢？”谢克熙见有生还的希望，急忙讨好地说：“不瞒大爷说，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就小有名气，后来又蒙杨总司令器重。如果大爷能放我一马，等兄弟大富大贵时，一定重重地报答您。”杨敏山一听哈哈大笑：“真是个书呆子，死到临头还臭美呢，大爷我是个粗人，不懂得什么北大南大，我只知道你目无大爷，霸占我侄媳，还跟我要钱，就是该死，来人，把他拖下去做了。”堂堂县长就这样惨死在袍哥手下。那一枝梅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一块儿也给杀了。

后来，金良佐向杨森报告这件事时，闭口不谈他与袍哥的勾结，只是说，谢克熙年少轻狂，目无地方贤俊，强抢民女，结怨甚多，终于被人暗算。杨森得到汇报，大骂谢克熙该死。从此，他渐渐看不起读书人，从而他的所谓文治武功就只剩下武功这一项了。

### 3. 蒋介石怒杀袍大爷

像袍哥这样的江湖团体，在一定时期可以在地方上横行，就连地方官员

也对它有几分惧怕。但是如果帮会势力过分强大，就会使军政领袖产生疑忌，甚至会采取措施加以制约和打

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丧师失地，节节败逃。1938年，国民党政府移都重庆，蒋介石到四川后发现袍哥势力太大，而且其他各地帮会组织纷纷内迁，恐日后难以驾驭和操纵，就一心想对它们加以扼制。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给了蒋介石一个借口，使蒋终于如愿以偿。

193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重庆嘉陵江大酒店旅馆部二楼一间房门被打开了。酒店经理张万财叫醒旅客，很客气地对他说：“实在抱歉，有位党国要人今晚要用这间房，您能不能委屈一下搬到别的地方去住？真是对不起，请您多多包涵。”旅客一听说是党国要人要来，就赶紧说：“要得，要得。”说着就将自己的行李物品收拾好走了。

这位旅客何许人也？此人名叫刘七，是一位袍哥兄弟。刘七在袍哥中虽还是个么大，地位并不怎么高，但由于他武艺高强，智勇双全，很受某位袍大爷的赏识和器重，视为得力助手。刘七跟着这位袍大爷见的世面并不算少，特别是这一两年来党国要人也没少见。这时他下得楼来，在路上琢磨着，这位党国要人是谁呢？莫非我见过？这么晚了，他来做什么呢？我倒要仔细地瞧一下。他在外面磨蹭了一段时间，到了午夜，又溜回旅店，蹑手蹑脚地摸到二楼他住过的那间房，侧耳倾听，只听得里面传来一男一女的声音。

“嗯，你还没有答应我的要求呢！你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收我做九姨太，带我到上海风光风光？”

“我的宝贝，你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只是现在上海在日本人的手里，我不带你到上海是为你的安全考虑。急什么，先在陪都住上几年，等日本人一走，一切都好说。”

“嗯，在这里也不安全嘛，那个嗨袍鬼总来纠缠，怪扫兴的。”

“有我护着你，你怕什么？那位袍大爷能把你怎么样？放心，一切都包在我身上，我的小乖乖！”

“这还差不多。嗯，轻点！”

“哈哈……”

紧接着传来一阵肉麻的浪笑……

刘七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不由得肺都气炸了。他听出来，那个女人名叫彩云，是个唱川剧的演员。两年前，袍大爷闲得无聊出去兜风看戏，被她的美貌和演技所吸引，就执意把她收为外室。谁知这女人心比天高，一心想往上爬。重庆改做陪都后，日渐繁荣起来，她也就更加一心一意地想跳槽，明里暗里借故与党国要人眉来眼去，频送秋波。再说那位男人是谁？刘七听声音，觉得像是戴笠，可他又不敢断定。于是他又折回街上，想等到天明他们出来时着个究竟。等他看到了，果真是戴笠，哼！这个老色鬼，竟玩到咱袍大爷头上来了！原来，戴笠在去年陪都川剧界抗日募捐演出时与彩云有过一面之交。那女人知道戴笠戴老板的身份，因此在他面前更是故弄风骚，曲意逢迎，戴笠是个情场老手，怎么不知个中奥秘？于是三下五除二，当时就和彩云眉来眼去勾搭上了。戴笠虽然妻妾成群，姘头就更不计其数，但眼前的这个川妹子于妩媚中露出来的那股胆大辣味儿，对他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很快两人就如胶似漆了。当他得知彩云是某袍大爷的相好时，曾经有过

顾虑，但是欲火难抑，他与这女人的关系越发不可收拾了。

小袍哥看得真切，文即飞奔回去向袍大爷报告。袍大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骂戴笠无耻，不够哥们。他咬牙切齿地说：“好啊，既然你戴某人能干出这样的好事来，可就不能怪我袍大爷绝情了。我要让你在袍规面前伏法！”原来袍哥中的规矩是禁止外人奸淫袍哥兄弟伙的妻子，一经发现，则由堂口的主事大爷指派袍哥兄弟将奸夫淫妇一齐杀掉，本来，彩云并不是这位袍大爷的妻子，只是他的一个姘头，但他在盛怒之下也顾不上了，而且他贪恋彩云的姿色，不想杀死她，只是把一腔怒火向戴笠泼去。

刘七一听到他大爷要派人杀死戴笠，连忙止住他说：“大爷，这事可要慎重。那戴笠是党国要人，在重庆耳目甚多，可不是个等闲之辈啊！处治他弄得不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事还要从长计议。我看不如给他一个威胁，不伤他的性命，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今后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做，双方的面子都有了，不知大爷以为如何。”袍大爷沉思了片刻说：“你说得有理，就照你所说的办。”当下两人密商行事机官，自以为很得计。4月1日上午，戴笠陪蒋介石出席军统的“四一”大会。戴笠管理军统很有办法，为了让他的部下忠于职守，每逢4月1日他都要主持召开一次纪念会，说是纪念死去的战友们。其实这些死去的人中也有不少是因为不听戴笠的话或者背叛戴笠而被处死的，他给这些人一个美名，叫做“殉法”。因此这样的纪念会既有激励作用，也有惩戒作用。特务们在他的威胁利诱下更不敢不死心地为他卖命了。今天他特地请来了蒋介石，心中好不得意。

10点钟光景，车队来到重庆郊外军统办公所在地。蒋介石第一个下车，向迎候在两边的人群招手致意，想到抗战以来他的威望越来越高，胸中不禁掠过一丝快意……这时，冷不防背后传来几声响，子弹从蒋的头顶上飞过。一时人群一片混乱，特务们急忙上来维持秩序，驱散人群，戴笠赶紧下车扶着老蒋走入密室。蒋介石怒容满面，拍着桌子吼道：“娘希匹，共产党不是在延安吗？怎么跑到重庆来了？我没有死在日本人飞机的轰炸下，难道死在共产党手中不成？”戴笠慌忙请罪：“是学生防范不严，以致几乎出了大事，还望恕罪。”蒋介石突然变得很平静，声调也和缓了下来：“这件事不小了，你要立即调查，务必迅速将调查结果直接告诉我。我本人受点惊吓倒不要紧，可事关陪都治安、党国大计，切不可大意。”戴笠连忙唯唯称是。

戴笠很快就查清了这一突发事件的前因后果。原来那位与戴笠争夺女人的不是别人，而是另一袍哥头子、现任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的哥哥程泽滋。程泽滋受了委屈之后向他弟弟谈起这件事，希望他能帮忙出出这口恶气。一开始程泽润还很犹豫，不敢应承下来，但经不住他哥哥以兄弟之情和江湖侠义打动他，他终于答应尽力帮忙。二程原只是想教训一下戴笠，没想到那天蒋介石会和戴笠在一起，二程派去的人把老头子当成戴老板，这下可惹下大祸了。

戴笠得到情报后，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他在汇报中只字不提与程泽滋争夺女人的事，只是说程泽润对委座心怀怨恨，于是和他哥哥合谋企图杀害委座。蒋介石听了汇报后大惊失色，万分震怒：“现在日寇犯难，共党方面也不断制造摩擦，这些都够心烦的了。袍哥土匪竟敢在后方也跟着凑热闹。这样下去，党国不是很危险了吗？你去布置一下，立即将二程解决掉。”对“解决”二字，戴笠当然是心领神会的。

实际上，蒋介石诛杀二程，是有更深刻的背景的，蒋害怕四川袍哥势力

太大，而且抗战期间内迁的帮会组织，如青帮、洪门的力量也有膨胀的势头。他早就想借机杀掉一两个帮会头目，以做效尤。也合当程泽润该死，前不久，蒋介石得到报告说兵役署的一名新兵突然神秘地死去了，便疑心与兵役署署长程泽润有关系，因为蒋介石对帮会人物从来是用而不信的，认为这些人不可靠。但是经过调查，那时兵役署已把兵权交给了交通部的运输大队，责任不在程而在俞飞鹏，但俞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不便深究，但这件事却加深了他对程泽润的疑忌。现在出了这件事，蒋介石终于抓住口实，名正言顺、毫不费力地将程泽润、程泽滋诛杀了。那个倒霉的帮手刘七，当然也一块儿被干掉了。

二程之死，曾在四川袍哥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二程的祖上据说是袍哥始祖陈近南的把兄弟，程氏在袍哥中威望极高。他们被杀的消息传来，各地徒众群情激愤，纷纷举行誓师大会，扬言要攻入重庆找蒋介石和戴笠索命，戴笠一方面怂恿蒋介石进一步剪除袍哥势力，一面调集大批特务应付可能出现的事变。一场大的流血案一触即发。

当时青帮大亨杜月笙也在重庆。他和袍哥头头们一向很有交情，而且面对蒋介石对帮会组织的先是利用而后又猜忌、诛杀的做法，感到忧心忡忡，担心二程的命运有一天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曾对杨虎和另一袍哥头子范绍增等人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一些。”惊惧之情溢于言表。这会儿他利用和戴笠的关系，了解到有关特务和军队的部署，急忙找到几位袍哥大爷向他们通风报信，劝他们主动息事宁人。他对他们说，大家如果闹了起来，蒋介石更会借口多杀人，枪杆子在他手里，何必吃这眼前亏。这些袍哥头子一向对他言听计从，这件事就这样慢慢平息下

来。

戴笠在这件事中获利甚丰。四川袍哥从此确实有所收敛，因此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势力得以在重庆和四川有了进一步的扩张。

有人说，袍哥当时虽慑于蒋政权的高压，没敢胡来，但在暗地里却一直盯着戴笠。据说戴笠后来在1946年坐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遇难，就是袍哥们干的。至于这种传说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就很难说了。

#### 4. 袍灾一瞥

辛亥革命后，袍哥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据说到抗日战争前夕，四川青壮年男性中有90%以上的人加入了袍哥。袍哥不但与各军政集团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在袍哥内部，虽然也时有一些联手的行动，但由于各堂口互不统属，各自行事，因此常不免旋分旋合。有时袍哥组织之间为了争码头或者一些小事也大打出手。应该说，袍哥之间的内讧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才多了起来的，因为这时他们以往“反清复明”的宗旨已经过时，根本就不能维系人心了。过去袍哥还有什么“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之分，清水袍哥是比较周正的，讲究“身家清，己事明”；现在却是清、浑一锅煮，其举止行为简直与一般盗匪无异：袍即是匪，匪即是袍。这种土匪之间的恶斗固然是袍哥这样的封建帮会组织不成气候的表现，但却同时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袍哥之间的内争往往殃及池鱼，使生灵涂炭。广大四川人民对此深恶痛绝，称之为“袍灾”。

1929年，天全县的袍哥大爷曹茂松的兄弟伙与另一袍哥大爷杨绍兴的兄弟伙打架，曹家就同杨家打起明仗来。这一仗前后打了15年。杨绍兴先被曹

家打死，后来杨家又把曹茂松打死，前一辈死了，后一辈又继续打下去。杨绍兴的儿子杨明光与曹茂松的侄子曹独手又打了几年。双方前后死伤几百人，烧毁的四合头大瓦房就有很多间。直到1944年刘文辉任命陈耀伦为雅属剿匪司令采取硬性调停手段，双方才算作罢。到争斗结束时，附近百家人都搬走，只剩下几户孤寡，田地也无人栽种，成了一片荒野。

同样是在天全，袍哥李银原来是陈步胜的兄弟伙。后来嗨了大爷就不买陈步胜的帐。陈步胜要喊人打死他，李银跑到他的连襟陈思亮处避祸，于是陈步胜就同陈思亮打了起来。陈思亮去搬邻近的袍哥头头侯明信、董之昭、康万寿来帮忙，陈步胜去搬李元亨、李幻文甚至还远到荣经搬来朱世正、熊大武等来助阵。战事从1941年开始，打到1946年才由陈耀伦调解和好。6年间，双方死伤几百人，烧毁房子几十间，他们所在的新街场子几年之间无人赶集。

应当说，“袍灾”不只限于天全，几乎是哪里有袍哥，哪里就有灾难。

1923年，双流柑子树场镇的李安邦，与刘家壕的黄瞎子的火并事件，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土匪战争。

事件的起因是黄瞎子的兄弟伙吴歪嘴带领土匪在李安邦“防地”抢劫军阀刘成部队一个团的枪支，弄得柑子树全场大乱，商店关门，引起了李安邦的不满。接着，黄瞎子又提出要在柑子树场镇成立码头，李安邦知道黄瞎子是要抢夺他的“防地”，便加以拒绝，黄瞎子气急败坏，串联了12个袍哥舵把子，纠集了2000多人枪，准备袭击柑子树场。李安邦事前得知消息，也约集骆孟阳（温江团练局长）等共约四五千枪，准备黄瞎子来攻击柑子树场时，直捣黄瞎子的老巢刘家壕。

起初，黄瞎子见势抵不过李安邦，便派人出面交涉议和，李安邦同意罢兵。哪知道黄瞎子议和是假，缓兵是真，待李安邦的人马撤退时立即卷土重来。一时李安邦大败，黄瞎子追了十余里，遇上李安邦的后援，一交手，黄瞎子就败下阵来。结果，黄瞎子、吴歪嘴不知下落，其余11个舵把子，经骆孟阳用招安骗局，在酒席间当场被击毙。

1929年金堂匪霸赖金迁与另一巨匪罗春山火并的战争，也是有名的土匪战争。

赖金迁是金堂有名的匪霸，驻防金堂的旅长杨秀春和县长许达权也怕他三分，不得不对他笼络。罗春山是另一匪首。开始时两人关系很好，曾拜过亲家，后赖金迁与罗春山争一支新式手枪，赖未夺到手，因而对罗颇有怨气。1927年，赖金迁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的兄弟伙罗老九，在罗春山管辖区内抢劫时被杀，何由此怀恨在心，经常在赖金迁面前说罗春山的坏话。1928年，罗春山的亲信严茂生率匪徒冒充军队去成都郊外抢劫时，慌乱中遗失物证，经查明是赖金迁手下的东西，成都有关方面怀疑此次抢劫系赖匪所为，乃将物证交驻军旅长杨秀春查处。杨旅长叫县长许达权委婉劝告赖金迁。赖金迁当即怒不可遏，认为是罗春山有意陷害他，加之过去就有一些积怨，便决计除掉罗春山。

1929年3月，赖金迁掌握罗春山信佛的特点，设计在康家渡做佛事，请罗春山申文上表，表示对他的尊敬。罗春山很高兴，便带了20多人欣然前往。到达康家渡后，赖金迁假意盛情招待，赖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与罗春山向来很熟，就在一旁陪罗春山烧鸦片烟，罗所带来的20多人也各有赖的兄弟伙陪伴，实则监视。当晚二更后，何锡珍与罗春山开玩笑，乘其不备，连发三枪，



未击中要害，又拖至天井里，把余下的七发子弹全部倾泻在罗身上，结束了他的性命。后又把罗的尸体从后门拖出放在市场坡。这时，赖金迁走来，潸然泪下，亲手给罗烧了一堆纸钱，并吩咐兄弟伙用被子裹尸，派人看守。第二天他又派赖合山、赖昆山等十余人，随带台盒二个，装满金银斗壳、香蜡纸钱、猪头三牲等祭品，护送罗春山的尸体回到罗家。赖金迁狡诈多端，这种假意标榜袍哥义气的作法，果然收到一时的效果。罗春山老婆非但没有计较，而且以礼相待。

罗春山死后，手下庄子才、严茂生马上扶植罗的幼弟罗绍光继续掌舵，他二人掌握实权，发誓要替罗春山报仇。赖金迁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要以武力吃掉庄、严实力。这年4月下旬，赖集中全部力量，分兵九路去攻打庄、严二匪部。这天，正是安葬罗春山的日期，庄的兄弟伙刚把棺材抬出大门，闻匪徒报警，庄子才立即集合兄弟伙走了。赖金迁手下管事刘华春带领一部分人赶到罗家门口，对着罗春山的棺材打了三枪。这事传到庄、严二匪的兄弟伙耳里，更激起了满腔仇恨。庄子才背着罗春山的灵牌，头上顶着纸钱，其余的人也脱光上身，一心要与赖金迁决一死战。于是兵分两路，向赖部拼命进攻。哀兵必胜，庄、严二部以一当十，锐不可当，一鼓作气把赖打败。赖金迁稳不住阵脚，节节败退，顷刻间全线崩溃。庄、严二匪虽然取得胜利，但自量实力不如赖金迁，庄子才避往新繁，严茂生逃走大邑，这场两大土匪势力的火并，才告停息。

那么当时四川各路军阀对袍灾和土匪战争是个什么态度呢？就拿雅安的情况来说吧。雅安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是一个堂口林立的袍哥世界。各个袍哥组织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很厉害的，有一阵子，各小堂口为了打破陈耀伦的垄断，曾彼此联合行动，在雅安城区张贴标语，要“打倒陈耀伦，解散荣宾合”。在荣经事变时，刘元琮把被群众击毙的官兵尸首抬到陈耀伦家，随后又借事把荣宾合副总社长杨国治扣押在荣经，关押半年多，陈耀伦、刘元琮、杨国治都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手下的袍哥师长；这些混乱情况，本来应当是很伤脑筋的；但是刘文辉对于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感到头痛，反而秀欣赏；他只是不时把一些舵把子如陈耀伦、刘元琮等叫去训训话，说袍哥的活动只能以二十四军的团体利益为重，不准分裂，不准乱整。他所说的团体利益，就是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利益，这就是他一定要组织袍哥的目的。当时不少军阀标榜以匪治匪，结果是使兵匪混一，广大四川人民所受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 5. 鲜为人知的洋袍哥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渐深入内地。1890年，清政府允许英国在重庆设领事，随后，列强中的日、美、法、德也取得了在重庆设领事的权利。一时间，许多洋行纷纷在四川成立分公司，列强各国都垂涎四川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实行经济侵略，与此同时，它们还加紧进行文化渗透，于各处设立布道教堂。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反抗。辛亥革命前，袍哥憎恨洋教，参加反洋教斗争。如1900年重庆袍哥大爷康廉江率领袍哥兄弟打了洋主教，闹成教案，被巴县衙门通缉，迫使他跑滩避居日本。应该说，袍哥组织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是很富有反帝性的，尽管在方式上有时显得落后，有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袍哥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是在辛亥革命以后。那时袍哥组织大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重视。有一位自号“浪迹天涯客”的西人，曾在民国初年在四川参加袍哥组织，并逐步升为大爷。他对袍哥的入会仪式、袍规和

执行纪律等情况了解甚详，并撰文向海外介绍。文中认为袍哥宗旨在于互相扶持，分仁义礼智信五门，与欧美工人团体相似。“会众入会有的是求兹以免扰攘者，有的为假势焰以报睚眦，有的为应援以雪覆盆者。而盗贼攘劫之行，大抵末流为害，本非袍哥所赞同。其对于辛亥革命、倒袁运动等均有大功”。以上评论大多数是符合事实的，这反映了袍哥已逐渐与洋人搭上关系了。军阀混战时期，重庆袍哥与帝国主义洋行的勾结愈加广泛。帝国主义洋行经常运来各种武器弹药在上海秘密销售，甚至将手枪和子弹运到汉口、宜昌出售。重庆袍哥中贩运烟土吗啡，买进枪枝弹药的人逐渐增加。袍哥与洋行、兵匪勾结，最初多靠洋袍哥牵线头。其中巴巴达在这方面的活动，时间最长。

巴巴达是希腊游民，少年时游荡海外。中法战争使法帝国主义得以入侵云南，他就在滇越铁路活动走私，深入内地州县，在走私活动中，他得知四川袍哥势力很大，在夔府经湘军将领鲍超的孙子鲍革的引见，参加了仁字旗“进同社”三排。回重庆后，他又经重庆仁字旗大爷邱绍芝的提拔出山当大爷。巴巴达最初是推销洋货，主要有钟表、日用百货、装饰品等，聘请袍哥弟兄李炳南为其助手。后来发展到牵线接头买军火，销售鸦片、吗啡。由于有袍哥势力协助，这位洋袍哥的生意做得很红火，销售货物极为迅速，获利极丰。他每至一处均出示公片拜码头，送礼应酬，因此上沿东大路直到成都，下沿长江直到夔府、宜昌等沿途各镇，都有他的踪迹，有一次，巴巴达在内江做生意途中与人打麻将被人做了手脚，一夜之间就输掉银元 1000 多块，第二天早晨抬了几箱时钟去偿还赌债。他的助手李炳南认为这次生意必然亏本，但回到重庆一结算仍有盈余，可见其利润之大。

1909 年，巴巴达在重庆开始以小型电影机流动放映电影，招徕顾客，推销洋货，此为四川电影的起始。以后他又在重庆设电影院，任李炳南为经理，放映外国电影。刘湘驻军重庆时，巴巴达又与袍哥师长范绍增、陈兰亭等结识，过往甚密，在他们的支持下于重庆千厮门城墙边开设华洋旅馆、西餐厅。以后又在南岸龙门浩开设华洋旅馆、酒吧餐厅，招待外国兵舰上的船员、水手，并为他们接洽走私买卖，介绍妓女玩乐。当时华洋旅馆成为军阀、买办、袍哥与帝国主义洋人水兵勾结的场所，许多罪恶交易都是在其中进行的。

巴巴达性喜活动，中国话讲得极好，又很熟悉中国主活方式，赌博是他的一大嗜好，尤其爱打麻将。他平时与袍哥、商人等接洽时，不但出手大方，而且与他们调笑戏谑，毫无拘束。他还娶了一个中国老婆，是李炳南的姨妹，生有二子五女。重庆解放后，巴巴达见大势已去，再呆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得于 1951 年 5 月，携带妻子儿女仓皇逃回希腊。前后总计，巴巴达这个希腊无赖在四川招摇竟达 40 余年。

## 6. 袍哥的绝迹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谈到帮会问题时指出：“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这段话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了帮会势力的阶级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成为后来中共对帮会组织进行统战工作根本指导思想，中共成立之初，曾为了开展工人运动，与上海的青帮、洪门发生过联系，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对四川袍哥的统战工作，主

要是在抗战以后开展起来的。

四川一些大的袍哥组织和舵把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多有过与蒋介石和军阀勾结，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历史。如 1933 年冬，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进驻四川通江、南江、巴州地区并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时，袍哥曾参与刘湘组织的对红军和苏区的六路围攻；1935 年春，红军放弃通南巴地区北上时，他们也和军阀一起对红军围追堵截。但是在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共面对国内严峻的抗日救亡形势，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毅然向他们伸出了统战之手。1936 年 7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委员会发表对哥老会宣言，肯定了哥老会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表达了中共愿与他们“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的真诚愿望，并表示“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起用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对袍哥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进行的，使得一部分袍哥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并促使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弃暗投明，获得新生。范绍增的转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范绍增 13 岁时就加入了袍哥组织，后羽翼日丰，与四川各路军阀时而相互勾结，时而发生摩擦，也参加过追剿红军的反动军事活动。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投靠蒋介石。1937 年 11 月，刘湘率部出川抗战，卧病汉口，范绍增在汉口侦得刘湘反蒋情报，连夜向孔祥熙、蒋介石报告，从此与蒋政权关系密切。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范绍增将自己的别墅“范庄”让出。请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居住。在孔祥熙、何应钦的帮助下，1938 年春，范绍增被委为第八十八军军长，率部出川，转战于江浙一带。1942 年，他被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何绍周任八十八军军长。他见部队被蒋介石吃掉，一气之下返回重庆从事袍哥活动。抗战胜利后，范绍增又到上海，混迹于十里洋场，与杜月笙等人打得火热。1947 年 4 月，他在上海成立“益社”，被选为理事长。在上海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对他做了争取工作。他以益社为地盘，掩护和招待过张澜、郭沫若等进步人士。他借国民党政界的势力，运出解放区的棉花，再换成西药、纸张运往华北解放区，打破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1949 年初，眼见国民党崩溃在即的范绍增，萌动了重拉队伍反蒋的念头，得到了民革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他返川后，从当年 5 月起，就四处约集旧部军言和地方势力，筹商组建军队。8 月，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部署西南反共军事，四处招兵买马，封官授命。范绍增通过与当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旧关系，提出组织川东挺进军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范绍增在大竹、渠县招揽旧部和袍哥，很快成立起八个纵队，11 月中旬，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范绍增为国防部直属川东挺进军总司令。11 月 24 日，解放军二野政治部派人给范送去密信，欢迎他伺机起义。12 月 1 日，范绍增在渠县三汇镇召开总司令部、各纵队将领紧急会议，宣读了起义电文：“刘伯承、邓小平将军：我率领陆部起义，愿为人民效力，正集结川东待命，请指示。”12 日，他收到了刘伯承的回电，13 日正式宣布起义。范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川东地区立下了功劳。解放后他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后调任河南省体育委员会副主任，1977 年 3 月 5 日病逝。

应该看到，袍哥组织本质上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组织，就整体而言，是绝不会真正转变到人民的立场上来的。它虽然曾经依违于国共两党之间，但这只是它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宜之计。它清楚地知道，在共产党将要建立的人民政权之下，决不会允许它像以前一样横行乡里、无法无天、因此当人民

解放战争迫近胜利的时候，除个别分子外，大多数都走上了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相勾结，对抗中共及其军事力量的反动道路。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愈来愈重视袍哥组织，利用它搞了许多反革命活动。国民党操纵的正诚社、融志社等袍哥组织，曾参与封闭《新华日报》馆，接收八路军办事处，破坏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组织反苏反共大游行等活动。袍哥分子往往还冒充民众，制造反革命事件。重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等都是国民党操纵袍哥组织冒充群众制造出来的。以校场口事件为例，1946年2月10日，在校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事前陈立夫指派中统特务刘野樵等分头负责。刘野樵以“群义社”社长名义，约同“众合社”舵把子贺洪兴、“全义社”舵把子王银山、“永德社”舵把子谭普连等，共纠集特务、袍哥、打手、流氓地痞约800人。准备捣乱会场。先是刘野樵霸占扩音器，自称大会主席；随后贺洪兴、王银山、谭普连等吆喝打手多人围攻殴打李公朴、郭沫若等人，李公朴、施复亮受重伤，郭沫若、马寅初也被打伤，台上台下共打伤6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校场口血案”。

1950年4月四川解放后，正当人民欢庆新生的人民政权时，不少袍哥竟投入到国民党军统特务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先是在成都龙潭寺、石板滩制造事端，后来则发动土匪游击战争，面对袍匪的嚣张气焰，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镇压了一批袍哥大首领、匪首、恶霸、特务。1951年2月，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又处决了一批首恶分子。同时，党和政府又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对大批胁从者重在说服教育。在正气的威慑和感化下，许多袍哥认清了袍哥组织的封建性和反动性，纷纷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其组织也随之解

散。

四川自古以来由于地势险恶，地方统治势力薄弱，因此常常是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唐代诗人李白有感于此，也不禁发出了“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的慨叹，新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解决土匪问题，根治袍灾，使蜀中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实在是了不起的功绩。

## 六、东北绿林

### 1. 东北绿林源与流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对内残酷剥削，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东北地区本是清王朝龙兴之地，但由于地处边陲，朝廷失治，当地的官僚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再加上后来沙俄、日本侵略者对这一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般老百姓中不堪忍受者，杀官造反，亡命之徒则铤而走险，使得这一地区变成了胡匪、盗贼啸聚之所，“绿林豪杰”汇集之地。

“绿林”的别名有“胡匪”、“马贼”、“红胡子”、“马达子”、“混混”等等。“东北绿林”作为帮会组织，在清末民初时期是非常有名的。但与当时其他帮会组织，如青帮，竹联帮，袍哥，洪门等比较起来，它的组织比较松散，其成员精于骑射。集体抢劫或格斗是“东北绿林”的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东北绿林”的起源，一般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在远古尧舜时代，维持治安限于以首都为中心的一定地域，其域外地区被称为夷狄之地。罪犯或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往往被流放或被迁到这些地方，久而久之，他们结成党徒或群伙，四处抢劫，骚扰百姓，成为早期的匪患。东北就属于这种匪祸泛滥之地。

第二种说法认为，春秋战国及秦朝时期，少数民族北狄不断地在边境地区进行袭扰。为防止他们的侵袭，各国的国君都在边境地区建筑长城，用以加强边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筑起了一座雄伟的万里长城，对外族的入侵起一种阻挡或震慑作用。那些北狄的骑马人或组织在一些史书中被称为“马贼”，这是“绿林”的早期形式。第三种说法认为：东汉末期，朝廷腐败，统治者对人民进

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人民怨声载道，不堪忍受压迫。巨鹿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提出了反映人民心声的口号。一时间，方圆几百里地方的贫苦大众都纷纷加入“太平道”，声势颇大。紧接着，张角联络各地首领和会员，以黄巾为标志举行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但终因朝廷大兵镇压，加上义军内部出现分裂，黄巾军被官兵击溃。义军残部退居深山老林。他们经常袭击远近富豪，有时也抢掠百姓的财物，逐渐演化成“绿林”。

第四种说法认为，绿林原为东北的一座山名，汉末以来，凡亡命之徒多隐居于此。这些人一部分能为贫苦百姓伸张正义，劫富济贫，成为草莽英雄，为人民所称道；但也有一部分本是强盗出身，迫于官家追捕，乃逃匿山林，聚众为王，独霸一方，时常干些侵害百姓的勾当。这后一部分人属于绿林中的败类，为百姓所痛恨。

第五种说法认为，唐朝僖宗年间，黄巢率众起义，遭镇压后，余众以公主岭为根据地反抗统治者。一些史书便把这些人称之为“马贼”或“绿林”。

第六种说法认为，“东北绿林”始于明末清初，是由明将毛文龙引起的。毛文龙曾任明朝总兵，镇守皮岛（又名东江镇，位于铁山、渲川之间）。毛文龙好大喜功，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为朝中正直大臣所痛恨。兵部尚书袁崇焕以阅兵为名，到皮岛将毛文龙诱而诛之。但毛文龙手下数万将校兵卒，在兵荒马乱的明朝末年，群龙元首，变成了散兵游勇，流窜各地，成为“东北绿林”的一大来源。

第七种说法认为，“东北绿林”起源于清代。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物

产富饶：莽莽林海，遮天蔽日，一望无际；高山峻岭，横亘千里，蔚为壮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一些无业游民，漏网罪犯，剪径强盗，提供了一个好去所。他们纠集党徒，啸聚山林，组织武装，袭击村镇，抢掠百姓财物，成为“绿林”。

1644年，清朝实行保甲法，凡有匪情即上报地方官兵，加以镇抚，以后清朝又实行坚壁清野政策，设立农民自卫组织——团练。在紧急情况下，团练配合官兵，进行剿匪。团练指挥往往借战功而跋扈，拥兵自立，成为一方霸主，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被百姓称之为“马达子”，也就是绿林。

鸦片战争结束后，许多地方农民纷纷成立自卫组织——“保卫团”，并进而联合成为“连庄会”，划分各自的管辖区域，其最高指挥连庄会长称为“总揽把”。许多连庄会为扩大自己的地盘，经常和其他地方势力发生武斗、火并。但他们倒也很讲义气，凡势力范围之内以及对比较友好的兄弟地区严禁任何违约或暴力行为。这些组织或集团内部，一般都有比较严格的戒规，违犯者要受到很重的处罚。此类“保卫团”、“连庄会”等组织，较之一般的“绿林”组织，情况要好得多。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公开抢劫，而往往以保护百姓免遭他乡匪团侵害为借口，收一定的饷银。“保卫团”、“连庄会”等属于自发的组织。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加上他们有反对官僚、土豪、军阀的盘剥，反映群众疾苦的一面。所以在官员的眼中，他们和“绿林”、“帮会”没有什么两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清政府损兵折将，为小日本所败。像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特别是叶志超、聂士成等的部队被日军打败后，一部分为清军将领收留，余者流窜各地，其中不少人乘机聚众成盗，占山为王，成为绿林。像著名的绿林帮会头子张作霖，就是出身于宋庆的溃

军。

1900年，北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杀洋人，除贪官，最后被八国联军和清朝政府联合绞杀。在东北各地，特别是盛京地区，有数以万计的义和团弟兄惨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毒杀。幸存者或为饥寒所迫，或为逃避官兵的追捕，或为保存实力，走向绿林生涯。

1905年，日、俄侵略者由于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而爆发了战争。由于腐败的清政府的所谓“中立”，这场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帝国主义还采用“以华制华”的手段，纷纷派遣特务，拉拢马匪，维持地方治安或直接利用马匪袭击对方。日本帝国主义派遣花田仲之助少佐（别号花大人）、桥口勇马少佐等间谍、特务，来收买各地亡匪、帮会，建立“满洲义勇军”和“东亚义勇军”，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俄国组织“花膀子队”为其卖命。帝国主义的纵容，清政府的无能，造成整个东北地区帮会林立，绿林丛生。加入帮会、绿林成了一种求生之路、致富升官之道，致使许多良民百姓也经受不住诱惑，乐此不疲。

此外，清政府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也使许多流放东北的所谓“流入”及大批“移民”，困于生计，被迫走向绿林。

东北绿林尽管是一种半成熟的帮会类型，但它仍然有一套自己的组织规则，当然也不乏组织严密的绿林存在。

在绿林组织中，各级指挥人员分为头目、小头目或副头目、崩头或头前人等。小股武装一般由头目直接指挥；大股武装则通常划分成若干小队分别

由小头目或副头目指挥。在小头目之下，又分若干个班，其人数 10—15 名不等，班长称为“崩头”或“头前人”。由于“东北绿林”是各个帮会组织的总称，各个帮会组织之间彼此没有从属关系，都是独立的，每个帮会自成一统，又有自己的一套组织规则，所以说，不能给“东北绿林”一个统一的组织规则。

绿林组织内部各个分队之间，彼此联络十分密切，信息十分灵通，同伙之间几乎不会发生因误会而自相交战的情况。为防止奸细打入内部，他们制订了暗语或黑话。这些暗语或黑话由头目随时发出，几乎每日有变。

时间长了，某些暗语或黑话渐渐地固定下来，为一般黑道朋友所通用，而不再为某个绿林帮会组织所专用。

下面是通常采用的一些暗语或黑话，括号内是大众语言中相当的词或话。

暗语如：富（贵），和（平），仁（义），福（顺），平（安），寿（禄）等等。

惯常用的黑话有：当家（头目），二当家（副头目），滑（走），押城（袭击），耍城（攻城），押杀（杀掠），采耍（集体决斗），采命（单骑决斗），红烧（焚烧），采花（诱拐妇女），灰扭子（陆军），水（官军），地苟子（警察），大妞（姑娘），内头财神爷或洋票（人质），枪子（步枪），柴火（子弹），啃富（吃饭），海（水），宝盖子（马鞍），吃海（饮水），啃饭张子（吃饼），来水（官军来了），睡丁（死亡），押烈子（强奸），堂桥（睡眠）。

东北地区，绿林丛生，帮派林立，但真正有实力的并不多。东北绿林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个帮派：

一、冯麟阁帮。冯麟阁，又名冯德麟，海城县人，衙役出身，为人贪残狠毒，利欲熏心，善于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他乘社会动荡不安之机，纠合地方上的流氓无赖，地痞恶棍、散兵游勇

等，盘踞在盘山县的田庄台、辽中、台安、锦州、彰武一带，独霸一方。他打着杀富济贫的幌子，对外声称要仿效义士赵志刚，

用以欺骗群众；实则是横行霸道，抢劫淫掠，无恶不作。赵志刚乃铁匠出身，为人有胆识，好打抱不平，深得群众拥护，被称为“赵义士”，当地范姓恶霸地主逼迫佃农白老头将其女儿菊花

抵债当侍女，引起群众公愤。赵志刚闻讯后，当晚趁人不注意，越墙翻入范姓地主院内，想探听究竟，恰巧遇见菊花正遭受毒打。赵志刚义愤填膺，大喝一声，冲过去揪住恶霸，一顿拳脚，把这个作威作福的恶霸活活打死，救出了菊花。随后组织穷人队，杀官济贫，为贫苦百姓伸张正义。后经老革命家宁武先生介绍，赵志刚加入了同盟会，表现非常积极、勇敢。辛亥革命时，他被部下出卖而牺牲。冯麟阁居然打赵志刚的旗号，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招摇撞骗，寡廉鲜耻。冯麟阁一生好事没做，坏事做绝，后为政府所改编，居然还当了个东北军二十八师师长。

二、金万福帮。金万福，又名金寿山，海城县人，兵痞出身。早年在天津小站北洋新军中当一个小头目，因过不惯纪律较严的军旅生活，便开小差跑回家乡。他耳闻目睹东北地区土匪、恶霸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情形，便产生将来在这一带独霸一方的想法。他纠集一群流氓、恶棍、赌徒成立了匪帮，自任总首领。但因力单势薄，不得不暂且投靠在冯麟阁门下。日俄战争

前夕，金万福感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到了，就离开冯麟阁，接受俄军上尉克留金的招募，参加了“花膀子队”（配袖标的俄国别动队）。借助俄军之威，他使用威逼利诱等手段，吞并小股散匪，壮大自己的势力，成为北镇一带的巨匪。

三、田义本帮。田义本以黑山胡匪闻名，却出身于贵族之家。据说清朝始祖爱新觉罗在长白山麓崛起时，田的先祖即属于爱新觉罗麾下建有奇功的满洲旗人贵族。当东北土匪猖獗之时，他因门第的关系被推举为自卫团的首领，成为对强大的私人武装集团拥有指挥权的实力人物。日俄战争期间，先是效忠于俄军，当看到日本处于上风时，又调转枪口，替日本人卖命。后因与日本人派来的指挥监督官道见勇彦不和，不辞而别，不知所终。

四、韩登举帮。韩登举可谓是东北绿林中较早的而且最有实力的帮会人物，盆踞在夹皮沟一带，称雄一时；并号称间岛、吉林两地绿林的总首领，其实力以此可窥见一斑。东北地区较有名的帮会头子如刘单子、徐福升、阿翰臣、唐殿荣、冯麟阁、刘同恩等都曾是韩登举的属下，但可惜韩登举好运不长。1900年，沙俄派武装开进吉林府。逮捕了俨然“东满”王国土皇帝的韩登举之侄，以控制韩家势力。对此，韩登举大为恼火，亲率精兵出击，在马烟大岭一半击溃俄军。俄军一面退守吉林府，一面集结兵力组织反攻。在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俄军面前，以英勇果敢著称的韩家武装也招架不住，节节败退。俄兵乘胜追击，直捣韩登举老巢，大败韩登举。韩家武装兵败如山倒，四散逃亡，化整为零，以小股马匪出没于各地。韩登举从此一蹶不振。

五、杜立三帮。杜乃辽中县人氏，家境贫寒，为人豪爽，是当时绿林首领中较年轻的一个。在日俄战争中，他专门袭击俄军，也不买日本人的帐，人称“紫面判官”、“包打洋人”。据说他有8个老婆，和他一样能骑善射，非常剽悍。杜立三在帮会中以强悍闻名，在绿林中颇有威信。清政府几次派兵围剿，都毫无结果。直到张作霖投降后，假张之手，才消灭了杜立三。

六、张作霖帮。张作霖，字雨亭，海城县人。其曾祖父原是直隶省河间府贫民、于道光年间带领全家逃往东北谋生。到其祖父张发这一代，张家已是殷实之户了。唯有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爱耍好赌，不务正业，最后连命也搭了进去。为维持生计，其母改嫁给同村兽医为妻。张作霖受其父影响，从小就不务正业，混迹于赌场，结交了不少黑道上的人物，张作霖工于心计，善于应酬，八面玲珑。靠着这一套本领，不少绿林人物愿为他效劳。张作霖后来居上，势力愈来愈大，成为绿林中引人侧目的人物，但他并不甘心混迹于绿林，千方百计巴结官府，获得了清政府的赏识，成为清朝官吏。靠着剿匪、镇压革命党有功，他逐步上升。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张作霖异军突起，以奉系军阀闻名于世。但因其不情愿跟着日本人的指挥棒转，于1928年6月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被日军埋置的炸药炸死。

七、日本的“王子辫子”帮。此人姓名不详，乃是甲午战争后潜伏下来的一个特务机关长，有一个助手名叫津久居。他们纠合一些歹徒、赌棍和流氓，成为一支专门从事间谍活动的别动队，为日本侵略中国效劳。他们的活动与其他各帮派不同，行动诡密，很少打家劫舍，其目的是拉拢各帮匪首，为日本侵略者的利益服务。

帝国主义的侵略，武装强人的跋扈，马贼的劫掠，使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 2. 豪杰未必真丈夫

距辽中县青麻坎西南约十华里，有个三不管地带（因处于辽阳、新民、海城的分界地段）叫三界沟。三界沟堤道串联，河渠纵横，暗堡林立，重门深巷，易守难攻。这里就是清末民初威震辽西的绿林豪杰杜立三的老巢。

杜立三，原名杜国义，字阁卿，乳名立子，排行第三，辽中青麻坎人。杜立三出身于绿林世家，其父杜宝增、叔父杜宝兴、杜宝善和杜宝旺都是著名的马胡子或坐地分红的寨主。

杜立三机警狡猾，善于应变。他第一次抢劫时，不慎露了马脚，被官兵追赶。他凭着熟悉的地形，东突西奔，企图把官兵甩掉。可官兵见他人单势薄，穷追不舍，一心想抓个活口，回去请赏。杜立三见甩不掉官兵，正在着急，忽见前面有一村庄，便灵机一动，迅速窜入村内。官兵赶到村外的三岔路口，正不知该向哪个方向追，忽见一穿着白褂、蓝裤的商人担着两筐黄鱼向他们缓步走来。几个当兵的立刻大声问道：“喂，卖鱼的！看见一个年轻的跑过去没有？”商人不急不忙，用手一指，“有个带枪的人，沿那条路跑了。”当兵的生怕上当，一拉枪栓，对着商人厉声喝道：“卖鱼的，你要撒谎，就让你吃枪子！”商人显得有些害怕，满脸堆笑，一副诚实的样子，说：“不敢，小的不敢。如有半点差错，你们拿小的是问。”当兵的看不出破绽，又见周围无他人可问，料定商人说的都是实话，便沿商人指的那条路追了下去。商人见官兵走远了，立即扔下鱼筐，朝相反方向跑去。原来商人就是杜立三，他在危险之时，急中生智，花几块银元买通一个商人，打扮成卖鱼人的模样，骗过了官兵。杜立三把这次得救看成是“天意”。从此，他对外常常报号“杜天意”。

杜立三不仅机灵狡黠，而且胆量过人。据说他17岁时曾单枪匹马在辽河岸抢劫。当时的辽河两岸，经常有土匪出没，对过往旅客或船只进行敲诈勒索，因而人们都提心吊胆，格外小心，生怕遇到土匪。狡猾的杜立三估摸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有一次，他斗胆把饭勺子用红布包好，假装土枪，威胁辽河过往船只。一天下来，劫了许多金银，竟无人过问。杜立三尝到了甜头，胆子越来越大，竟然以此为业，在沿岸搭起席棚。设立“卡哨”，公开进行勒索。下航船每只2元，上航船每只5元，当地政府却拿他没办法。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是多么腐败！杜立三飞扬跋扈，以“保护”农民免遭匪祸为由，强占民田800余亩，强迫农民为其耕种。他还在西岗子设立“天意大寨”，以大寨主的身分隆重接待前来拜访的各地帮会头目。杜立三酷爱良马，有些土匪头目知道杜立三的这一癖好，便从各地弄来好枪良马供他享用。杜立三每次出行，都要300匹宝马良驹相随。马分青、黄、红、白四队，马尾和马鬃系上五色绸带，远远望去，好似哪位将军出征，好不威风。杜立三则骑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腰扎大带，斜插两柄手枪，还有一支毛瑟枪悬挂鞍桥，更是威风凛凛。手下人与他打扮没有什么两样，个个头扎红巾，脑垂飘带，上穿紫红绸衣，下着蓝色缎裤，脚登白色线袜，外罩青色缎靴，目露凶光，脸布杀气，让人不寒而。

杜立三有一匹快马叫“青燕子”，穿林越沟，纵横驰骋，任凭调遣，杜立三爱如至宝。有一次，杜立三骑着“青燕子”外出，回来后，它不吃不喝，耷拉着耳朵，萎靡不振。手下人都知道杜立三火爆脾气，如果当面去讲，说不定他一怒之下，拔枪把你给崩了。大家只好想些土办法，采些山草野药来治疗。由于药不对症，眼看着“青燕子”不但不见好，反而一天天消瘦了

下去。最后，大家无计可施，不得不告诉杜立三。杜立三听喽罗一说，霍地从安乐椅上跳起来，大声骂道：“混小子！王八蛋！怎么搞的？快去找医生，回来咱们再算帐。快！治不好马，我把你们统统枪毙！”其实手下人早就去找过兽医了，只因人家早就听说过杜立三的大名，知道杜立三的性格，谁个敢来？既然杜立三已经发了话，手下人哪个敢违抗，只好分头再去寻找兽医。最后总算连蒙带骗请来了一位。这兽医早年曾在营口的兵营中作过事，人称“兽医王”。

“兽医王”被介绍给杜立三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手里提的药箱差点掉在地上。杜立三拍了拍兽医的肩膀，说：“噢——，你就是‘兽医王’吗？听说过，你医道高明，有药到病除、起死回生的本领。只要你治好我的马，杜某人是不会亏待你的。怎么样？有把握吧？”那位兽医王一听最后一句话，心里想，糟了，杜立三是不是在怀疑我呢？但转念又一想，就凭我的本事，虽不敢说能起死回生，但还不至于治不好。行医十几年，从未失过手，难道这次就会栽筋斗吗？兽医心里这么想，嘴里也就不自觉地说道：“杜大人，我能治好。”“兽医王”给黑道人物治马，尤其是给像杜立三这样的人医马，尚属首次。兽医把“青燕子”仔细检查了一遍，知道这马病得厉害，能否治好，还在两可之间，后悔刚才在杜立三面前下了保证。杜立三和众头目站在周围，个个凶神恶煞般模样，又把兽医的信心给吓掉了三分。那兽医手在发抖，腿在打颤，精神有些恍惚，匆匆忙忙把药配好，灌入了“青燕子”口中。

灌完药，“兽医王”总算舒了口气，心里在想：老天爷保佑，千万别出差错。

杜立三走到“青燕子”跟前，疼爱地在马鬃上摸了几下，转身对兽医道：“没问题吧？”“没问题，过一会就会好的。”兽医强打精神说道。接着杜立三吩咐手下人把兽医领下去，好吃好喝好招待。

由于药剂用量过大，不到一个时辰，“青燕子”就呜呼哀哉了。这下可把杜立三气坏了，他大声骂道：“妈拉个巴子，我把那家伙毙了不可！”他命令左右把那兽医叫来，一把揪住兽医的前襟，恶狠狠地说道：“小子，你怎么搞的？你把马弄死了，我要让你偿命！”说完，用力往外一推，兽医被重重地摔倒在地。紧接着，杜立三抽出手枪就要射击。在这一瞬间，杜立三被站在旁边的姑母攥住手腕。趁着这空档，“兽医王”拔腿就跑。杜立三向一个头目一递眼色，那头目心领神会，举起枪来，朝兽医的后心就是一梭子。可怜“兽医王”，跑出去还没几米远，便一头栽到在地，命归黄泉。这正是：匪首性残忍，人命如儿戏。

杜立三生性狠毒，嗜杀成性是出了名的，杀兽医替马偿命不过是小事一桩，其他帮会头子也照样能干得出来。真正能反映杜立三这一性格特点的还有另外一件事。

话说1901年11月16日这一天，三界沟杜家大院张灯结彩，鞭炮齐鸣，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当地的财主、绅士、官吏、外地的秀才、举人、绿林首领、帮会头目，都纷纷前来助兴。整个村府，车喧马啸，人声沸腾，好不热闹。

原来杜立三的大老婆刚去世不久，他便迫不及待地又娶了一个二老婆。说起这第二夫人，还有一段姻缘故事。

这一年的8月18日，辽中县高坎镇的庙会上，做买卖的，挑挑的，担担的，炸油条的，卖大碗儿面的，打把式卖艺的，走江湖的，锣鼓喧天，吆喝

声不断，别提多热闹了。

在高坎镇东头的一块空地上，有一场马戏煞是好看。只见一齿白唇红、面庞白皙的红装少女正在飞奔的马上做着各种惊险动作，鹞子翻身，蜻蜓点水，倒挂鞍桥……做得纹丝不乱、恰到好处，不时引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

正当此时，庙会一阵大乱，人们争相高喊：“大鼻子来了！大鼻子来了！”只见六七个俄国兵骑着高头大马，闯进场子，直奔那红装少女而来。眼看着少女就要吃亏，就在这关键时刻，一大汉快速赶来——马快枪准，枪响处，马上俄兵纷纷落下。剩下一个挂彩的，怪叫着朝附近俄军驻地而去。

那大汉正是杜立三，他在此已经观看多时了。他不仅为姑娘的美貌所打动，更惊叹少女的上乘表演。杜立三这时见俄兵被打退，急忙对姑娘和马戏班的小伙子们说：“快！跟我来！先避避风头。”说完，带领大家一块朝三界沟奔去。

那姑娘名叫郑梅红，河北沧州人氏。她武功超群，不甘忍受洋人及其走狗的欺压，就和本家的一些人拉起了马戏班子，一路卖艺，来到东北辽中地带，巧遇杜立三。

郑梅红被安置在赵寡妇家中。从赵寡妇的口中，郑梅红了解了杜立三的身世和为人。杜立三嫉恶如仇，对赃官恶棍、为富不仁的地主豪绅，绝不留情。杜立三豪爽仗义，对落难的江湖、绿林人物总是伸出热情的手。对愿意投奔三界沟入伙的，他一律慨然收容，日后谁想另立山头，也决不为难。杜立三很有志气，宁愿老死绿林，也不愿受官家招安。盛京将军曾派新民知府携带厚礼到三界沟去劝降，杜立三却冷笑道：“干我们，这行买卖，连脑袋都不稀罕了，还稀罕什么官！杜某硬是不服天朝管，你们撒网不行，想让我吞钩更是做梦！”

郑梅红本也是豪侠女子，为人仗义执言。正是巾帼爱豪杰，肝胆结同心，郑梅红不禁暗暗地喜欢上了杜立三。赵寡妇猜到了姑娘的心事，趁机撮合，成就了一对乱世鸳鸯。

却说杜立三里外应酬，招待宾客，整整忙了三天。待客人走后，杜立三来到母亲房间，正待问安，却见母亲表情严肃，若有所思。杜立三见状，忙同道：“不知母亲为何不乐？”见儿子发问，母亲“唉”一声说：“要是你爹活着看到今日光景，该多高兴啊！你爹的死，就在你二叔一句话。”原来，杜立三的父亲杜宝增共弟兄四人，二弟宝善、三弟宝兴、四弟宝旺。三弟和四弟早被官府捕捉杀头。杜宝增和杜宝善也因屡次作案而被官府追捕。两人在一位农民家中隐匿了几天。等风声一过，又去抢劫，

被官兵包围，杜宝善被捉，杜宝增侥幸逃脱，但最后杜宝增被捉去杀了头，杜宝善则被释放。为此事，杜立三的母亲一直记恨在心。却一直没把这事告诉儿子，生怕儿子一怒之下去和杜宝善拼命……

听了母亲的叙说，杜立三须眉倒立，咬牙切齿。若不是母亲劝说，他立刻就要去和叔父算帐；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杜立三瞒着母亲，悄悄带着打手萧汉、王福兴等十几人，骑上快马直奔王家窝棚杜宝善家。杜宝善也觉得对不住大哥，很是内疚，他也一直在警惕杜立三找他麻烦。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杜宝善以为此事就算了结了。平时杜宝善也常去大哥家，探望嫂子和侄子，大家彼此也不再提那让人痛苦的事情。这次杜立三前来，杜宝善还以为是侄子办完喜事后来拜望他的，因此一点戒备也没有。他高兴地对侄子说：“立

三，没吃饭在这吃吧！”谁知杜立三“嗖”地掏出手枪喝道：“你要吃饭就到阴间去吃吧！”杜宝善刚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拥而上的四五个打手捆绑起来。杜宝善的儿子正在旁边，杜立三二话没说，对手下人一挥：“一块带走！”杜立三把杜宝善父子二人带到村外的堤坝上，令萧汉枪毙了杜宝善。杜宝善的儿子吓得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三哥，饶我一命吧！我才19岁，留下我吧，情愿终身侍奉您一家老小。”杜立三不为所动，命王福兴一枪把他也打死了。

从此，杜立三的残忍在绿林中出了名。

### 3. 大年夜火并栾家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大年年关，处处洋溢着喜庆之气。街镇上自是红红绿绿，老庄户人家再穷也割舍出一点钱为儿女置办新衣裳，买好香、挂好炮，只等夜幕来临，合家欢欢喜喜过个团圆年。然而，在众多热热闹闹、欢欢喜喜的庄子中，有一个庄子却例外。这庄子里，狗不吠，鸡不跳，人不闹，静悄悄没啥动静，死寂里透出一股阴杀之气。庄民们都缩在家里，孩子娃儿给看得紧紧的，谁也不许外出，做爹的一脸懊丧气，做娘的也无半点喜色。这庄子就是辽河边的高力房子村。这庄子怎么会这样呢？原来，这村有个豪绅地主叫栾佐廷，人称栾七爷，也是一个道上的人物。他家有几十亩良田，是一方豪富。他拥庄自立，与帮会头子冯麟阁、绿林好汉张作霖等都有交往，做了“连庄会”的大揽把，一心想扩张自己的势力。但杜立三的活动对他威胁很大，因此杜栾两家势不两立。栾佐廷把杜立三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年春天，栾七爷通过道上的几个朋友，穿针引线，勾搭上了俄国佬。他与俄军的一个小头目串通好，把二十多名俄国兵从大石桥引来驻防荒地一带。他自己则做暗探，随时向俄兵报告杜立三的行踪，准备时机把杜立三干掉。

四月里的一天，杜立三在三界沟老巢大摆筵席，为他的弟兄们庆功。大小喽罗、你来我往吆三喝四，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杜立三这天格外高兴，喝酒也放开了量。只见他，端起酒来，一气灌下十多碗，依旧是面不改色。两旁的弟兄轰然叫好，“大哥，好海量！”“当家的，赛三江啦！”……大家直喝得日落西山，才意犹未尽地散了。杜立三这时已有七分醉意，他拉着二当家的萧汉一块进了屋，倒头便睡，连值班当哨的也忘了给布置。栾佐廷的密探把上面一幕探了个一清二楚，急忙回去向七爷报告。栾佐廷一听大喜，心想，“天助我也”，火速派人告诉了俄国佬。老毛子一行二十多人，荷枪实弹，悄悄向三界沟进发。俄兵也知道杜立三厉害，行动十分诡秘，不敢麻痹大意。待接近三界沟时，却见在悠悠的灯光下，值班的哨兵一个个东倒西歪，烂醉如泥。见此情景，俄兵胆子壮了起来，但多亏栾七爷的指点，俄兵没有放枪，而是留下一半人在外面放风，其余在栾佐廷的那个密探的指引下，七弯八拐地来到杜立三睡的房间。只见一样装束的两条大汉正没人样地躺在炕上酣睡。杜立三十分狡猾，他平时总是让几个最亲密的弟兄打扮成和自己一样的装束，以备在危急时刻以假乱真，乘机逃脱。这一招果然奏效，别说俄国兵，就连栾七爷也一时没分辨出哪个是杜立三。正迟疑间，一个俄兵早已按捺不住，跨步向前，举起刺刀就朝睡在外侧的大汉的心窝直捅下去，只听“扑”的一声，鲜血迸溅，可怜萧汉，在梦中就去见了阎王。杜立三真不愧绿林中的佼佼者，多年出生入死的江湖生涯，使他变得格外机敏，哪怕有一点异常的声音，即使是睡在梦中，他也会立刻惊醒，这也正是他多次逃

过死亡威胁的原因所在。刚才俄兵进屋时脚步的杂踏声虽然很小，但也没逃过杜立三的耳朵。杜立三刚想侧身细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却见几个人高马大的身影已来到了床前。他心里刚想大事不妙，正准备推醒萧汉，没料到一俄兵的刺刀已捅进了萧汉的心窝。萧汉是他的至交，已跟随他多年，哪曾想顷刻之间便命丧黄泉。杜立三尽管万分悲痛，但此时已顾不得许多，先保住自己性命再说。好个杜立三，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猛然操起炕上的大被朝俄兵罩了过去，同时，双腿一分，一个燕子抄水从炕上跃起，飞起一脚把蒙住头的俄兵踹倒。刚才的一连串动作可说是眨眼功夫完成的。后面的俄兵一见惊呆了，正在他们稍一愣神的时候，杜立三早已抄枪在手，左右开弓，撂倒几个俄兵，并乘乱奔了出去。枪声把喽罗们从醉意中惊醒，他们提着枪，呼拉一声也赶来接应，双方混战在一块。杜立三毕竟人多势众，老毛子一看不好，就边打边退逃出了三界沟。这次交战，俄兵死伤过半，杜立三手下弟兄也损失不少。

杜立三一个人坐在虎皮椅里，想着心事。真是怪事：俄国鬼子可从没这样干过，最多碰上也是大白天真刀真枪对着干，这里面肯定有鬼！是不是哪个狗娘养的把老毛子勾来和我作对？真是这样，那又是谁呢？仔细核对，平素与自己结下怨的仇家里，风闻只有栾七爷与俄国鬼子有勾搭。如此一合计，杜立三马上把栾佐廷给盯上了，心想要是你这个王八羔子干的，我一定得把你端平了，好为我的弟兄们出这口气。杜立三发下大愿，我非报此仇不可。他用了几个月的功夫，明察暗访，最后证明栾七爷与此事脱不了干系。

杜立三咬牙切齿，心想，好你个栾佐廷，竟到太岁爷头上动土来了，真是不知好歹，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他开始制订消灭栾佐廷的详细计划。

再说栾佐廷，自从上次偷袭失败以来，一直是小心翼翼，行动谨慎，防范严密。大半年过去了，杜立三也没找上门来报仇，栾心里也就放松了许多，还以为杜立三不知道那次偷袭的主谋是谁呢。他正暗自庆幸，却不料年二十七日晚收到杜立三送

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杜天意要在年三十来给您栾七爷拜年。栾佐廷激灵灵打了个哆嗦，谁料他个杜立三这么会找晦气，早不报，晚不报，偏偏挑了个大年三十来报仇，而且还那么狂，竟然当面下贴子立生死。栾佐廷当时就在送信的面前吃不消了，黄豆儿大的汗珠滚了下来。栾佐廷发了半天怔，才想起召集心腹商议，大家也毫无办法，权且好生防备这一夜再说，因为贴子说的是“拜年”，拜不成也就多半不会再挑衅了，再不成就会找冯德麟大爷商量。栾佐廷告知全村，谁也不许外出，不许过年，不许燃放，本宅护院的都得披挂齐整，各处巡视，火炮手也不得松懈，一天到晚都是守住楼，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怪异一幕。

夜幕来临时，星星点点的灯火把这寂静的村庄点缀得愈发诡气，平空添了许多鬼眼似的。时间一分一分地流过去，偶而一声沉闷的狗吠也让栾宅内的人心跳加速，仿佛杜立三真来了，忙不迭地端枪吆喝，“注意啦！注意啦！”庄子里的人们纷纷动将起来，一阵搜索，又慢慢地沉寂下去，恢复到黑夜里，只是死寂一般的黑暗，压在每个人心头，如此两次三番，折腾得人们极度紧张。打更的敲过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空旷的声音在整个黑暗里回荡，像鬼魂不散似的绕在每一处宅内。终于，梆子不紧不慢地敲了五下，五更到来了，黑夜也正在退去，整个栾府中的人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今天平安过去了，菩萨保佑。府内的女眷就合计着明天该怎样补庆一下，孩子们该如

何玩耍了。紧张了一夜的栾七爷眼皮立刻耷拉了下来，他打着哈欠对亲信说：“啊啊，你守着，我睡去了，要小心点。”他钻入被窝就入了梦乡，鼾声震天响……家丁护院也都暗自松了一口气，有的人都快迷糊过去了。难道杜立三不来了吗？

不，他早到了。不过既没有骑马，也没有带很多弟兄，只有刘海青等十二个过得硬的伙计随着，悄没声地早在上半夜就来了。但他没动手，他早料到栾佐廷会防范得很周密，他也了解一般人的弱点，紧张过后便会懈怠，所以他不声不响地埋伏着。五更过去了，杜立三朝左右弟兄们一使眼色，一行十三人把枪别在腰间，赶到四门紧闭的栾家大院前，一扣铜门环，大声叫道：“给七爷拜年来了。”栾佐廷的大兄栾大爷迷糊间听到有人高声叫门，不疑有他，以为是其他码头上的人给栾七爷拜早年来了，所以蒙头蒙脸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杜立三哪容他哆嗦，快手给他一梭子，可怜栾大爷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了鬼门关。然后，十三人一拥而入，众枪齐发，栾家护院的别看平时耀武扬威的，可一碰上凶悍的杜立三一伙，就成了泥捏的了，加上折腾了一夜，睡眠不足，精神振作不起来。因此，双方一交手，栾家护院的就慌成了一团，放了几枪，稀稀拉拉地抵抗了一阵，就且退且走，各人顾各人生死去了。杜立三长驱直入，径奔栾佐廷卧室。栾佐廷刚沉入梦乡，乍然听到杂乱的声音，正迷糊着，杜立三已经带人冲了进来。杜立三一见栾佐廷死睡在炕上，一把把他前胸揪住，“老狗，起来看看我是谁？”栾佐廷此时早已吓得魂飞天外，瞪着两个死鱼眼珠子不知所措，连饶命都不会喊了。杜立三“啪！啪！”两个耳刮子把他煽倒，“今日就叫你还了我兄弟的帐吧！叫你勾结老毛子，死有余辜！”栾佐廷知道自己已是死路一条，因此一声也不吭。杜立三一摆手，只见后面十二把枪举起来了，十二颗子弹只把栾七爷打得遍身开花。

杜立三血洗栾家庄传开后，不少绿林人物引为奇谈，对其表示敬服，杜立三杜天意的名声也就更响了。

#### 4. 包打洋人美名传

杜立三无法无天，谁也不放在眼里，若是天王老子惹了他，他照样抡起家伙跟天老爷过下去。但他也有一桩好处，让人们至今还记着，那就是“包打洋人”，曾在辽河岸边打得俄国鬼子鬼哭狼嚎。

杜立三是怎么赢得这样一个名声的呢？

其实，从东北绿林的源流也可以看出，东北民风强悍是真，但真要是做匪，大部分是官逼的、外国侵略者给激的。杜立三出身绿林世家，他的父亲和三个叔叔都是胡子出身，尤其他父亲杜宝增，在清末是专劫“皇纲”的绿林好汉，很讲义气。杜宝增玩世不恭，杀官济贫，仇恨洋人，见了俄国鬼子就生气，冷不丁就要杀一两个，宝增的老婆也鼓励丈夫这么干。杜立三是个孝子，很听母亲的话，认为不能违背父亲的愿望去和俄国鬼子勾搭。当有的帮会头子投靠俄军充当走狗并派人来拉拢他的时候，他不管来人提出怎样优厚的条件，一点也不为所动，冷冰冰地说：“杜某是顶天立地的硬骨头汉子，不能干那些没廉耻的营生！”这样一来就激怒了俄国佬。当栾佐廷勾结俄兵袭击来遂以后，杜立三越发地与俄国佬作对了。杜立三组织了一队精干人马，准备与俄军大干一场。一次，他带领这帮人马，偷偷地埋伏在俄军驻地。天一黑，俄国鬼子闭营灭了灯火，开始休息。杜立三一挨他们鼾声大起，派人摸到草料房和马房，放了一把火，同时指挥人马，急速偷袭，俄国鬼子糊里

糊涂被杀了十几个。俄兵一看外边通红火亮，不知有多少人在围攻他们，也慌了手脚，大冷天的，穿衣戴帽也不利索了，在黑暗中磕磕碰碰挤作一团，叽哩咕噜地互相埋怨。这么一下子，杜立三又得手好几个，然后唿哨一声，全帮人马不慌不忙往后撤……。

清晨，俄国鬼子一点数，死了二十多，伤的也不少。俄国兵还从来没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不敢再驻下去了，赶紧跟上边打报告，坚决要求退回大连。

当地老百姓那个高兴啊，欢天喜地地制了个大红匾来谢杜立三，并送他一个绝美的称号：“包打洋人杜立三。”杜立三也感到从来没有这么美气过，做胡子当马贼，固然也有手下兄弟的奉承拍马。也有敬佩和赞扬，但是受到一般老百姓如此衷心的感谢；还是头一回。过去百姓提到他的名字只有摇头和诅咒，今儿却抬着大红厦来赞他。杜立三当着众百姓的面就说开了：“我杜天意好歹是地方上一人物，俄国鬼子横行乡里，跟大家过不去，我杜立三要跟他们讨个公道！”

从此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不少人慕名来投靠他，为的是和他一起杀洋人。最多的时候，他的队伍有过上千人。

时隔不久，俄国鬼子得知那夜偷袭是杜立三所干，气得咬牙切齿，发狠非报此仇不可。

杜立三早有所闻，他不动声色，暗中又组织了一次战斗，那一天，杜立三从各队精心挑选了七八十名精干骑射的弟兄，骑着快马，携着短枪，埋伏在辽河岸班的堤坝后，只等像上次那样趁黑夜无光，杀他老毛子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俄国鬼子加强了戒备。杜文三等七八十人潜伏在堤坝后，虽说都有经验，但毕竟人多马杂，一不小心咣当弄出一声响，被俄军巡逻队发觉，“哒、哒、哒……”鸣枪射击，并发出叫喊和警报声。杜立三一看事情紧急，下令让大家准备应战。俄军从营中搬来大炮，向堤坝射击，一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杜立三根本没办法反击。他一看精形不好，急今后撤，却不料又遇上了俄军马队。原来，俄国鬼子也学得精乖了，在发射炮火的同时，派了一部分骑兵偷偷绕到杜立三的左侧。这一下杜立三可吃了大亏。大凡胡子作战，宜胜不宜败，败了就全无斗志，一窝蜂地只管逃命。杜立三部下虽然强悍，但此次却慌了手脚，拼杀一阵也就退了。这一战，杜立三部下死伤三四十名。杜立三率残兵败将逃回，俄兵也不敢深追，怕杜立三半途杀回马枪。

杜立三回去一想：这样干不行，我的部下虽然作战勇敢，但毕竟抵不过俄国蛮子的精良武器，不能跟他们硬拼硬斗，只能巧取。

后来在与俄军的冲突中，杜立三改变了打法。他把队伍分成小队，各队由一首领统率，这样行动起来，就机动灵活多了。杜立三每次出去带上几队人马，突然地出现在敌军防备薄弱的地方，冷不丁地偷袭一下，打了就跑。就这样忽隐忽现，出没无常令俄军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对他毫无办法，任由他来来去去。俄军深感杜立三厉害，对他百般警惕，每到一处，遇到中国老百姓便问：“杜立三有没有？”老百姓也借着“杜立三”的名字来吓唬鬼子，会说一点俄国话的就讲“也西（俄语“有”的意思）！”不会说的就作手势。俄国佬一见，马上离开此地。因着这个缘故，不少村镇得以保全，当地百姓都对杜立三佩服得不得了，把他当作大英雄来敬。

这样相互斗了一两年，俄国鬼子死了不少，杜立三也时有伤亡。这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了，俄军在旅顺吃了败仗，龟缩在

城内，死守待援，沙皇政府接到求援密报，派了一队强悍的哥萨克骑兵

南下救援。这一队哥萨克骑兵，对日军威胁很大。日本鬼子竟想出一个法子，叫中国人组成什么“东亚义勇军”，专收编那些胡匪、马贼，来对抗俄国人。当时“东亚义勇军”的头目是冯麟阁，他是辽西一带绿林元老级人物，为了讨好日本人，他四处招兵买马。

冯麟阁瞅准了杜立三，他看到杜立三对俄国人的威慑力，心想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力量，于是找上门去。杜立三本不想见他，对他所提的也没有兴趣，但冯麟阁是以前辈的身份来见的，依着绿林的规矩，杜立三不能拒绝。冯麟阁并不直接提出条件，而是说：“天意，我知道你不想和日本人有牵连，但是呢，你现在总不能两面都开火。你一个人对两家，危险太大。俗话说，事情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你先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打击俄国鬼子，至于以后的事，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杜立三拎起手中的枪看了看，当即说道：“好！只要依我两条：第一，我不受谁的管辖，日本人也甭想；第二，必须保证枪支弹药的供应。答应了，我准保把俄国人赶出东北地面。”冯麟阁喜道：“就依你。”

杜立三得到援助后，立即带领手下马队北上，到了洮南府，和哥萨克兵正好遇上。杜立三见他们以新式枪炮装备，又非常勇悍，当即决定不打计划好的阵地对垒战，而采取以前的灵活战术。他命令全体人员编成几队；每从三十几人，成纵列，快速直冲过去。俄国人乍遇这么一队人马，还以为是日本人，便急忙摆开阵势，架起大炮。杜立三带着马队冲到阵前快到射程内时，突然勒马急转，走偏锋，冲向两翼，疾驰而过，俄军被这一招弄得昏头昏脑，还以为这队日本人怕了他们，于是收起大炮继续前进。杜立三在这一漂亮的穿插战术之后立刻集结队伍，悄悄地在哥萨克骑兵后面跟住，等到距离很近时，忽然快速突进，接近敌人，抽出大刀，展开肉搏。沙俄骑兵猝不及防，来不及调转马头。纷纷在背后中刀。杜立三一俟得手，并不恋战，抽身便走，俄兵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但杜立三并不罢手，重新聚合了队伍，又如法炮制……如此几次三番，哥萨克骑兵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一点斗志也没有，只要远远一见杜立三来了，马上绕道避开而行。就这样，哥萨克骑兵没有按时到达。缩在旅顺的俄军海陆部队经不起日本人的围困，全军溃败。杜立三经此一战，名扬东北地区，人人都知道有个“包打洋人”的杜立三，许多轶闻旧事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直把杜立三吹嘘得神猛无双。多年以后，杜立三的传奇故事被艺人改编加工，从辽河两岸到小兴安岭，在民间流传甚广。

#### 5. 年少无赖是宵小

张作霖祖先是河北河间人，本也不姓张，姓李，因为过继给张家而改的姓。道光年间，他的曾祖张永贵被迫出关谋生，定居于辽宁海城城西小洼村。他祖父时已比较富裕，所生四人都没病没灾的长大成人。张作霖父亲张有财是第三子，他先娶妻邵氏，生有一子一女，后被他气死；继娶王氏，生二子，大的是张作孚，小的就是张作霖，小名是“张老疙瘩”。1875年他出生后不久，张有财搬到海城驾掌寺开了个小杂货铺。

张有财生性不成器，好赌如命，天天在外边鬼混，放赌抽红；赢了就大吃大喝，输了就卖东西，对家里的死活根本不放在心上。张作霖14岁那一年，张有财在栾家堡与人赌钱，对方有一个姓王的输了，张有财要人家拿老婆抵债，双方发生口角。那姓王的也不是软的，他怀恨在心，偷偷跟着张有财，半路上乘他不备，一脚狠命踹死了张有财，将其尸体拉到一个荒废的池塘边。



王氏见张有财好几月没回，慌了神，到处找，据说最后还是他家老黄狗发现了他的尸体。这时，他家里穷得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只得草草掩埋在乱坟堆里了事：孤儿寡母上告无据，事情就不了了之。后来王氏又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改嫁了一个兽医。

张作霖从小就是其母亲的宝贝疙瘩，一直被偏爱，小时候在邻里伙伴孩子中称王称霸，发号施令，动不动就拳脚相加，邻家孩子都怕他，谁都不敢惹。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父亲张有财赌博负债累累，无力供他上学，母亲让他放猪以补贴家用。张作霖看见昔日的伙伴一个个比自己有“出息”，有学上，心里十分嫉恨，常常在道口拦截他们，辱骂威胁他们，有时还闯进私塾，是个谁见了都头疼的“捣乱分子”。但他比较机灵，那私塾先生看他闹也不是办法，就采取“文治”，让张作霖来免费上学，因此他好好歹歹有点文化，识得几个字。

张作霖聪明狡黠可以通过一件小事看出来。父亲死后，他随母迁居黑山县依靠外祖父过活，日子过得很艰辛，欠了邻居不少债务。王氏很是发愁，常常唉声叹气。他看在眼里也不言语。有一天，他乘邻居不注意，偷偷溜进人家猪圈，把其最肥的一头带崽母猪赶入水塘。然后大叫“猪落水了，猪落水了……”等到那家人都奔出来看时，他早一个猛子扎进塘池里，将那淹得半死不活的母猪托上来。那家人见他如此卖力，心下好生感激，就将他家的债给免了作为谢礼。

后来他母亲改嫁给兽医后，他跟随继父学了点粗浅的兽医知识。

张作霖 16 岁那年跟随一个商人到了高坎镇，在那里开始了他人生的转折。在高坎镇，他没有固定的职业，跑跑腿，打打杂，谁家有活就让他去帮忙，因此常常是三餐不继，当地有个富户孙寡妇，有三十多长工，专门开了一间饭厅供长工用，张作霖时常混进去白吃，开始长工们都向着他为他遮掩，后来便讨厌他了。但孙家寡妇是念佛的，心软，不计较反而特让他白

吃。

后来他又到另外一个姓樊的财主家打长工放猪，因丢了一头，樊大户把他打得半死不活，又不让死在他家里头以免霉运，把他扔到野外，被一个拾粪老头救起。

他在家就染上其父赌博恶习，在高坎镇变得更加厉害，一天不赌博就没法过，他在赌场结识了一个富户叫于六。于六觉着他人机灵，又有点医马本事，于是跟他开了一家医马小铺子，倒也赚了不少小钱。但他暗地里和于六老婆有来往，有一天，这女人收拾了细软叫张作霖一起逃跑，张作霖跟她说：“嫂子，张某不负朋友义气，于大爷对我好，我不能坑他。”女人怀恨在心，在于六耳边吹风，于六最后也把他赶走了。

后来他又在一家车马店里干活，他腿快人机灵，嘴又甜，认了主人常老三做父。在店里他端茶送水，细心观察，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知道了不少社会上的事，对黑道人物也颇为熟悉，为他以后进入绿林奠定了底子，但他恶习不改，依然出入赌场，而且调戏当地一恶霸的相好，惹来一场大祸。那恶霸追到赌场，拿刀就朝他砍，张作霖乘众人拦阻的当儿跳窗逃跑，那恶霸追到卒马店里逼常老三交出人来，常老三把他给藏在一堆行李货架里。后来张作霖又到外面去躲了几天风头，常老三请一些吃得开的人物劝架，好不容易把这笔帐结了。

张作霖输钱就借，再不就赖，当地一些赌棍很不满，有一天故意串通起

来坑他，叫他输得一干二净，而且欠了一屁股还不完的帐，借这个缘故把他赶出了高坎镇。张作霖回到常老三的小店子里，说明了窘况，常老三见义子实在无路可走，就把自家的一头小毛驴给他，叫他出外讨生活，那伙赌棍、无赖和地痞流氓听说张作霖是骑驴走的，就赶到常家小店大吵大闹，让常老三把驴子收回来，把衣服给扒了。常老三被那伙人闹得没法，就骑马去赶张作霖。张作霖见干爹骑马过来，心想不会是好事，于是就先发制人说道：“干爹，这么大的雪天，您老人家可别冻着，干儿以后报答您的大恩。”常老三一听这话，心也软了，原话也不好说出口了，于是转口说道：“干爹看你衣服单薄。想送你我身上穿的老羊皮袄，别冻伤了。”张作霖赶紧接过，少不了又对常老三说了一通感谢的话。据说后来张作霖发家，曾送常老三两张狐狸皮和两匹高头大马，还曾把他接进大帅府，把他当上宾。

张作霖离开高坎镇后，游荡了一个时期，后来经人介绍，投到毅军宋庆手下当兵。给一个叫赵德胜的营管带当勤务兵，后来升任哨长。在这里他学到一手好枪法。“精干骑射，善于迎合”是时人对他的评语。这期间他二哥张作孚犯事被押在省城，张作霖前去营救。他听说当时的盛家将军依克唐阿的爱马病了，计上心来，他不直接去找官面上的人物搭救，而是进了将军府，替依克唐阿的马治病。马病好后，主人赠钱物他不要，只求将其兄放了。正当他混得得意、上下皆欢的时候，这支清军要移防关内，张作霖不愿离开，而且也不愿受纪律管束，于是私自逃回黑山。

回家后，他身价顿时高了起来，他自吹自擂，招摇过市，十分得意。赵家庙的一个地主赵占元见他有几分才干，便把次女嫁给了他。其实呢，张作霖早年当小货郎走村串巷时就和这个赵氏女见过面。年轻的张作霖是颇为英俊的一个人物，薄唇细目，挺拔鼻梁，在女人面前很讨喜欢，赵氏女一见钟情，很有好感。张作霖与她很快结婚，婚后住在岳父家里，但他不甘寂寞，仍旧出去耍钱，岳父赞助他干兽医，他干了一阵嫌钱少，干脆靠赌为生。

后来有人告发他二哥张作孚和他通匪，让官府把他们给抓起来。原来，他二哥张作孚也是流氓胚子，外号叫“揭宝的”（在赌局里为“宝局”揭宝）。因为有一次与人吵架，吵得很凶，这人就把他俩告了。官府也知张作霖与匪帮交往很密。于是以“通匪为匪”的罪名把他给抓起来了。赵氏女在家软磨硬泡她家老爷子，哭哭闹闹让赵占元花钱打点救出张作霖，赵占元没法，只有忍痛出钱了事，把张作霖训了一顿。

但他出狱后，仍是不务正业，赌得更狂，地方上的无赖地痞和草莽英雄，都喜欢和他交朋友。有一次他又赌输了，无钱还债，他就想办法去偷人家的猪，结果给逮住，受了一顿辱骂，他感到很没脸面，无地自容，抬不起头来，于是下决心去当土

匪。

最先他找到在高坎镇车马店认识的冯麟阁，想投靠他，但冯麟阁不愿收留他，只叫他去另外一小匪帮董大虎处入伙。他作“胡子”主要充当“兰把子”，负责“看票”，他感到没意思，久居人下不是滋味，后来便脱离了这帮，自己独干。

## 6. 草莽之中斗龙蛇

1900年，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正当中华儿女奋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之时，沙俄借机派出大量兵马疯狂侵略我东北，日本鬼子也前来骚扰，一时之间，东北战乱频频，民不聊生，胡匪马贼更是横行无忌。辽

河沿岸地主绅商，为保卫自己的家财，纷纷建起了“保险队”之类的地主武装。实际上，这种“保险队”往往与土匪勾结在一起，名为“保境安民”，实则是在劫掠为生，只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危害本区居民，但却索要高额的“保险护费”。当时著名的匪首冯麟阁就与黑山县齐家堡劣绅串通成立“保险队”，附近小匪帮纷纷加入。

张作霖见“保险队”生意兴隆，心里也萌发了这个念头。他叫岳父赵占元帮忙联络附近有钱富户，由他们出钱帮他成立“保险队”。赵占元觉得这样很好。于是，在赵占元帮助下，张作霖招兵买马干了起来，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张作霖颇懂心机，平时不乱抢乱夺，有别的胡匪马贼来搅水，他凭过去的联系和用灵活的手腕都给妥善地解决了。因此他的势力范围扩展很快，最后把营盘扎在了安堡镇。

这时，为争夺地盘他和另外一匪帮的头目金寿山发生了冲突。

金寿山有一百多人，兵强马壮，势力比张作霖强大，而且还暗地里投靠了俄国人，后台硬，据说当时沙俄侵略者要他“招安”张作霖。张作霖这时还有点良心，不愿为虎作伥，更不愿受沙俄牵制，因此回话金寿山说：“我家的事你管不着。”金寿山受了难堪，心有不甘。

金寿山帮甚至在他保险区内都勒索强抢，比一般匪贼都厉害。当地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暗地里相邀张作霖打他。一天，当地人趁金寿山防备疏松时，派了一人到安堡镇通风报信，张作霖闻听大喜，马上命令手下整装出发，一行人马火速开拔，急袭中安堡。金寿山投防备，冷不丁地被张作霖打了个措手不及，人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不到半数随他逃出中安堡。

金寿山火冒三丈。他把张作霖视作不共戴天之敌，恨不得剥了张作霖的皮。他整日里绞尽脑汁，计划着如何消灭张作霖。他手下的一个喽罗记在心里，有一天到金寿山的跟前，献了一计。金寿山收这人为干儿子，不久派他去“投靠”张作霖。

张作霖高兴地接待了这人。因为土匪被仇家打散后，散匪往往投靠另外的一伙，也有加入仇帮的，因此张作霖一点也没有疑心有诈。金寿山的干儿子就这样在张作霖手下干起来了，样样挺出色，很受张作霖的赏识。转眼到了来年春节（1901年2月），张作霖欢天喜地准备过年。张作霖笑容满面，觉得自己诸事顺遂，打跑了金寿山，平定了中安堡，老婆又为他生了一女，而且，弟兄们一个个身手不凡，能骑善射，自己是稳坐了这一方的太岁爷。张作霖高兴，也就放心让部下去闹。金寿山的干儿子瞅准了这一好时机，心想张作霖平时防备比兔子还机警，今儿却这般麻痹大意，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于是借机溜出安堡镇，赶到金寿山处。金寿山一听大喜，连叫“好功劳，好功劳”，赏了这干儿子大宗钱财，然后马上集结匪军，并且派人通知沙俄侵略军，要他们和他一道血洗张作霖的二柳子。夜半时候，安堡镇枪声四起，张作霖从好梦中惊醒，也辨不清东南西北，急急慌慌也不知是哪路人马来犯，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拔起盒子枪仓惶突围，危急之中，只有汤宝麟、孙大虎两个亲信在他身边。他的妻子赵氏由汤宝麟背着。女儿由孙大虎抱着，一行五人边走边打，好不容易在天大亮的时候跑到了台安北面的姜家屯。张作霖看了后面已没有枪声，追兵也不见踪影，决定进村再作打算。这村子很小，人们见这五个人这副狼狈落魄的样子，心知是匪，但是想到狗急了也跳墙，况且是打败的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村里人怕张作霖发狠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商议来商议去决定还是客客气气招待这伙人，大家派一个读书人名叫

赵贡九的出面去安抚他。

不久，失散的人马陆续汇集了，但枪马都给金寿山夺了，元气很难恢复。张作霖想到过去在台面上结交的另外一帮人马洪辅臣部和陈印堂部，便去求援。洪辅臣、陈印堂与金寿山也有嫌隙，因此慨然相助这位小兄弟，给马给枪以外还赠送了一大批钱财、物资。张作霖对此感恩不尽。

张作霖感到姜家屯不是久居之地，便想去投靠冯麟阁，他把赵氏母女送到他岳父的堂侄孙家，赵氏在此生了后来赫赫大名的张学良，张作霖很疼这长子，常称他为小六子。从姜家屯到冯麟阁处要经过一个大集镇八角台。当时八角台也有团练。张作霖估计硬闯不得，通过和赵贡九交谈，知道他和八角台的头面人物张紫云有交往，于是央他告诉张紫云准备“借道”。张紫云是八角台商会会长，是镇上烧锅的财东（当时烧锅很有财势），读过书，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大事小事都由他点头，他手下的保险队有炮手30多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大汉奸的张景惠就是炮手头目。此外还有洋炮、快枪等。当时张紫云问送信人：“张作霖有几人？”那人受过张作霖的嘱咐，按预先教好的往多里说，就回答有四五十人。又问：“背什么枪。”那人答道是快枪。张紫云一听对方有四五十人，而且人人都有快枪，心里没底，于是招张景惠来商量。张景惠也以为人单力薄于不过张作霖，又听说张作霖在安堡镇时纪律很好。大家伙都不主张打，最后不但让借道，而且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张作霖本来是落难的老虎变为犬，但是时来运转，因祸得福，反而捞得更大好处。

张作霖的人马平安进了八角台。张作霖也是竭力周旋，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打点得很好，人称“万人喜”，可见他如何受欢迎。张作霖能说会道，聪明机警颇得张紫云好评，并引为知交，竭力留他，叫他休息几天，并把他的的人马安排在自己的家里和铺子里。过了两天和张景惠商量后，又请张作霖留下来保卫地面。张作霖初时以为“鸠占鹊巢”，名声不好，推辞了一阵，后张紫云说：“你的能耐胜俺十倍，第一把交椅非你坐不可。”张作霖这才接受。两人还结成了生死之交，一直相依为命。这次收编为大团，张作霖手下有70多人，商会出钱养活他们。

张作霖在八角台安营扎寨后，对于当地百姓不怎么危害，但是经常外出劫掠。在这过程中，他也逐步收编了一些小股匪贼，也有一些人主动来投奔。

当时台安一带有一帮回民土匪，头子叫项招子，有200人马。他把八角台视为自己嘴边肥肉，怎容张作霖称王称霸，隔三差五就与张作霖干上一仗。张作霖力量没有他大，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撤到镇安县，求助另外一个土匪头子汤玉麟。

汤玉麟也是赌棍出身，而且是个赌命的家伙。据说有一次他在赌场赌输了无钱还帐，几个地痞轰他，他一言不发，转身到铁匠铺子取来一根烧红的铁通条，撕啦一声裂开衣服，拿起它就往身上烫，一面烫，一面笑骂到：“谁要爷的钱？谁过来把爷的熟皮肉拿去？”周围的人吓得直打寒颤，见他如此赌狠，都知他是亡命之徒，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反而献钱去孝敬。汤玉麟有狠赖的一面，也有讲义气的一面，听张作霖一说，马上答应借兵相助。

汤拨出四五十人跟着张作霖进攻项招子，一场恶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眼珠子都红了，终究还是张作霖杀了项招子，转危为安，此后，张作霖在这一带就没有什么强的对手。这时候锦州泥水匠出身的张作相带来一帮人马前来投靠，不久汤玉麟帮因为和别的匪帮火并失利，也率部前来投靠。一时间，

八角台的“保险队”声威远播，名声大振。张作霖为了面子上好看，决定把他的匪帮按军事编制行事，出入之时，队前都列有洋鼓洋号的乐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再打上一竿“保境安民”之旗，煞有其事似的，威风得很。

附近各部小匪都不敢招惹他，但有一个偏偏不服气的，人称海沙子，他故意在八角台一带出没活动。开始张作霖还忍着，海沙子以为他怯了，胆子也就越发大了，有一回竟公然率100多人到半拉山门抢了一家士绅，把那家的老太太绑了“肉票”。张作霖闻讯，拍桌子大怒道：“也欺人太甚了。”于是派张景惠率一部分弟兄在半道上堵住了海沙子，经过一场血战，当场击毙了海沙子，那老太太也被送回来了。

至此，张作霖帮更是声名远括。就连清政府的官兵，一提起张作霖部，也畏惧三分。

### 7. 通天有术投大清

从现存的一些资料和照片看，张作霖并不像我们一般想像中的土匪或军阀模样，肥头大耳、满脸横肉、一身杀气，不学无术、言语鄙陋，一味蛮横。张作霖年轻时长得颇为清秀，很像一个文弱书生。他的早年经历和在当“保险队”头领过程中，渐感到如果要发展自己的努力，单靠抢边和抽税捐、勒索当地百姓不行，迟早会被人家吃掉，还必须取悦于当地豪绅，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他通过张紫云和一些名士来往密切，如海城“孝廉”出身的刘春良（此人一贯为非作歹，和许多土匪头目都有来往），台安“孝廉”出身的李雨农（又名李龙石），秀才杜泮林（又名杜恩波），还有附生陶允恭，方克猷等。这些所谓“文士”是东北特殊人物，既学孔孟之道，懂“礼”守“道”，又和江湖之士互通声气；他们诡计多端，能说会道，历史知识丰富，有些人往往成为匪帮之间的中间人，常常一句话就可以消弥战祸；有时发生了冲突，也是由他们出面安排，做说客或调停人。这些人头脑活络，结识人物很多，在本乡本镇也是有点势力的，有的甚至是一方首脑，一般小匪都不敢轻易伤害他们。张作霖对他们很尊敬，年轻的称兄道弟，年长的不是拜作“干爹”，就称“义叔”，叫得十分甜，来往很热络；这些人也投桃报李，经常为张出谋划策，成为张的“智囊”。除此之外，张作霖还广泛结交豪富，如新民烧锅彭学根、八角台富商戴春荣、新民厅的红人赵经丞。由于他“护卫”有方，商会每月支给他白银三千两充饷。

正在这时候，义和团运动失败了，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镇压各地的反抗，辽西土匪很多，颇使清廷头疼。新民府的一个官儿廖彭就向盛京将军增祺建议：化私团为公团，收编保险队，补充官军之不足，以加强地方统治。增祺采纳了这项建议，指示各府各县着手收编。

张作霖身边的商绅文人得知这个消息，就劝他说：绑架抢劫是末道，现在十室九空，差不多快给抢空了，商人旅客都不来了，将来抢无可抢，不如趁早改换门庭、得到清廷厚遇，将来之事或有大希望。张作霖也是深有机谋之人，认为“言之有理”。他对他的亲信说道：“清廷和洋人订了约，俄国佬滚回去了，清廷很快就会来收拾咱们了，我们吃绿林饭是不会长久了，咱们不如借机捞个官当当，也好有个前途。”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也有同感，于是急问怎么办？张作霖却笑着说：“各位有没有听说盛京将军增祺的夫人将要经过咱们地面？”几个人大惑不解，有人就说了：“大哥，咱既是要投了，难道还劫她不成。”张作霖又笑了：“别傻笨了，增祺这鬼头在庚子事变拖家带眷的躲到锦州、义州一带。后来他自己先回去了，却把他老

婆给留下了。这些日子想起来了，已派人去接，不日正会从此经过，众位兄弟听我吩咐，咱把人财物都给劫了，但是不要动他们一根汗毛，听清楚了，不许乱动。剩下的好戏就让我来演吧！”如此这般一说，众人大笑，纷纷翘起大拇指赞道：“大哥，好计”、“当家的，可真有你的”、“咱兄弟有你不用愁啦……”张作霖也随众人放声大笑。

张作霖这帮人候了两天，周密地布置好怎样下手，上上下下都是一团热闹劲儿。第三天“放远线儿”的探马飞马来报：“增太太已到新卫屯前一站了。”张作霖一听，拍掌大笑到：“天助我也。时候到了，弟兄们备马去吧。”他带着一帮得力干将就出发了。原来新卫屯一带草深林密，又靠近荒山老林，中间有一条通道是过往行人必经之地，以往太平年间，来来往往商人结伴成行；灾乱时候土匪横行，见一个抢一个，见一队抢一队，闹得大家伙儿谁都不敢走，因此道儿也就荒了。如今增夫人选走了这条道走，不正是撞上来了吗？张作霖令众弟兄蹲伏在草丛里，只听他令下就冲出去。

增祺夫人带着七八个丫环婆子并小厮儿，坐着一辆大车，前面有增祺派来的护卫，后面也跟着几个亲随，还有马弁押着的几十箱子衣物、财宝。这些人也没有想到会遇劫，哪个敢在盛京将军面前虎口拔牙，除非不要命了。况且还有这么四五十个带枪的护卫。这一队就这么顺溜着过来了。张作霖一看时机已到，叫一声：“上！”增祺夫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周围突然“哗啦啦”钻出来一群骑着马、挎着枪、横披衣衫的徒众，丫环婆子早已吓作一堆，糠筛般缩成一团，有几个胆小的吓得放声大哭，缩着脑袋往人堆里钻，还有的大叫：“爷，饶命吧！”也有的大叫“救命啊”。一时间乱成一团，其实，卫队头头和几个机警的侍卫已经拔枪在手，但是张作霖早有准备，呼啦啦一帮人早把他们围在中间，四五支枪指着一个，那卫队头头一看：没戏唱了，打吧，注定要吃亏，而且投鼠忌器，后面还有增夫人哪，有个闪失咱担当不起；不打吧，也太窝囊了，不放一枪就给人家连窝端了去。这么一迟疑间，早被张作霖部下给下了枪。其他人一看：还干啥子呢？张作霖一见大局已定，结果很好，他暗地里吩咐心腹，要他们小心侍候，不要弄僵了，好歹都要把他们哄住。他自己带着几个随从，先行骑着快马回到街子上，先去换了一身衫，还修整了一下容貌，然后坐在中堂之上，他那副样子，使周围的马弁都很吃凉：想不到我们当家背后还有另外一副面孔。张作霖吩咐手下把以前劫来的最好的鸦片烟拿来，装在上等烟枪里。

不多会儿，就听见门外车马喧闹。张作霖心知手下已把增夫人押到了，于是迎了出去。增夫人和几个随从都有点莫名其妙，闹不清这到底是些什么人。要说是劫道的土匪吧，可一路上也没有打骂，也没有抢她东西，而且和她搭过话的人都言语和善，丝毫也看不出为匪为盗的蛮横。增祺夫人心里正猜想着呢，却迎来几个年轻妇女，穿着很随俗，把她们给迎入一间房舍里去了。这几个女人看样子很安分，也颇懂得些礼节，很恭敬地招待她们，为她们打扫，弄吃的和安顿东西，一点也没有什么捏扭不安的样子，倒像是自己家里的使唤仆人。增祺夫人心里疑团更大了，随从也是惊疑参半，有的疑疑惑惑的还在担心，有的却满不在乎，抱着生死随命的态度。增祺夫人也是大家闺秀出身，丈夫是盛京将军，场面自也经历了不少，心里略一定，把那几个帮忙的妇人叫来问道：“辛苦诸位大姐了，可否告诉我们贵主人尊姓大名，好让我亲谢一番。”妇人中有一嘴快的，马上说道：“夫人，您甭急，我们主人不会为难您，您只管安心好了。”另几个妇人也帮腔答道：“是呀，我

们家主人很知礼的，夫人您就好好歇息吧。”增祺夫人心知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也就作罢。

前厅里，张作霖把增祺卫队带进早已准备好的一间大屋里。那些人进屋一看，大炕上一横排的都是鸦片烟枪，识货的还看出是上好的货色，原来清军里几乎人人都是烟鬼，增祺卫队也不例外。这些人莫名其妙，只听张作霖说道：“诸位，请。”自己就首先上了炕，他带头作了样子，大家也只好上了。一时间，整个房间里喷云吐雾的，一片乌烟瘴气。卫队的人一直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气氛不知不觉变得很轻松，大家都开始搭话了。张作霖不失时机鼓动嘴皮，说了不少笑话，众人觉得很有趣，竟然都笑了，根本忘了身处何地，也都跟着讲了一些。过了一会儿，话题渐渐扯到时局上头，张作霖首先重重叹息了一声，好似满腹愁闷的样子，很痛惜的说道：“咳，现在国家衰败了，我做百姓的也有些责任呐，受尽了洋毛子的欺侮，民众又软弱，国家也没有办法，我们被逼不过，才走上这条路，可是心里也是有愧，觉得没有颜面去见祖宗，愧对大清天子啊。”这番话一说出来，增祺夫人的卫队诸人听了，觉着其中大有文章，一个小头目就问道：“打扰贵府多时了，只是还不知道您贵姓；我们很是明白您的处境，待我们回去之后，我们家老爷也许会替您想个法子，您终将有出头之日。”老张听了这番说，心想：有门子，但表面依然很平静地说道：“不敢当‘贵’字，殿名就是张作霖。”这话一说出来，几个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增祺手下都知道辽西有一巨匪叫张作霖。据传长得身魁膀大，力壮如牛，满面疤痕，十分凶狠，谁也不敢惹，增祺都显得头疼。可跟前这白面细眼，说话文质彬彬，温和有礼的人说他是张作霖。一时之间，满室沉寂。还是那个头目，率先转过弯来，说道：“久闻您的大名，想不到今天竟是一见如故了，和传说中的竟是大不一样。我看您更像读书人呐。”张作霖于是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会走上绿林，其中他自然略去自己的劣迹，把话说得冠冕堂皇，最后说道：“我虽然落到了这一步，但并不是像别人一样，聚啸凶徒，强霸一方，正如您老看到的，我还是很向善的，保护这一方百姓，为过往商旅提供方便。只是最近听说盛京将军增祺到任不久，听信恨我的人的谗言，就要拿我们严惩法办，将军大人高台在上，我们山泽草民背上这罪名有口难辩。不过我们既是干这种事的，也就豁出去了。”头目略一思索说道：“常言说得好，鸡蛋碰不过石头，自古邪不压正，我看同官家作对，十有九个没有好下场，不如走正道。依我的眼力，看得出您是个人才，何愁以后役个好前途，说不定封妻荫子，做到侯爵呢。”张作霖假意默然半晌，也说道：“我们兄弟都想过这么干，弃暗投明，报效国家，但是苦于没有门路，现在增将军这么做，我们更是无法表白自己的心意。”这头目就答道：“您有这份心就好了，我们或许可替你引见。”张作霖故作惊讶，忙问：“大哥，此话怎讲，难道大哥您有法子不成？”这人说：“我得回禀太太一声。”于是这人立刻到后房见到增太太，把前因后果叙说一遍，并称赞张是个人才，增祺太太正愁不知如何脱身，听到这消息，心里盘算：现在我们在人家手里随人家怎么捏，而且听丈夫说过这人是土匪霸王。他若真有这等心思，我替他讲几句好话，收降了也未必不可，况且听得说这张作霖和传闻中竟然毫不相像，却是一名二十六七的温良青年。增祺夫人略略和随从商量了几句，那几个婆子丫环也怀着好奇心，都主张一见，事情就定了。那头目就去回话了。

张作霖一入室，先行了个大礼参拜，并低首说道：“张作霖冒犯夫人，

愿听吩咐。”增祺夫人细一打量，看他果然不同想像中模样，而是恭谦有礼，心里便有了数，于是开口说道：“我也不用瞒你，我就是盛京将军增祺的夫人。我原在将军身边，听说过你的名声，现在巧遇相逢，多蒙照顾，我们很是感谢，而且，也见你和别的匪贼不一样。听说，你有心改邪归正却无人引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向增大人进言的。我看你年纪还很轻，是个人才，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就不要在这小小山沟里混事了。”张作霖立即答道：“如是这样，我们兄弟就有希望了，我替我们大家伙儿谢谢您啦，以后驱遣，当效犬马之劳，报答夫人您的大恩，以前若有所冒犯的话还请夫人宽大方怀，不要计较。”增夫人说道：“不必谢了，只要你对朝廷忠心，对将军忠心，为国报效，我也就不没此功了。您的随从很好，我得赏她们五锭纹银吧。”张作霖忙道：“那个自然，银子就不必赏了吧，我们没有获罪就已经是很大的荣幸啦。”张作霖随即告退出去并命令手下把所有的东西连同枪械一并交还，让他们一一点清。第二天还派了大队人马护送增夫人一行。

增祺在奉天听说夫人被劫，又不知是谁干的，正在发急，忽听得夫人已平安抵达，赶忙出去迎接。安顿之后问起缘由，增祺夫人就把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增祺，告知了自己的许诺。增祺老奸巨滑，一眼识破其中把戏，倒是心里对张作霖有了底，于是命新民府知府增韞经办此事。

增韞手下红人赵经丞和张作霖早已勾勾搭搭，由他穿针引线，并由张紫云等人作保，将张作霖一帮正式收编，张作霖作了营长，手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亲信也是各有封赏，这正应了“不做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的老话了。

#### 8. 早有毒饵投前头

日俄战争爆发前一段时间、日本沙俄为了争夺霸权，在东北地区发生冲突，一个是到口肥肉岂可放，一个是红眼豺狗紧相逼，双方在东三省驻扎了大量兵力，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对于这种明目张胆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清政府却是不闻不问，厚颜无耻地宣布中立，任由这两条豺狼拿东北做练兵场，残杀人民。

日俄双方互相角逐，各自拉拢一批没有骨气的中国人做“先锋”，土匪、马贼、强盗是重点拉拢对象，这叫“以华制华”。日本帝国主义派遣花田仲之助少佐、桥口勇马少佐等间谍特务，来东北各地收买土匪，建立所谓“满洲义勇军”和“东亚义勇军”。沙俄岂甘示弱。也拉起“花膀子队”（臂上缚有袖标），一些土匪被收买，为其利用。

张作霖早在未投靠清廷以前，就与旧本人勾结上了。

那是在1901年春天。

张作霖已在八角台落脚，有一天，辽阳东山的一个老土匪头子“徐大帅”，特意派人来下了个贴子，说是有“花大人”前来拜访，望兄弟好生招待云云，张作霖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花大人”是何方神仙，竟连一徐大帅”都如此恭敬。张作霖心存疑惑，却也不敢怠慢，忙准备了接待仪式。

第二天，值哨的就来报告说“花大人”已递上贴子，要求访见，张作霖带着几个兄弟迎出去，一抱拳说道：“贵客，有失远迎了。”对方也还了礼。张作霖见这个“花大人”矮胖身材，肥大脑袋，后面挂一根稀疏小辫，还带了两个随从，拎着些山东土产，看样子不见得是很出色的人物，又听得“花大人”说话里带着山东味儿，心里更有点瞧不起了。

宾主双方至大堂后，行了正式参拜的礼节，张作霖摆上一桌精致的酒宴，



请来众家兄弟作陪。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都是胡子一个，也不讲客气，吆三喝五的就大吃大喝起来，那“花大人”却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两个随从也是很有风度，客客气气的。酒过三巡，大家就闲聊起来，张作霖发现，“花大人”确实不简单，对于胡子的规矩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对于各帮了如指掌，各帮头目的来历，发家史都是明了得很，各帮各派的人马、实力也分析得条条是道。张作霖暗道：怪不得徐老师如此看重此人，恐怕他对我张作霖也是一清二楚吧。然而我对此人都是一无所知，这是很不利的，于是改变了先前的态度。张作霖这人心里想什么表面上却什么也不露出来，就像他刚才看不起“花大人”却仍然客客气气。张作霖听“花大人”越谈越深，而且说的都是以前闻而未闻的道理，心里越发想了解一下这个人。他几个把兄弟虽然也是听得有滋有味，但是只不过觉得这个“花大人”如此而已。张作霖和“花大人”越谈越投机，酒宴撤下去后，已是晚上五六点钟，“花大人”对张作霖说：“我想借贵府暂歇一下，望君许可。”张作霖正求之不得，答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老是徐大帅请来的贵客，我怎能怠慢，今夜你我二人可同睡一榻，好好聊聊。”

当下，两人共抵一榻。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想从“花大人”嘴里套出点什么来，但是这个“花大人”却大谈国家大事，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本是友邦，而今沙俄佬强加一脚，离间中日兄弟般的情谊，造成两国不睦，沙俄却从中得利，占据了东三省，给百姓造成很大危害，张作霖暗忖这人气概不凡，的确高出他人一筹，心里非常佩服。于是张作霖也随声附和，大骂沙俄鬼子，并谈了自己的壮志：屈居在这小小一隅，干这些不光彩的勾当，也不是个办法，希望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做个英雄。两人越谈越觉得相见恨晚，真巴不得长久在一块儿，最后，“花大人”提出来了：“你我既如此有缘，何不结为‘金兰’，也不枉相交这一场。”张作霖一听欣然同意还说：“求之不得。”

第二天一早，依照规矩、双方得正式换贴，焚香给拜，张作霖叫精通笔墨的一个部下写好了贴子，送到花大人那边；即刻花大人也派随从送来回贴，张作霖一看，贴子上印着四个大字“花田××”，老张心想：我的妈妈，这不是日本小鬼子的名字吗？难道这花大人……，张作霖拿着贴子就进去问花大人了：“大哥，我跟你是诚心相交，小弟不敢辜负大哥，可大哥您太不够朋友，怎么跟我瞒了这一件大事？”花大人却笑道：“兄弟多虑了，我昨儿如此，实在是替你着想，若我昨儿一来就说我是日本人，兄弟会答应么？恐怕早把我赶了吧。”张作霖也不答话，花田又笑道：“我本皇军少佐，奉大日本帝国陆军省委任，来招募‘东亚义勇军’的。俄国人是外种，我们中日两国亲善，理应共同驱逐俄国佬，邀请诸位加入‘义勇军’，确是一片诚心，将来立下大功，咱们是大大有奖。做兄的不瞒你说，只要你入了，银钱、枪械我们皇军要多少给多少；怎么样？”

张作霖此时脑中飞快地转了十七八个念头，但想一想对方所提条件那么优厚，而且如果别的帮加入，而自己不入，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超过自己的力量，说不定以后就轮到别人来逼自己了。唉，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答应再说吧。张作霖把这一番心思告诉了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几个心腹，几个人也一致议定“先答应再说”。于是张作霖和花田拍板，加入了“东亚义勇军”，订立盟约，共推花田为盟主，共同驱俄。花田随即叫随从从礼品匣子里取出大洋数千赏给众家兄弟，并委任张作霖为招募官。3个月后，军饷和枪械都运到了张作霖手中，从此之后，张作霖就和日本人勾结上了，时

不时的从日本人那里领取资助。

张作霖投靠清朝以后，当上营长，便十分卖力效劳清政府，清政府提出中立后。他表示忠诚遵守“中立”政策，张作霖“确实”做到了这一条。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表示对日俄不偏不倚，却暗地里收到日本或俄国的金钱或是枪支贿赂，有时站在日本人一边为日本人收集情报，提供粮草；有时又偷偷为俄军干活。他是稳坐中间，以“渔翁取利”的态度从日俄战争中闷声不响地扩大自己的势力，或者说以“有奶便是娘”的态度对待日俄战争。他这一手急剧地扩充了势力。

但日本人也不是好糊弄的，日本的特务间谍机关很快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张作霖在耍俩面勾当，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的《对华回忆录》中记载，1904年12月，日本陆军满洲司令部翻译黑泽兼次郎在新民府一带活动，曾住在张作霖家里，黑泽对张的看法是：张作霖只不过是利所驱而干的。张认为日本虽然暂时胜科，但最终胜利还是属于俄国。张作霖当时是否有如此想法，已不得而知，但他可能对黑泽等从来不抱好感是真。黑泽回去后对“特别任务班”（间谍组织）讲了此事后，这些人杀气腾腾想干掉张作霖，不料此事被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安正听到，立刻加以制止说：“张作霖现在正是大有用处之时，得一人便添一分力，切不可因为小事而失大利。”原来福岛安正曾从花田那儿听到过张作霖的名声，福岛派黑泽送了张作霖银币1000元，说是专门酬劳，黑泽就留在张作霖身边了，张作霖明白这是敲山震虎，明摆的警告，于是对于俄军方面就松弛了不少，暗暗加紧为亲日的马贼匪帮开“绿灯”，给予各种接济，这一方面，是借着日本人银钱为自己铺后路，接交生死兄弟，买个人情；另一方面，又应了日本的差，可谓左右逢源，狡猾至极。

《对华回忆录》中还记载了日本特别任务班的间谍土井市之进少佐一段日记，其中大意是：1905年2月，当他潜入锦州一带活动，准备在新民府设置情报收集站，为即将发生的日俄之战提供情报时，曾派翻译中町香桔物色可靠人物，中町观察三四天后，带回来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据报告，这位中国人是驻在新民府的营官，名叫张作霖，他对日本军队抱有好感，愿为日本效力，他又允诺将中町隐藏在他家里，他家除妻女外，只有一个两岁的幼儿，张作霖表示要直接在少佐面前“立誓振助日本军”，所以中町带他面见土井少佐，土井给予了很优厚的接待。这件事发生在黑泽派在张作霖身边不久，也许张作霖是在他的暗示之下如此行事的。但无论如何，表明了张作霖老早就与日本人勾结在一块了。

张作霖这种两面派行径在日本侵略者内部引起了分歧，另外一部分人主张“杀鸡给猴看”，要把张作霖杀了以做仿效者，一些与侵华浪人的秘密社团“黑龙会”联系密切的人就主张这样干，据“黑龙会”出版的所谓《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日本于日俄奉天战役后，当地日本宪兵认为张作霖有充当俄军间谍的嫌疑，把他给抓住了，呈请当时日军驻新民屯军政署长井户川判处死刑，但井户川认为张作霖部颇多精锐，可供利用。倘偌冒然处死，张部起来反叛，不大容易对付。他不顾其中某些人阻挡，一再向上请示，并亲到参谋长眼前请示，而且搬动福岛安正和田中义一为张作霖说项，经过如此斡旋，张作霖小命终于被救，对井户川是言听计从。当井户川命令他在“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时，他乖乖地按了手印。日本人1906年在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刊登的《张作霖传》也记载了这一事件。

张作霖在日俄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他心目中根本无国家利益，毫无廉耻之心，谁得势就靠谁。他在日俄夹击境况之下，竟然可以应付周到，也说明他有过人之处。也许正是这种状况使他更加受到“锻炼”，出落得比以前更狡猾。如果说他以前的狡猾只不过是黑道小人物式的勾心斗角、见不得大台面的末技，而今这种本事却是懂得韬略、有谋有略的狡猾，正好比“出身寒门的粗陋女子突然跃上高校变为华装富贵的大小姐一样”，张作霖从小小的山沟，从红胡子生涯卷入清末民初一场大的时代洪流中去了。

#### 9. 卖友求荣加朱绂

在日俄战争中的几年间，张作霖大大地发了起来，武器精良，人强马壮，张作霖的胆子和野心也越来越大了。为了能够进一步高攀，他不惜撕破朋友脸面，将以前高唱的“侠义肝胆”的“哥们义气”高调抛之九霄云外，谁挡了他的道，他必要斩而后快。

当时辽西锦西一带有一股大匪，由苑四、苑五兄弟掌舵，拥有四五百人，很是猖狂，出没无常，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当地愚笨如牛的官府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县太爷走马灯似的换，只好请新民府派张作霖来清剿。张作霖焉能放过这个扩展地盘又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他气势汹汹地将队伍开了过去，苑四、苑五岂甘示弱，也摆开阵势，双方战将起来，真是杀得天昏地暗，可终究是张作霖武器装备好，将苑四、苑五击溃，另外一些小匪如金陵宝部、大海河子股、小海河子股、高升、金生牙签、脑袋瓜子等等，听说张作霖率部来剿，不战自溃，张作霖乘机收编不少。

张作霖如此卖命传到增祺耳朵里，增祺心想：这小子果真还有点能耐，我得重重赏他。于是下令让张作霖到省城晋见。张作霖接到命令，并不急巴巴地想邀功请赏，去见这位老大人。他想到自己这几年来发家很快，是不是有哪个家伙进了谗言，让增祺把我诓骗去杀了头呢？张作霖以己腹度他人之想，决定叫二当家的张景惠冒名顶替前去晋见，张景惠倒也没二话，一杆子就带着几个兄弟去了，增祺出来一看，觉得不是味儿，横竖看都不像是夫人描述的温儒人物，而是满脸疙瘩的大汉。增祺也是大奸若愚的，肚里暗暗想好了对策。过了一会儿，他对“张作霖”说：“上次承你保驾我太太有功，太太很想再见见你，叙叙旧，尊意如何？”土头土脑的张景惠一听，心想：我的妈妈哎，感情要砸锅了，这位老夫人肯定会认出我不是我大哥。”这张景惠一急，说话也结巴了：“将……将军大人，末将……将……”增祺微微一笑，“走吧，难道我会吃了你不成……”。张景惠愈发怕急了，越急越口讷，最后他干脆心一横，大声说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大哥不在，我是他把弟张景惠，你想怎么整治我看着办好了。”增祺却大声笑道：“我早已知道你不是张作霖了，但你能够说实话，很好，很好！我要嘉奖你。回去告诉张作霖，就说我增大人不计较你们，只要你们带罪立功，洗尽前嫌，我仍旧是要为你们加官进爵的。”张景惠诚惶诚恐地告辞了将军府，一刻也不敢多留，飞马回去告诉张作霖始末，张作霖想不到盛京将军原来是很看重信任自己，不免心生感激，决心为清廷效尽全力。果然，不久张作霖就被任为五营统带。1907年，东三省改制，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代替盛京将军增祺职务，徐世昌一来就想搞个下马威，想把以前几任都没敢撼动一根汗毛的杜立三部给剿杀了，然后杀一儆百，把这胡匪遍地、红胡子横行的东三省好好整治整治，他想到了张作霖，知道他是前任跟前的红人，于是命他解决。

张作霖接到这道命令，头疼了好几天，想起一段往事，以前张作霖还没

受降前在八角台混混的时候，曾经和杜立三大战过一场。那时候张作霖已是兵强马壮，志满意得之时，想趁着自己人多势众，彻彻底底在那一带坐稳台子，称霸一方。他看到杜立三是自己一大威胁，于是处心积虑要除掉杜立三，机会终于给他等到了。有一天，杜立三的大股人马出去劫一个镇子，只留下杜立三和他的几个随从守在老巢，张作霖点起得力干将，将他的百十来号人马全拉出去了。他本以为轻易地就可将杜家老窝一脚踹平了，哪晓得全然不是这回事。杜立三虽然只有十几个人，却是凶猛强横、一点也不示弱，再加上杜家堡子经过多年修葺，沟渠纵横，堤道骈联，暗堡林立，重门深巷，易守难攻，张作霖手下冲上去，暗堡里冷不丁几颗子弹送将过来，那些人连“哼”一声都来不及小命就丢了。胡子向来是打胜不打败，一旦溃败比什么都逃得快，几番强攻不下，张作霖的部下就开始军心动摇，压不住阵脚了。张作霖气得亲自催马上阵，猛呼：“弟兄们给我好好干，后边的是孬种。”但是，谁也木听他的。张作霖见状，也只有认栽了，带着几个把兄弟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落荒而逃。杜立三一看，岂能放过这老兔崽子，他倒提双枪，暴眸环眼，跃上他的快马，如飞一般追去，手下见状也纷纷跃马随后。张作霖回头远远望见杜立三凶神般追来，只道这条小命完了，猛踢马刺，狠甩马鞭，又命几个小喽罗留下阻击。杜立三毫不客气，见一个打一个，这样一直从辽阳追到镇安县，张作霖慌不择路，竟然往街镇上窜去。几个人正舍命穷逃，汤玉麟忽然大叫：“有救了。”张作霖两眼一黑，差点喜晕过去，略略喘了口气，忙不迭的讨问：“怎个说法？谁能救我？”汤玉麟勒马定身说：“汤二爷，我的本家！”几个字一出，张作霖顿时明白，叫道：“老天救我。”于是一帮人马开进镇上那座高宅大院里去了。原来汤玉麟的本家汤二爷，是镇安县的首富，也是地方上的一霸，有权有势，黑白两道都有来往，明里跟官府热络，暗地里勾结绿林，是个转得开的角色。汤玉麟原先就得到这位二爷的不少庇护，今儿又遇上“救命星”了。汤玉麟带着张作霖跌跌撞撞、急冲冲地进了汤府，汤二爷早听得仆妇来报，忙迎出府来接应，张作霖一见，急忙打躬，口里不住的称：“多有打扰，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了。”汤二爷听完事情本末后，略一沉吟，说道：“我曾卖过杜立三面子，就看杜立三怎么了结，现在请宽心吧。”张作霖一听：“您老恩德，我们做小辈的无以为报，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甘愿拜你为义父。”说完跪倒在地就给汤二爷磕了三个头，还口称“小子不孝，没有给干爹带上孝敬的东西。”汤二爷见如此，忙称“怎敢当，怎敢当，老朽理应尽力，罢了，罢了”。张作霖这一手，闹得汤老爷子非得为他解围不可了，这正是张作霖高妙之处。杜立三追到镇子上，不见张作霖踪影，火爆性起，劈胸抓住一个行人就喝问。那行人见他如此凶煞，早吓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着汤家大院。杜立三一把把那人揉倒在地，快马来到汤府，正要叫骂山门却见汤二爷笑咪咪地早立在府门前，冲他打揖，杜立三只好下马，还了一个大礼，汤二爷先发制人，招呼一声小厮把杜立三的马牵进去，又拉起杜立三的手说：“我该为兄弟接风洗尘了。”杜立三是吃软不吃硬的人物，再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多少还得卖点交情，因此，也不答活，随他就往里走，刚进厅堂大门，却见张作霖五六个人跪倒在地，每个人头上还点着一枝香。按照绿林里的老规则，这是表示谢罪了，任是帮子里犯天大的错，再也不能惩罚了。原来这是汤二爷早就交待好了的；汤二爷又在另一边笑咪咪撸着胡须说，“杜兄弟啊，俗话说得好，得理也得让人三分，况且张兄弟已经发下这等大誓向你认错了，冲我的老脸

皮，您就点个头让他们起来吧。”张作霖跪在地上又说：“杜大哥，我们这次受人挑拨，冒然攻打大哥，确实是犯了大错，请大哥看在我们无知的份上，原谅我们一次。”杜立三见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又向来是很遵从绿林规矩的，于是点了点头。汤二爷笑道：“这就对了哇，从此后呐，亲亲热热是一家人了。”张作霖看得明白，原来事情这样容易解决了，他心里狂喜，心腔子都蹦得受不住了，却依旧是很恭谨地站了起来，道了一声谢，几个弟兄也照办了。那边厢，几桌酒宴已是热气腾腾，等着主客入席了。酒席桌上，汤二爷拼命做“甘国老”，竭力调和；张作霖调动全副脑筋，鼓动如簧巧舌，得体地恭维杜立三，说什么杜立三是绿林千百年来最有义气的一位，杜立三被捧得飘飘然，张作霖乘机提出要结成拜把子兄弟，汤二爷又从中撮合，这段缘就如此结下了。张作霖从此再也不敢招惹杜立三，反而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叫他为杜大哥，逢年过节常常送礼。杜立三倒也不再为难他，两人也相安无事。但到了张作霖投靠清廷，翻过脸来屠杀旧日里一起闯天下的绿林兄弟时，杜立三就开始对张作霖冷淡了，常对人说：“小张子心地险恶、毒辣，竟然这样没义气。”张作霖听后，也闷闷不乐了几天，又曾派人几次去解释，杜立三闭门不见，两家就很少来往。

而今徐世昌一道命令下来，张作霖好生为难，一想前几年那一幕，犹自心寒肝颤，可他也明白这个徐世昌是拿自己开刀，无论去掉他们中哪一个，他都会拍手称快，这场拼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张作霖咬牙暗道：“杜大哥，别怪我无情无义，无毒不丈夫，我只有对不起你啦。”张作霖决定为了自己头上的翎子，狠心拿杜立三作垫脚石，爬上更高的地方。他想到杜家堡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之地，杜立三手下个个精兵强将，骠壮凶悍，硬拼肯定不行，说不定还得再栽一次，看来，只有用软计智取了。他急忙赶到新民府新任知府沈金鏊那里，密谋定下一个恶毒计策，准备下杀手。

过了几天，一切准备停当后，张作霖派了一员得力手下，带着丰厚的礼物，赶到杜家堡子下海叶（信），派去的人很恭敬地给杜立三行了大礼，双手捧上帖子，杜立三接过扫了两眼，对来人说：“告诉你们当家的，他当官，我为匪，已是两条道上的人；他走他的阳关大道，升官发财去吧，我仍旧做我的绿林好汉，拿脑袋吃饭而已，不稀罕这鸟东西。”张作霖碰了个老大没趣，心里恨得不行，又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一连几天在营帐里发脾气，差点把一个马弁给毙了。

正在一愁莫展之时，忽有人报“黑山杜老爹驾到”，张作霖两眼一亮，精神一振，大声吩咐好生接待“杜老爹”，自己忙换衣帽，整装迎接。你道张作霖为何这般看重这位“杜老爹”，原来杜老爹杜恩波（杜泮林）是杜立三的远房叔父，是个秀才，也是个红黑人物，当年张作霖也称他为“义父”，靠他和张紫云的担保，新民府才接收了张作霖。杜立三天不怕，地不怕，却唯独敬他这个老叔几分，杜老爹对杜立三也是很爱护，常常对他说些圣人之道，先贤之义，劝他放弃亡命生涯。

张作霖义父长义父短地把杜老爹迎进府厅，亲亲热热地叙旧，一个劲儿地感谢老爹。杜泮林只当是义子孝顺，张作霖没忘恩义，也就乐哈哈地和张作霖聊天，张作霖说：“干爹呐，当年要不是您老力劝，我小张可能还在八角台混地面，说不定谁黑吃黑，早就把我给吃了。您老大义，使我小张能有今天。”杜泮林接嘴说道：“呐，小张，这是你的造化，也是天意使然，水符众英雄也是归于圣朝，这都是托庇天子的福气和圣人的教诲，我有何德何

能呢？”张作霖接茬又道：“可现在就有人不归正道，反骂我是没骨头的。”杜老爹忙问：“是谁呐？”张作霖很气愤地说：“就是我的大哥，您的侄儿杜天意呀。”杜老爹“哦”了一声，又叹道：“我也劝过我侄儿好几次，无奈他久在绿林，脱身不易，况且听说现在总督徐大人对他很是不满，那就没有办法啦！”张作霖见杜洋林上钩，心中暗喜，忙道：“干爹，您老不知道，徐总督其实很看重天意大哥，特派委员殷鸿寿殷兄来见我，希望见见杜大哥，有心安抚。可前天我派了兄弟到杜大哥处，把这番心意转告了，没料到大哥竟疑心起我了，骂我为软骨头、走狗，这叫作霖很伤心。若是杜大哥一定不答应的话，殷委员回去，徐总督少不得要发怒，派下兵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说不定还要弄得兄弟干戈相见，您老肯定不喜；其实呢，依杜大哥的高才和力量，远远胜过作霖，何愁不青云直上呢？干爹还是劝劝杜大哥为是，免得他再生误会，使我兄弟不睦了。干爹，您看怎样呢？”杜洋林呷了一口茶说：“作霖，此话有理，拿纸笔来，待我给天意侄儿写封信劝劝。”于是杜洋林杜老爹展开一张上等白纸，挽起袖子，挥毫落墨叙述省里招安来人属实，希望不要再疑虑，要信得过老叔的保证。并在信中写道：“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荣耀祖宗”，希望他速来新民府义弟张作霖处，和作霖一起晋见殷委员并随之进省。

杜立三接到杜洋林的信后，感到老叔心意至诚，况且，多年绿林生涯也有些倦意，不想再和官府恶斗不休，便想看看再说。杜立三的老母竭力反对：“立三呐，你可别忘了杀父之仇。官府恶毒啊，咱做胡匪的万万要防着，而且小张子你也知道，诡计多端。”杜立三的夫人郑氏也说：“娘的话很有道理，咱多年与官府打交道，谁知他们又弄什么花招，还是不去为好。”杜立三说：“娘，您老人家放心，夫人，你也不必过虑，杜天意连天都不怕，难道还怕这几个小崽子？我晓得，我会安排好一切的。我先去探探风声，如下去的话，叔叔面子不好交待。”杜立三于是送信人回话说杜某一定来。接着，杜立三做了周密安排，首先派了得力干将安排好堡子里的防务，并派精干人马从杜家堡到新民府一路夹道设防，并吩咐老母和夫人说，要是过时没有回来，就先请到外地避避。随后带了卫队长于藏山和几名护卫和帮带宋庆濂，一起奔赴新民府。

1907年4月26日，天刚拂晓，杜立三便带了13名侍卫和宋庆濂骑马到了张作霖处。张作霖闻报，脸也未洗，只简装带着几个人出门迎接，一见面就大哥长大哥短的，处处现出亲热样子，并拉着杜立三，一同吃了一顿午餐。杜立三心中警惕，很少下箸，张作霖也不介意，也不劝，只是自管放开了吃，却也不冷落他，一面跟他搭话。午饭过后，张作霖说：“为免大哥心急，我还是早点带您到殷委员处。”

一行十几人又来到招待处，由张作霖引见，杜立三拜见殷鸿寿和沈金鏊。行了见面礼后，双方就坐下来商谈。殷鸿寿对杜立三说：“听说您阁下有个美名叫‘包打洋人杜天意’，是不是啊？”杜立三答了个是。殷鸿寿又说：“你和俄国佬开仗，把他们赶跑了，给国家争了光，徐大人很赏识你，认为你是了不起的俊才，特命兄弟我来见见你，只要你肯效力，朝廷爱惜人才，一定会赦您过去所犯之罪，而且会提升你为官。”杜立三说：“如此便好。”他选择座位很“刁”，一直靠着墙，不肯把背心给任何人，而且紧靠殷鸿寿，以便随时可抓他为人质。张作霖见杜立三如此警觉，心内暗骂：真是精如鬼，叫老子不好下手。但他不动声色，相信自己还有机会，脸上依旧是笑咪咪地

替双方圆场。沈金鏊也在旁边帮腔。杜立三听得殷鸿寿谈了半天，并无实质性东西，心里便不乐了，略略应酬了几句，准备告辞。殷鸿寿一看，便高声叫道：“送客。”暗示伏在屋后的武士动手。杜立三很懂江湖礼数，向来有个习惯，便是出门前要返过来几步抱拳行礼后再告辞，这是张作霖经过多次观察得出来的结论，便瞅准了这是对杜天意下手的最好时机。就在杜立三走近门边，返身抱拳说道：“殷委员，沈大人，张兄……”话还未完，只见门后几个如狼似虎的带甲卫士从背后扑上前来，七手八脚把杜立三放倒在地，杜立三措手不及，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会来这一手，待醒过味来正要反抗，已是五花大绑得像粽子了。他刚骂出一声“好你个张作霖”，嘴便被一团油腻腻的破布给塞住了，他两个卫士也早被张作霖布置的武士给捆起来，殷鸿寿拍着张作霖的肩膀说：“张营官，还是你有智有谋，这份功劳兄弟我一定给你上报。”沈知府也凑趣说：“张营官这下帽子又得垫高了。”张作霖忙温谦地说：“鄙职其实无能，还不是托两位老大人的福，凑巧碰上这份功劳罢了。”这一番话杜立三听在耳里，心里却是刀扎般难受，悔不该不听母妻之劝，心想：我杜天意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到头来却落到张作霖这等龟鳖手里，栽得太不值了。但愿老母妻儿都平安，东山再起为我杀这狗贼。不由自主地从那圆环眼中滴下两滴英雄泪。

张作霖当晚就将杜立三和他的侍卫孙殿卿、杜振东三人枪毙在西郊荒地滩上。临死之前杜立三仰天长叹：“老天爷，你不长眼，几时也叫张作霖尝尝这滋味。”

杜老爹杜泮林正等这几人回来报喜，心想自己又做了一件好事。忽听得消息传来，惊恼得几乎昏了过去，大骂张作霖不是人，毫无江湖道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张作霖垂手拱立说：“干爹，事已至此，悔也无用。我难道还能叫大哥复生么？如今您老要出气，尽管打骂我好了。杜大哥横行乡里，为害一方，我奉总督之命保护百姓，正是大仁大义，您老人家曾教导我过的，作霖不敢忘圣贤的教训，况且您老人家是亲自写过信的，之所以事先不告诉您老，只怕事不机密，你我反而受害。一旦发生争端，必定要伤害乡里百姓，如此行径虽然不符作霖个性，但这样一来所全者大，所杀者小。我也知道杜大哥是您的侄儿，但也是我的兄弟，按您先前教过我的大义灭亲的道理，我们便不可惭愧了。这次不动干戈，兵不血刃，全靠您老人家的力量，非作霖之功也，我得把功劳呈请总督给予表彰。”杜泮林听了这话，驳也不是，不驳也不是，平日能说会道的嘴巴哑了两哑，最后说：“我没料到你会骗我，多年以来我何尝负你，我已老了，苟全性命于这乱世，也不求闻达于诸侯；我骗了我的侄儿，已是万死莫赎，还谈功劳，功从何来？劳从何来？全是我侄儿的血啊……”张作霖见状又甜言蜜语地安慰了几句。杜泮林原也见惯江湖风波的，知道有人为官为财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只不过没料到自己掉进这样的陷阱里。他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无益，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沉声说：“作霖，死者不可复生，我也没有什么话来责备你，只是杜立三的身后事和他家的老母妻儿，你不可太黑，也要顾着以前的情义，悉心照看一番。我老了，经不起折腾了，你的前途远大，好自为之吧！”张作霖只得应道：“干爹说得极是，作霖一定照办。”事后，张作霖倒也风风光光地为杜立三送了葬。杜泮林亲自为杜立三写了一篇沉痛祭文。文中有两句：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但是张作霖对于另一项诺言却没有实现。捕杀杜立三的同时，他已派人

告诉埋伏在杜家周围的张景惠，要不惜一切代价端平杜家老窝。张景惠不敢怠慢，马上令喽罗开火。杜家堡虽然经过杜立三多年苦心经营，可谓铜墙铁壁，但无亲张作霖和他交往多年底细也知道些，而且张作霖已决定下手，准备得更周详，一时之间，杜家堡子周围枪声大作，浓烟四起。杜立三手下虽然勇猛强悍，然而群龙无首，又听说杜立三已死，张作霖大军压境，已无心恋战了，杜立三夫人也压阵脚不住，想起杜立三临走前的吩咐，只有忍痛突围。在几个忠心效命的兄弟的保护下，杜家老小总算杀出重围，逃得一条生路。杜夫人清点人马，发现只有十多个兄弟随她出来了，想到杜立三一生豪横，却不料落到如此下场，不禁心里滴血：誓杀张作霖。

杜家堡被攻破之后，张作霖把杜家多年所得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除了拿出一部分奖赏部下，一部分贿赂上司外，其余全归己囊。杜老爹听说后，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但也拿张作霖没办法，只有任其所为。不久，连气带病，就一命呜呼了。

徐世昌听说张作霖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消灭了辽西多年以来最大的匪患，于是上奏朝廷，说：“今兵不血刃，巨魁授首，不但辽西安抚，连他处匪徒，亦闻而知惧。该统领等赴机迅速，实属异常，出力奋勇可嘉，应唯其择优褒奖，以昭激励。”不久，清廷就授张作霖为蓝翎都司，以游击补用，升为奉天巡防前路统领，手下一个个从此也升官进爵。张作霖用把兄弟的血染红了翎子，官运亨通了。但是张作霖从来不准别人提起这桩事，暗地里也加强了防备。

#### 10. 大漠烟飞马蹄疾

洮南一带本属蒙古，蒙古人世代在此居住，过着“逐水草，牧牛羊”的生活。清朝前期的几个皇帝对蒙古采取笼络政策，和蒙族贵胃联姻，因此清初好几个皇后都是蒙古姨娘，蒙古族也归顺大清。但到了清末，乱世衰相，祸弊流传，清政府硬要在洮南一带设置县府移民垦种，激起了蒙古王公的不满，他们便组织武装，对抗清廷。后来人马散失，逐渐演变为匪类，当时最著名的两支，一支叫陶克陶胡帮，另一支叫白音大责和六十三牙于帮，一时之间，洮南一带匪患猖獗，有甚于当年辽西。这些匪帮有的暗中得到蒙古王公的接济，有的与沙俄勾结起来，进行叛国活动。他们纵横蒙古草原，在黄沙白草之间呼啸往来，骁勇强悍，祸国殃民，无恶不作。清廷最初派去围剿的兵力都不能抵挡，有时一仗下来就溃不成军，清政府为此很恼火。

恰在这时，原新民知府增韫调任浙江巡抚，他向西太后力保张作霖是个将才，多谋善断干练机智，一定能剿灭蒙匪，西太后经他一提，想起前番也是这个张作霖杀了辽西巨匪杜立三，徐世昌上报要求表彰来着。于是一道懿旨，升张作霖为统领，命他移驻辽源（后改为洮南），清剿匪患。

张作霖不敢违命，只得硬着头皮上，他对手下说：“兄弟们跟我多年，受累不少，作霖也不是毫无恩义之人，此番前去，恐怕不利，如果各位中有谁不愿去的话可以告诉我一声，作霖决不为难，并送上安家费用，算是答谢；如果众位兄弟不嫌弃的话，愿随作霖走，那就得听我号令，不能到了那地方再反悔，否则，不要逼得我不讲义气。”这番言语一出，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几人就大声应道：“大哥，难道我们是那等贪生怕死的小辈么？阎王殿都闯过了，还怕蒙古鞑子么？去就去，还鸟甚？”手下兵士听了，即使有想走的，也就住了念头，不敢哼一声了，张作霖又下令把他自己的家财拿出来，分给士兵，让他们拿回去养家；又放假三天，随他们出去玩儿。这样一



套收买人心的法子还是真奏效，上上下下都对张作霖有好感。

原来张作霖深知桃南一带环境险恶。那里是干燥的草原，黄沙侵蚀，刮起风来，天啸地转，满川碎石随风走，铺天盖地而来；草高二尺，一望无边，而且人烟稀少，往往几日不见一个人影；草原蚊虫成群，大的有如蜜蜂，逢上了就寸步难行。前几任官军受不了这样的苦楚，多半是开小差走了，故此张作霖先有一番说在前头的话压住众人，让众人死心塌地的跟他走。

张作霖到了洮南，所预料的果然不错，而且比他预想的还要困难。

草原宽广无边，蒙古人又是游牧民族，马上征战向无敌手，当年成吉思汗就是凭借胯下战马横扫亚欧大陆，未逢敌手；他的子孙当然也是能骑善射。蒙古军队都是一人骑两匹马，轮流使唤，脚程快。张作霖及其部下出身马贼，当然不会是不骑马的，但是他们的马匹素质不如蒙古种的马，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备用的马，这使得张作霖很苦恼，后来在地方上征调了一些，才勉强解决了这个问题。

双方遭遇后，开了几战，张作霖又发现自己这一边虽然有新式枪炮，但毫无优势可言。原来蒙兵不擅于集团作战，而是几个为一队，碰上便跃马而前，挥刀就砍，全是凭个人的勇悍拼斗，而且打了就跑，呼啸一声便无影无踪，张作霖部一开始乍然遇上他们，还想摆开阵式，正规地和他们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有时候，双方也是大队人马接触拼杀一阵，蒙军抵挡不住，回马便逃，张作霖便下令追击，哪知这些蒙匪散得很开，几十里路后，就是单线个人奔逃，绕几个圈子再回老巢，张作霖部下一看，也不知追哪个好，也就东一股西一股的散乱了，往往脱离大队人马，孤军深入草原荒漠，几天不能回来；草原上狼群又多，晚上更是狼声凄厉，白天也有，碰上就闷不响的把人给吃剩下一把骨头。张作霖手下的跑拨子（通信官）就被吃掉了好几个，一时谈狼色变，这些人吃饭也不敢单独出去。那些脱队掉队的兵士一旦发现自己的处境，便心寒胆颤。几次之后，大家谁都不敢追远了，张作霖也不敢强求，见好就收。士兵们几经折腾，都有点灰心丧气了。张作霖心想得打一漂亮仗，让大家振作起来。

不久，一股蒙匪又来进犯，他们采取的是近身搏击，用蒙古砍刀冲杀，张作霖不敢正面硬拼，令全军后退和蒙匪拉开一段距离，再发射排枪，一排子过去，蒙匪人翻马仰，砍刀随之抛落，一下子倒了好几个。蒙匪首领一看大势不妙，打一声唿哨，急今后撤，几百匹骏马卷起冲天烟尘，滚滚而去，张作霖一见，马上急令全军人马开拔，紧跟在后，又传令不能擅自追击，须得与各队人马一起走。蒙匪也真了得，张作霖整整追击了一天，到底也没赶上。有时他们故意三五成群地停在前面山岗子上，很悠闲地随便晃荡，待得张作霖发现，拍马上前，他们又如惊鸟一般，催马急驰而去。第一天，张作霖还能基本上保持出发前的阵势；第二天就有不少兵士因马匹倒毙而掉队，或是追击时走了岔路；第三天，掉队的越来越多。他手下的得力大将像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都率各自的一哨人马追击去了，与张作霖失去了联系，张作霖身边只剩一个陶励卿，带着 21 个士兵在后面寻找。张作霖眼望那莽莽黄沙，连天哀草，暗暗叫苦，但又不能明说，还得给士兵们加油打气。他不敢叫人放枪联系因为怕蒙匪会循枪声而来，反把他们给全部活捉去。由于仓促之间下令追击，张作霖百忙一失忘记了叫士兵带足干粮（他也没想到会追这么久）。士兵们都饥肠辘辘，马困人乏。陶励卿是统领的总理（即后来的参谋长一类人物），是个读过几年书的文人，也饿得不行，两眼发花，骑在

马上东倒西歪。张作霖见后，东摸西找，总算在褡裢里找到一个肉饼子，他轻拍坐骑走近陶身边，悄悄对地说：“喏，你吃了这个吧。”陶励卿睁眼一看，精神猛长。人也清醒了好多，他伸出手去就要抓住那个肉饼，突然想到张作霖也是一天多水米没粘牙，便缩手说：“统领还是你吃吧。”张作霖说：“我粗人不比你，抗得住的。”陶励卿这才没话，他吃了几口还是想让张作霖也尝尝。张作霖仍是示意他一个人吃。就这么着，这二十来人紧挪慢移地找了一天，到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发现前面坡子上，影影绰绰散着好些人马。张作霖打起精神细细一瞧，原来就是失散的各部人马，喜得他马上呼起众人，告诉这一好消息。这些人原是蔫头蔫脑地随马走，此时一听，顿时困意全消，推动坐骑跟着张作霖急急赶去汇合，各兵士看见，都去报告了各自的哨官，几个把兄弟急忙出来迎接，拿出食物，让他们好好吃了一顿。一连走了三四天，大家都疲劳得不得了，打死也不愿再走了，大家看这岗子前侧有一个小盆地，四面高中间低，敌人望不到，于是请求张作霖允许在此宿营，休息一两天再走，张作霖答应了。他想也该让大家歇息，恢复元气。大家于是高兴得忘了疲劳，打桩的打桩，牵帐的牵帐，喂马的喂马。张作霖叫了几个亲信，说出去溜溜，几个就信马走上山岗，闲逛着去了。张作霖说了几个笑话，聊以解闷，众人听得有趣，笑个不停，都奉承他，张作霖也自觉得意，正要拍马回去，就在回转的一瞬间，忽然他看见前面似乎有一骑的淡淡虚影一晃而过。张作霖马上严肃起来，急忙赶回，下令把搭好的帐篷桩子都给拔了，继续往前走，士兵们满心不愿意，张作霖说：“不要命的就给我住下。”大家一听他发火了，都不敢顶撞。

到了天明，走了大约一百多里，看前面是既有蒙古包，也有土房子，知道是到汉蒙杂居的边界地区，张作霖这才发令住下，这时，后面的哨探来报，昨夜果有大股蒙匪来偷袭，万幸发现得早，大家听后，都很佩服张作霖。

张作霖和陶励卿找了一座小土房住下了。白天睡了一觉，晚上，张作霖把陶励卿唤醒，说是要写几封书信，叫他代写。陶励卿就拿出笔墨，张作霖说一句他便写一句，一封又一封，没完没了，一直到半夜，还没完，这时站在身边侍候的勤务兵都累得站着打瞌睡，陶励卿也快支持不住，张作霖见此情景，就命令搁下。他进里屋拿来了大烟盘子，招呼他吸几口，陶说“不会”，张作霖非叫他吸不可，又亲自为他卷了烟泡。陶吸了两口，还是觉得很迷糊，于是向张作霖告退，倒在床上，随便抓起枕头往脑袋上一放，便呼呼地大睡了。也不知过了几时，他迷迷糊糊的听到“噗哧噗哧”的声音，惊然而醒便看见炕前寒光闪动，有一高大人影正挥刀剁来；他急忙伸手摸枪便打，子弹却偏了，陶励卿心慌手软，身子也动弹不得，头脑里晓得此命休矣，恍然之间，却见里屋出来一人，一把把陶拽下炕来，把他给压在身下，并且端枪就扣了三响，陶励卿凭感觉知道是张作霖，但吓得不敢动弹。这时，外面也枪声大作，人马闹成一团，人喊马嘶的，一会儿又静了下来。张作霖急忙升帐议事，各哨营官当差都来报到。原来蒙匪昨夜不曾得手，但还是循迹悄悄跟来，一挨半夜便发动偷袭，他们向来用惯蒙古刀，因此只用刀砍。陶励卿是巧中碰巧把个脑袋给缩在枕头下边，否则，焉能有小命在；倒是张作霖比兔子还精，一夜不睡，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事件，怪不得“命大”。

这场遭遇战后几个月，张作霖部毫无进展。一年过去了，非但没有剿灭土匪，他们自己反而匪性大发，对于沿途百姓，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当地蒙汉百姓真是苦不堪言，所到之处，蒙民“含泪诉苦者，门盈如市”。人们

编了一支歌谣说：“白了头发掉了牙，没有见过红胡子来驻扎。”连洮南府知府也不得上参了一本，指责他们。清政府见张作霖师久无功又搔扰地方，很是震怒，下令夺张作霖的顶翎，叫他带罪立功，以观后效。张作霖最初接此命令，大怒，心想：“老子为你们卖命，你们却如此待我，真是走瞎了眼，反不如还做我的老本行，重新做土匪；又一想，还不能这么意气行事，当初既反了，如今再复过去，江湖上的好汉定要瞧不起，手下兄弟也不会干；在辽西又结下众多仇家，尤其是杜立三一家还没死绝，将来也很难立足；要干还是干到底吧。”于是召集人马说道：“大家总得好生想一个法子，如果不把这些蒙匪消灭，作霖我是没脸见大家了。”顿了一顿，又说：“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当地人都不愿替我们作向导，道路不熟，散在这茫茫的大草原上，只能吃亏。我想过了。不能像以前那样碰上就打，打了就追，最后又散的老打法，得找出他们的老巢，一家伙给踏平了才好。这样的话，就

必须有人去卧底，把情况搞清楚。”张景惠就说：“在座的兄弟们是没这个本事，须得另外找人，都给我仔细挖挖，究竟有谁的伙计过硬，能担当起这活计。”大家都闷着头，忽然汤玉麟就跳起来说：“安遇吾大当家的！”此话一出，众人顿时释颜，气氛轻松好多。大家七嘴八舌地便说起来了。

原来安遇吾这个人在辽西一带也和杜立三一样，是鼎鼎有名的。他不是当把子的，但比土匪更厉害。土匪都推崇他，只要他一句活，赴汤蹈火也愿干，威风得了不得，台安一带，唯他独尊。这个人个子很高，块头很大，日常打扮是蓝色缎袍，散开胸膛，腰系着宽大的红布带子，喜欢骑快马打快枪，万无一失，也不拿马鞭子，只拿蝇拂，颇有戏曲里黄三大的派头；他家很有钱，平时不来什么客，也是三桌五桌的招待各方朋友，朋友有急，舍得挥金如土，颇像孟尝君；朋友有难，也能舍命相交，又像古代豪侠之士，因此颇受黑白两道尊敬，张作霖和他有过一段交往，算信得过的朋友之一。张作霖听了大家一席话后，也感到只有他才能解此危难，因此派了心腹送去一信，约安遇吾到通辽来聚聚。

安遇吾看信后，便对来说：“你先去，我随后就来。”随即，他就在家中杀猪宰羊，把过去有过交情的朋友，亲戚和邻里都找来，聚坐一堂，大宴美酒佳肴。酒席终时，他站起来大声说道：“安某有一事相托众位，请在我去后，善待我家，不知能否？”众人愕然，不知他言从何出。安就把事情约略一说，他想张作霖一定是遇上非常大的困难，才出面请他；正因为如此，便是凶险异常，能不能回转便是大疑问了，于是趁还在时拟托众人。众人感他平时好处，又敬其为人，那有不应的。

安遇吾快马赶到通辽，与张作霖见面，张作霖设盛宴款待他，叫众家兄弟相陪。直吃到尽欢才散，却不提有什么难处。第二天，以观览为名，亲自陪遇吾游玩，说说笑笑，尽是插科打诨的趣事，再不就是当年一同在绿林的那些掌故。这样，你请我请，过了一个月，张作霖也没有提到底是什么事相求，安遇吾忍不住了，就找到张作霖：“兄弟，你要是有难处尽管直说，安某容不得弯弯曲曲肠子，够朋友的不会这样，你便有天大难事，我也替你担起来！”张作霖见时机成熟，已经逼得安遇吾自己来请令，于是把前因后果都说出来了，并说道：“此事实是除了大哥您没有别人再能帮我了，因为有个鲍老疙瘩，过去是您家仆人，现在在牙千驱那儿办事，混得很好，如能找到他帮忙，我们就有救了。”安遇吾说：“好，雨亭，明天我就去。”第二天两人一前一后出了营门，安遇吾回身一抱拳，也不打话，勒马如飞而去，

张作霖立在门前，看着他在沙漠里卷起一烟风尘，直至背影完全消失。

鲍老疙瘩一见安遇吾，又惊又喜，安遇吾就说：“最近冯德麟也投了清靴子，他想立功，就派人挑了我的盘，我在家乡没法立足，已把妻儿老小转移到别地去了，一个人出来重新闯荡，不期到了这里，听说你混得不错，就想见见你。”鲍老疙瘩半信半疑，但还是领他去见了牙千驱等人。牙千驱平常也曾听人说起过安遇吾的大名，知道他马上功夫和射击本领都过人，有心留他下来，安遇吾假意推辞了几回，最后像是迫不得已的才留下来了。

安遇吾这人天性聪明，他虽然并不懂蒙语，混了几个月后，竟然能用不很标准的蒙语和那些蒙匪交谈，他记性又好，过目的人都忘不了，一见面就和那些人打招呼，和这些蒙匪谈得来，逐渐地他们也不把安遇吾当外人看待，有什么话也愿和他聊聊，安遇吾从中套出不少情报。

安遇吾其实早在张作霖招待他的一个月里头，就已经在暗中做好准备。因他到的第二天就知晓是怎么回事，那一个月两人都心照不宣。在那时，他计划好了，要为张作霖干好这件事只有两策，一策是刺死蒙匪头子，使蒙匪失去中坚；二是把牙千驱的老巢及周围通道都画好，然后潜回去交给张作霖，让他带兵进剿。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活动，安遇吾已经把图画好了，鲍老疙瘩和他住在一块儿，心知是怎么回事，但顾他以前关照的情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不管。画好图后，安遇吾便想走，转念又一想：我这么一逃回去，失踪了，蒙匪肯定会警觉，说不定会搬家的，这样一来，我的努力便白费，而且张作霖也更难找到他们的踪迹了，他想来又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可以两全的。有一天，他到牙千驱那儿的时候，故意显得很暴躁，和他手下的一小头目争吵起来，他抄起蒙古刀就朝那人刺去，那人闪避不及，一下子被刺死了。安遇吾又转过身来，砍倒几名蒙兵，牙千驱暴跳起来，喝令众侍卫上前，安遇吾不能抵挡，负伤后被擒，牙千驱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安遇吾便要鲍老疙瘩转告说：“我甘愿受死，但希望尸骨能回那边。”暗中又吩咐鲍老疙瘩说：“只求你一件事，就是这件事一定要办到，把我的尸体一定要送过去。”鲍老疙瘩只有含泪点头，极力在牙千驱面前求情，牙千驱就把安遇吾处死，卸成几大块。

张作霖在通辽一连几月得不到安遇吾的消息，心里也有隐约的不安。一天，他率着众人出外散心，突然见一队蒙古骑兵疾驰而来，张作霖正要下令追击，却见那些人根本不上前来，而是把一包袱东西往一棵枯树一挂转身就走了。张作霖手下上前取下一看，原来是一堆踩成几块的尸体，里面掉出一个头，还是栩栩如生的样子，部下认出是安遇吾。看他脸上的表情，竟然没有一点痛苦，反而有一种很神秘的笑容，真是非常奇怪，张作霖听见喧嚷声，赶上前来一看，不禁放声大哭：“安兄啊安兄，是我害了你啦……。”众人急忙劝住，说是料理后事要紧。

回营后，张作霖把安遇吾遇害的消息告诉众人，众人想起从前他的诸般好处，心里也是悲痛难言，硬汉子也滴下几滴苦泪，连一般的兵士听了都义愤填胸，全营上下哭成一片，哀悼安遇吾。张作霖红着眼睛对手下说：“你们要好好的把安大哥的尸体给洗涮干净，再把它用金线缝上。”众人小心应了，便忙碌起来，正洗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叫了起来：“快看，这是什么？”原来在安遇吾的大腿上，有一处口子很大的刀伤，已经红肿溃烂了，那人洗涮时隐约见里面露出来白色一团东西，扯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非常小的油

纸包，里面有一张折叠得很齐整的小纸片，呈送上去给张作霖看，张作霖打开油包，见里面原来是一张画好的各种符号的地图，标志很清楚。张作霖这才明白，原来竟是安遇吾用了生命的代价，不惜故意叫敌方杀自己，才弄到这幅图，心里也对安遇吾敬佩得不行。

张作霖把安遇吾的灵堂设在大堂上，隆重祭奠了三天后，下令按图进军牙千驱的老巢，牙千驱根本想不到死了的安遇吾竟然还能传递密信，他一心以为自己的巢穴是狐狸也找不到的隐密地方，张作霖大军忽然前来袭击，吓得他要死，急急忙忙唤起手下士兵，仓促应战，由于毫无防备，根本没有斗志。张作霖部又是带着满腔怒气前来，士气激昂，牙千驱根本不能抵挡，只好带了几个心腹突出重围落荒而走，他的部下大部分被张作霖歼灭，两个儿子也被逮住。张作霖以此为要挟，迫牙千驱投降。牙千驱没法，只好降了，张作霖就把他给杀了，以他的人头来祭安遇吾。牙千驱被灭，其他蒙匪也胆战心惊，斗志大大削弱。张作霖乘着这高昂士气，又请求黑龙江省的官兵协助，最终把其他两股匪兵也消灭，最远的追到 800 里外兴安岭的索伦山。到第二年春，悍匪白音大赉被毙，陶克陶胡帮逃出内蒙，迁往俄境，求俄国主子庇护去了。

蒙匪剿平了，张作霖受到清廷嘉奖，原来骚扰地方的罪名一笔勾销，红花翎子又戴上了，由六营统领升到九营，队伍有三四千人。张作霖于是派人把安遇吾的灵枢送回台安县又举行隆重的丧礼，乡里听到他的传说，都暗暗表示敬佩，很是引以为骄傲。安遇吾的两个儿子安庆吾、安庆余这时才十几岁，张作霖把他们收养在身边，带到洮南，让两人都补上哨官，以报安遇吾毁身救他之恩。安遇吾这两个儿子也深得安遇吾秉性，很不习惯这样做，他们几次故意犯法，希望张作霖开除他们，张作霖总是一味庇护，谁告状也不理，从不加追究。兄弟两人看这办法行不通，于是留了一条子，开小差出走了，至于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

据说“九·一八”事变后，有一股土匪打进台安县里，勒索百姓，台安县人敢怒不敢言，勉勉强强凑齐了他们所要的 20 万，正要交去，忽然又来了股人马，把前面的给赶跑了，人们就想把这笔钱交给这股人马以求个平安。谁知这位当家的大笑道：“拿不起这个钱，我是回来保护家乡的！”第二天就走了，有人说虽然打扮有些变了，但和年轻时的安遇吾没什么两样，很可能就是安遇吾的儿子。

### 11. 乱世功名血手成

张作霖剿灭蒙匪以后，势力得到很大扩张，几年之中，他不断地与日本人勾结，用劫掠来的财物换取日本商人的精良武器。但他不愿长期呆在这荒凉的辽北，因为此地再已没有多少油水可捞。1911 年 5 月，清朝第二次派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张作霖见老上司回来，心思大动，令幕僚拟好文章。打电报给赵尔巽，借口辽南土匪正在滋生，请回辽南剿匪云云。赵尔巽识破他是想到富裕的辽南发展，因此婉言拒绝了。张作霖碰了个软钉子，但心里并不甘，他知道现在是乱世，只要把握住机会，就会脱颖而出，于风雷之际直上青云，他蛰伏在小小的辽北，耳朵里却不忘捕捉四面八方对他有利的情报，眼里时刻警惕着。

机会不久就来了。

这时正是 1911 年。这一年，历史发生了惊人的转折；这一年，东北的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北地区历经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炮火几度洗劫，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沙俄和日本侵略者一前一后在这片大好河山上烧杀抢掠、鲸吞财富，强占土地。东北人民不甘为亡国奴，渐渐在觉醒、在抗争，出现了规模较小的罢工和罢市斗争，民众运动为东北革命党人领导起义、推翻清朝祖居龙廷宝地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实早在 1905 年 8 月同盟会成立的同时，孙中山先生就曾派人到东北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1907 年宋教仁先生又亲自到大连着手成立辽东支部，准备二袭辽东，“逼榆关，窥燕京”。同盟会的声势越来越壮大，连不少马贼、胡子、土匪都加入到此洪流中去了。奉天新军中吴禄祜、蓝天蔚和张绍增所率的三部，约有 3 万多人，革命党人暗中加紧活动，时刻准备起

事。1911 年 10 月 10 日这个伟人的日子，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控制武汉三镇。消息传来，在东北的革命党人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是个死硬的保皇派，乍闻起义，吓得腿肚子哆嗦，立即从视察地赶回奉天，召集群僚商讨对策，可笑这些大小官员平时只知搜刮民膏，此际却哑口无言，也都是惶惶然的。

正在这时，蓝天蔚的一个部下又来告密，把革命党人的密谋全部泄露出去了。原来蓝天蔚等人在他的寓所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以不流血之方式，使东北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并迫使赵尔巽出走。

赵尔巽听到这个消息，已是魂不附体，颤微微在堂上踱来踱去，找来袁金铠商议，述说目前困境和迫不得已将入关的情况。袁金铠是一只巨奸的老狐狸，他一听，马上说：“大帅，此事万万行不得，革命党人气焰虽盛，但终是花花架子，他们的部下都来告密，可见是事不机密，人心还是向着大帅的。”顿了一顿，又说：“袁某有上、中、下三策，不知大帅愿听不愿听。”赵尔巽说，“道来！”袁金铠的三策如下：上策是整军保境，镇慑革命；中策是暂作中文，静观事变；下策是响应民军，甘居叛逆。”赵尔巽沉思良久，黯然叹道：“我不能负圣朝！”可笑这老头子，顽固得要命，袁金铠早料他会如此反映，于是又说道：“现今只有调防兵力以抗革命党人，我看张作霖此人可用。”

赵尔巽当即密调张作霖进奉天，但他深知张作霖的为人，不敢赖以重任，又另外秘密调驻通辽的吴俊升部开往奉天，以防万一。哪知他密令刚下的第二天，张作霖就在袁金铠的引荐下，前来拜见。赵尔巽很是吃惊，张作霖便花言巧语的说道：“未将见时局紧迫，唯恐总督身边危险，所以日夜兼程，先行率兵保驾，如果总督认为雨亭擅自行动，甘愿受罚。”赵尔巽此时已是无话可说，只有默认。待到吴俊升接到调令，张作霖的军队早已占满奉天城。他再赶去，已是毫无立足之地，只能屈居在张作霖之下。这正是张作霖的得意之作。原来在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张景惠等人早已把消息传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已看准这是绝好机会，关键所在。于是秘密星夜兼程率部向省城移动，到得城外，他先去密见了袁金铠，和他拉好关系结好网，故此袁有此力保。

张作霖晋见赵尔巽，指天立誓要为他效劳，赵尔巽见他有此心意，成了自己手中唯一能与新军抗衡的力量，当即任命他为“剿匪总司令，兼奉天城防司令，提升为前路和中路巡防统领，统率马兵步兵共 14 营。张作霖此次投机，可谓及时。此时革命党人仍然被蒙在鼓里，仍然希望和平夺权。

袁金铠这只老狐狸，见一切准备就绪，就建议赵尔巽根据目前形势，不

可立即镇压，须得采取缓进之策，与立宪派合作，以缓和革命党人的激进情绪，赵尔巽、袁金铠和张作霖密谋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会”（简称“保安会”），拟定了赵尔巽任会长，立宪派吴景濂为副会长，张作霖任军事部长，革命党人张榕也取得了参谋副部长的虚衔。

11月12日下午，在咨议局召开了各界各团体代表大会，准备正式成立。大会开始后，咨议局议长吴景濂请赵尔巽讲话，赵尔巽站起身来，睥睨着会场说：“某两次到任东北，自问无愧，当此际关内风云多变，情形不定，我们东三省处于日俄两强之间，不可异动，否则前途不堪设想，我想诸位大可不必性急，还是静观时局演变为好。”说毕缓缓坐下，又横扫了会场一眼，革命党人赵忠鹄立即站起来大声说道：“清廷腐败，陷国家于危险之中，我们东三省人民应起而反之，以拯国家，以应民众，怎可坐等？鄂省近有武昌之义旗，其他各省也纷纷响应，风雷之势遍布全国，我们东三省也应顺应潮流，宣布独立。”他的话义正词严，令赵尔巽没法回答，因为他不敢说出他仍是效命于清朝，深知众怒难犯，可不驳倒赵忠鹄，自己的全部努力也就白费力气了。他坐在台上，脸上布满黄豆大的汗珠，张口欲言而无辞，惶惶然四顾。张作霖一看，心想他是在找我呐，此时不干，何时才干？他在一片沉默紧张的气氛中蹬蹬蹬就走上讲台，把手枪往桌上一拍，环顾全场，厉声说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效命天职，保护赵大帅，倘有事发，我张某虽爱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暗藏在会场中的汤玉麟等带着大兵，见张作霖在台上发威，也哗啦啦掏出手枪，怒目而视。下面开会的人士见这等土匪流氓的无赖行径，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谁敢仗义执言？谁敢将自己的小命往上碰？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代表见大势不妙，自己又手无寸铁，毫无抵抗能力，纷纷外逃作鸟兽散。赵尔巽在张作霖武力支持下，大获全胜，保安会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全班人马几乎都是原来旧官僚，只不过换了一副牌而已，只有一个和袁金铠关系较密切的，幻想和平交权的张榕在里面挂了个参谋副职。这场活剧就这样收场了。

保安会成立后，张作霖的部队几千人，陆续开进省城，大街小巷布满了张作霖荷枪实弹的部下，名为“保安”，实为镇压革命。

可怜革命党人毫无斗争经验，张绍增被流放，吴禄祜被暗杀，蓝天蔚被免职，吴景濂被迫出走，革命形势越来越不利了。

革命党人待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受骗上当了。于是成立了“联合急进会”来与“保安会”抗衡，准备派大部分革命党人，分赴各地，联络力量发动起义。另留张榕等人在奉天坐镇中枢，策动新军或张作霖部下起义。

11月20日起，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大有星星之火，将要燎原之势，革命群众纷纷要求“保安会”脱离清政府，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巽闻听此情形，又吓得全身乱颤，急忙找张作霖、袁金铠商议。不久就到了1912年的元旦，这时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可卖国贼袁世凯密令北洋军阀通电反对，又给张作霖、聂汝清发电，鼓动张作霖坚决与革命作对，并送来军需财物，这样，张作霖开始干预全国政事，并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他的胆子更大了，原先心里稍存的观望心理一下消散，决定大干一场，准备对张榕暗下毒手。

张榕出身于富家子弟，到日本留过学，年轻而富幻想，他与袁金铠交往很久。但袁金铠老奸巨滑，把张榕一直蒙在鼓里，张榕还以为他是同情革命的，对他很是信任的。1912年10月23日，袁金铠到容光胡同拜访张榕，寒

暄一阵，袁金铠就对张榕说：“张作霖虽出身不好听，但据老朽冷眼观察，他还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你应该请他来聚谈聚谈，看看他怎样想法。”张榕心想也是，该摸摸底。这个时候他仍然执迷不悟，对张作霖抱有幻想，于是三人就在一间高雅的酒楼摆了一桌，席间三人谈笑颇欢，张作霖准备了一肚子花言巧语哄得张榕昏昏然，再加上袁金铠在一边帮腔，酒席宴后，张榕就把张作霖作者朋友对待，一点防备心思也没有，将走时候，袁金铠就对张榕、张作霖说：“蜚红馆新来一个小桃，听说很美艳，两位该去看看。”张榕认为这是进一步拉拢张作霖的好法子，于是一道去了，两人来到蜚红馆内，走进准备好的房间里，那个小桃就端上来两盘上好云烟，又轻掩房间，袅袅娜娜地出去了，张作霖招呼张榕一起来玩烟，两人并肩躺在床上，一面谈话，一面卷烟土，张作霖故意说了很多很钦佩的话，说过去自己出身草莽，也不知世上原有这等大义，如今托老兄之福得以知晓，真是万幸。张榕也把他过去的一些事告诉张作霖，并讲了同盟会和革命的道理。他感到张作霖确实是可用之人，并不是原先想象中的那样，谈了大约半个时辰，张作霖托辞先出去一趟，张榕也没在意，仍旧躺在床上玩烟土，等着张作霖回来，忽然间就从外面闪入两个人来，举枪就向张榕射击，张榕根本来不及摸枪反击，便被打死了，身上好几个窟窿，血流了满床。这两人是张作霖的手下，一个叫高金山，一个叫于文甲。张榕一死，张作霖马上派人去抄他的家，同天被杀和抄家的有“联合急进会”秘书、机关报《国民报》的编辑田亚宾和张榕好友宝昆。此后数日，张作霖大施恐怖手段，见到剪去发辫或行迹可疑的人，就杀头或关监牢，还称“杀秃子”。一时之间奉天城内，街巷冷清杀气弥漫，谁也不敢出来。

赵尔巽当即即为张作霖请功道：“该统领不动声色，即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清政府，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如获至宝，马上赏其顶戴花翎，封其为“关外练兵大臣”，将其部改为二十四镇（师）。张作霖受宠若惊，为报皇恩浩荡，他甚至准备“武装勤王”。

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激起革命党人极大愤怒。连张作霖部下部分兵士，都转向革命一边。有一天，各路巡防统领在张家公馆打牌，几个人围坐一圈，正打得兴高采烈之时，张作霖多年的马弁梁二虎受革命党人委托，正想下手击毙这群东西，正抬手之间，不意金寿山（原与张作霖是对头，后被收编）于漫不经心之际从穿衣镜中窥见，多年土匪生涯练出来的警惕性使他大喊：“有刺客！”桌上众人反应也不慢，张作霖一抬手掀翻桌子，所有人和物乱成一团，其他几个拔枪便射，可怜梁二虎当即身亡，张作霖从此更加强了戒心，平时不管走哪儿，身边都有大队警卫人员跟着。

据说张作霖部下一个营长刘景双经革命党的介绍与杜立三夫人郑梅红结婚，他们俩率骑兵 200 多人，也时刻想下手，但最后终于没成功，两人不知所终。

第二混成协的新军在 1922 年 6 月 19 日晚，在革命党人孙祥夫带领下，发动兵变，其他各标兵丁也随之哗变，终因仓促而败。张作霖事后斩杀变兵 200 多人，遣散余者。一时间血腥味闻于街巷。

东三省革命的大好势头就这样被张作霖破坏了，其间固然也有革命党人的软弱和缺乏经验等原因，但张作霖扮的不光彩的历史角色阻碍了历史的进程。然而，张作霖本人却从中捞到极大好处。他从一个不起眼的绿林胡子到投降清廷的一介武官再到左右奉天局势的军队实权人物，从荒村到小镇再进



入风云多变的省城，崛起在其间，以致于后来有人称之为“一代枭雄”。

张作霖斩杀革命党人之干净利索，受到袁世凯的青睐。张作霖也很知趣，转弯使舵甚是麻利，抛开老皇历，扔了大清朝，紧跟袁世凯。袁世凯将张部改编为第二十七师，任他为中将师长。由师长而督军，由督军而东北王，继而挑起直奉战争，再而坐镇北京，张作霖一步步的在权力阶梯上大踏步前进。其间，又有多少悲欢故事，又有多少沉沉浮浮，正是“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然而，滚滚霸业，轰然一声黯黯地收场于皇姑屯，连他自己最初在赌场里混混、在绿林中打滚也未必想到身后几许“功名”，几许骂名。

## 七、西北帮情

茫茫大西北，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一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千百年来，生息在这个广大区域的人们形成了许多不同的部落群体与民族集团，互相之间既交流、接近、融汇与聚合，又对峙、磨擦、隔阂乃至兵戎相见，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呈现在这个大舞台上。在这些为人瞩目的舞台的背后，还有秘密社会组织活动于其间，这就是西北帮会。

### 西北帮会概况

西北地区的帮会按其势力大小可分为三种，一是哥老会，二是青洪帮在西北地区的分支，三是地方性帮会组织——刀客。他们构成了西北地区帮会的主旋律。

哥老会是西北地区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帮会势力。太平天国失败后，白莲教遭到清廷镇压，其残部从长江流域分成两路，大部分进入四川，其余的活动在陕甘一带，先后改名为红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等。从此，西北地区开始有了哥老会组织。

清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回汉大仇杀，左宗棠率兵平定后，被裁减的部分湘军自谋出路，纷纷加入了哥老会，由此奠定了西北地区哥老会发展的基础。一些老湘军纷纷组建“码头”成了哥老会头目，哥老会在西北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左宗棠率军入甘后，甘肃处于战乱之中，人民生活无保障，争入帮会者甚多，人们以参加帮会后与老爷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为光荣。据估计，除军队帮会外，地方老百姓参加帮会的有百万之

众。

左宗棠回朝后，清朝派兵对哥老会进行了镇压，哥老会活动一度受挫。到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动荡，哥老会又活跃起来，这时哥老会在陕西的组织主要有：太白山，山主李汉章；秦风山，山主马秉乾；定军山，山主马文伯；贺兰山，山主高志清；通统山，山主张云山。在甘肃的有：五龙山，山主吴慕堂；洪均山，山主王沐震；龙兴山，山主张世雄；万佛山，山主洪子普；奉天山，山主魏光信。在宁夏的哥老会首领有刘华堂、黄连升、高士秀、马跃川等。在新疆一带有乌鲁木齐的迪龙山堂、伊犁的新民山堂等。在青海有牛华山，山主是闵铸久。

青红（洪）帮在西北地区也是一支重要的帮会势力。洪帮是由哥老会演变而来，时间不确定。就西北地区而言，据传1934年，某军司王英由北套来到武威县，他与马步青的军官李华亭建立重新山。他倡议说，哥老会很难听，会被人误解为阁老的公子参加的会，不如改为洪帮。他们在西街赵家大门摆设香堂，宣布不再称哥老会，而称洪帮。因此，西北地区的洪帮势力，可视为哥老会势力的延续。青帮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来西北活动的，“七·七”事变后青帮分子大量涌入西北。当时在西北地区主要的青帮头目有：西安的刘海亭、叶鑫甫、王大同，兰州的杨尊、蔡青山、张友贤等。

关中刀客是陕西关中地区的一种地方性帮会组织。这些人携带一种“关山刀子”结成帮会组织，多做些行侠仗义之事。

### 西北地区的哥老会与辛亥革命

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烈火燃遍中华大地。西北地区也有同盟会的活动。当时同盟会在陕西的主要领导人有关有井勿幕、钱鼎、张钫等：在伊犁一带有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等。他们一方面发动广大群众，另一方

面积极联系哥老会一起参加反清斗争。同盟会的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哥老会的“反清复明”宗旨有一定联系，二者在反清问题上有共同的基础。1910年，同盟会领导人与哥老会头目敌血订盟，标志着双方关系的建立，辛亥革命在陕西、甘肃、宁夏、伊犁进行的过程中，当地的哥老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都参与了，特别是前期，哥老会利用自己原有的力量在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光复西安的过程中，如没有哥老会的参加，要迅速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在后期，哥老会暴露了自己的散漫性和破坏性。当时哥老会的一些重要活动，反映了这方面的历史状况。

### 1. 大雁塔下歃血订盟

张云山是陕西新军第一师师长，同时也是新军中哥老会头目。在当时新军中，他的哥弟较多，形成一股强大的哥老会势力。在革命之初，他自称为“兵马大元帅”。每当外出时，有“铡刀队”跟随左右，前呼后拥，非常威风。人们望见后都敬而远之，以防不测。

关于张云山的铡刀队，有这样一个传说。张云山本是新军中的司号官，他看到新军中许多士兵都加入了哥老会，于是他怀着政治野心也入了会。入会仪式是在深夜进行的。会场中间摆有香案，正中供有各种神位，走进会场后，主持人手捧一只雄鸡步至案前，边舞边念：“此鸡不是凡鸡，头高尾低，飞到香堂里，仁义大哥见了笑嘻嘻。仁义大哥撒把米，这叫结仁、结义患难鸡。”念毕将鸡头猛地扭下，鲜红的鸡血流入酒碗里。然后，宣读誓词并将血酒一饮而尽。事后，张云山虽然对入会时的誓词忘得一干二净，但鲜红的血酒却刻骨铭心，使他以后对红色一直特别感兴趣，他吹的军号上挂着红绸子，使用的大刀也常用红绸子包着。张云山成为新军哥老会的头目后，常常模仿包公，装出一副执法如山的样子，以在军中树立威信。他手下有个教官李起林，对士兵非常残忍，在操演时随意对士兵进行打骂，如士兵不服便关在笼子里站立三四天，有的士兵因一点小事就站立而死。当时在军中流传这样一首歌：“穷人要找事，真比登天难，送子学吹号，经常泪不干。”此外，李起林还经常扣军饷，因此，士兵们对李起林恨之入骨，酝酿发起兵变，杀掉李起林。张云山闻之坐卧不安，心如火燎，决定除掉李起林，以稳军心，把李起林抓起来之后，张云山便询问士兵，“各位哥弟，你们说怎样处置李起林？”士兵们同声道：“让李起林站立而死！”张答道：“这样不妥，李教官虽得罪了诸位，但他也是我们哥老会的哥弟，应让他痛痛快快的死，我要在众位面前用铡刀将他一刀铡断！”众人听后个个目瞪口呆。第二天，张云山集合士兵站在院子四周，吩咐手下将铡刀抬上来。

铡刀约有五尺来长，由四名身高马大的士兵抬着，“将李起林押上！”一声令下，只见李起林用布蒙着头，五花大绑被两名士兵推到铡刀旁边。张云山看了看李起林，然后面对士兵说道：“众位哥弟，李起林罪恶深重，恕我管教不严，引起公怒，现在为大家出这口气。”说罢便喊道：“开铡！”只见四名士兵分别按住李的头和脚，另外两人握住铡刀把，猛的往下一按，“噗”的一声将李起林拦腰斩断。鲜血喷撒满地，有些胆小的士兵吓得闭上眼睛或背过脸去，当他们再看时，只见血淋淋的尸体分放在铡刀两旁。

腰斩李起林后，其他教官对士兵的态度大为改观，军中哗变的行动也就悄悄息鼓了。自此，张云山哥老会的势力成为新军中最大的哥老会势力。张云山对他的铡刀也就更感兴趣了。后来，他又派人造了十几把铡刀，在军队中专门挑选粗壮高大的士兵组成了铡刀队。所有的铡刀都用红绸子包起来，

见到红绸子就使人联想到鲜红的血染满铡刀，难怪人们对他的铡刀队望而生畏了。每当他外出巡视总有铡刀队跟随，以显示其威风。当他演讲时，先搭一个台子，人还未出场就先把红绸子包好的铡刀抬到台子两旁，一阵喊叫声之后，再将最大的铡刀放在台子中央。一切摆设好后，张云山再出场站在中间的大铡刀上演讲。演讲时，会场气氛极为紧张，人人都心惊肉跳。不过，他的铡刀队对当地为非作歹的恶人也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在新军中，加入他领导的哥老会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宣统元年（1909），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开始传入军队。在初级军官中有同盟会会员四人，他们是张作栋、彭世安、张光奎、朱叙五。宣统二年春，张益谦、张风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省，也进入了新军。后来钱鼎、曹位康、党伴昭、张钊、张仲仁也来到了新军，这样军队中的同盟会会员增多了，对推动革命也就更加有力。同盟会决定联合军队中的哥老会共同革命，由于钱鼎和张仲仁是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哥老会兄弟，通过他们在双方之间进行联系是很便利的。

宣统二年4月，钱鼎开始与张云山进行联系，两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钱鼎是个热心人，乐意在同盟会与哥老会之间奔走。经过他的一系列活动，张云山同意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愿意与同盟会联合，但在实际行动上，还没有具体明确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约言”。

哥老会的许多活动带有封建迷信色彩，比如无论是入会，还是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要把鸡血滴在酒里喝血酒、举行神前宣誓。这样才能对哥老会兄弟在精神和行动上产生巨大的约束力。钱鼎身为哥老会兄弟，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张云山虽然在口头上答应参加革命，但若同盟会与哥老会之间不举行仪式，进行“歃血订盟”，在实际行动上难于使双方达到真正的联合。为此，钱鼎找到了张云山，与他商议道：“大哥，既然你已答应与同盟会共同起事，为何不与他们订立盟约？”张便问道：“怎订立盟约？”“就按我们哥老会的规定歃血订盟。”钱乘机答道。张云山一听到要喝血酒，立刻就兴奋了起来，赶忙问道：“在何时何地举行？”“我们在农历六月初六（1910年）举行，以图吉利，张大哥意下如何？”钱鼎回答说，“地点就是西安城南大雁塔。”张云山听罢表示同意。

六月初六，张云山及其他新军中的哥老会头目刘世杰、万炳南、陈殿等人兴冲冲地赶到大雁塔。同盟会的钱鼎等人也随即赶到。双方见到后互相问候，然后走进了大慈恩寺。大庙佛像前面供着关圣帝君的神位，供桌上陈列着香表蜡烛，大厅内香烟缭绕，庄重肃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人分两旁坐下，然后由哥老会中资格较老的朱福胜带领所有人员行叩拜礼，把一只大公鸡当场宰掉，鸡血滴在酒里，张云山将一大碗血酒一饮而尽，其他的人也都各喝一点。喝完酒后，众人在神前宣誓：“经这次歃血订盟后，彼此都应同心同德，谁也不能三心二意，如有违背，神灵鉴察。”这样就算正式结盟了。此后，把这次参与结盟的人称作三十六弟兄，实际上参与的人数不只36人，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哥老会习惯认为“36”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大雁塔歃血订盟，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团结，为后来的九月初一的起义打下了基础。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当时给正在准备起义的同盟会以很大鼓舞和推动。钱鼎等同盟会会员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积极作好起义的准备。但考虑到还没有与新军的哥老会就起义的具体事项联系好，而单靠

同盟会的力量还不能发动起义，所以尚未行动。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只靠八九个成员活动，在士兵中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而哥老会恰恰相反，他们很早就在新军士兵中建有的与军队编制相适应的自己的组织系统，有“标舵”、“营舵”、“队舵”。这些“舵把子”（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领导人）都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一帮兄弟。张云山正是通过“舵把子”掌握了更多的哥老会兄弟。这些“舵把子。虽在军事上没有指挥的权力，但在自己组织内部领导力量却很强。可见，在当时陕西的新军中有双层编制：一是军队的编制，分为标、营、队三级；二是哥老会的编制，分为“标舵”、“营舵”、“队舵”。当军队编制被打乱的时候，军事实力和军事指挥权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哥老会手中。因此，同盟会发动新军起义实际上也就是发动哥老会起义，利用新军的力量就是利用哥老会的力量。

为了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哥老会的工作，同盟会决定在九月初八举事。起义正在加紧准备时，钱鼎闻驻在西安的新军要调到宝鸡、凤翔和岐山，从九月初三起，每天调走一个营。面对紫急变化的情况，钱鼎在同盟会内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九月初一举行。会议一致推举钱鼎为起义的总领导人。

钱鼎以革命利益为重，对大家说：“我虽身兼两重身份，能够联系哥老会一道举事，但要担当起义的总领导人，自己军事指挥经验不足，恐难以负此重任。”众人便问：“谁能负此重任？”钱答道：“依我之见，张风任此职最为适宜。因为张是司令部参军官，地位较起义者诸位都高，他在操场上经常与官兵接触，一般人对他有好感。更重要的是，他若能出面起事，张云山等人的哥老会，就会与我们更好地合作，这样起义必成。”大家认为言之有理。但有人问道：“事到临头，仓促让他上马，他是否肯干？万一不允而失密，岂不坏了大事？”钱鼎便回答：“张风近来处境不佳，新军调离省城后他很可能要被撤职。诸位放心，我去同张进行联系。”有人又问：“哥老会方面怎样联系？”最后大家商议决定，张风同意起事后，再与张云山联系，九月初一上午在林家坟召开会议，对起义之事最后决定。

八月三十日晚，钱鼎赶到张风的营地，张从临潼演习归来，正在床上休息，钱鼎遂告以军中的革命活动和当前革命形势，同时讲述了大家一致推崇拥戴他为首领的意见。张风猛地站起，钱鼎见状大吃一惊，以为要坏事。过了一会儿，只见张在屋中踱来踱去，问道：“准备何时举事？”钱鼎告以决定明日，张说：“好罢，既承你们大家厚爱，我也不便推却，现在已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了，大家叫我干，我就担当起来干罢！”九月初一上午，张风、钱鼎、张云山等30多人在林家坟召开会议。最后，确定在午饭后举行起义。张风宣布：“现在同盟会哥老会都是一家人，干的是一事，要同心协力，不分彼此，今天听到午炮就行动起来，第一步先占领军装局。大家回去快作准备，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解散吧。”不过半个小时，会议就结束了。

正午12时，“轰”的一声炮响震动了西安大地。城外的新军及哥老会兄弟在一片冲杀声中，冲向军装局。当时住在局里的巡防队星期天大多数出去游逛了，剩下的士兵不敢抵抗，纷纷从后门溜走。有很大部分的哥老会兄弟是三五成群地分散进城的，他们也集结在军装局周围，听到冲杀声后，便蜂拥而入，争先恐后地爬上楼梯，用石块砸碎库门上的铁锁，七手八脚地把成捆成箱的枪械子弹从楼上往院子里乱扔，没上楼去的人就争着捡枪挑子弹。这些枪械和子弹，口径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拆不出去，合膛的又平射试放，

竟有打伤自己人的，闹得人声鼎沸，混乱不堪。幸好敌人没有乘乱来攻，否则必遭惨败。占领军装局后，旗人将军文瑞逃回满城，在省城的清政府官吏，都逃跑或隐藏在商民家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顺利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一阵大乱之后，新军原有的军事编制已被完全打乱，军事指挥权落到了哥老会各级“舵把子”手中，哥老会的首领从前几乎都掌握着一定数目的军事队伍。

占领军装局后，便开始攻打满城，满城是西安城内的一个城，里面驻扎着旗兵和旗人家属，不许汉人居住。

初二黎明，开始进攻满城。攻满城的主力是哥老会，当时，张云山带领众兄弟从西面进攻，守城的旗兵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故都死命相拼。经过激战，终于把新西门攻下，并向旗兵火药库的守兵集中火力射击，引起火药库轰然爆炸，城上和附近据守的旗兵伤亡极大，顿时混乱起来，张云山乘机命令他的铡刀队，在敌人中横冲直撞，敌军见状吓得魂飞胆破，敌营大乱，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满城终于被攻陷。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军政府，张风任大统领，钱鼎是副大统领，张云山当上了调遣兵马都督。其他哥老会头目也在军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西安光复后，清政府大为震惊，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当时驻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电奏清廷，保荐什允担任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并积极进行车事部署，准备犯陕。对于甘军犯陕，军政府已经料到。十月初八，张云山率大军由省城到乾州。乾州是甘肃清军进攻西安的必经之地，保住了乾州也就保障了西安的安全。因此，保卫乾州的战役至关重要。乾州城高池深，进可以攻，退可守，张云山到乾州后，积极修城凿壕，又让哥老会中的“舵把子”扩充兄弟成员，吸收当地人加入，以增加兵员。当时甘肃的哥老会头目彭四海在甘肃起义失败后，投靠张云山，大大增强了张的势力。又将城防按营分段，严令戒备。对于城内居民，也进行了组织训练，协助军队守城。张云山治军注重纪律，常对兵讲要爱护百姓。他还亲自上街巡视，铡刀队跟随其后，发现不法之徒，就即刻处罚，在乾州城做到了兵不扰民，这对于守卫乾州起了很大作用。乾州居民中有许多人，加入了哥老会。

十一月初。什允率清军二十营，占据了乾陵北十八里铺、铁佛寺等地，威胁乾州。什允的队伍均系西北边防多年训练的精兵，枪炮齐全，作战经验丰富。张云山的军队除新军的兄弟外，有许多是临时招募的，使用的武器多数为刀、矛、梭镖和铡刀，夹杂着少数的大枪和快枪。与清军比虽装备悬殊，但斗志旺盛，当什允的军队到乾州城下后，张云山决定主动出击。十一月十一日拂晓，张云山分兵三路突然从城中扑出，向清军猛烈攻击。每前进一程，城上的兵民敲鼓放炮、呼喊助威，声势雄壮。清军乱成一团，四处逃命。正乘胜追击，清军忽用大炮轰击，骑兵侧击，张云山的军队只得退回城中。十六日又继续攻击，当部队前进时忽中清军埋伏，导致失利，此后张云山凭城固守未再出战。十二月十九日，西安军政府派炸弹队队长薛西林率队送来炸弹十余车，大大加强了守城兵力。从此远则炮击，近用弹炸。城高池深，什允屯兵坚城之下，颇为窘急。十二月二十一日，什允又责成马安良制造云梯攻具，选拔精锐兵士，在北城门下竖梯靠城，蚁附猛上，城上士兵用炸弹抛炸，清军败下。第二天，清军用大炮数尊，瞄准北城门城楼，轮番轰射，整日不停，将一段城墙炸坏。张云山坐镇城上，督促民兵民夫连夜用石条土袋堆砌如故。最后，张云山命城上大炮还击，摧毁了清军炮兵阵地，其中有一

炮弹射入清军大炮口内，清兵停攻退却。

张云山坐镇乾州城，坚守到底，阻挡甘军，保障了西安的安全，取得了最后胜利。战事平息后，乾州人特在高等小学堂内建立张风岗公生祠一所，以作纪念。

在清军攻击乾州失利后，张云山正好收到南北议和停战的电文。张云山派雷恒炎去和什允议和，在十八里铺被什允杀掉。正月底，什允被调回甘肃，张云山与马安良在陵坡会面。双方互送牛羊，分别撤军，战事遂平。

西安光复应该说是同盟会与哥老会联合行动的结果。同盟会起了发动者、组织者的作用，哥老会起了主力军的作用。但在哥老会中，只有少数识大体、顾大局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多数人都以为全系哥老会的功劳，于是错误地认为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西安光复后，哥老会积极扩充势力，在省城和各县遍设“码头”。码头是哥老会的基层秘密组织，这时设立的码头，都公开地插上三角形小红旗一面，上写某山某码头，中间写上该码头负责人的姓名，表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兵马都督张云山对于扩充哥老会、增设码头特别热心。他在这个时候，大量印发“布票”（会员证），吸收会员。又令各县的哥老会广设码头于交通大道或有驻军的州县。码头兼办粮台、派款项，有的还办理讼事、设私刑，其权居然在县官之上。码头与码头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大欺小、强凌弱的现象常常发生。哥老会在西安街巷中增设的码头，除办理他们的会务以外，也管理地方上的治安，在晚间传令居民各家出人组成民团队，在街口守夜。为了便于检查，命令各家门口点一盏油灯，各码头办公费也是按户摊派。由于西安是省会所在地，因此，他们不敢过于胡作非为。至于在西安城外各县设置的码头，常常是拦路抢劫、抄家破寨、强奸民女，其行为与土匪无异。石泉县码头负责人张应龙，假借张云山的名义、独霸一方，随意向村民摊派粮款，甚至将周围村庄中的年轻妇女抢入自己住宅，供他玩乐。他常常对村民宣称：“我大哥在省城当大官，谁不听我的话，送到省城处死。”村民们不知内情，对他又怕又恨。

哥老会在州县的滋扰，使地方的治安和财政都受到严重影响，对当时的军事、政治都不利。各码头的非法行为，引起老百姓极大不满，他们屡次劝告张云山加以制裁，张云山也感到，这种情况对他的声誉影响甚大。他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召集各码头的头目在衙署内开会，在南院搭起台子，铡刀队分列两旁，把铡刀放在台子上。他模仿铁面无私的包公，以示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清官。会后他订立了一个创设码头的章程：

- 一、大县码头，以 150 名为额；小县码头，以 100 名为额。
- 二、口食暂由巡警旧费拨支，不得妄动地丁、钱粮及一切公款。
- 三、驻扎地方，即借城内庙宇公地。
- 四、不准吸食洋烟、不准抗官扰民。
- 五、不得勒捐民间财物。
- 六、不得干预公事。
- 七、有调遣即速派，不得违抗迟延。
- 八、须防彻地方，驱逐土匪，保卫商民治安。
- 九、学堂、教堂、电杆、电局，须一律保护。
- 十、回汉一体不得歧视。

以上各条，有不遵守者，军法从事。

这个章程发往各州县，并宣布凡码头负责人有违法行为，照律治罪，决

不庇护。又以兵马都督的名义给各州县官加上兼营务处的头衔、以使用军法惩办土匪和不法军人。以后，又把各县码头中罪恶严重的杀了几个，如三原码头陈坤山、韦曲码头乔世荣、石泉码头张应龙等。从此码头的气焰为之大减。后来各地码头也就结束了。这样张云山既想当“名将”又想当“清官”的愿望，总算是实现了。

## 2. 高庆云起事斩殿魁

陕西省安康县是兴安府的首县，驻有兴安镇总兵傅殿魁、知县林杨光等。这些封建酷吏，残暴成性，对老百姓竭尽压迫、剥削之能事，对士兵也经常克扣饷银，以致士兵生活窘迫，满腹怨气。在辛亥革命前，知府有感于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为缓解士兵的激愤，特拨款白银一百两，让傅殿魁分发给士兵。而傅却贪财如命，竟把这笔款全部鲸吞。这位总兵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和自己的地位，对土豪劣绅迎合、关照，言听计从。傅殿魁看到安康木材便宜，就计上心来，雇佣不少工人制成大批棺木，用船运到湖北家乡出卖，大发“死人财”，就连人粪也制成饼肥，运到外面销售。傅还有一个哑吧孙子，20多岁，人虽哑，心眼却坏得很。和他祖父一脉相承，凭借傅的权势在地方上奸淫邪盗，无恶不作。他每到一村，便指手划脚要肉要酒要钱，要吸鸦片，奸淫妇女，人们一见到他就远远躲开。

知县林杨光，贪婪残忍不亚于傅殿魁，群众把他叫做“糊涂浆子”、“林痞迷”。说他“糊涂”其实是财迷心窍。他每次上街巡视，一到店铺就派人伸手要钱，若不给马上派人砸烂店铺。常常因为小事，他就随意施用酷刑拷打平民。有位过路的商人，因不懂这里的“规矩”，当林的爪牙随意向他要钱时，这个商人没有给，林杨光立刻派人将这个商人的货物全部烧掉，并将这个人抓入县衙门，用火刑将这个商人慢慢地烫死。

当地的群众对这两个酷吏恨之入骨，盼望着早日将他们杀掉。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傅殿魁、林杨光，安康两只狼。伤人害命黑心肠，打狼英雄早日到，斩尽恶狼保安康。”

当时，在安康一带有位哥老会头目叫梁悦兴，他原籍湖北，在汉口曾组织附近的哥老会兄弟，密谋反清，但未及起事就被地方政府察觉，他便逃到了河南，后又跑到西安。到西安后住在城隍庙李老道处。李是西安的哥老会头目之一，是悦兴收的徒弟，而现在却有很大势力了。悦兴在庙内住了三四个月，一面和李老道鼓动清军中的哥老会官兵起义，一面派人前往安康，召集安康的哥老会兄弟来西安，共图大举。悦兴在西安日久，来往的人逐渐增多，引起西安官府的注意，就和李老道商议移居到南郊大雁塔附近一个哥老会兄弟家里，仍然感到不太隐蔽，于是落发为僧，以避耳目。从此，梁悦兴被称为梁和尚了。

光绪三十年五六月间，梁和尚约集一大批徒弟来到西安，李老道负责生活供应，密谋在西安起义。经过两个月光景，鉴于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梁和尚带着一帮安康及外地的哥老会兄弟来到了安康。

梁和尚到安康后，和当地的哥老会头目高庆云取得了联系，暗中策动当地巡防队中的哥老会兄弟共同举事，还和县知事王世瑛暗通声气，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活动，梁和尚在当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加入哥老会的人逐渐增多。

光绪三十一年初，梁和尚探听到傅殿魁要到安康城外的文昌宫祭祀，认为这是举事捕杀傅殿魁的好机会。他召集了当地的铁匠，在陈家沟生起炉火，赶制武器，当地的村民听说要制造兵器杀傅殿魁，都热情地将自己家中的废



铁、旧农具送到陈家沟。铁匠们更是卖力，抡锤锻打，日夜不停。哥老会的兄弟们除了帮忙外，还四处巡视以防暗探。除了准备武器外，还备了两大柜铜钱、二十多桶洋油，准备火烧文昌宫。起义前夕，梁和尚又把妇女们集合起来，做了大量的蒸馍，作为干粮。二月初二，是傅殿魁到文昌宫祭祀，以求神灵为他消灾除难的日子。二月初一，梁和尚就秘密通知他事先联络好的安康一带的哥老会和一批志愿参加的农民，于当晚集合在文昌宫附近陈家沟、小沙沟的村里，每人发给白布条，挂在胸前。这时高庆云对梁和尚说：“起义时每人发一个白布条，多不吉利，我看还是发给红布条吧？我们要火烧文昌宫，这样岂不更吉利？”梁和尚一听，言之有理，便答道：“好！按称说的去做，发红布条，我们来个万条火龙烧傅殿魁！”因为时间太急，当时村中又没有那么多红布，因此，只好发给一部分人红布条，这样有的人胸前挂红布条，有的挂白布条，大小也不一样，好不热闹。后来又发给每人铜钱一枚，带在身上，作为暗号。

当时，参与起事的人热情都很高，争先恐后地把储藏已久的武器、物资都搬运出来。梁和尚负责分发武器、高庆云负责分发草鞋、食物。又派人将二十多桶洋油运到文昌宫，把庙里的门窗都浇上洋油。哥老会的兄弟装扮成和尚等候在庙内，命四喜子、李元谋二人等到傅来烧香时，乘机纵火。约定见到文昌宫起火，大家一齐向文昌宫冲杀。

入夜，人们忙了一天，有的睡觉了，有的在炉边烤火。梁和尚一直没睡，他披着羊皮袄和几个哥老会兄弟先在村子里巡视了一趟，告诉大家好好休息，准备明天大干一场。回来后，又坐在屋子里盘算起明天的行动，仔细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初二早晨，傅殿魁带领着他的亲兵，耀武扬威地来到文昌宫。当他走进文昌宫时，闻到一股扑鼻的洋油味，立刻问道：“为何庙内有这等气味？”装作和尚的四喜子赶紧回答：“大人，由于庙内的一位小和尚今早不小心，将一油灯打翻了。”傅听后不再多问了，便去烧香。

这时，四喜子忙偷着退到窗户旁，乘傅磕头时暗暗地在窗上点火，可是怎么也点不着。原来买的油被商人掺了水！急得四喜子手足无措，恰好李元谋来到庙中，李赶忙到院中抱来一捆干草。此时，傅殿魁已祭祀完毕，正准备起身离去，四喜子急忙上前搭话，以拖住傅在庙内：“总兵大人，下次何时来祭祀？如能得知，贫僧早做些准备。”傅见到四喜子脸色有异，正欲答话，忽见神像后面有人正在点火。吓得他大喊一声：“来人！有人放火！”门外的亲兵一拥而入，将四喜子、李元谋抓获。绑后用烧纸堵上嘴，让人看管起来。命令亲兵赶紧把好庙门，又派人化装后偷偷地从小道回城，去调集队伍。

在庙外潜伏的梁和尚一直在等着文昌宫起火。他见傅进庙后已有一段时间，却不见动静。他开始以为傅可能还没有进行祭祀。可是过了一会儿后，仍不见起火，心中非常着急，可是又没有见到傅离开庙。

正在纳闷时，忽见庙的后门处有一和尚跑出，后面有士兵追赶。那人高喊道：“梁大哥赶紧攻打文昌宫！”顷刻间，这个和尚被后面的士兵击毙。

梁和尚一听，知道事情有变，立刻命令周围的人冲向文昌宫。潜伏在其他地方的人群，因没有见到庙内起火，也没有进攻，只听到庙周围大乱，不知怎么回事。梁和尚带着一群队伍很快冲到庙前。不料，敌人早有准备，冲了几次没有冲进去。双方在庙前正打得血肉横飞，傅从城内调集的部队赶到。

当时，哥老会兄弟及参加起义的群众，有的仍潜伏在周围，等待着庙内起火，有的在攻打庙门，忽见后面有官府的队伍冲上来，顿时阵营大乱。集结的起义队伍很快就被冲散。在庙周围与官府军拼杀的起义群众，死伤的也很多。梁和尚策划已久的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傅殿魁把四喜子、李元谋带回安康后，想从他俩的口中问出更多的人来。傅殿魁和县知事王世瑛共同审讯，严刑拷问。王世瑛怕事态扩大，于己不利，乃拍案问道：“你们为什么偷人家的牛？”两人答道：“我并没有偷过人家的耕牛。我们为的是杀掉傅殿魁才起事的，并无其他情节。”坐在一旁的傅闻听此言，顿时气得火冒三丈，把他们二人定为叛逆罪，处以极刑。

后来，傅殿魁知道了事情是梁和尚带头干的，便下令逮捕他。高庆云得知消息后，劝梁到外地躲避一段时间。但梁和尚觉得事情是自己带头干的，如今失败，把祸留给别人，有失江湖义气，坚持不走。高庆云无奈，只得自己逃到了西安幸免于难。后来由于王世瑛的极力劝说，梁和尚才去汉江北岸金中山暂避。后由于会内的叛徒夏充、王臣二人的告密，终被傅殿魁抓获，押解至白河县被杀。白河县哥老会为他立了碑，以表纪念，至今在白河县有梁和尚的纪念碑。

星转斗移，时间到了宣统三年，西安九月初一反正的消息传到了安康，当地的哥老会又开始活动起来。

此时，高庆云已成为安康一带哥老会的一个大头目。他把以前梁和尚手下的哥老会兄弟又召集了起来，大家立誓要为死去的梁和尚、四喜子、李元谋及众多的哥老会兄弟报仇，杀掉傅殿魁。为了吸取梁和尚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准备起义的工作中，特别重视联络部分官兵参加起义，他认真分析了巡防队的情况。当时的巡防队官兵对傅克扣军饷、拖延发饷非常不满。另外，在巡防队中已有不少哥老会兄弟，其中，在第二和第三哨中哥老会兄弟人数较多。如果从哥老会内部把他们联系好，到时候起来响应起义是有可能的。高庆云经常派人到巡防队中，暗中做鼓动工作，基本把二、三哨的官兵都争取过来了。有了这些士兵参加，高庆云心中就有底了。

除了做好士兵的工作外，高庆云还积极联络各地的哥老会头目。刘家寨有位哥老会头目叫刘明山，此人从小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武功，特别是腿上的功夫。平时走路极快，与人打斗时，动作更快使人防不胜防。当他看到野兔子时，也能跑上去将它捉住，人送外号“刘快腿”。由于刘快腿为人正直又会武功，很快就成了当地哥老会的头目，手下有不少哥老会兄弟。若把他争取过来参加起义，力量就会大大加强。高庆云开始派人与他联系时，刘快腿托辞自己是村民出身，不懂得作战，不愿参加起义。高庆云只好亲自去找他。当时高庆云在安康一带的哥老会中，已经很有名望了。刘快腿见到高亲自来拜访，也就诚心答应带领自己的兄弟参加起义。

九月初七，高庆云召集哥老会头目到他家中开会，决定举事的日期。高庆云对大家说：“现在各地都在举事反清，形势极为有利，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时机。”说话问众头目群情激奋，有人问道：“高大哥！我们何时举事？”高庆云见到大家劲头很足，便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正是商议此事，订下日期后，大家再分头准备。”刘快腿站起来说：“有五天准备时间就够了。”高庆云又说：“五天之内还不能起事，因为九月十三是新军中的标统王玉发的生日，我已答应去为他祝寿，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他参加起义，如果成功的话，我们的举事就万无一失了。”巡

防队中哥老会头目马治林接着说：“如果他不答应，我们就乘机将他杀掉。”听罢众头目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如果杀掉了王玉发，必然引起傅殿魁的警觉，举事就困难了。最后，高庆云对大家说：“我们起义的时间就定在九月十四吧！十三日晚我和马治林、刘快腿一起到王玉发家去。如真的将他杀了，必然引起军中大乱，我们就乘机在九月十四日举事。”大家一听都一致赞同。

九月十三日晚，高庆云、马治林、刘快腿三人来到王玉发家。王家灯火通明，宾客如流。高开门见山向玉说明来意，动员王一道起事，果遭王拒绝。随行的马治林、刘快腿遂将玉杀死，三人迅速离去。

九月十四日，高庆云向哥老会兄弟们和巡防队部分官兵发出起义的号令，向安康城进攻。参加起义的人胸前交叉着十字布条，作为记号，行动口令是“天保得胜”。他们分途会合后，向安康城发起了猛攻。

连日来，傅殿魁一伙也觉察出蛛丝马迹。各地反正的消息越来越紧，更使傅心中惶惶不安。傅担心发生兵变，所以给士兵只发枪不配子弹，有的士兵赤手空拳，连枪也不发给。

傅殿魁听到攻城消息后，一下子着了慌。连忙派人去联络新军。新军得知王玉发被杀，接着又听到安康起义的消息，军中大乱，士兵们也集合不起来了。傅又忙着派人给士兵们发子弹，但军装库已被城内巡防队的哥老会兄弟控制。这样，起义的群众很快就攻进了安康城，直冲衙门府。知县林杨光企图翻墙逃跑。不料从墙上掉在街后的一个院子里，当即被群众抓获。傅殿魁也在一个商人家中被抓获。群众积愤难遏，一致高喊“杀死傅殿魁！”第二天，高庆云召集了全城群众大会，将傅殿魁和他的哑吧孙子梟首示众。这正是：高庆云率哥老会为民除害，群众拍手齐称快。

### 3. 黑英雄聚众打盐局

事情发生在辛亥革命初期、陕西省凤翔府一带。

凤翔府的贪官污吏，勾结土豪劣绅，假借各种名义，巧取豪夺。这些官吏控制着盐的卖卖，在凤翔府内设有分局。当时的盐局总局长是刘绍涵，他原是清朝的一个统领，因与凤翔府的知府有密切关系，便当上了总局长。他雇用的税收人员多数是粗识文字而又利欲熏心者。这帮人依仗刘绍涵的势力，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当地的农民对盐局非常痛恨，经常发生因盐价闹风潮的事情。当地的哥老会头目晁黑狗、王摇摇、李猪娃三人，领导哥老会兄弟在农民中开展鼓动工作，同盐局进行斗

争。

晁黑狗是凤翔县的一个哥老会头目，出身于农民家庭，秉性刚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一位老人到盐局买盐，当盐局的人用碗倒盐时，不小心将碗碰在柜台上，把碗弄碎了，盐撒了一地。盐局的人硬说是老人将碗碰掉的，不仅不给这位老人盐，而且还让老人赔偿损失，老人苦苦央求，盐局的人还是不肯放过，恰好晁黑狗路过盐局，听到吵闹声后便走了进去，问清了事由，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揪住盐局的人，大声对他说：“你先把盐给这位老人，有什么事对我讲！”盐局的人一见是哥老会头目晁黑狗，知道此人不好惹，也不敢多作声了，只好用另一个碗给这位老人量了盐。由于晁黑狗经常替当地村民打抱不平，人们称他“黑英雄”。他使用的武器是长柄斧头。

王摇摇也系农民出身，岐山县人，身材高大，目光炯炯，甚有胆略，不畏强暴，远近知其性格的人，皆愿与他结交朋友，他好使用大刀。

李猪娃也是岐山县人，家无恒产，衣食经常不济，他是王摇摇的好朋友。

此人较有谋略，平时爱听三国、水浒故事。他手中常拿着红缨长杆矛枪。

当黑英雄在凤翔县带领哥老会的兄弟进行反对提高盐价的斗争时，王摇摇和李猪娃也带领岐山县的一些哥老会兄弟积极响应。为了共同的斗争，他们很快联合起来，在凤翔府周围形成了一支力量较大的反盐局势力。当他们看到全省各地的哥老会都在起事时，于是也决定率领农民起义，攻打凤翔府盐局。

起义前，三人在眉县齐家寨召开了会议。黑英雄说：“东方已有事故（指扶风一带张化龙起事），我们吃不上平价盐，有冤无处伸。时下霜降已过，冬麦种妥，值此农闲时机，民众容易集会，以凤翔、岐山、宝鸡三县民众推翻各地盐务机关，我看是十分容易的事情。”王摇摇说：“明天我们传出鸡毛信帖，捣毁西铺各处盐务衙门。”李猪娃说：“对！就这么办，今晚我们分别密传邻近的哥老会兄弟，让他们宣传集合当地民众，才能壮大声威、达到目的。”

计划定好以后，三人分头行动。第二天晚上，他们分别带着各自召集的兄弟又到原地集合，共有三四百人。第三天黎明，他们首先捣毁了眉县齐家寨盐局，把盐全部分给了村民。齐家寨的农民纷纷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此后，又捣毁了岐山高店镇盐局。他们的行动风声远播、人心称快，一路上加入的人越来越多。黑英雄对大家喊道：“我们不仅要捣毁这些小盐局，还要砸烂凤翔府的盐局！大家愿意不愿意？”这时众人热情已非常高，听说要打凤翔盐局。都高呼道：“砸烂凤翔府盐局！”随后，大队人马便浩浩荡荡直奔凤翔府，人数越来越多，在通往凤翔府的大小路上，只见人头攒动，到凤翔附近已有三千多

人。

凤翔城内和往常一样平静，居民们忽见这么多的农民涌进城来，有的拿着农具、有的拿着布袋，不知是怎么回事。城上的士兵也觉得奇怪，个个发愣，因没有接到命令，士兵们也没有阻拦这些农民。因此，黑英雄带着他的打盐局队伍顺顺当当的涌进城内。

进城后，他们直奔盐局总局，这时刘绍涵适赴西安未在总局。盐局的伙计们见到这么多人，知道事情不妙，便遁逃一空。但盐局的大门却被锁上了。这时，黑英雄跳到门前，举起明晃晃的长把大斧头，三两下就把局门劈开了。民众蜂拥而入，把盐袋、盐包、盐囤顷刻之间搜抢得一干二净。他们背的背、抬的抬，也有的将盐转移到别处藏起来。官府还不知是怎么回事，黑英雄带着他的打盐局队伍已回到了村子里。

事后，官府逮捕了晁黑狗、李猪娃、王摇摇，并将三人定为死罪。哥老会的兄弟们听说官府要枪杀三位英雄，便准备劫刑场，但是却走漏了风声。官府为防引起众怒，遂命刽子手将三人暗中杀害。三人为民众谋福利，英雄事迹感人至深。他们虽死于非命，而精神却长留于人间，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乐道。

#### 4. 哥老会起义宁夏城

西安光复后，前陕甘总督什允逃到兰州。他利用回汉隔阂，大量征调回民军，以甘肃提督马安良为统帅向西安反扑。同时，为防止甘肃革命的发生，对甘肃的哥老会势力大加镇压，四处搜捕哥老会首领。官府派兵日夜巡逻，发现哥老会稍有活动，便立即逮捕。宣统三年9月19日，宁夏知县陈元骧发现了帮会的活动后，即将哥老会兄弟李麻花、吴说书、罗大辫子、贼狮子等

十余人逮捕下狱。尽管官府严加防范，给哥老会的行动造成很多困难，但并没有能阻止住宁夏的哥老会响应革命。他们在暗中积极活动，准备起义，表面平静的宁夏城（现银川市）犹如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宁夏哥老会首领刘华堂，秘密组织宁夏的哥老会进行活动，并经常与西安革命首领张凤取得联系，将西安的革命情况传播给宁夏民众，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他还常常派人在夜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西安光复的消息传到宁夏城后，全城谣言四起。市民纷纷迁到乡间避难，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气氛极为紧张。由于官府防备甚严，刘华堂以聚众赌钱为掩护，在赌场上将众头目联系起来。当时官府对赌场不大注意，只注重市面的巡逻、盘查，故他们的行动一直没有被官方察觉。他还用鸡毛传帖联系各地的哥老会兄弟，鼓动他们参加起事。为进一步扩大宁夏哥老会的势力，刘华堂与当地的各个山主订立盟约，各山主拥立刘为大哥，同意率自己的帮会成员参加起义。

刘华堂在联系帮会势力的同时，还在士兵中开展工作。他秘密联络宁夏镇标营军官刘复太、袁宗刚和左旗号官黄连升。约定当刘华堂在宁夏城起义时，率部分士兵响应。

正当刘华堂在寻找适当的时机准备起事时，灵武县哥老会首领高士秀、高登云因行动不慎，被官府察觉。他们迫不及待地在9月27日晚率领哥老会及群众千余人，攻占了灵武县守备衙门继而又围攻州署。知州余重基和守备潘大海均逃匿民间。

9月27日灵武光复的消息传到宁夏府城。当时宁夏镇总兵张绍先到兰州述职未归，其职务由中营游击贺明堂代理，文武官员惊惶失措、六神无主。城内虽有各营旗约千余人驻防，但当局怀疑与哥老会有勾结、也不敢调用。因此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满营副都统常连甲带旗兵两千多人，全副武装，于28日开到府城。

刘华堂看到形势严峻，已没有时间与各帮会头目取得联系，决定立即起义。29日晚，他带领一批哥老会兄弟，突然点放纸炮，又沿街呐喊，街上顿时大乱。这时，刘复太乘机率卫兵100多人向空中放枪响应。各哥老会头目闻听枪声，知道发生事变，纷纷率众兄弟也从四处喊杀到街上，城内贫民也随之而起。顷刻之间宁夏城内人声鼎沸，人民多年的积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刘华堂率部分起义民众首先围攻中营游击衙门，要求代理总兵贺明堂反正，协助军民起义，贺拒不答应，当即被起义者枪杀，后刘华堂又率众围攻驻防城内的续备左旗部队。该旗营牟宪章见民军气势正旺，即派人与刘谈判，不阻挠民军活动，愿以帮会义气在事成后参加革命，双方协商互不侵犯。此后，起义群众又围攻县衙门，打开监狱，将已被捕的兄弟李麻花、沈疯子、罗大辫子及狱中所有犯人一齐放出，并放火焚烧了县衙门。府内文武官吏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刘华堂投降。宁夏城得以光复。

宁夏府城光复后，刘华堂在全城最高处竖立大白旗一面，上书“支持革命大元帅”，以表示拥护孙中山的领导。10月1日，成立宁夏军政府。因哥老会无主政经验，便让原宁夏道台为政府都督，刘华堂为总指挥，主掌宁夏府一切军政事务，刘复太为宁夏镇台，黄连升、牟宪章为标统。同时还任命了其他哥老会头目。

军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宣布哥老会起义是响应孙中山革命，推翻清室，起义队伍不得抢劫讹诈，骚扰百姓。大小商店公平买卖，照

常营业，任何人不得无故扰乱秩序，违者军法从事。

宁夏府城虽为民军占领，但离府城十里路的满营，尚驻有旗兵 2000 余人，他们武装齐备，实力雄厚，对军政府是很大的威胁。于是军政府便积极准备攻打满营，号召各哥老会头目，凡是自行召集群众参加民军者，100 人以上者为连长，200 人至 300 人者为营长。召集的民军统由牟宪章、黄连升二人编制训练，官兵均用白布包头，以作标记，武器方面除旧式枪支和土抬枪外，其他全部刀矛令铁匠连夜赶制。同时，对满营先礼后兵，派胡宝森到满营劝说官兵缴械投降，当时满营都统常连甲以“双方各守城池，互不侵犯”托辞推却。军政府见满营拒绝投降，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攻打满营。

满营火急派人向甘肃省求援。陕甘总督长庚即派马麒等率部分攻打西安的军队驰赴宁夏。军政府得此消息，召开紧急会议。刘华堂和其他首领们发生意见分歧，同时感到民军均系临时召集，无法应战，只得将围攻满营的民军撤退，保卫城府，民军士兵听说官军大兵压境，军心涣散，自行瓦解。刘华堂等首领也出城逃走，后遭杀害，宁夏哥老会及民众响应辛亥革命的壮举，终归失败。

#### 5. 李旺起义丹噶尔城

西宁在清朝时是甘肃省所属的一个府。丹噶尔城（今泊源）距西宁以西 90 里，属西宁府管辖。清朝指定该城为青海蒙藏族与内地汉、回、土、撒拉各族贸易的主要市场，同时又把它作为“青藏咽喉”的军事据点，在此驻兵设防。

李旺是丹噶尔城后北小庄人，与哥老会的兄弟来往甚密。李旺不识字，但人颇精干，当过兵，善技击。有一年，他为做生意，行经羊肠子沟，遇土匪行劫，他舞动流星（武器名），土匪多人不敢近身。宣统二年，有位叫裴道人的雇他运牲口来西宁。裴道人是义和团组织中的重要分子，失败后脱逃西来。李旺与裴道人接触后，了解了义和团运动的种种内幕，他就把裴道人认作师父，把他接到丹噶尔。当时西宁有位董蜡匠是李旺的好友，董蜡匠经李旺介绍认识了裴道人后，也决定参加反清起义。宣统三年初，李旺与他们一起组织了“黄龙大道会”。黄龙大道会也叫章龙会、黄表会、黄标会，简称“黄会”。加入的人都要以黄色的饰物作标志。李旺为了联络人们入会，常常采取迷信的方式，他装成一个“摔罗儿”、“拦切刀”的巫师给群众看病，并谎言自己会“过阴”，和宋朝的包公一样，也可升天见玉帝。他称自己是“天狗星”。他在自己家中立起了十几丈高的幡竿，上粘有北斗七星的纸旗和五色旗，幡竿顶端挂一面大黄旗。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民众入会。当时有两首歌谣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黄龙大会立竿子，里头收的是人尖子，有钱的主儿你别喊，穷人们行善你少管。”

“穷人翻身要行善，跟上有钱汉子你莫转，早上香，晚点灯，李旺的话儿你要听。”

他们还写了许多传单，传单上的大标题是“扫清灭洋”。传单的内容有两种，一种属于迷信的，宣扬天运气数，神兵鬼将，消灾免罪等。另一种是鼓舞群众起来反抗压迫的。这样的传单从丹噶尔、西宁贴到西安、汉中、潼关各地，从东到西组织成一条严密的通讯网，有事则一传十、十传百互通信息。李旺还专门挑选了一些跑得快的人做“开路将军”，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凡入会者，都捐献粮食和衣物，甚至有许多人将全部家财一并捐出。黄龙会

常常把集聚的财物粮食分发给贫苦的农民，贫苦之人为了衣食有给。纷纷入会。李旺对大家说：“加入黄会的是一家人，不分你我。等时机一到，先取丹噶尔，城内有太仓和义仓，夺取粮仓分粮食给大家。”他又说：“我们这些穷人造反都是被有钱有势之人逼出来的，只要万众一心，立定百折不回的志气，没有不成功的。”在加入黄会的人中，也有不少哥老会的兄弟，如王呼郎、唐古尔殿等人，他们经常在丹噶尔城乡做联络工作。他们利用6月6日老爷山朝山会的机会，进行广泛联络，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哥老大会和黄会，不分你我不分谁，团结起来闹暴动，共杀官府和洋贼。”

李旺规定，凡是入会的都必须在神像前喝血酒、对天发誓和挂黄号。号衣的中间缝着“虎吃羊”三个黑色大字，虎指汉人，羊指清朝和洋人。意思是：我们穷人联合起来，像饿虎下山一样，吃掉清官和洋人。

经过一系列的的组织准备以后，李旺和裴道人制定了起义的计划，准备攻占丹噶尔，夺取粮仓，作为东进的根据地；抢占临城牧场，用牧场的马匹组建骑兵。起义的日期定在7月15日。

可是在起义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李旺后期的活动地点在北小庄，该庄有二三十户人家，大半是皮匠、挂面匠、小商贩和农民，也有两户地主。这个村距丹噶尔城很近。有一天，李旺等人在北小庄聚会时，村中的地主赵来寿向官府告密，官府即派人前来捉拿。李旺仓促掩埋了衣服和旗帜，携带兵册，越墙而逃。裴道人由于年龄较大，行动不便，没有逃走。但裴道人有装神弄鬼的本领。官府兵来到村庄后，他大摇大摆地街上行走，口中还振振有词道：“西北起手坤地乱，前清江山一旦完，世事大乱，世事大乱。”说话间，官府军走到面前，裴道人指着其中的头目说：“你是命大的人，长相与佛爷差不多。你是活佛转生的，我要你到寺里当佛爷，你跟我走吧！”那位头目一见是个疯子，理也没理，就带着人向前走去。裴道人也安全地离开了村庄。

官府这次没抓到李旺，便下令各处缉拿。李旺决定提前起义。6月初，当李旺带一批人在西川搅隆庄一带行进时，忽遭官兵追击。6月2日黎明，李旺、裴道人等率众300多人挺进丹噶尔城，同时传集会众，搜集武器，准备进攻东城门。

李旺所以率这么少的人攻城，因为他估计城内的营兵都是烟鬼，没有作战能力，城防空虚。他也常常听人们说，营兵们隔月轮流当差，平时躺在家里吸食鸦片，个个面黄肌瘦全无人气。操演时拿鸟枪瞄准，打哼声替代射击，拿黑漆的长竿当长矛，有的兵弱不禁风，一摆竿即倒在地上，常使观众哄然发笑。因此，李旺认为，这些营兵不堪一击，攻城易如反掌。一部分营兵确实是这种情况，但是有一部分营兵还是有战斗力的，并且营兵的武器也较好，更重要的是官府早就有所准备，料定黄龙会迟早要攻城。他们故意让这些吸食鸦片的营兵，平日在街上巡视，操练时让人参观，并且将身强力壮时营兵组织起来，配上好的武器，在营盘内部操练。同时，他们还召集城内外的歇家洋行和城市富商大贾，让他们出钱组成民团武装。这些地方武装有快枪、骏马、壮丁，战斗力较强，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主力。

当李旺率几百人到离城一箭之地时，歇家李耀廷率地主武装即用快枪射击，打死不少会众，李旺见势不妙，便率人过河，试图与南西东三面涌来的群众会合，但这些群众已被地主武装分段阻击，集合不起来。会众们用的武器多是刀矛棍棒，也没有统一的指挥，只是四姓乱冲，一遇到敌人的快枪，

顿时大乱，纷纷逃去。李旺见无法控制，也率一部分人向城西逃去。官府的地主武装不让李旺有喘息的机会，紧紧追赶。李旺一面抵抗，一面西退，当逃到离城西二十里之远的纳隆庄时，被该庄地主李通事所率的团勇包围。李旺苦战两天一夜，因力竭被抓。这样，攻打丹噶尔城的斗争就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许多黄会群众被地主武装杀死，或者被逼上荒山困死。有人劝裴道人逃走，他却对人说：“这是我再一次的失败，我本来是一个要‘过铁’（杀头）人，今天已无路可走，正是‘了劫’的大好时候。”他不但不逃走，而且还让官役把自己缉拿起来送进监狱。多次的毒打、审讯，但他没有丝毫畏惧，而常常是谈笑自若。他对这些酷吏们说：“我已算好，不出一两个月，清室即亡。我不过是早死几天，到阴间等候你们的游魂。”他因刑伤溃烂，死在丹噶尔的监狱里，直到临死，对黄会内幕也不吐一辞。

### 关中刀客

刀客，是关中渭河两岸地区携带一种所谓“关山刀子”的人的总称。这种关山刀于是临潼县属的关山镇制造的，长约3尺，宽不足2寸，形状特别，极为锋利。关中刀客的成员主要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他们各自形成一个个大小不同的集团，成为一种帮会组织。这些刀客帮会组织在受到官府势力迫害时互相支持；而有时也因一些意气之争互相残杀，即所谓‘打对头’或‘捡对头’。

#### 1. 严孝全力斩四麻子，杀官府血祭独刀子

严孝全，名飞龙，字子青，陕西朝邑县北寺子村人。家境贫穷，父早亡，由寡母抚育。11岁就财就给窑前村温家做工，常被主人欺凌虐待。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温全寿逼他上山砍柴，因山路难走，又有积雪，严孝全不小心从山坡上滚落下来，腿被山石划破受伤，强忍剧痛回到温家。温见严未砍到柴，而且把柴刀也丢了，不由分说，将严孝全痛打了一顿，还扣了5天的工钱。因此，在严孝全幼小的心灵中早就埋藏下了反抗的种子。

严孝全18岁那年，有一天，忽听街上一阵锣声，村民们都去观看，严孝全也来到了街上，只见一位耍武艺的人，手中拿着一把三尺来长的刀站在街上，他身边有一位十来岁的小孩在打锣。锣声停后，那位卖艺的人将刀挎在腰中，抱拳对观看的人们喊道：“各位乡亲，在下张刀子借贵村宝地，献丑卖艺练几下‘五环刀法’给众人看，以求生计。”说罢，只见他脱去上衣，穿着一件布背心，双手拿刀在胸前竖起，然后猛地向上跃起，突向右刺，落地后又向左刺，接着就地旋转，指前刺后，闪转腾挪，轻盈便捷。村民们都拍手叫好。练完后，张刀子对大家说：“‘五环刀法’既能护身，又能攻击，若有愿学者，我可教给技法，只求给些剩饭、杂粮。”当时，官府腐败、社会混乱，村民们常遭到土匪抢劫。今天见到张刀子要教给大家刀法，并且要求不高，因此，村中青少年参加者众多。

严孝全对这件事特别热心，他一下子从家中背来了大半口袋粮食。张刀子执意不收，严孝全对他说：“我们家人口少，我又身强力壮，能种地，收成尚可，今天略表心意。”张刀子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当时，村子东头有一片打谷场，场旁边有两小间土屋，秋收过后，打谷场和土屋都闭置起来，张刀子就暂住在里面。每天吃过晚饭，严孝全主动积极召集村中学艺的青年到打谷场上学艺。严孝全常对学艺的青年们讲：“我们要好好地跟张刀子学。学成后，我们每人也做一把刀，保卫村庄，土匪们就再也不敢来犯了。”青年们听他这么一鼓动，学起来都很卖力。



张刀子原名张万虎，蒲城县兴市镇人，出身贫寒，对官府的横征暴敛尤为痛恨，是当地的一个刀客头目。每逢政府差役到兴市镇勒索，他便率刀客将官府的差人打跑。由于他刀法好，差人们也都惧怕他；当地人称他“张刀子”。

后来，张刀子到北寺子村卖艺。青年们跟他学艺很认真，特别是严孝全，学起来格外卖力。张刀子也就将自己的“五环刀法”教给了严孝全等人。

当时，土匪抢村劫寨之事，经常发生。有一天，严孝全对青年们讲“为防止土匪骚扰我村，我们组成一个刀客队，我们今后不仅要练刀技，而且还要杀土匪，保村卫民。”大家一听都积极响应。于是，他仍请来铁匠为他们打制新刀，很快组成了小寺子村刃客队。由于他们练的是“五环刀法”，人们都称他们为“五环刀客队”。在刀客队内，严孝全是头目，被尊称为大哥，其他人互称兄弟。

朝邑县一带有个土匪头子马兰田，家有弟兄五人，他排行第四，又长了满脸麻子，人称麻子老四。他性情残暴，是村中一霸。有一天，他的一个哥哥和村民王三路发生口角，麻子老四不由分说抡起大镐向王三路砸去，幸好王三路躲闪得快，没砸中头部，只是将手臂打伤。村中管事的从中调解，麻子老四又把这个人家中的柴禾暗中点燃，险些把房子烧掉。麻子老四四处勾结邻村的地痞、流氓，组成了一个“马家帮”，在周围各村干起了打劫行凶的勾当。麻子老四带着他的马家帮，常常在夜间行动，白天睡觉，当地人都把这帮匪人称为“夜猫子帮”。当地人流传这样几句话：“夜猫子一叫，灾害来到，麻子老四，来做恶事。”每当夜深人静时，麻子老四带着夜猫子帮，忽地把一家围住，猛地砸门而入，进屋后先把主人打昏或打死，见到年轻的妇女。也乘机奸污，然后将屋中的粮食、财物洗劫一空。那一带被他们折腾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麻子老四还有一套勾结官府的本领。当时朝邑县知事吴福田是一个贪财如命的家伙，麻子老四便派人将他们抢劫的珍贵财物送给吴福田；此外，麻子老四还专门物色了两名有姿色的民女，抢来后送给吴福田做小老婆。尽管村民们多次向衙门报告麻子老四的作恶行为，但吴福田总是说：“县衙门内的大事还管不过来，小偷小摸的事让各个村去管吧。”官府对麻子老四总是置若罔闻，使得夜猫子帮胆子越来越大，不仅暗偷，而且明抢。

朝邑县高庙，每年有庙会。每逢大会期间，商贾云集，演戏聚赌，热闹非凡。麻子老四认为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他便带着他的“夜猫子帮”来到庙会。当地的一些小商贩一看到他们都赶忙上前送钱送礼以免被抢。麻子老四带着他的人在庙会上逛来逛去，见好的就吃，见到商贩就要钱。当他们正要准备到赌场去时，忽听前面锣鼓喧天，人们纷纷围观，麻子老四也带人去看，原来是一个马戏班子，正要演马戏。麻子老四对他的人说：“我们到赌场去钱还不多，向这个马戏班子再借点！”马戏班子正要表演，麻子老四带着十几个人，忽然冲到前面。“先交200块大洋再演！”麻子老四凶狠地对马戏团的人喊，马戏团的头目赶紧上前答道：“这位大哥请见谅，我们刚到此地，还没演出，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钱。”麻子老四把眼一瞪：“你想不给钱？”随后对他手下的人一挥：“抢！”众徒一拥而上，棍棒齐下，把马戏团的人打伤，把所带器具全部砸烂，仅有的一点财物也被拾走。他们还把马戏团所带的猴子、老虎放跑，围观的人一看老虎跑了出来，顷刻之间大乱，纷纷向四处逃散，小商贩的东西也被踩烂。人们一听说庙会上跑了一只老虎，不知

是怎么回事，顿时整个庙会乱作一团，有的往东逃，有的向西跑，叫声连天。

这天严孝全也和几个刀客一起来逛庙会，刚到庙会不久，忽见前方大乱，听人喊道：“老虎来了！快跑！”严孝全问道：“哪来的老虎？”众人帮说不知道。严孝全对他手下的几位刀客兄弟说：“如果老虎跑到了庙会，必定会伤很多人，我们几个都带着刀，何不去把老虎捉住，以保护众人的性命？”他们赶紧向前挤去。

挤到庙会中心，他们才知道是马戏团的老虎跑了出来，又赶紧找到马戏团，这时才知道马戏团的老虎是被一帮土匪放出的，因老虎在马戏团从小受驯，放出来后没有伤人，马戏团的人不顾一切地将老虎捉了回去。马戏团的人告诉他，是一位长麻子的土匪带人砸了马戏团，放出了老虎。

“我们这次非狠狠的教训麻子老四一顿不可！”严孝全说着带着众刀客向前走去。当他们走到一个牛肉店旁边时，忽听屋内有叫喊声，向里一看，正是麻子老四带着几个土匪在这里吃喝。遂命几个刀客在门口把守，严孝全带几个人走进了屋子。严孝全上前对麻子老四说：“四兄！借我200块大洋，给马戏团买道具。”麻子老四一听火冒三丈：“你敢管老子的事？”“我今天就是要管！”严孝全说罢，举刀刺向麻子老四，麻子老四一闪，刀刺在肩上，众匪乘严孝全抽刀之际，蜂拥而上，严孝全和几个刀客赶忙退到院中。土匪们仗着人多势众，将严孝全等几个刀客围住，麻子老四乘机在几个土匪的护送下逃走。

这次虽没有杀死麻子老四，但土匪的气焰大为收敛，在白天也不敢任意抢劫了。

严孝全回到北寺子庄后，对五环刀客队的人说，这次我们教训了麻子老四，要防止他报复，每晚我们都要在村口轮流巡视。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一天夜晚，张二栓正在村口巡视，忽听远处有走路的声音，好像有很多人，他便故意向前方掷去一块石头，就听得一片叫骂声。张二栓马上敲起了铜锣。

严孝全听到锣声，立刻将村中的刀客队集合起来，暗暗地向土匪后面包抄过去。村中的其他青壮年也都拿起农具、木棒集合了起来。

麻子老四的“夜猫子帮”听到锣声，疯狂地向村中扑去，正往前冲，发现前面有一群人，麻子老四以为是刀客队，即刻停止了前进，准备迎战。不料前方却毫无动静，相持了一会儿，忽见周围火光四起，杀声震天，麻子老四一看都是拿着农具的农民，没有见刀客队伍，也就壮了胆子，对众匪喊：“刀客队不在，往前打！”村民们和众匪混战在一起，麻子老四忽见身后，又燃起一片火光，严孝全带着刀客队冲了上来，“夜猫子帮”一下了乱了阵脚，四处乱打，有的自己人对打起来。这次麻子老四纠集了100人左右，企图偷袭刀客队，现在死伤了四五十人。麻子老四见大势已去，就想逃走。这时天色渐亮，刀客队和村民们已将“夜猫子帮”团团围住，众匪纷纷投降。严孝全将麻子老四从众匪中揪了出来，当众斩首。

严孝全杀死了麻子老四，为民除了害，朝邑县众乡亲拍手称快；严孝全的威名也就远近皆知了。外地的刀客有许多也投奔到他这里，势力逐渐壮大。

有一天从澄城县来了一位刀客，见到严孝全后，告诉了他澄城县知事刘金财杀死了一个卖艺的刀客张刀子。严孝全一听，立即召集“五环刀客队”的弟兄们，要为张刀子报仇，杀掉狗官刘金财。

严孝全和关中著名的刀客严锡龙、王飞虎等人来到澄城县城。

到县城后，严孝全得知刘金财既贪钱又爱赌博，严孝全等刀客便在澄城县开了一个赌场。为了吸引官府的人来赌，严孝全在赌场的大门上贴出公告，凡是官府的人来赌，可以到赌场白喝酒。严孝全把经营赌场所赚的钱，都买了酒，钱不够时，就往酒里倒水，保让官府的人喝够。这样，严孝全的赌场在澄城县的名气渐大，特别是官府的人，大多来这里赌钱。

知县刘金财也渐渐地来这里赌钱，每当他来赌钱时，酒肉都给他准备好，赌完后就喝酒，这样一来刘金财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严孝全见时机成熟，便假装成自己过生日请刘金财来赌场。“生日”那天，刘金财和几个官吏喝得大醉，严孝全命人关上赌场的大门，趁夜晚，严孝全将刘金财等几个官吏的头割下，又找来一大块白布用血写上“血祭张刀子”，然后，把尸体抬到院子里，把布挂在院子中间，清晨，城门一开，他们便离开了。

第二天，赌场的大门迟迟不开，官府中也找不到刘金财，差役们来到赌场，只见大门紧闭，差役们也不敢砸门，只好等候。到了午后，仍听不到动静，他们便爬到墙上去看。一个差役刚爬上墙头，就吓得“啊”的一声，掉了下来，赶紧跑回官府通报。官吏们来到赌场一看，个个目瞪口呆，有五个血淋淋的人头滚在地上，五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放在院中。有块大白布上写着“血祭张刀子”，他们一看便知道了是怎么回事。马上下令捕杀严孝全。

严孝全逃到了甘肃，在西安光复前，正是官府捕杀他最吃紧的时候。1911年，严孝全与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西安光复后，严孝全从甘肃回到陕西。10月下旬，陕西革命领导人井勿幕、陈树藩找到严孝全，成立了革命军，陈树藩为总指挥，严孝全为第十标标统，在蒲州把守黄河，巩固后方交通。民国元年正月间，陕西西路故事紧急，严孝全率部进攻礼泉城。在攻城时，因重伤而卒。

## 2. 刀客护商人过险道，王狮子被害瘟神庙

王狮子，名振乾，朝邑县寨子村人，其父王祥，为朝邑云班头。王狮子受父亲影响，从小练武，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他为人豁达，喜结豪侠，周围几个县的刀客行侠者，每遇杀人犯案或为仇家相逼者，有很多都投奔王狮子，而他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皆予收留，事过以后从不要报酬。

清宣统年间，山西的盐运往西北各地，大多要途经关中各县。蒙古、西藏人喝的砖茶从湖南运到陕西泾阳，分别销往各地。做这两项生意虽然很赚钱，但也有两大难处：一是要受沿途官府额外勒索，二是担心土匪的抢劫。因此，商人们都乐意雇一些保镖，刀客们有很多充当了商人的保镖或保运人。随着运输量的扩大，作为保运人的刀客也逐渐多了起来。

王狮子也做了商人王金宝的保镖，他同其他刀客结成帮派，遇着税卡人员拦阻盘查，便威胁着强行通过。

有一年王金宝在山西弄到了一批盐，想运到陕西关中一带，由于运量较大，要交很多的税，王金宝找王狮子商议道：“我们把钱交给官府，还不如我们之间将税款平分，如能通过税局检查，我们即可得到这笔钱。”王狮子答道：“我再叫上几个刀客兄弟，一定能通过税局的检查。你在山西买了盐以后，先走一步，到朝邑县城等我，我一定将盐运到。”王金宝知道王狮子是义气之人，不会坑害他，也就先到了朝邑县城。随后，王狮子又找了几位刀客朋友，赶着马车将盐运往关中。路上果然遭到了盐局的盘查，“车上装的什么货？”王狮子答道：“下面的货是人骨头，上面的几包是人皮。”说

罢用手指着局丁对另外几名刀客说：“来！把他这张人皮也捎上！”局丁听罢，吓得面如土色，赶紧退到一边再也不敢问了。王狮子顺利地把盐运到了朝邑。

王狮子在当保运人的过程中，除了与官府打交道外，也常常与土匪拼杀。

在运货路上土匪常常出没，当时大的土匪帮有“地帮”和“山帮”。地帮土匪主要是在路上挖陷坑，当商人的车队掉入陷坑后，他们便乘机打劫，他们挖的陷坑有一丈多深，宽度由道路的状况而定，用细树枝架好，蒙上破布，上面再撒些细土，然后用木棒压平。如不仔细看很难辨出，特别是马车，更容易陷下去，常常是人仰马翻。山帮土匪多出没在山路险要之处，如在山口或是峡谷地带，这类土匪更是厉害，他们在山上见到商人车队时，猛地从山上滚下大山石，将车队砸烂或是挡住道路。如遇上这种土匪，商人们十有八九难以逃脱。因此，商人们每当经过这种路段时，在货物上都插上小黄旗，以表示自愿交出“买路钱”，这样商人们虽然损失很多财物，但可保命和货物，然后在出卖时加价补偿。

有一次，王狮子给一位茶叶商当保运人，这位茶叶商从湖南运一批茶叶到陕西。王狮子对这个商人说：“如遇到山匪，你一切听我的就是了。”途经山西、陕西交界处，有一片山地，是土匪出没之地，走到了山口，王狮子让商人在货物上插上小黄旗。果然来了一帮山匪，其中的一个头目喊道：“将买路钱送上来！”王狮子拿了一袋钱后，对商人说：“你稍候，我去收拾他们！”说罢转身上山，他见到土匪头目后说道：“各位好汉，我也是绿林中人，现以保运为生，实为艰难，有一事能否商议？”土匪头目问道：“你有什么事与我们商议？”“在我身后有一大队商人同行，保运人有十几人，在这十几个人中有我的几个朋友，我们能否联合起来将这队商人吃掉？”众匪听说能发大财，都满口答应。王狮子对他们说：“要联合行动，我需要与你们头目制定一个计划。”土匪头目说：“你有什么妙计？”“让众位兄弟在山口监视，请你随我到这边来。”王狮子说着将那位头目带到一个巨石后面。王狮子对他说：“我有一样东西让你看一下。”说话间，王狮子将钱袋放在一块石头上：“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那个头目急忙蹲下去，正要打开布袋，王狮子手疾眼快，刀起头落，将这头目杀死。随后，王狮子又跑回来对另外几个土匪喊道：“把这些钱先给你们，然后布置行动。”王狮子故意将这些钱撒落在地上，土匪们一见钱，都急忙去拣，王狮子乘机冲上前又杀死两名土匪，另外三个土匪吓得连滚带爬拼命往山下逃去。王狮子也没有追赶，赶忙下山了。

那位商人一直在山下等着，听到山上也没有什么动静，正在犯疑，忽见王狮子下来，急忙问道：“情况如何？”“我们放心地通过这个山口吧！”这样王狮子就护卫着这个商人，终于到了陕西。

王狮子做了几年保镖后，赚了些什么钱，在朝邑县城开设了一个赌场。那时的刀客除了做保运人外，另一桩经常干的事情就是赌博。王狮子和几个刀客一起，无论是在平日，还是集市庙会，总是摆着赌博摊子，刀客们自己赌也让别人赌，很讲信用，输多少给多少，并没蛮不讲理。王狮子开设这个赌博摊子一来是为了生计，二来是为了结识一些刀客豪侠。由于王狮子为人仗义，他的刀客朋友遍布各县，尤以陕西东部的各县为多，成为一带的刀客领袖。各县的刀客如遇到什么灾祸，都求助于王狮子。

蒲城县李满盈是当地的一名刀客。县里有位大商人赵一林，勾结官府囤

积居奇。宣统元年，蒲城一带发生旱灾，饥民遍地。而赵一林却乘机在粮食中掺上沙土出卖，当地人对他的恨之入骨，宁可去要饭也不去买他的粮。赵一林勾结官府派兵在各路口把守，不许饥民外逃。李满盈与当地的几名刀客联合一部分饥民，杀掉了赵一林，并把粮仓的粮食分给饥民。官府派衙门的差役四处捉拿李满盈。他便逃到朝邑县投奔了王狮子。王狮子让他装扮成赌客，在他的赌博摊子上帮忙。以逃避官府的追捕。

蒲城县衙门得知李投奔了王狮子，便勾结朝邑县官府共同抓捕。

这一天，王狮子和几个刀客正在赌博，忽听官府来抓人，他赶紧让李满盈藏了起来，自己去见差役，其中的头目对王狮子说：“快把李满盈交出来！”“我从不知李满盈是何人，你们一定是找错了地方。”王狮子冷静地答道。那位头目对众差役大喝一声：“搜！”王狮子见事不好，连忙拿起刀拦住。众差役一拥而上，双方打斗在一起，屋中的众刀客也乘机杀出。差役们哪是他们的对手？一会儿，七八个差役被杀，剩下的几个吓得跑回了衙门。

刀客们知道闯下了大祸，都劝王狮子一道离去，王狮子说：“我们要分散开逃去，你们往北走，我往东走，官府不会全部抓住我们。”情况紧急，几个刀客向北走后，王狮子却一直没走。终于被知事王焕墀抓入班房，将王狮子定为“巨奸”，命差人在夜晚杀害王狮子于城内瘟神庙前。时宣统二年9月26日。

青帮内讧闹西安

陕西原无青帮组织，杨虎城将军率十七路军返陕后，青帮便在这一地区开始活动起来。

先是西安警察总局侦缉队队长刘海亭摆设香堂收门徒，接着，警察总局科长叶鑫甫和省政府秘书康叔平也先后摆堂纳徒。这三人都是青帮通字班。

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后，由沈阳来的青帮大字班王大同也到了西安。他在西安招收的门徒都成为通字班。这引起了当地青帮头目刘海亭、叶鑫甫的不满。而王大同认为，他本人是大字班的，招收的门徒理应就是通字班的，与刘、叶无关。由于刘、叶是本地人，又是当局的官员，因此，加入他们青帮组织的人很多。而王大同辈数大，加入的青帮分子辈数也大，有不少人加入了王大同的青帮组织。在抗日战争前夕，西安城就形成了两股青帮势力，二者之间的积怨也日深。

刘海亭为了排挤王大同，扩充自己的青帮势力，在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中积极发展青帮分子。当时的政府官员中、有不少是刘海亭的好友，认识他的人也很多，加之刘海亭乐于助人，因此，政府官员中许多人加入了他的青帮组织。而平民百姓觉得刘海亭是个官吏，入了他的青帮，也算是有了靠山。西安郊区的一位农民王占青在灾荒之年向本村财主王兰福借了钱，由于利滚利，王占青在三年后仍未还清，王兰福硬要让王占青用自己的一亩好地抵押，王占青不同意，二人便打官司。王占青听说刘海亭招收青帮分子，加入后容易办事，便也加入了进来。王占青在打官司时，托人托到了刘海亭，在刘的帮助下，王占青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这件事传开后，西安城内外的平民百姓，有许多人都加入了刘海亭的青帮。

刘海亭因与王大同有矛盾，一直想找王大同的把柄，但苦于无法下手，最后，决定行刺王大同。

刘海亭选中了一个叫赵龙山的人去当刺客。赵龙山本是无业游民，也会些武功。常常打劫商人，在当地是一霸。加入青帮后，给刘海亭惹了不少麻

烦，刘一直想抓他入狱，考虑到他是自己的青帮分子，故迟迟没有动手。用赵杀王大同可谓是一箭双雕。

刘海亭将赵龙山找来，向他吩咐了此事，并答应事成后，让他在侦缉队当一名小队长。赵龙山考虑能得到刘海亭的重用，也乐于卖命。

一天晚上，赵龙山假装给王大同送礼，来到了王的住宅。王大同刚盘算完一批货，正在休息，听得有人求见，赶忙迎出去一看。原来是刘海亭手下的一个青帮小头目。赵龙山见到王大同后说道：“王大人在上，晚辈打扰了。”“大英雄光临寒舍，有何贵干？”王大同答道。“晚辈近来生活无着落，想在长辈的商店找点事干，不知长辈能否答应？”赵龙山问道。王大同一听，心中一惊，因为他知道赵龙山在西安南郊一带为非作歹，抢劫了商贩不少财物，岂有生活艰难之理？但在表面上却说：“你我都是青帮一家，何必客气？”王大同答应了下來。又闲谈了一会儿后，赵龙山便说：“多谢长辈关照，晚辈告辞了。”当王大同送至门口时，赵龙山猛地回头，抽刀刺向王大同，王大同是青帮老手，早有戒心，急忙闪开。随声喊道：“来人！”即刻，他手下的几个青帮分子，棍棒齐下，将赵龙山打死。

事后，刘海亭反咬一口，说王大同让手下的青帮分子，打死了前来谈生意的赵龙山，王大同也有口难辩，非常被动。随后，刘海亭又派自己青帮中的地痞、流氓，成群结队地到王的商店前骚扰。顾客们都不敢来买东西。

有一天，王大同手下的店员，见到刘海亭帮的人拦一些顾客，气愤不过，上前制止。刘海亭的青帮分子上来围住这个店员就打。其他店员都是王大同手下的青帮分子，一起涌出，两股青帮分子混战在一起，秩序大乱。双方直打得力竭气衰，方才罢休。后来，经张学良出面，才算将此事平息。王大同深感在西安难以立足，便悄然回到了东北。西安解放后刘海亭逃亡上海，不久被捕病死于劳教所。

#### 洪帮发财武威县

1913年，从兰州来的洪帮分子郝汉礼、秦大爷来到甘肃武威县，自称是同统山副山主，以卖茶水为名，发展帮会成员。他们为求得官府的支持，大力吸收衙门人入会，在武威县衙门内形成了一股洪帮势力。郝、秦二人死后（1928年前后），武威人伊万年、杨卫成了当地的洪帮头目，他们的人都是武威县衙门的补班头（捕捉盗贼的人）；手下有12个将爷，都是洪帮骨干，伊万年、杨卫凭借衙门的势力，欺压平民、无恶不作，人称“阴阳二太岁”。

阴阳二太岁为了扩充洪帮在武威一带的势力，成立了“双龙山”，把帮会的组织进一步完善化。双龙山的纲领是：“重新设计引群仙，降世星辰烈满天，福寿宫里常摆筵，文兴武庆太平年。”口号是：“双龙山、忠义堂、长江山，福寿香。”

阴阳二太岁既是洪帮头目又是衙门的班头，他们最拿手的好戏就是“抓贼”，表面上是为民除害，实际上是借贼之手坑害平民。

他们抓来贼之后，令贼栽赃，诬陷好人，借此敲诈勒索。对于二太岁来说，抓贼如抓宝，每抓一个贼，他们就发一笔财，在他们的家中堆满了各种财宝，二人靠这个发了大财。当地人都说他们发了“贼财”。陈家沟有一村民陈大柱，因经常到外地做买卖，赚了钱，不料家中被盗。这时全村的人都害怕起来，纷纷把自家的财物藏起来，以防贼被捉住后，将赃栽到自己头上。陈大柱见到村民都很紧张，心想即使报了官，自己的财物也不能追回，并有可能连累乡亲们。因此他就没有去报告官府。阴阳二太岁知道了这件事，

大为恼火，派差役将陈大栓抓了起来，以护盗为由，将他痛打一顿，还坐了10天班房。

为了防止人们有贼不报，断了他们的财路，阴阳二太岁还想出了另一个“高招”。他们命令各村的村长，定期报本村盗贼的情况，不报者受惩罚。各村的村长为讨好他们，将各种小偷小摸之事都报给他们。这样一来，反倒做贼的人少了起来。后来阴阳二太岁不再抓贼了，又干起了“养贼”的勾当。他们在洪帮分子内部专门挑一批贼头贼脑的人，怂恿他们去做贼。每当盗窃财物后，做贼的就赶紧找抓贼的，抓贼的等着做贼的，每次出动他们都事先约定好时间、地点，允许这些“贼人”带着赃物跑回衙门，如此干起了明偷暗抢的勾当。多行不义必自毙，阴阳二太岁作恶多端，为人民所痛恨。后来，杨卫被人杀掉，伊万年在1940年，脖颈生了对口疮，疼痛不止，大叫身亡。

## 八、台岛竹联

### 1. 天下第一帮

1949年，即民国三十八年，几百万人随着国民党政府一涌而入台湾，使整个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陷于混乱状态。这些来自大陆各地、操着不同方言、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外省籍人与本地居民挤在这块弹丸之地，所受的生存压力简直难以想象。大批青少年由于失业、失学或家长的疏失而流落街头，聚众斗殴。尤其是那些刚踏入人生大门的外省籍孩子，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父母因苦于生计而疏于照顾，因此常受到本地弟子及社会渣滓的殴打侮辱，受的罪也就更难想象。渐渐地，他们开始抱团成伙，依不同的居住区、出气和就读的学校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以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来渲泄心头的失落感和苦闷之情，用拳头和刀棒来维护各自人格的尊严，回敬仇敌的凌辱。

因“江南命案”而“闻达于诸侯”、“享誉”于海外的竹联帮，便是这些少年帮会中的声名最著者。

竹联帮是竹林联盟的简称，因其组建地而得名；正式立帮的时间是1953年，当时叫中和帮，由一个叫孙德培的中学生率领，其成员也大多是台北市永和镇的中学生。刚开山时，也只是十几个人的一支小太保队伍。

孙德培个子矮小，难免会常常受到那些人高马大的同学欺侮。他的父亲就请了龙虎武师教他武术，使其练就了一身娴熟的功夫。拳头硬了的孙德培在混战中崛起，由孩子王而为一帮之主，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他率领手下的“五虎将”，与其他少年帮派争夺地盘，向摊贩收取“保护费”，很快就成了从萤桥到秀朗与永和交界的一条长街上的霸主。刺杀江南的现场主持人陈启礼，就是这个时期拜入中和帮，开始他的黑道生涯的。

一年之后，孙德培在一场帮派火并中打死了一个叫周天送的少年，锒铛入狱。失去头领的中和帮因“五虎将”的互不买帐而成分崩离析状，甚至有人投入了敌对的四海帮和万国帮。五虎将之一的潘世明于1955年率先组成万字帮，在水源地一带打天下；另一位虎将湛洲吾于1956年2月也拉出一个山头，组成三环帮，在台大、师大、泰顺街一带混世界。剩下来的帮众虽仍然奉中和帮为正宗，但常常内讧，属于强恕中学的学生与属于励行中学的帮众经常打得鼻青脸肿。结果，这竟然成了中和帮兴旺发达的契机。

1956年，以赵宁为首的几位“有识之士”，痛感于中和帮的中落，倡议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克服分裂、重振声威。这一倡议得到不少好事之徒的响应，他们于6月的一天纷纷赶到永和镇竹林路尽头的一片竹林里，结成了所谓“竹林联盟”，即竹联帮。这时候你如果恰巧路过，走进这片茂密的竹林，便会幸运地看到这一番只能在章回小说中看到的情景：

两百左右的中学生混混儿围着一罐酒席地而坐，都是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从中走出几个头领模样的人来到酒坛子前，把三柄匕首一一插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

“第一刀，插中央，叛帮出卖弟兄的，千刀万剐无人葬！”

“第二刀、第三刀，刀口刀刃向外方，齐心协力对外帮！”

三刀插毕，众人依次沥血入酒。几个帮众排开一圈大海碗，斟上血酒。先是几个帮中头领，即后来的各堂堂主捧起海碗，口诵帮词：“竹叶飘飘片片生，竹棍光光根连根；狂沙万里皆竹联，做笑江湖唯竹尊。”诵毕，仰头



将血酒一口饮下。其余帮徒，效仿首领们，一一来过。

成立之初的竹联帮，约两百来人，大都是安置国民党军人及家属的“军眷区”内的中学生。为表示对身在狱中的孙德培的尊敬，规定不设立帮主。帮中设堂，各堂有“掌法”一人，主管堂中事务。帮中大事则由各堂掌法会商处决。当时设了狮、虎、豹、凤、鸭五个堂口。其中鸭堂的掌法是周格，绰号“旱鸭子”的陈启礼便是他手下的一个小混混。这一时期，竹联帮主要在冰果店一带活动，以打群架、向摊贩和三轮车夫收保护费为主要活动内容。武斗时多以钢丝鞭、飞轮等“冷兵器”为武器，偶尔出现一、两把武士刀就称得上“现代化”的东西了。

进入60年代，竹联帮的势力开媳强盛起来，“旱鸭子”陈启礼脱颖而出，坐上竹联帮的前排交椅。旱鸭子的飞升和竹联帮与四海帮的“世仇”有关。

四海帮的骨干分子是台湾大学的学生。1955年5月，一名冯姓和一名王姓的大学生，在台湾大学校园内召集了44名一、二年级学生，以四海篮球队的“四海”为名，组成四海帮，成为台湾第一个最具组织规模的青少年帮派组织。四海帮的成员多为富家子弟，有些还是国民党高官之后，因而帮会的财政基础好，帮众的文化素质也高。他们以“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打平台北”为口号，以“一条心，二不白（不白吃、不白嫖），三结义，四海为家”为帮诀，以某些帮众家的公馆为据点，活动于西门町、台湾大学、北商一带，专门找“凯子”打架斗殴。凯子就是他们看中的有钱好欺侮的富家子弟。竹联帮的陈启礼、董桂森这两个“江南命案”的首犯，在读中学时就当过他们的凯子。可以说，竹联帮帮众与四海帮的仇恨始于他们成为帮众之前。1957年9月，竹联帮初定“帮规”时，第一条就是“专门对付四海”。可见，打击四海帮乃竹联帮的第一使命。

竹联与四海的打斗几乎从未止息，双方的恩怨也就越结越深，1959年，四海联合文山、三环等几个小帮派，大举围剿竹联，迫使竹联退避三舍，含韬养晦。如果说黑道活动就是地下活动的话，这时的竹联就是处于地下的地下了。1960年，经过一年涵养的竹联恢复活力，并在春节之夜绑架了四海一个绰号叫加贝的头目，带到中和郊野施以酷刑，剃了他全身毛发。嗣后，竹联乘胜追击，收复失去的地盘，一时间名声大噪，不可一世。1962年3月6日，四海帮因犯案而宣布“解散”，帮中干将纷纷金盘洗手；竹联帮乘虚而入，宜捣四海帮老巢。使其一蹶不振，沉寂多年。此役的头号功臣，便是陈启礼这只与四海仇恨似海、在战斗中茁壮成长、在竹联帮内羽翼渐丰的旱鸭子。

60年代前期，竹联帮在人才方面亦有充实，一批后来成为其灵魂人物的新鲜血液加盟竹联。1964年，在南海路帮担任“护法”之职的张安乐投身竹联，成为竹林中的一只“白狼”。此人旋即成为竹联的狗头军师，在“江南命案”查审期间曾公开在大众传媒露面，名噪于海内外华人社会；向江南射出致命一弹的“鬼见愁”吴敦，也是在1965年与白狼前后拜入竹联。

这一时期，对竹联帮势力膨胀贡献最大的当数另一位新进人物绰号“杨站长”的杨剑平。他率领凶狠的“竹联远征军”四面出击，横扫台北市各地大小帮派，尤其是打下了西门町这块原属四海帮的“黄金宝地”，从经济上保障了竹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至1966年，竹联帮已有帮徒上千人。在接掌了台北市帮派的龙头地位之后，其远征军更南下台中、桃园、嘉义、台南、高雄、彰化；打拉结合、恩威并施，铁蹄所封，各帮派望风披靡，大有一统江湖之势，被当时的黑道许为“天下第一帮”。

## 2. 黑道“现代化”

### 2. 黑道“现代化”

60年代后期，台湾经济起飞，现代化浪潮之中黑道角头帮会在组织结构、武器装备、观念意识等诸方面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最早具有现代社会组织特色的是竹联帮的世仇四海帮。前面说过，四海帮的骨干是一批大学生，成员文化素质较高。建帮伊始，他们就效法其父辈治党治军的方式治帮。帮中元者十分重视人才的吸收和训练，订有考核制度。考核分初审、复审、决审；考核的项目包括体力、智能、反应、口才、仪表等。帮众有职业化分工，分属于战斗组、社交组、经济组、内务组等。四海帮也是最早走向企业化道路的黑帮之一。他们仿效美国的黑手党，以发展企业作为帮派生存的基础。除开设赌场、舞厅等特种营业之外，还在台北复兴北路开了个期货公司，大搞买空卖空，在买进卖出的差额上做手脚。参与期货买卖的商人如发觉受骗上当要报案，他们就亮出凶器，露出黑道的本来面目。有了本钱的黑帮进一步公开化，纷纷组建营造厂、建筑公司、煤气公司等合法企业，甚至开始插手演艺界，组成影业公司和大众传播公司，以暴力为后盾，包档包秀，从歌星影星身上大赚香艳之钱，又得皮色之便，可谓双倍的实惠受用。就在竹联帮拳打全岛之际，它也开始向它的世仇四海帮看齐，注重人才培养、组织管理与企业经营。其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有灰鸭柳茂川、白狼张安乐、元老周榕，当然也离不了陈启礼这位竹联帮的“教父”。

1967年，柳茂川服役退伍后，靠着家中的万贯家私，从永和镇选了几十名竹联帮众，在新生北路“中兴妇孺教养院”中集训，成了竹联帮训练亲手的高等学府。这批未来的杀手每日里跑步、打球、练剑道，灌输帮派思想，传授黑道活动经验，交流临场打斗体会。柳茂川组织的这个“战斗堂”，实际上已具有一定的职业武装性质，后来竹联帮的突击队即是在此基础上组建而成。

大约在1967年底，陈启礼在赌场中结识“赌博郎中”陈仁。旱鸭子慧眼识英才，将其网罗入帮，从此两人通力合作，一个诱“凯子”入局，另一个则凭高超的作弊手段榨财，自然是财源滚滚、财星高照。早期竹联帮众靠家里零用钱接济度日的时代一去不再。

1968年，竹联帮杀手型巨头之一，绰号“杨站长”的杨剑平因打斗犯案，与几名竹联头目相继入狱；1970年7月，“赌博郎中”陈仁私吞帮中60多万元台币的基金后想抽身脱帮，并向警方请求保护。陈仁的叛帮行为迫使新近成为帮中实际上第一号人物的陈启礼不得不动用帮规，清理门户。否则既不能服众，也不足树威。旱鸭子派出张如虹等三人，在西门町闹市区找到陈仁，将其连砍三刀。竹联帮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人群中行凶杀人，震动了整个台北，成了当日各大小报的头条新闻，警方因之大力搜捕陈启礼等人。7天后，陈启礼在台南市的藏身之所被逮捕，送绿岛管制6年，作了当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李敖的“同窗”。

竹联帮巨头纷纷落入法网，一时间元气大伤，进入不景气阶段。这时“白狼”张安乐在几位帮中头领的敦促下粉墨登场，重组竹联。张安乐是淡江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凭着学得的一些历史知识，模仿满清八旗旧制，组成了“新竹联”。新竹联制定红、白、黄、蓝、黑、灰各色旗帜、用虎、豹、龙、狮、熊、凤、狼、鸟为名立堂，确立堂口制度。每堂有堂主、护法、副堂主等人，张安乐自任总掌法，遥尊陈启礼为总堂主大哥。新竹联在其成立大会

上确立了遍设赌场广开财路、吸收新人扩大基层组织两项方针大计。

张安乐意识到在工商社会之中，发展组织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能搞到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组织才能生存壮大。暴力只是手段，暴利才是目的。因此，他在广辟财路的同时，完善了帮内财务管理体制，建立了所谓“母金提留与流动资金的分层管理制度”。其要点是，基层组织开赌场及收取的“保护费”、“抽头”，分层上缴留成，缴入总堂的称为母金，平时不得动用，专为受警方通缉的在逃帮众和抚恤入狱帮众及在打斗中死伤帮众的家属而备，也可以视财政状况的好坏而作为开设新企业的本金。

竹联帮的基本成员都是些在校或中途退学的中学生，打

架虽然狠凶，常常令四海帮的大学生帮众望风而逃，其仪表风度却没法儿跟人家比。张安乐出掌新竹联后，一方面向他们灌输“国家民族”观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教他们待人接物的礼数，把他们手上的破表换成金表、布鞋换成皮鞋，让他们脱下牛仔裤、T恤衫，换上了西装领带、名牌衬衫。在张安乐的着意整顿下，这批新竹联小兄弟的帮派意识已初步成熟，其手下“鸟”、“狮”、“豹”辈的弟兄一个个沐猴而冠，为人练达起来，亦能担当独挡一面的重任了。

白狼张安乐虽然宏才大略，但资历不深，难令以周榕为首的老竹联帮众眼气。这期间的竹联实际上分成了新旧两派，双方各行其是，互不买帐，后来在柳茂川等人的协调下，才勉强组成松散联合。这期间发生了新竹联分子在台北街杀人为警方通缉的事件，新竹联在警方压力下被迫解散。同时，张安乐也因帮内分子的明争暗斗而心灰意懒，于1975年去美国留学深造。

368

在陈启礼被管训之后，竹联元老周榕成了名誉老大。周榕早在中和帮成立之初就是“五虎将”之一，排名“老幺”，竹林结盟之后，仍然位居“老幺”，是陈启礼的顶头上司。他可以说是竹联中自始至终仅存的资深头目，即使作了竹联帮教父的陈启礼，对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大管束，留几分香火之情。周榕曾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几年，混到少尉军衔后退役。退伍后的周榕立即与往日的竹联兄弟沆瀣一气，开赌场、办公司、插手演艺界，是竹联走向企业化道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周在作期货生意时结识了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重要成员永野一郎、未户千秋等人，于是走向黑道国际大联合的道路，双方在台北敦化北路国泰金融中心买下两层楼面，办起了“香港恒升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这期间，竹联帮在武器装备上也逐步实现了现代化，进入“热兵器”时代。他们用已掌握的现代化武器，与“世仇”四海帮狠狠地干过几仗。先是与竹联帮交往密切的港台武打明星王羽等一干竹联兄弟，在台北民生西路杏花阁酒家，为争夺一个绰号叫“贵妃”的粉头而与四海帮人马大打出手，开枪见血，酿成所谓“杏花阁大血案”。其后，已入竹联帮的王羽在台北南京西路天厨餐厅吃饭时为四海帮头目刘伟民所派的枪手暗算，受重伤后幸免一死。不久之后，台北法庭开庭审理“天厨餐厅血案”，王羽手下竟在法庭走廊上当众砍了四海帮头目刘台生一刀，造成轰动港台各界的“法庭大血案”。

“三血案”之后，竹联帮为警方所忌讳，气焰稍有所抑。

1976年，旱鸭子刑满获释，飞回台北。他先是有过脱离黑道，过普通人生活的念头，多次拒绝与往日弟兄来往。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方面是往日弟兄的拉，另一方面是警方与社会大众的推。于是，在白道上谋生有成

的陈启礼再度下海，重整竹联帮。

在监狱这所大学校磨练成熟的陈启礼如今已是今非昔

比，更上层楼。竹联帮在他出任总堂主后，势力急速扩充。到 80 年代初，已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地、至、尊、万、古、长、青、东、西、南、北”等 28 个堂口，每堂二三百人不等，最多者 800 多人，总计约有三四万人之众。其基本帮众仍是失学、逃学的中学生，称为“竹叶青”。一时间，“竹叶青”满街走，竹联帮处处有。竹联各堂口之间基本上独立活动，只维系一个联盟的形式。但陈启礼由各堂口中挑选出了一批强悍的帮众，组成所谓“竹联帮突击队”，由总堂直接指挥，专门用于需要显示武力的场合。因为组织过于庞大，各堂口之间有时也会发生争夺地盘之类的打斗事件，连陈启礼这样智勇双全、德才兼备的人有时也觉鞭长莫及，难以控制。

竹联帮各堂口以收保护费、开赌场、搞色情特种营业为重

要经济来源。除控制电影院、戏院、夜总会及其他娱乐场所外，还拥有各种合法商店、公司，从事建筑、水电、桥梁、公路、铁路等工程的承包施工，并开设银行，投资金融事业，代办运输，插手营运业等等。陈启礼为扩大社会影响，还极力打入文伦圈，出版报刊杂志、直至侧身于社会名流。据好吹牛的“黄鸟”陈志一透露，竹联帮实际上控制了台北市 50% 以上各类型生意。财大气粗后的竹联帮鸟枪换炮，除各堂口配备有先进的枪支弹药外，还有武装组织“突击队”和训练专职打手、杀手的训练营。从 1982 年起，在石碇山区、鹭鸶溪畔的训练基地，每三个月就有一批职业凶手学成毕业。竹联帮还拥有自己的律师，“拿法律玩玩”还不算什么，甚至插手地方选举、操纵地方政治运作。处于鼎盛期的竹联帮，更将其势力延伸到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这期间，赴美留学、经商的竹联骨干分子“青蛇”邓国洋、“黄鸟”陈志一、“白狼”张安乐等人在美国打下了基础，其成员遍布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休士敦、费城等大城市，号称 1 万多人。在香港，竹联帮设了分堂——侨堂，帮众约 150 多人，大都栖身于娱乐圈或体育界。另外，日本、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南非等地也存竹联帮的势力。上述国家和地区与竹联帮挂钩的黑社会组织计有：日本的山口组、赤旗军；美国的华青帮；菲律宾的虎克党，香港的十四 K 等。

据台湾特务机构透露，1985 年前后，竹联帮主要堂口及头目如下：

总堂主：旱鸭子陈启礼

总护法：鬼见愁吴敦

执法：陈功

总巡查：么么黄少岑

巡查：汪沛雷、船长林庆增、小蔷薇张启民

忠堂：堂主董桂森

孝堂：堂主花枝花继忠

仁堂：堂主项美华、副堂主冯在政

爱堂：堂主刘振南、副堂主张恕隆、汪裕弘

信堂：堂主蕃蕃邱文钦

义堂：堂主大锤杨榕顺

和堂：堂主周士弘

平堂：堂主小鬼黄云龙

天堂：堂主狗仔王国庆  
地堂：堂主李宗奎、副堂主张北华

371

至堂：堂主小佛张伟华  
尊堂：堂主彭荣沪  
万堂：堂主阿斌  
古堂：堂主阿南陈水南、副堂主郑文斌  
长堂：堂主鄧长老  
青堂：堂主老鼠何根成

一帆风顺的陈启礼这时已是得意忘形，不思进退之度，竟想效法青帮大亨，作杜月笙第二。1984年8月，陈启礼从国民党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处接受刺杀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的密任；同年10月15日，江南命案发生；同年11月13日，台湾当局为了控制局势，掩盖江南命案真相而实施所谓“一清专案”，陈启礼第一个被捕，此后，竹帮重要成员数百人相继落网。

1985年1月，潜至日本的竹联帮“冷面杀手”刘焕荣被日本警方逮捕，随之移交台湾当局。

同年9月16日，竹联帮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分支机构被美国联邦警察局破获，首要分子无一漏网。

同年9月20日，杀害江南的凶手之一董桂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被捕归案，引渡美国。

至此，横行江湖三十年的竹联帮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但有道是，百足之虫，虽死犹僵，谁也吃不准这个黑道大帮会有没有重振雄风之日，东山再起之时。

### 3. 杜月笙第二

前面说过，旱鸭子陈启礼于1962年率领一帮弟兄端了四海帮的老巢。竹联帮由此兴旺发达，成为“天下第一帮”，陈启礼也因此脱颖而出，进而成为该帮的龙头老大；1984年，陈启礼受国民党利用，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导致竹联帮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因此，可以说竹联帮的兴衰与旱鸭子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旱鸭子从一个受人欺诈的中学生成长为名噪海内外的黑道一霸，在台湾新一代黑道帮派人物中，也可说最为典型。

陈启礼祖籍江苏太仓，本人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49年，7岁的陈启礼随着父母一道去了台湾。

陈启礼的父亲现在是台湾一家大报《联合报》报社的人事室主任，名叫陈钟曾。在大陆时曾任职于四川省政府，到台湾后，长期任法院推事。陈的母亲也在同一家法院的财务法庭担任书记官。有一句老话，所谓“严义慈母”，用在陈启礼头上可以说再恰当不过。母不仅慈，而且在其丈夫前还显得懦，这样一来，在一般中国家庭常见的那种“父亲手挥鞭，母亲身相护；父训于前，母哄于后”的场景，在陈家本见不到。虽然有“棒头出孝子”之说，但出个把反叛之徒也不足为奇。

陈父可谓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谨守书诗传家的传统，从小就对陈启礼抱有非常高的期望，用一整套严格的礼教规范来要求他、训练他。他本人熟读典籍、书画亦佳，颇有几分才气，对于将来要担当“光宗耀祖”重任的儿子，书画琴棋，无所不教。更有甚者，陈启礼刚刚10岁的时候，就得每天清

晨4点钟起床，用手推石磨为全家人磨早餐吃的豆浆，因为按陈父的逻辑，也是孔圣人的逻辑，欲成非常之志，先受非常之苦，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怀才不遇的父母期望在儿女身上看到自己未曾取得的成功，原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人之常情，但陈父望子成龙之心太切，其训练陈启礼的方法，似乎着着在考验儿童潜力的极限，其结果如何也就不难揣测。刚刚10岁的陈启礼，当然不能理解老父的良苦用心，小小年纪便视上学为解脱，视回家为畏途。在解脱的天地里自由地释放家庭中压抑的能量，也就成了他维持身心平衡之道。因此，他个儿虽然不大，在学校却以好勇斗狠出名，常常与同学们打得头破血流。特别是在大陆籍孩子与台湾本地孩子发生争斗时，陈启礼总是冲锋在前，每仗必打，很快就成了他那一茬大陆籍子弟中的“孩子王”。而每打一仗，必有人上家来哭诉，因为同学们吃准了法官先生家教之严，每告一状自有上顿重重的板子等着陈启礼，每挨一顿板子，陈启礼幼小的心灵就会与这个家庭，社会拉出一段距离，他开始寻求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

14岁的陈启礼在强恕中学时，遇到了一件改变他整个人生态度的事。有一天，他的手表和钢笔在回家的路上让一个大他几岁的少年抢了，他先是找了父亲，又找到老师和校长，学校和家庭在解决这件事时却显得无能为力，近在身边的强徒不仅未受丝毫惩罚，被抢之物竟然也索之不得。从此之后，陈启礼对家长与社会抱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终于破灭，得出了第一条不是来自家长和老师的的人生哲理：家庭和学校并不能真正替他解决什么问题，朋友和拳头才能在困难面前显出力量。陈启礼之父后来忆及此事，曾感慨良深地说道：“当时，我看到他那满是失望的眼光就明白了，这孩子以后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来告诉我了。”

其实，早在1952年，12岁的陈启礼就加入了中和帮，在“中和五虎将”之一的周德新、“老幺”周榕的带领下开始混江湖。为了逃避家长的监督，他每天骑车到学校，把车放到学校附近之后再回到竹林中向周榕等大哥报到，然后或盟兄盟弟们比划拳脚，或与仇人对头动拳动脚。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便回学校附近取了车骑回家，俨然学后归来。久而久之，陈父当然不会被蒙在鼓里，眼见儿子越来越野，便与学校商量好，要儿子每天带一本联络簿，由上课教师签上上下下课后带回家，缺一节课便是一顿板子。这样一来，陈启礼干脆连家也不回，由逃学而至逃家了。

陈启礼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他14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对家庭与学校彻底失望之后。他后来曾向朋友描述过当时的感受：当他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自己不是睡在家中的床上，而是躺在一栋破房的干草堆里时，心中有种难道其妙的轻松感。他感到了完完全全的解脱，完完全全的自由自在。从此之后，他便决心自己管自己的事，自己拿自己的主意。因此，陈启礼常向朋友们表示，他最恨人家说他是因为家教不严而走入歧途。不，他是因为老子管教太严了，要求太高了，这才走上了反叛之路，开始他的黑道生涯的。

1956年，永和镇竹林大结盟之后，陈启礼与他的中和兄弟们自然转入竹联，成为鸭堂中的一员悍将。因他打起架来不要命，只知进不知退，“赢”得了“悍鸭子”的称号。又因他不会游泳，每次弟兄下河戏水他总抱膝而观，悍鸭子便成了旱鸭子关于其绰号的来历还有一说，亦与其作战勇猛有关。

陈启礼加盟竹联不久，陈父将其转入南强中学，企图把他与那帮不良少年隔离开来。但此时采取任何措施都已嫌晚，陈启礼反其道而行之、与“青

蛇”邓国洋等人组织了“南强联盟”，成为竹联帮势力扩充时期的一个重要分支组织。从此，陈启礼由一个普通的帮派小喽罗成了颇有点权势的黑道小头目。

陈父的“意志训练”未在“光宗耀祖”时建功，先在帮派火并中立威。有一次，从中和帮分裂中出的三环帮一个老大因小事与陈启礼起了争执，将陈的左臂砍伤了，陈父见他整天吊着绷带养伤，一心想着伺机报仇，这时已不敢教训他了，只是担心儿子有仇必报不服输的性格，会闹出人命大事，便拉扯上陈的母亲四处跟踪陈的踪迹，想诉诸母子之情来消弥一场大祸。但任凭父母喊哑了嗓子，陈启礼吊着发炎红肿的膀子躲在酷热的竹林之中就是不出来。陈父知道儿子强烈的复仇欲和自尊心只能用软的办法，便老着脸皮找到那个三环帮老大的父母，说服他们带着儿子向陈启礼当面陪话示小，这才化解了一场怨祸。

1959年，陈父在无可奈何之中竟出新招，把儿子亲手送到了台北市警察局的“特别保护室”，试图做最后的挽救工作。在陈启礼铁窗独处的日子里，陈父每天下班之后便来陪他，教他念《古文观止》，诵“四书五经”。然而，已开始自己写自己的人生哲学的陈启礼，当然不会把这些腐儒之论放在心上，他要自己的人生哲学指导下走他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0年，陈启礼考入当时的淡江文理学院五年制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淡江大学，学的是测量专科。在积极投入黑道活动的同时，居然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而且成绩优良，倒也能说明他天赋不低。陈父每每见高分成绩单，于忐忑之中颇觉欣慰，以为浪子回头有望，然而，1962年发生的事使他对这个聪明的儿子又一次失望了，彻底失望了。

1962年，陈启礼率领一帮弟兄端了四海帮的老巢，由此一飞冲天，成了竹联帮最具实力的老大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彻底地与学校割断了联系，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职业黑道头目。

1967年，有勇有谋、智勇兼备的陈启礼成了竹联帮的头号老大，开始掌管一帮大事。这时候，他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台北市理发公会会长、红楼剧场经理陈惠文。陈惠文早年混迹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当过青帮的小头目，是杜月笙的再传弟子，到台湾后，陈惠文先在台北西门町落脚，广结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一度拥有三百多名弟子，并想伺机恢复青帮组织。陈启礼与他相见恨晚，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杜月笙的黑道轶事，也学到了不少的黑道经验，尤其是用暴力控制娱乐场所的“知识”，陈启礼现炒现卖，竟是大获成功。他把自己的手下干将派到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充任“业务经理”、“场务经理”，真是外行领导内行，铜钿滚滚入帮。可惜好景不长，良师益友陈惠文的所作所为早为警方所忌视，在陈启礼与他相识数月之后被警方抓到一点由头，被判管训三年。

这时候，陈启礼的个人生活中出现了绯闻，一个艺名“曼娜”的舞女成了他的相好，曼娜的真名已不可考。与陈启礼一样，她也是读过两年大学后中途退学的，只是陈启礼是因为要干黑道而主动弃学，她则是因为父亲盛年早逝，家中唯一能挣钱的顶梁柱垮了。她之为舞女，原也只利用业余时间挣几个钱，一来帮妈妈养活弟弟妹妹，二来为自己弄几个学费，然而，377这种场合里混久了难免染上恶习，又无陈启礼边干黑这边拿高分的才能，退学就舞也可谓是迫不得已。

如今的陈启礼已开始走向成熟，在黑道生涯中打滚，陈启礼逐渐悟出了

一点道理：要想在危机四伏的黑社会站稳脚跟，除了心狠手辣之外，更需要的是运筹帷幄、以智降力。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动辄拳们相向、凶相华露，最多只能成为一个逞凶于一时的流氓打手，决当不上杜月笙那样的流氓大亨。为竹联帮发展，他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常常彻夜不眠。在社交场合、他每每显得谦谦有礼，陈父早年对他进行的“礼仪训练”又开奇葩。加之他人长得清秀，赚了大钱之后衣着入时，作了帮头之后气度不凡，的确是一般倩女梦中王子。曼娜与他一筹而情动，她作了他怀中的人儿。他作了她心中的人儿。这在丈夫夜夜换、新娘时时有的风月场中，可谓是一件颇为罕见的事儿。

自与陈启礼相识，曼娜即抽身舞场，不再接待外客，虽知陈不会认真对待，也要勉力为其尽一时之欢。一年之后，陈启礼正式娶妻生子，曼娜即杳如黄鹤，从陈启礼的生活中彻底地消失了。如果不发生意外，她如今当还在台湾某地，或为良家妇、或为寮中娼。但不管为良为娼，对于铁帷重重之中的陈启礼，也只有遥寄相思，暗忆往昔了。

1968年，复活了的四海帮联合三环、文山等几个小帮派起而反抗，企图改变竹联帮独霸江湖的局面。竹联帮虽然捷报频传，但“杀人一千，自伤八百”，自身也陷入穷途末路。为摆脱这种不景气的状况，陈启礼广辟财路，进而谋求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他先和警界一名姓何的退休警察搭上了线，通过他认识了在中山区开餐馆的陆某。陆某受够了牛埔帮的压榨，便投入竹联帮，出资为竹联帮购买枪支弹药，帮助陈启礼迈出了武器现代化的第一步。

一块肥肉溜入竹联帮之口，牛埔帮当然感到不满，即使为着本帮在黑道中的声誉，也必须起而反击。1970年，一场久经酝酿的帮派大火并终于在七七餐厅爆发。在这场战斗中，竹联帮亮出了四支手枪和一支卡宾枪，牛埔帮则动用土炸弹还击，成为黑社会帮派进入热兵器交战时代的标志。

通过这一场大交兵，陈启礼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已成为现代工商社会的台湾要发展黑社会帮派势力，必须走全面现代化的路子，仅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化的组织分工方式、现代化的管理体制。于是，把竹联帮逐步改造成类似美国黑手党式的帮派的目标在他心目中确立了。陈启礼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使竹联帮“按理性的原则行事”，消除原始黑帮间义气用事、无利可图的争斗，即使有了仇隙，也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解决，不要凭藉武力逞一时之快。为此，他一方面改革帮务，一方面向往日的冤家伸出和解之手，准备和组建四海、文山、三环、牛埔五大帮派的兄弟联盟，以达共同谋利、五马分肥、共存共荣之目的。一时之间，陈启礼因讲义气、讲道理、热衷于主持公道而在台北黑社会名声鹊起、地位日重，成了黑道上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1970年7月14日，就在陈启礼踌躇满志、宏图大展之际，发生了“赌博郎中”陈仁卷款叛帮，陈启礼为正帮规而指使子下将其重伤的事件。旱鸭子因此事一跤跌入谷底，竹联帮也因此一度中落。

原来，陈仁之叛帮固然因为见钱眼开，也不是没有金盆洗手、为老婆孩子谋一份安稳日子过的想法，主要是受了一名索

379

贿未成而与陈启礼翻脸相向的刑警组长的唆使。这名刑警组长曾出面为一个木材商摆平赌债，想借职业的力量压制陈启礼。陈启礼于谈判的餐桌上当场翻脸，根本不吃他那一套。说来也是陈年轻气盛，尚未完全成熟。他一



脚踢翻酒席，点住木材商的鼻子威胁道：“到期还钱，一毛不能少，否则要你的好看！”又转头对那位警官大人道：“你干你的警察，我干我的流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没什么可谈的了！”

殊不知，井水固然不犯河水，河水泛滥起来则有可能淹没井水，而流氓与警察的关系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兵戎相见，绝不可能出现井水不犯河水的情形。于是，刑警组长与陈仁演出了一场双簧。陈启礼在顺境中过了一段顺风满帆的日子后不愿退让，亲自携带利斧化装成油漆工，先后多次前往汉中街华美整形医院找“赌博郎中”算帐，直至怂恿张如虹等三名帮众将其杀伤。

陈仁重伤后奄奄一息，却奇迹般活了过来，于是将竹联帮核心人物及砍伤他的前后经过和盘托出，警方将以陈启礼为首的竹联骨干及酒店合股人陆、何两位老板一举成擒。

1970年10月，陈启礼被提起公诉，判刑三年。也算是祸不单行，在他服刑完毕时，恰逢台湾国民党当局制订“防治青少年参加不良组织方案”，在1977年第一次办理“不良帮会自动解散登记”，陈启礼因之“青春二度”，被送往专门关管训政治死囚和甲级流氓的绿岛（即火烧岛）服刑，成了李敖的学年弟。李敖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一位知识分子，不仅挥笔痛骂国民党及其“大有为政府”，对那些一面向国民党当局献媚、一面又向台湾大众邀宠的党外文化人等也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为国民党所不容而于1972年以煽动叛乱罪被送入绿岛，又为高级小市民型的台湾知识分子所忌恨而冠之以“文化太保”。从此后，一文一武、一假一真两个太保在风光旖旎的绿岛之上比邻而囚、同监受训，直至1976年，国民党政府因蒋介石逝世而大赦，一龙一蛇重入江湖。

绿岛风光美丽，祖居于此的亚美族人的古朴风俗亦令人陶醉，其为台湾之圣赫勒拿。国民党当局看中了这里四面环海，交通不便，若置犯人于此，即使逃出监狱也难逃岛外。有关绿岛监狱内的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传闻，早在台湾大众之间广为流传，即使是黑道之中杀人不眨眼的硬角色也闻之色变，视为人间地狱。若一个黑道角头敢以“进绿岛”来起誓时，对其给予信任绝不会有错。

陈启礼被囚于此，受尽了人间折磨。数年之后，每当他酒醉谈起这一段往事，仍是唏嘘不已，泪洒衣襟。除了最残酷的各式刑罚，他还被逼吞吃自己的大便，甚至惨遭剥皮之苦。台湾狱政的黑暗更加扭曲了陈启礼本来变形的灵魂，更加坚定了他彻底反社会的决心，可谓是继陈父早年所谓“意志训练”之后的又一次“意志训练”。陈启礼没有被压倒，他在一次次非人的折磨中变得更成熟、更坚强了。

五年的苦囚生活，也使陈启礼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他开始苦读父亲寄来的古文史书，咀嚼自己的人生经验，反思黑道生涯的点点滴滴，并与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印证检讨，终于写完了他那黑道哲学的最后一章。以后的事，就是如何适时运用了。

尚在狱中，陈启礼就迫不及待地要检验其哲学的“真理性”了。有一次，他为了试验“众口铄金”的效果，利用出庭时同乘一辆囚车的机会，把一个流氓头子的嘴堵住，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回到狱中之后，他又让人大肆造谣，说那家伙如何如何“草鸡”，如何如何下跪求饶，架子倒尽，丑态百出。有人不相信那个平时骄横霸道死硬到底的家伙会如此丢人下作，乖乖就范，陈启礼又心生一计。当晚，他和几个同伙夹在那家伙两边睡下，乘夜深人静，

故作抽泣之声，再以耳语向挤得密不透风的囚犯们低语：听，那小子做梦都在撒猫尿求饶呢！果不其然，此事第二天就在狱中轰传开了。一个黑道上响当当硬梆梆的人物的名声就此毁了。

另外，监狱中的劳改生活也成了他试验管理方法、锻炼领导能力的场所。他运用黑道经验与科学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把同车间劳动的犯人按各人的体力和工作经验分成不同的几个小组，采取分工协作，按特长承包工作的流水线作业方式把整体生产联系起来，成效很是突出。几乎每次评比，陈启礼带领的职训班所做的外销纸花都超额完成任务，名列前茅。

五年的牢狱生活，虽然改变了他那锋芒毕露的外观，却没有磨去他桀傲不驯的棱角。他将锋芒深深地敛起，用仇恨的毒液磨得更加锋利。他变得老谋深算了，即使受到故意刁难，他已不再暴跳如雷。就是跳，他也是事先想好了跳的后果，觉得跳一下后果更佳才跳。

监狱真可谓是一座大学校，它代替淡江大学成了陈启礼高分毕业的唯一一所大学。在这里，陈启礼真正获得了作杜月笙第二的资格。

#### 4. 驰骋黑白道

1976年，“先总统蒋公”的故世为陈启礼签发了“绿岛大学”毕业证。但此后的一大段时间里，其所作所为说起来却颇令家人高兴，他似乎一夜之间改过从善，成了孩子的好父亲、妻子的好丈夫、父母的好孩子。他的名字被列入《工商企业名人录》，并获得过英国伦敦公布的“世界对社会公益事业卓有贡献者”称号。我们虽然知道他再入黑道的原因，却实在不明白他忽然改恶从善的根由，因此，叙述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只讲行为，不谈动机。

1976年的某一天，在台北市辛亥路四段的一栋小楼前，出现了一个脸色苍白、头顶早谢的三十出头的男子，浑身上下只有一双眼睛能表明他不是穷途末路之人。然而，面对白发苍然的双亲、木然呆视的孩子，他的眼神也很快变得黯然。

两个女儿望着这和陌生的穷汉不知所措，当她们的母亲哭着扑了上去后，方知面前的就是铁窗相隔六年之久的父亲陈启礼。

我们吃不准是否就在他拥着痛哭的妻子、望着衰老的双亲、听着女儿呼叫“爸爸”的陌生声音之时，已然决心退出江湖，脱离那种终日寻仇斗勇、睚眦必报的险恶生涯。反正自他

出狱之始，似乎便踏上了一条靠劳动吃饭、凭双手发家的生活之路。昔日的竹林兄弟送来几百万开办赌场的本金时，他断然拒绝，宁愿去建筑工地做监工，甚而作沿街揽活的油漆工、四处求人的小广告代理商。

在他做临时工的这段日子里，他们家的生活水准大概属于全台北市最低的档次了。由于收入少且不稳定，吃饭的人口多，陈启礼常常不得不靠打野狗，或偷偷到寺庙的放生池钓乌龟甲鱼，为菜色满面的妻女找一点营养品。而以他这样自尊心极强的人，在干这种事时常常受到奚落甚至痛斥后，居然能忍气吞声，低眉顺眼而退，似乎确曾表明这时候的他已成为一个我们司空见惯的中国式社会顺民。

手头积攒了几个钱后，陈启礼开始小心翼翼地经起商来，他先后经营过电子工厂、不锈钢管业、重机械进出口贸易等买卖，似乎都不太成功，家庭经济状况虽有所好转，但未有太大的起色。直到他接手一家正在亏损的消防公司，经营消防及水电设备后，才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状况。

即便当临时工卖苦力，生活又困难，陈启礼仍坚持抽空学习各种现代科

学知识，短短的三年时间，他自修完了他早年半途而废的学业，并获取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大学学历。进入商界之后，他又开始自修现代工商管理及财政金融等科目，并努力使其所学运用于经营实践之中，不仅靠资本赚钱，亦靠知识赚钱。到 1984 年，陈启礼靠着系统的知识、黑社会的关系、不服输的个性和善于迎合新潮流的灵活头脑，已成为承安水电工程公司常务董事，台北市消防公会常务董事，几乎控制了台北市所有的水电消防工程项目。经商时期的陈启礼能伸也能屈，即使别人欠公司几百万元帐也不去追讨。逢年过节，他还给一些政府官僚上供，给警察老爷送礼。曾听一位茶店老板说过，陈启礼每次为送礼到茶行买茶叶时，总是笑嘻嘻地对伙计们说：“我要给那帮贪官污吏送礼，你们拿些次茶给我，只要用上好的包装盒就行。那些酒囊饭袋懂得什么，别让他们糟蹋了好茶！”

陈启礼真正切身感到白道权势之重要是在 1979 年。一个偶然的机，陈认识了一个姓杨的人。杨某告诉他，如果他肯拿出 300 万元新台币行贿赂送礼，就可以承包到国营或公营事业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的承包权几乎为国民党权贵子弟及亲信们全部垄断了。当时他的经济底子还很薄弱，但经过反复思量后，陈启礼决定孤注一掷，取出所有存款，加上东挪西借，凑足了 300 万。果然他就此一举成功，发了起来。

腰缠万贯的陈启礼并不以作一个安乐富翁为满足，又开始以“名”和“权”为目标，为其日后身败名裂，再沦绿岛埋下了伏笔。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陈启礼确定的第一个步骤是办报纸。他先是接过了日渐亏损的《华美日报》，由于看不到什么起色，又与余祥生另辟疆域，创办了图文并茂的杂志《华美报道》。余祥生即原《华美日报》的独家股东兼社长，就在他这家报纸迹近倒闭之时，陈启礼向他伸出救援之手，从此，余祥生便在报业同仁中获得了“黑道新闻局长”的头衔。名声固然重要，但应使自己不受金钱方面的损失为前提，老是赔钱办报的傻事陈启礼是不干的。他办《华美报道》，第一宗旨乃是杂志的销路，销路好才能赚，杂志才叫得响，他这个昔日的黑帮分子才能藉著名杂志的发行人身份一跃而为文化名人、社会贤达。为此，陈启礼向来编们宣称：“没有耸人听闻、轰动社会的内容绝对不允许出刊。”在陈启礼一手策划下，《华美报道》创刊号果然“出手不凡”。歌星上官明莉的全裸照片赫然出现在封面，里面的内容也是香艳刺激，有色有血。诸如“亚洲羚羊”纪政的婚姻内幕、“青蛙王子”高凌风被枪击始末，还有竹联帮的老大之一、曾与陈启礼联组“南强联盟”的青蛇邓国沣如何涉及杏花阁争夺酒女“贵妃”的血案，潜逃海外后摇身一变而为华侨领袖人物的传闻，均是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编成故事和盘托出。而国民党党外“党员”许信良在美国自杀的内幕，则完全出于陈启礼的杜撰。

经过精心谋划，陈启礼邀请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在发布《华美报道》创刊号正式面世的消息时，同时亮出了上官明莉的裸体原版照片，企图一鸣惊人。然而，在报刊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官办的时报系统因其《时报杂志》的销路受到影响而对《华美报道》大加挞伐。最后，《华美报道》被指控为与原发行旨趣，即以报道工商财经问题的旨趣不符而遭到查禁，受到停刊半年的处分。

陈启礼遇挫不馁，高招叠出。他以退为进，不仅挽回败局，并藉此一举成名。一方面，他将杂志改换一下名称《华美报道》重新登记出刊，另一方

面又以杂志社董事长的身份公开亮相，接受同业杂志的“访问”，向全社会吹嘘创刊动机和刊登上官明莉全裸照片的始末。这样一来，原来影响不太大的杂志反而身价倍增，销路更畅。他自己也因此与权倾一时的国民党将军王升同时成了一家很有影响的刊物《在野者论坛》的封面人物。

陈启礼业已证明，在黑道中积累的经验用于白道上的企业经营可以大赚其钱，将黑道的手法稍作修订，用于办报出刊也能大获成功。《美华报道》第一期就以报复《中国时报》老板、国民党中常委委员余纪忠为目标，集中报道了余纪忠的爱将王笃学兄弟的风流帐，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陈启礼使用的手法高明之极，不留丝毫予人可乘的痕迹，余纪忠只好服输，央人出面请陈启礼酒肉一顿和解了事。

陈启礼一着得手，又花样翻新，在《美华报道》上办了个“大亨摘星点将录”专栏，专事向财界大亨、娱乐界明星敲榨勒索，若有不肯就范者，便在“点将录”上见高低，将其发家史、床第秘闻大曝其光。这一招既来钱又能招徕读者，乃是典型的黑道手笔。

敛财成名之后，陈启礼文向“权势”方面进行试探，利用手中杂志与国民党当局作开了交易。他偶尔也捧捧国民党方面不喜欢的人，像党外人士江鹏坚、雷渝齐等他都曾作为社会名流而大吹大捧，搞得“中央文工会”和市党部颇为紧张，常常得与他私下沟通一番，不敢轻视于他。有时候，他又在一些江湖秘闻中间插入几篇“忠党爱国”之类的文章，捧一捧国民党，讨好“中央文工会”。可以说，陈启礼办杂志成了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因此获财获名，从一个黑道角头、奸诈商人一跃而为“文化名人”、“社会贤达”，并进一步结识权贵，与国民党上层也拉上了关系。

为了成为“文化人”，陈启礼早在办杂志之始就有心全面涉入文化界，尤其是演艺圈子。他早就看准了是个既来钱又捞名的场所，更是欲得之而心甘。《美华报道》上办起“点将录”后，机会终于来了，著名“爱国导演”刘家昌有所求而来，成了他的座上客，两人又合伙开办了一家欧帝威唱片公司。

其实，陈启礼的竹联同志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在演艺界混得颇为不错。竹联帮第一代元老，陈启礼昔日的大哥周榕曾组织一家飞龙影业公司；竹联“大护法”吴敦一直是刘家昌的导演助手，在刘家昌的昌江影业公司任制片主任之职，制作过《圣战千秋》之类捧国民党的影片。实际上，竹联帮介入电影

387·387·圈，大都是他居间策划。不过，导致陈启礼进入演艺界的关键人物，还是前面提过“三大血案”中的主要人物，港台武打电影明星王羽。

王羽可谓影视圈中天生的“江湖艺人”。在香港邵氏公司时，曾献百万港币的晋见礼而拜入“十四K”。到美国拍片时，又以30万港币的“资助费”拜入“华青帮”。1970年到台湾后，很快就与竹联帮的几名重要分子打成一片，“杏花阁血案”一役，王羽初显其空手道三段的真功夫，自此正式拜入竹联。“三大血案”之后，王羽更干出了一件大事，惊动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

1982年11月，“亚太影展”在台北市东来大饭店举行，其主题礼仪曲“亚太颂”的作者刘家昌于某日应邀前来参加彩排，中途休息时，王羽忽然率领一帮竹联弟兄闯了进来，指责刘家昌派人砸了他的汽车。刘家昌不仅是港台影视圈中名人，与国民党上层权贵亦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在电影界向来

是自高自大惯了的，见王羽点着鼻子叫阵，张口就甩出一句口头禅：“你他妈的……。”还没骂完，空手道三段王羽叭叭两响，当众甩了他两个耳光。素有“赵城之虎”之称的刘家昌不肯吃瘪，跳起来就要与三段拼命。当时在场的吴敦见对方人多，好歹把双方劝住了。事后，王羽请动竹联帮元老作陪，在天吉楼餐厅摆宴向刘家昌道歉，仍未平息刘家昌的怒气。于是，导致了刘家昌请陈启礼，陈启礼又通过刘家昌结识国民党权贵，黑白两道巨寇联手谋杀一名出走异乡的艺人的丑剧。

为了替刘家昌出气，陈启礼一面令人在《美华报道》上抖搂王羽的劣迹，一面下令总护法吴敦遣派杀手追杀王羽。王羽在竹联帮内朋友的警告下，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陈启礼得知帮内有人通风报信，便将一向维护王羽的帮众叫来，要他们发誓不再报信，否则格杀勿论。帮内弟兄知道，“老鸭”要杀的人谁也救不了，于是纷纷表态不再帮忙。一向气盛的王羽这时也只好托人求饶，答应交付1700万元“罚金”和他拍制的所有电影版权为交换条件，求旱鸭子放他一马。

陈启礼东山复出，以“总堂主”的身份重操竹联帮大权，是在1980年。与帮中弟兄重新交往，则可追溯到他经商有成之初。

从组织形态上看，如果说四海帮采取的是青帮那种拜师收徒，上下根传的发展模式，竹联帮则是仿效洪门的横向裂殖方式，各堂口互不统属，当初竹林结盟之时，为表示对身在狱中的孙德培的尊敬而未设帮主，帮中大事往往由几个有位份的老大会商处理。但如果谁有足够的名望与实力，未尝不可行帮主之实权，陈启礼就曾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凭实力接掌帮中龙头位份。陈启礼入狱之后，竹联元老周榕、陈大伟等人都先后充任帮中名誉上的龙头大哥，但其名望与能力都不足以服众而相继退位。陈启礼经商后，曾一起混过的老兄弟常常找他叙旧，遇到问题也愿意来听听他的意见。帮内发生冲突，陈启礼以资深大哥的身份出面摆平。弟兄手头紧时，陈也往往出资周济。由于他处事公正，出手大方，深谋远虑，颇得帮中大哥们的尊重。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陈虽然未脱离黑社会的圈子，却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外界认为他又重新入主竹联。

陈启礼二度出山，还有一半原因与国民党当局有关。陈启礼曾为一位国民党权贵的儿子摆平过债务纠纷，这个贵胄之后希望陈启礼能把帮派组织统一起来，为其所用。当时，陈启礼以不愿再混迹于江湖为借口加以推托。结果出现了一连串怪事，一些与陈启礼关系根深的竹联帮成员在未犯案的情况下纷纷被拘捕。过去，陈启礼出面保人，警方一般不会为难，可现在他越保警方越抓。接着另一权贵弟子通过一名叫林嘉麒的人出面，希望陈启礼利用帮派力量在菲律宾搞一组织，保护他家的产业，陈启礼还是推托了。其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情报部门的要员纷纷出动，或直言无忌，或曲言相邀，其目的无非是要他重主竹联。

政府支持所辖范围的黑社会发展势力，可谓罕见罕闻，听起来令人不可思议。我们听了陈启礼于江南命案发生后留下的一盘磁带，也许疑虑顿释。陈启礼在录音中说：“……在四年以前，政府方面希望我能够出来，重新组织竹联帮，把它发展到全省各乡镇地方去。这样一来，第一是可以控制台湾的黑社会，第二，如果有党外人士或者是台独分子要暴动，地方上的流氓去聚集的时候，我都可以知道，然后政府可以采取……”虽是陈启礼的一面之词，多少也有可信之处。陈启礼正式出任总堂主的仪式，于1980年的一

个夜晚在“自由之家”举行。仪式之后，陈启礼当即宣布三条措施：（1）整顿纪律重订帮规；（2）成立“竹联突击队”；（3）重组堂口，大力吸收社会下层不良少年。而没有宣布的一条措施也许更为重要，即逐步使竹联帮的活动“公开化”，用合法的外衣掩护非法活动。在他看来，白道与黑道的唯一区别就是前者披了一件合法的外衣，竹联帮也能做到这点，而且会做得更好。为此，他把台湾许多退役军人、情报人员聘请安插到竹联帮控制的企事业单位中，与官方及大企业财团建立起共存共荣、相互利用的关系。1983年，《华美报道》杂志开业时，当时的警备总部副司令刘戈仓，台北市警察局长颜世锡等前往祝贺，与陈启礼交杯换盏。陈启礼曾十分狂妄地宣称：“竹联帮旗下的‘名商俱乐部’（竹联帮总堂）是警总的大本营！”这个俱乐部就是陈启礼与原在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后从台湾警总保安处上校组长一职退休的朱国良共同经营的。他手下第一堂“忠堂”堂主就是退役的国民党员，堂中弟兄十来人是退伍军人。栋本人还是国民党“花瓶”青年党的少壮派主席，陈对此颇为得意，将委任状高高挂在办公室墙上，并通令竹联帮兄弟，凡是尚未加入任何党籍者，一律加入青年党。

陈启礼重建竹联的消息在黑道传开，不少黑道人物纷纷投效门下，如三重天台帮、三部西门堂帮，以及中场、新竹一带小帮派都先后归入竹联旗下。竹联帮原是外省籍人的帮会，现在却扩展到全省各乡镇，连许多不会说国语的本地角头，也摇身一变成了竹联分子。入帮的不良青少年更是猛增，在台北市上招摇过市的“青竹叶”，一时间如过江之鲫。

对其他帮派，陈启礼实现了入狱前未来得及实施的政策，即有仇释仇、有怨释怨，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甚至对仇深似海的四海帮，也以共存共荣为第一要务。黑道上的朋友们对陈启礼的深不可测的城府与善于应变的手腕无不又敬又畏，遇有大的纠纷，都渐渐愿请“老鸭”出面摆平、主持公道。经过陈启礼的刻意整顿，四分五裂的竹联帮迅速强大起来，帮众从400多人膨胀至上万人，势力扩展到台湾全岛，并越洋过海至东南亚、沙特阿拉伯、日本、美国 and 香港。竹联堂口至1984年已扩充至20多个，台北市的地下酒家、陪酒女郎几乎全为各堂口控制。竹联帮总堂办的几家期货公司更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为竹联帮组织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为其企业化、公开化、合法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陈启礼高居“名商俱乐部”内豪华办公室里，一手处理帮内大事，一手摆平帮间纠纷，确乎抓住了台湾黑社会的牛耳朵。陈启礼的老婆陈怡帆曾得意地告诉朋友：“没有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算命先生坚持说我将来会嫁给一个王。当时我想，都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王呀？婚后有时想想，那个算命先生的话也算灵验，在台湾黑社会中，陈启礼哪一点不像一个王？”

陈启礼用黑道的经验在白道上奋斗，又用白道上的要求来修饰黑道，从1976年出狱到1984年入狱，八年之间成绩斐然，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他曾说过：“作不成人上人，也要当兽中王。”而他既作成了人上人，也当上了兽中王。

#### 5. 越洋杀人案

以“江南命案”而见之于报端、渲之于人口的事件，是竹联帮、尤其是陈启礼一生中干出的最为“轰轰烈烈”的大事。它震惊了整个华人社会。正直的人们，尤其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既震怒于黑白两道竟然联手谋害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文人，又惊惜于一个正直善良的英才的被毁。

被害人江南，本名刘宜良，江南是其笔名。他 1932 年生于江苏省靖江县，是个富家子弟。1941 年，其父为新四军所杀，因此，按国民党的说法，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江南从 9 岁起由有过功名的祖父抚养，直至 1949 年与国民党政府一起到台湾。

大概沾了“出身好”的光，江南于 1950 年进了“国防部”的政治干部训练班，两年之后又被送进干校受训。如果照此混下去，不辜负党国的栽培，前程似锦自可保证。然而，他却于 1954 年脱离了国民党军方的栽培，跑到台北市师范大学念英语去了。毕业后在《台湾日报》任过记者，去过香港、菲律宾等地采访，还写下了《香港纪行》、《动乱的东南亚》两本书。1967 年，江南被报社派到了美国，实现了他生活于自由世界的梦想。据李敖说，“江南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如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客座教授的陈鼓应曾宣称，江南是他所遇到的朋友中，对国民党了解得最为透彻的人。

到美国后，江南利用业余时间，在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2 年，江南修完博士课程，准备以蒋经国生平及其政治理想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但因申请不到奖学金，经济来源没有着落，论文也就搁浅了。为了生计，江南改文从商，在华盛顿市区“郎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1978 年，江南迁至旧金山市，在渔人码头开了个瓷像店。

从商后，江南仍在继续写作，于 1973 年完成《蒋经国传》前四章，交由香港《南北报》月刊连载，前后刊了两年。连载完后，《南北报》月刊社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于 1975 年擅自结集出版，遭到江南去信抗议。1983 年初，江南写完了《蒋经国传》后几章，并改写了前面四章，遂与洛杉矶华文报《论坛报》签定合约，将《蒋经国传》改写稿交成该报连载并出版单行本，这便是造成轰动的《蒋经国传》一书的由来。

除《蒋经国传》之外，江南还写了《龙云传》的上卷，接着便写下卷。同时，他还答应把英文版的《吴国祯传》译成华文。

江南于 1956 年与刘冠伦在台湾结婚，生有一儿子，1959 年，两人因意见不合而离异。第二任妻子叫崔蓉芝，两人于 1967 年结婚，也有一个儿子，叫家禾。据说崔蓉芝很是温顺体贴，因此夫妻二人感情甚笃，家庭生活其乐融融。

1984 年 10 月 15 日清晨，崔蓉芝像往常一样，开车送完孩子上学后把车子开进了自家楼下的车库。车库的门没有锁，因为她上楼稍作整理后，便要与江南一起开车去渔人码头自己的瓷像店开门营业。

9 点 20 分，江南先下楼进入车房。随后就是三声枪响，崔蓉芝以为是江南不小心碰翻了什么重物。待到她下来察看，江南已倒在血泊之中，人事不省。这时候，行凶的歹徒已逃得不见踪影。半小时后来了警车和救护车，但江南的生命已无可挽救了。

据崔蓉芝回忆，那天清早她和江南都曾注意到门前有两名骑自行车的人留连忘返，但没有当回事。按当时美国警方的估计，这两个骑单车的便是凶手。因江南家在德科市一条死胡同的顶头，汽车进入易引人注意，凶手可能是乘车至巷口附近，换骑单车进来作案，再乘车逃走的。果然，警方在附近大路上找到了两辆被抛弃的自行车。

由于江南的名字在华人社会广为人知，江南之死当天就成了美国各大报的头条新闻。紧接着，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华人社会为之震动，有关江南命

案的新闻、社论连篇累牍，对其死因更是议论纷纷。其实不难猜测，一个手无四两力的穷文人怎么会成为被谋杀的对象呢？当然是笔下惹祸了，而他写的东西能惹上谁，看看内容也就一清二楚。当然是国民党，是蒋氏家族了。

然而，开枪的却是竹联帮总护法吴敦、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现场策划人是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就是说，堂堂国民党政府与其辖下一个黑社会帮派组织勾结在一起，合黑白两道之力杀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

按事后逐渐显露的情节，国民党与竹联帮的联系虽早，但真正计划合伙作成江南命案，则始于1984年5月的一顿家宴。中国人的买卖，从政治军事到婚姻家庭，似乎都与请吃饭有关。而这一顿饭，请者与被请者固然很重要，单是那个联系请与被请双方的引线人，就不是个马虎脚色。

引线人叫帅岳峰，出身于国民党将校之家，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帅于1972年7月退伍后混迹于电影圈，因制作获台湾电影界最高奖——金马奖的影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爆得大名。1984年5月，台湾电影圈里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帅岳峰所在的锦华影业公司被竹联帮所控制的昌江影业公司派人砸了。帅是制片人，理应对此事负起处理的责任。于是，他通过熟人找到陈启礼，请他出面摆平。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帅岳峰却因此结识陈启礼，随之便加盟竹联。因他神通广大，能弄到连警察也配备不上的新式武器装备，虽然入帮很晚，在竹联帮中的职位却是不低，掌管着部分堂口的军火供应。

在“江南命案”里，帅岳峰是个关键性人物，但他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值得一提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加入过青帮，是杜月笙正宗的第三代弟子。而杜月笙的第一代弟子，如今大都是党国要人，他们在台北设有“恒社”，并有定期聚会。同时，帅岳峰与白道也有密切关系，通过拍电影认识了不少国民党军政界要人。

1984年7月，在帅岳峰的牵引下，陈启礼往贺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导演白景瑞的乔迁之喜。白是国民党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的密友，邀请汪氏夫妇与宴自不待言。然而，席间赫然在座的还有“蒋总统”的二公子蒋纬国将军，可见白氏身手之不凡。帅岳峰与汪希苓挂上钩，白便是引路人。帅岳峰为什么千方百计为汪希苓与陈启礼引线搭桥，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帅本来就是汪手下的谍报员，作引线人是出于汪的授意；第二种，陈自己想与国民党上层密切关系而利用手下人。现在一般人都倾向于前一种看法。1984年5月间，陈启礼以“观光”名义赴海外视察、组建竹联帮分支机构回来，曾在香根餐厅宴请帮中的头面人物。饭后，帅岳峰向陈启礼报告：“有一条线路已经和情报局长接上了，他希望我们为国家做些事。汪局长想和你面谈，你意见如何？”

自和国民党上层结文以来，陈启礼已饱尝了甜头，如今情报局局长找上门来，岂能轻易错过？当时听了，不由两眼放光。于是，汪与陈便有了前面所提的宴上交杯、宴下换言。国民党情治系统想利用竹联帮干些他们自己不便出面干的事情，而竹联帮财企图通过与情报局的交往提高自己的地位，使帮派活动合法化。二者各有所图，自然一拍即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试探，双方均感满意，于是合伙投注，大赌一场。白景瑞乔迁之喜的饭局，算是一个小小的序幕。

数日之后，陈启礼与帅岳峰正式应召前往中央情报局所在永康街招待所。副局长胡仪敏开门见山，向他们布置了竹联帮“海外工作”的大政方针：“汪局长安排你们从事敌后工作，这是很好的构想。此事以前没有做过，



汪局长这次也是大胆一试。希望你们本着忠党爱国的精神，好好为国家做事，发展敌后布建情事。希望竹联帮到海外发展，挑选好忠心干部，不必急在一时。慢慢做去，一二年内建立即可。”

胡副局长“宣导”完毕，接着是陈启礼汇报竹联帮在海外发展的情况。真正的召见目的，是其后的酒席之间，由局长汪希苓之口吐出：“在美国有个刘宜良，你知道吧？此人当年在蒋总统经国先生开办的政工干校学习，跑到美国之后却写了本《蒋经国传》，对领袖诬蔑丑化。他与共匪有杀父之仇，居然还秘密跑到大陆去与共匪勾结。这个叛徒……”

陈启礼当即大怒道：“这样的党国叛徒，为何不严厉制裁？”

“是呀，应该教训教训他。不然的话，这些吃党国奶水长大的人都会投向共匪了。可是，这家伙如今在美国，入了美国籍，我们出面恐怕有损党国的形象……”

陈启礼马上心领神会。汪希苓既要杀一儆百，又不愿弄脏自己的双手。经过反复思量，陈启礼决心“慷慨请战”，通过这件事使竹联帮与情报局成为一条线上拴着的两只蚂蚱，建立起祸福与共的关系。于是，陈启礼提出了接受情报局正式培训的要求。

8月14日，陈启礼依约与帅岳峰一起到阳明山“松竹山庄”情报局训练中心基地，接受培训。在这里，他正式成了国防部情报局谍报员，化名为“郑泰成”，秘密代号是730063，直属局长汪希苓指挥。帅岳峰的化名是“谢振业”。当天，二人参加只有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主管东南亚方面事务的第二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加上他们二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会上，陈启礼正式接受了谋杀江南的任务。为避免嫌疑，决定由陈虎门担任陈、汪之间的联络官，即汪希苓通过陈虎门向陈启礼发命令，陈启礼亦通过陈虎门向“上面”汇报工作。

陈启礼在“松竹山庄”受训了5天，训练课程有密码、照相、密显、射击等科目。陈虎门一直陪同受训，并负责照料陈启礼的生活起居。其中局长曾两次前来“慰问”。

9月14日，陈启礼一切准备就绪，携同太太陈怡帆、助手帅岳峰与侨居美国的竹联帮头目黄鸟陈志一搭机赴美。到洛杉矶略事休息，便与帅岳峰及竹联帮另一名在美居住的头目灰鸭柳茂川一起到了旧金山。他们到江南开设的瓷像店探查虚实的时候，江南正好不在店中。在旧金山呆了三天后，他们返回洛杉矶。这时，帅岳峰借口自己17岁的女儿离家出走，先回了台湾。

这些天里，陈启礼发现，在美国华侨界，江南是个很有点名声的人，一般人都与他熟识，为避免走露风声或事后暴露身份，陈启礼决定不用在美的竹联帮分子，于是电召在台的竹联帮总护法鬼见愁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以及他自己的贴身卫士、竹联帮王牌杀手——“冷面杀手”刘焕荣。吴与董随之奉召而至，冷面杀手因从前杀人太多，名声在外，不能露面公开办理出关手续而未成行。

10月10日，陈启礼选中了“双十国庆”这个黄道吉日，带着吴敦、董桂森又到了旧金山，住在一个姓宋的朋友家里，开始侦查江南的行动规律及附近的地形。他们发现渔人码头正举行罢工，警察很多，不易下手，便决定把作案现场选在江南的家里。随之，制定了伪装晨练而潜入江南住宅行刺，得手后骑单车脱离现场，再乘小车远遁的作案计划。

10月15日上午7时，吴敦、董桂森各带一支左轮手枪，骑单车到江南

住宅外，尔后潜入未关门的车库埋伏起来；陈启礼坐镇一辆小车中等候消息；另一辆工具车由俞大钧驾驶，停在江南住宅所在的巷口附近，等候吴、董二人作案归来一起逃匿。9时20分，江南下楼进了车库，他发现车库中有人时，只是平静地看了他们一眼，便转过头去。吴敦当即从楼梯后热水器旁一跃而出，对着江南的头部，迎面一枪命中江南眉心，随即窜出了车库。董桂森见吴敦抢了头功，忙朝着江南脸部补了两枪，然后窜回街上，骑自行车至等候的接应车处，与吴敦一起弃了单车，乘俞大钧的车飞速往汇陈启礼，再分头处理作案的手枪、化妆用具等物，各自前往洛杉矶相会。

两天之后，即10月17日，陈启礼在洛杉矶打电话向负责联络的陈虎门副处长报告：“生意已成交，准备返台。”这时，“江南命案”已成全美各大报及华埠各报的重大新闻。面对舆论界如此强烈的反应，情报局颇为慌乱，因此陈虎门叫他们暂缓几天返台，但随后不久，陈虎门又急促陈启礼返台，并一再申言三人同返。陈启礼以黑道上翻滚多年的经验，察觉事情有异，吴敦与董桂森也担心回台湾后有被灭口的可能，甚为踌躇。为防万一，陈启礼便将整个案件经过口述录音，并复制了几盘录音带，分别存放在美国竹联帮弟兄的手里，以备后患。

10月20日，陈启礼偕吴敦、董桂森三人乘机抵达日本东京，然后换乘国泰航班，于21日下午9时许返回台北桃园国际机场。一场越洋谋杀案降下帷幕。

## 6、江湖风波恶

杜月笙曾说：帮会好比夜壶，尿急时赶快拿来救急，尿意一去，便只能藏身最黑暗的角落。以杜月笙第二自居的陈启礼不会不知这一段名言，因此，为防止事发后国民党洗脱与竹联帮的干系，推出竹联帮当替罪羊，他留了几盘磁带后才返回台湾。他以为这样一来就使国民党失去了杀人灭口依据，或许私下还打算今后作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未可知。

回台湾后，陈虎门上校与帅岳峰等竹联头目及陈启礼的妻子陈怡帆亲至机场迎接。在“大大”公司黄卓汉的办公室里，稍事休息的陈启礼向陈上校详细地汇报了赴美执行任务的经过。陈上校当即表示：“你们为党国立了一件大功，过两天老板会当面听取你的汇报，并给予嘉奖。”至此，不知是“荣归故里”还是“自投罗网”的三名杀人犯，总算松了一口气。

10月23日，陈后礼、帅岳峰被陈虎门接到情报局招待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设宴为其接风。席间，陈启礼汇报了赴美经过后，汪希苓示意胡仪敏，胡取出一个纸包道：“这两万元给你，你们辛苦了。”

陈启礼忙摇手推却：“钱我不能收，我本人是情报局的成员，杀敌报国乃是本人职责。”

“那给吴敦、小董两人好了。”

“他们也不会收。依我之见，局里最好派员安抚他们；他们有案在身，如能吸收进情报局，他们会为党国拼死效忠的。”

“这事由陈虎门办。”汪希苓点点头，“你把这次行动详情尽快整理出来，我好向大老板汇报。”

然而，陈启礼再度会见汪局长，却是数月之后公堂之上。

江南命案轰动全美，不少报刊文章当即指出必与台湾官方有所牵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动反间谍干员200多人全力侦破，数天之内便有突破。陈启礼在旧金山给陈虎门打的越洋电话，曾被美国电话公司录音，旋为联邦调查

局所获；陈启礼等人在察看江南住宅时，曾被一名华裔女大学生看见，此人成了重要人证。江南命案指日可破，台湾情报局在美派有大量特工人员，对此岂有不知之理？

11月12日下午6时，陈启礼在台北市辛亥路家中被捕。当晚11点，内政部长吴伯雄在警政署召开记者会，宣布全面扫黑行动开始。这就是后来舆论所称的“一清专案”。

很明显，一清专案是专为陈启礼等人所发动的，其他黑帮分子不过是其陪衬。因此，第一波行动就是抓陈启礼。几天之内，竹联帮上至护法、堂主，下至各级头目，大都一网成擒。在台中避风的吴敦亦被诱至台北，作了笼中之鸟。董桂森见势头不对，匆忙逃之海外。

一清专案使竹联帮慌了手脚，也引起他们极度的不满，认为“狡兔死、走狗烹”、陈启礼在被捕时曾质问：“我为你们做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雷声》周刊发行人雷渝齐收到一个神秘电话后，江南命案与一清专案的关系开始曝光。11月24日，《雷声》刊出独家新闻：“江南是竹联帮所杀。”于是，台港各报竞相发表分析性文章，回答了陈启礼提出的问题。

一般认为，国民党派遣竹联帮分子刺杀江南，乃是一石二鸟之计。试想，以国民党之能耐，暗杀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文人并非难事，何以处心积虑地收买一个黑道头目，亲自越洋作案？按情报局的算盘，暗杀江南后，若该案不破、万事大吉；一旦东窗事发，则推出陈启礼顶罪，并乘机接收竹联帮。因此，从江南遇刺到老鸭入笼，乃是杀人灭口至抓人禁口的逻辑发展，而专抓陈启礼与竹联帮首要，太过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便有所谓一清专案的出台。

国民党在一清专案的掩护下抓了陈启礼及其他重要证人，果然掌握了局势发展的主动权。当美方11月29日宣布江南命案凶手并要求引渡时，台湾当局以双方没有引渡条约为理由予以拒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舆论界的分析有理。

情报局的算盘固然精妙，久历江湖的老鸭也非常容易对付，他毕竟留下了磁带；而天下第一帮虽然首脑尽失，却也能量惊人，还逃出了江南命案重要证人董桂森。这样，一石二鸟变成一石三鸟，第三只鸟便是国民党自己。

竹联帮与国民党就推脱罪责、援救老鸭之间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是董桂森、吴敦打电话给陈虎门以公布江南命案相胁，要当局放人，而《雷声》登出们那篇文章，则是国民党先发制人的谋略，随后又诱捕了吴敦。1985年1月8日的香港《文汇报》首次暴露了陈启礼录有磁带的消息后，在美国的白狼张安乐第二天便在《中报》上予以证实，有关江南命案的一卷录音带，“目前正在有关人士手中”，问是否将交给美国警方，回答“那是肯定的”。“同日，美国德利市警方也表示，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听说有陈启礼录音带之事，目前正在追查之中。

1985年1月15日，合众国际社自台北发出消息，国民党情报局代理处长陈虎门上校已经被捕，局长汪希苓中将“因故停职”，其职务暂由安全局长汪敬煦兼任。1月17日，美联社自台北报道：“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已被军方收押待审”。同日上市的美国《国际日报》引述“台北消息人士”的说法：“汪希苓和副局长胡仪敏少将目前被软禁于情报局招待所内，不准会客。”至此可以断定，国民党已被迫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收押，从“丢卒保车”到“弃车保帅”了。

1月31日，台湾的《中国时报》公布了陈启礼录音带的主要内容。据称，陈启礼的自述包括五个部分：一、自我简介；二、刺杀江南的原因及与情报局官员的关系；三、作案的计划和准备；四、行动过程和参与者；五、制作录音带的目的。其中大部分情况已为人所知或推知，只是不及其详而已。

小小一名刘宜良，区区一个竹联帮，竟然在台岛内外造成如此之大的冲击，实为国民党始料不及。2月2日出版的《雷声》周刊报道：“突然爆发的情报局高级官员涉及江南命案的不寻常事件，为经国先生知悉后，连续数夜，即使勉强入眠，也经常惊醒，一夜之间，数度如此。”另据一位台北高官透露：“大老板（蒋经国）生气概了，在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大发雷霆。党政首长一个个俯首危坐，噤若寒蝉，脸色发青。”台湾《前进广场》报也透露，台湾几十名“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他严惩真凶。

正式审判陈启礼本人是1985年3月20日，在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进行。这次审讯是再三拒绝美方引渡要求后进行的，而海内外舆论早就对江南命案有了定论，之所以有大量岛内外记者前往听审，乃是对国民党将如何掩饰自己涉案及对陈启礼的处置结果感到好奇。另外，当然也希望陈启礼会突然抖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黑内幕来。

陈启礼和吴敦在法庭上只是反复强调汪希苓指派他们行刺的事实。陈说，汪希苓要他去杀江南，而他只叫吴敦、董桂森去教训江南。吴敦也说，陈启礼只要他们教训江南，而开枪是出于意外，因为江南曾与他纠缠。

4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判陈启礼、吴敦两人无期徒刑，罪名是共同杀人。判决书拒绝了陈启礼供词中杀江南为情报局汪希苓所命令的说法，而说陈启礼是想邀功于汪希苓而主动请战。对于陈自供“只想让江南躺一个星期”的供词，亦裁定不能成立。根据台湾法律，无期徒刑在执行十年后，若犯人表现良好可假释出狱。就是说，陈、吴二人十年后便可复出江湖。

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军事法庭亦开庭审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涉嫌江南命案。汪等三个均否认汪曾指示陈刺杀江南，只说是教训江南，而且说只是“以后有机会教训”。对三人的判决在4月19日。汪等三人分别以共同杀人和帮助杀人被判有罪。汪判无期；胡与陈被判二年半管训。判决书认为，汪是出于私怨而利用职务之便指使他人行凶的，从而刷洗了国民党手上的斑斑血迹。

陈启礼从被捕之日起就已预感不妙，也曾勉力挣扎，以图打乱当局的玩弄法律的步骤。首先，他在首次审讯前两天出版的第44期《美华报道》上发表了两份书面自白，一份自白称自己杀江南是“制裁叛逆，杀敌报国”，所以无罪；另一份自白则把自己打扮成早已脱离竹联帮的“自新”分子，甚至还为社会“消弭了不少铤而定险的事，造成了许多人自新的机会”，因此有功。在法庭对质时，面对汪希苓的矢口否认，陈怒目圆睁：“白景瑞当时亲口说，如果运用竹联在美的兄弟教训一个人，简直是小事一桩。现在却一口否认，实在令人费解。”又叫道：“我去白景瑞家吃那顿饭，就是他们设计安排的！”

另一次发怒是在4月2日的庭审辩论时，面对帅岳峰否认他知情江南命案，陈声色俱厉地问：“你四十多岁才进竹联帮，很不寻常！四十岁进竹联，没几个月就去自首，你笔录上说，你四月去自首，而警方要求自首是七、八、九月才开始的。你自首不去向治安单位自首，却去向主管大陆工作情报局自首求助，我怀疑你是不是也是双重间谍！”帅直被问得汗流浹背，张口结舌。

最后是审判长出面制止陈的追问，救了帅一把。

404 在法庭的最后辩白中，陈启礼大概已经完全感到绝望，谈起自己当年被囚绿岛，整日里凭窗呆看海水，不由悲从中来，洒下几滴“英雄”泪，想当杜月笙第二却被国民党玩弄于股掌之中，不仅自己受罪，亦给杜月笙丢脸。

9月12日清晨，陈启礼被一辆警车悄悄从台北看守所送往龟山监狱，关入叫“和一舍”的牢房区。同被关在这里的还有吴敦及著名党外反对派人士林正杰、施性忠等人。为了防止被谋杀，陈启礼专门养了一盆花，每天吃饭对要将一些饭菜汤洒在花上，看是否有毒。他后来还托人带进一双银筷子，用它检验饭菜是否有毒。平时放风时，他与吴敦打打羽毛球，共同活动一下。每周他可以对外通信一封，收受亲友寄来的物品。定期会见亲友，即使皇父母、妻子、儿女，探视也要经过荧先屏或玻璃屏风进行，而且有人在旁监听录音。很显然，陈对当局来说，虽在囚笼之中，仍是危险人物。

陈启礼有着良好的家世，本人天赋甚高，性格沉稳，从不在朋友、妻女前粗语相向。他对自己的孩子很有耐心，还在办公室放了一个糖盒，让偶尔来玩的儿子有糖可吃。他的第一个妻子齐淮莉曾参加了菲律宾选美大赛，是个名噪一时的女人，因受不了陈专心帮务而离异，带着两个女儿定居美国。与第二任妻子陈怡帆相恋时，每天上班前都要到她家中为其烧牛奶；下班后，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到她的住处检查门窗，以确保她的安全。陈怡帆的父母常常夸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如今，刘宜良墓木高拱，其死因仍是疑雾重重。台湾当局经历了一阵慌乱后，已在时间老人的帮助下脱出身来。我们不禁要问，陈启礼是否还在坚持他的“杀敌报国”之说？吴敦和董桂森早已对江南之死感到仟悔，董看到报载“江南的母亲是饿死的，所以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尽快富强”之时，曾热泪滚滚道：“谁不希望中国富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却杀死了一个希望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同胞！”据说陈启礼在狱中习画自娱，国画造诣已颇具功底，其父甚至为他在台北市举办过个人画展，陈似乎真成了一名“文化人”了。以一个“文化人”的良心，是应该为廓清江南命案疑雾尽力的，也理该为江南之死深深仟悔的！另一方面，台湾最后一位政治强人蒋经国已于1988年1月去世，强人政治时代已一去不再，台湾当局是否应该理性从事，主动出面澄清江南迷雾，以谢国人？

## 7. 竹联点将台

忠堂堂主董桂森，国民党军人之后。其父一生为党国尽忠，死后其灵位得供台北“忠烈祠”之中。董的大哥和妹夫都是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生，是现役军人。

董桂森祖籍四川，有着一副四川人的短小身材。他从小生长于军眷村，初中毕业后，继承父业进了士官学校。士校毕业后在金门等地服役近十年，并加入了国民党。但军队似不能用其所长，干了十年只混上个上士士官长，于是退役不干，在社会上另谋发展。

董桂森从2万多元台币的退伍金中抽出1万元送给寡母，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货车，开始干送货员、外务员的工作。好不容易积下一些钱，便和几个朋友跑到台北市合伙开了一家印刷厂。小本经营，自然需要倍加努力，方能在资金雄厚的同业们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生意开始好转后，董桂森还是毫不松懈，仍然吃大苦流大汗，一心想的是先苦后甜，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公

司，当个公司老板，虽不能光宗耀祖，也对得父母的养育之恩了。他是个孝顺的儿子，深知父亲早丧，寡母养育兄妹三个着实吃尽了苦头。如今大哥与妹夫都是军官，只有他在军中混不出名堂，因此希望在社会上作为一番。

然而社会上着实太复杂了，同业竞争也不讲究什么商业规范。董桂森一着不慎，工厂被骗破产了。在其事业有成之际突遭如此重击，董桂森只觉前途一片黯淡，深深感到商场如战场，而且不如战场来得公正。社会上的司法制度一如军队，对没有势力的人毫无保障作用。他平时不仅要给警察老爷们送红包以免除骚扰，一旦出了事，钱被骗找到司法机关求个公道，也同样需要钱来开路，否则“有理无钱莫进来”。黑暗的社会在董桂森心中投下的黑暗阴影，再也无从抹去了。

1978年，董桂森穷困潦倒之时，通过从前军中的一位老长官结识了竹联帮执法陈功，并在陈功开办的兰沁咖啡店当小弟。1980年，陈功转到新生东路开了一家银禧餐厅，董桂森也跟着转了过去。恰在此时，陈启礼准备二度出山，正在网罗人才，在与陈功的几次接触过程中，发现了董桂森。

董桂森个子虽不大，但十年军旅生涯却使他变得异常强健。他肤色棕红，胸肌结实，头发浓黑，声音宏亮，一身刺青。一支半自动步枪在他手里可以变成全自动枪使。由于他具备训练有素的军人气质和一定的组织能力，很快为陈启礼所器重，收为心腹，并一手栽培他当了竹联帮最大堂口忠堂的堂主。自此之后，董桂森戾气大增、除陈启礼和白狼张安乐之外，连竹联元老也不放在眼里。

有一次，忠堂几个小弟在外饮酒，碰到几个竹林元老喝醉了耍威风，要他们当众下跪掌嘴，受辱的弟兄报告了董桂森。董火冒三丈：“他娘的，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口气非出不可！”面打电话要总堂执法陈功开堂执法，一面磨拳擦掌，准备开战。

惹事的大哥绰号猴子，请了人解释、却又不肯认错。董更是恼怒，联络了天堂、和堂的弟兄，将猴子等人开在中山北路的几家餐厅砸了个稀烂，并“俘虏”了店中的“新军”。

这一仗打出了威风，也为老鸭陈启礼挣了面子，董桂森从此名声大震，忠堂在董桂森的领导下愈见兴旺。可好景不长，竹联帮的兴盛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开始三天两头地来找麻烦。一帮流氓小混混也常打着忠堂的旗号到饭店、餐厅收保护费，弄得管区警察动不动就找他去问话。1981年3月，警方从他家里查到一件他朋友的防弹衣，以“共同犯公共危险罪”判了他8个月管训。出牢不久，恰逢台湾警方开始第三次“不良帮派自首登记”，董桂森几次想去自首，但考虑到大哥和妹夫是现役军官，不能有一个流氓小弟或大哥，结果选择了出走美国的道路。在美国，董桂森整天住在白狼大哥家里，直到陈启礼召唤，才犯下刺杀江南之罪。

陈启礼被捕之后，董桂森在一位黑道上称为卓大姐的女人的帮助下逃出台湾，亡命菲律宾。其间，台湾当局曾唆使一名叫刘伟民的黑道头目去菲律宾追杀他，结果为冷面杀手刘焕荣所救。其后，董桂森与刘焕荣、齐瑞生一道去了泰国，准备赴美汇合白狼张安乐和黄鸟陈志一，为营救老鸭出力，因为他现在是唯一还能自由说话的江南命案当事人了。不曾想白狼送给他的路费让一个泰国朋友在赛马场输掉了，只好再回菲律宾。

几经周折，董桂森辗转到了巴西。这一段时间的逃亡生活，大概是他一生最为艰难的。在巴西的时候，他有一段日子是靠捉鸽子活过来的。就在他

准备经巴拉圭前往美国汇合黄鸟时，在里约热内卢的旅馆失手被擒。在巴西监狱中，董桂森吃尽苦头，越狱不成曾想过自杀，据说是靠了“营救老鸭”的念头支撑，这才忍辱活了下来。

1986年4月16日，巴西法庭作出判决，将董桂森引渡赴美。对他的判决是1988年作出的。美国以一级谋杀罪判处董桂森有期徒刑27年。

白狼张安乐，1949年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均是大学教师；自幼聪明过人，进中学后，开始加入不良少年的帮派活动。他那时年纪虽然不大，却是泡妞、打架，无所不为，成为学校里一名著名的太保，并一度成为南海路帮的护法。

16岁那年，张安乐在台北永和镇杀伤了一名便衣宪警，被捕入狱一年，成了“有前科的人”，如此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本来，一个人在其成年之初那段心理不稳定的时期，干出些荒唐事也不为怪，随着各方面的成熟，也会走上正常人的道路。比如第一个上太空的中国人王赣俊也曾于60年代初干过竹联帮，后来去了美国，终于学有所成，成为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张安乐出狱后，成日踟躕于台北街头，看到往日的朋友抓的抓，关的关，不由万分感叹。他原本是个刚愎自用而又多愁善感之人，如今有了前科，遭人白眼，心中的滋味，外人也难体会。为此，他动拳头的时候就更多了，父亲先后把儿子转到建国中学夜间部、基隆一中和台北师大附中就读，但这个性格刚硬的儿子总是不能成为训导员眼中的好学生，张安乐于入狱前已从南海路帮过底到竹联帮，出狱后基本上与竹联帮失去了联系。大概他此时在家长劝说下熄灭了帮派念头，可他不肯让人的个性、好讲道理的脾气不改，又怎么能让“大人们”满意，从而取得进入正常社会的入场券呢？

1967年，张安乐考上淡江文理学院历史系，成了一名大学生。台湾的大学，汇集着各种思想，也组合着各种小团体。各大学生团体因政治取向和志趣而辩论，因辩论而动拳头的事时有发生，成为一时的时尚。以张安乐之巧舌如簧、铁拳如锤，他在淡大的名气很快就大了起来，甚至有人给他起了个“地下训导长”的雅号。

正是张安乐的硬汉派作风，再一次把他引进了竹联帮，成了陈启礼的莫逆之交。

张安乐的名字响起来之后，有个叫斧头的流氓很不服气，便纠集了一帮弟兄前来寻衅。当时张安乐正在屋中读书，见对方人多，便不予理睬。后来外面的叫骂更凶了，还砸进来一块大石头，人单势孤的张安乐已再无选择余地，当即一手持土枪，一手持扁钻冲了出去。趁着对方不及反应，他举手向着人群上方轰了一枪，然后一扁钻刺伤了斧头。众流氓被白狼的气势彻底压倒，竟然没有反击。

陈启礼知斧头心有不甘，欲聚众报复后，领了一帮竹联弟兄找到斧头的上司烧饼，双方达成了协议后，陈把白狼带回了台北。在淡江大学的张安乐同伙不明真相，又与斧头的弟兄们干上了。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最后还是靠陈启礼出面摆平。经此一事，张安乐深为陈启礼的义气所折服，加上两人有着共同的出身经历、相似的智力水平，一致的人生志趣，很快便结为莫逆。1968年4月，张安乐二度加盟竹联帮。

当时竹联帮因杀手型头目杨剑平等人被捕而陷于不景气阶段，张安乐便以淡大63名太保和太妹为骨干，成立了新竹联，又称为淡竹。这个组织存在不过一年，因一名帮众在臣龙街杀伤人命而被警方强行解散。存在时间虽不

长，但张安乐组织帮派的方法，管理帮会的措施却成了竹联帮的宝贵经验。日后陈启礼二度出掌竹联，许多革新帮务的措施皆源出于此。淡竹解散后，张安乐又开始专志于学，并很快沉入爱河。恋爱虽无结果，大学却顺顺当当毕业了，随后又考上了研究生。这期间，他所至爱的老父过世，算是少了一道与黑道交往的感情障碍，但他似乎已彻底脱离了竹联帮，又安安稳稳地读完了研究生，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张安乐再返竹联是在1972年。陈启礼于1970年入狱后，陈大伟、周榕等人都曾以元老身份出掌竹联，但他们心胸不广、领导无方，把竹联帮搞得四分五裂。当时，帮中新一代有识之士力主请张安乐出山，重振江湖第一大帮的威风。张安乐经不起老友们一再恳请，也是感于陈启礼的义气，觉得陈入狱后不能眼看着陈的基业毁于一旦，于是决定出山。

这时的张安乐已有一整套关于现代社会与现代帮派的成熟看法，出山之后踌躇满志，准备大革大改，使竹联帮彻底成为一个类似黑手党的组织，即以企业为基地、以盈利为目的、以暴力为手段的现代化黑社会组织。他的努力成效显著，但也引发了帮中老一辈的忌恨。经过多次帮内的明争暗斗，张安乐又多愁善感起来，遂生退避江湖之念。

1974年6月的一晚，竹联弟兄在长桥餐厅聚会。酒过三巡，两位帮众起了争执。当一个拔出扁钻向对方刺出时，白狼及时出手，抓住了扁钻。鲜红的血液从指缝间淌了出来，席间一时间沉默了。张安乐看了看众位弟兄，长叹一声，扬长而去。

随后，张安乐不愿再与竹联弟兄往来，整日里在家读书课子。但他的妻子李青是个颇具“大姐头”风范的女子，对道上的弟兄极为照顾。她不但为弟兄们洗衣烧饭，还掏腰包给零花钱。因此，张虽有心摆脱帮务，帮务却不肯摆脱张安乐。

1975年，张安乐通过托福考试，把手下的势力交给康宁后，赴美求学去了。

两年后回台省亲，因其妻李青窝藏一名警方追捕的三光帮分子而受牵连，被判了6个月刑。亏他的同学寄来了他在美国的优异成绩单，加上留学生的招牌，很快被保释出来了。但这样一来，也就又与保释他的昔日弟兄们拉上了关系。据说，张安乐就是在这个时候萌发在美国组建竹联帮分堂的念头的。

1979年，张安乐去美国继续读书；1981年返台与李青离婚；1983年与珍妮斯·杰克逊结婚，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张安乐在美期间勤奋好学，若有王赣俊的生活条件，可能也会学业有成，无奈生活迫人，只得弃学从业，到处找零活干。一次，向过去的朋友柳茂川告贷遭拒绝，二人便有了隔阂。1982年回台湾时，陈启礼已东山复出，陈对白狼道：“你有抱负有什么用？有理想没有经济后盾，你凭什么实现理想？”柳与陈是竹联帮中让他佩服的人，如今一个遇难不助，一个劝他经济自救，顿觉自己拼命苦读太不现实。

弃学后，张安乐在洛杉矶遇到了黄鸟陈志一，二人合伙开餐馆，果然生意兴隆。二人又都有在美国组建竹联的理想，因此合作愉快。

江南命案后，张安乐多次在电视、记者会等公开场合露面，成了援救陈启礼最热心的竹联分子。而他的所作所为令美国警方不快，结果以餐厅有死老鼠为由，吊销了他的执照。他虽然多次受到警方和台方的骚扰，仍决心全



力搭救陈启礼，还为此写了遗书。然而，凭一腔义气是斗不过两个政府的。1985年5月，张安乐因涉嫌绑架而被捕。

张安乐智力超群，正义感很强。只是在白道上求不到正义，这才求诸黑道；感受到黑道上的凉薄之后，又想返身白道。因此，他一直徘徊于黑白道之间，只是感于义气，才成了狱中之囚。当一切趋于平静之后，张在狱中又作何感想呢？

冷面杀手刘焕荣，又号神经刘，1957年出生于台中市北屯区陆光八村的一个军眷区里，是家中的老。像陈启礼等人一样，刘也由一个受人欺侮的外省籍子弟逐渐成了不良少年。上台中商工职校后，他加入了小梅花帮。1974年，刘与小兄弟们在收保护费时为警察所困。突围中，刘伤了一个警察的脚部，当晚被抓进警局吊打一顿，然后被判刑4个月。

刘焕荣出狱后一心想改过从善，但令人惊心的是，社会的确没有给他丝毫机会，不仅到处遭白眼，而且警方还时时威吓他，似乎不进黑道就不放过他。于是，刘只有走黑道一途。

1979年，刘焕荣因赌债纠纷杀了第一个人，从此开弓没有回头箭，从被动干黑道变成主动闯江湖的硬手，很快获得了“神经刘”的绰号。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慧眼识英才，千方百计将他罗织进堂，封为执事。

刘焕荣进入竹联后，并未获得他万分仰慕的陈启礼的信任，刘急于表现，遂起“要出头，杀老大”之心。再说，他不愿默默无闻地在黑道混，于是决心走职业杀手之路。

刘焕荣杀的第一个老大是台湾黑道很有名气的大树林帮帮主杨伯峰，获酬金40万元。因为此事，刘焕荣一夜成名，且开了为求成名而杀老大的新风尚，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也不再有任何疑问，将其收为贴身侍卫。

杀杨伯峰3个月之后，即1983年9月，刘焕荣再爆冷门，于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枪杀了有“九命怪猫”之称的大湖帮帮主廖龙辉。从此，刘焕荣成了黑道上闻名丧胆的人物，竹联帮也因拥有这样一名王牌杀手而名声更彰。每每遇到难题，陈启礼只要动用刘焕荣，莫不迎刃而解。同时，刘也成了黑白两道追杀、寻捕的目标，开始过起难见阳光的逃亡生活来。

1984年春节时期，台湾黑道发生了一起诈赌大案。受诈者肖家训不甘心两亿元台币有去无回，便通过一位警官请陈启礼出面摆平。陈因一时没有找到诈赌的黑道分子而无所作为，肖某病急乱投医，又找了松联帮老大吴仕杰、四海帮老大杨南光等人调停，答应事成之后，各以500万元相酬。此时，其他帮派也知道了这一肥票，人人都欲分一杯羹。经过一番交易，终于达成协议：以2300万元一次偿还，在纪德旺师律师事务所交割。到了交割时间，纪德旺事务所人头晃动。角头云集。当肖某的代表入场时，众角头暗叫不妙，陪同他的竟是冷面杀手刘焕荣！原来陈启礼觉得这件事没能由自己解决有失面子，这才在关键时刻拿出了“秘密武器人”。

看着刘焕荣俨然以保护人的面目出扬，与会群魔知道碰上了难缠的鬼了。一位角头和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缓缓说：“阿荣仔，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他心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头脸的人物，刘焕荣这个后起之秀还能不给面子？谁知刘焕荣道：“凭什么”？这事我管定了！这是我竹联帮面子的事情，我非得给陈大哥挣回这个面子不可！”

律师见证，交割已毕。众人待富商的代表走后，盯住被刘焕荣坐在屁股下的800万现款和桌面上1500万的支票，问：“怎么分？”

“这样分！”刘焕荣一脚踢翻座椅，左手握着一颗手榴弹，右手拔枪、大喝一声。

一时间，众人全楞了。俗话说，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刘焕荣不辱使命，凭一支枪、一颗手榴弹镇住黑道群雄，不仅为竹联帮挣够了面子，也使自己的名声更响了。而他干职业杀手的价码也随着名望看涨，一个月后杀一山帮老大张德忆，他得了80万元酬劳。

当初杀杨伯峰，刘受台南另一个黑道老大游国麟所雇，如今刘的枪口在无人所雇的情况下指向了游国麟。刘与游本是哥们儿，但游颇不识时务。自刘名声鹊起之后，连董桂森这个昔日栽培过他的人也有意躲着他，以免一个不小心开罪了这个因遭追杀而变得疑神疑鬼的职业杀手。游国麟倒好，仍以刘的朋友自居，可谓自辟死路。1984年6月21日晚，游从刘之邀到了台北大安区一家宾馆。刘显得格外热情：“今日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其他。兄弟我做东叫你逍遥一夜，以尽地主之谊。”酒足饭饱之后，刘又换了个地方，为游叫了三个陪酒女郎。游摸摸这个的乳房又捏捏那个的大腿，还说不满意。刘按住性子唤来鸨儿，厉声道：“你再给我们搞这些肥膘瘦骨的，老子砸了你的台子！”鸨儿战战兢兢的去了，果然领来四个上等货，令游国麟胃口大开。

在游辟屋做乐时，同来的竹联帮天堂堂主王国庆不耐烦了：“不是讲好杀掉他吗？怎么对他那么好，连叫四个小姐？”刘语出如冰：“让他死个痛快，也算我刘焕荣对得起朋友了！”

游国麟逍遥一夜后，被刘焕荣带到忠堂开设的荔坊餐厅。任他百般哀求，刘还是砍了他四肢，然后用布袋装了，开车拉到一处山崖，对其脑袋开了一枪。半年后，登山者在坪林山区发现一具白骨，又怎知原是一个横行台南的黑道大亨级人物？

江南命案后，竹联帮头目几乎一网成擒。刘是台湾警方近年来每年公布一次的十大枪击要犯榜上的状元公，一直在逃之中，这一次也未能让警方如愿。但岛内是无论如何呆不下去了，刘于是亡命菲律宾、泰国，最后到了日本。在菲律宾曾协助齐瑞生杀陈正昌、陈南光兄弟两家九口人。到日本后，他展示了人性的另一面，一个被迫走上职业杀手之路的人对人世湿情的深沉感。那是在东京新宿的一个酒吧里，刘焕荣豪饮之时被旁桌一个女孩子的哭声打动。“喂，台湾人吗？”刘端着酒杯走过去。这女子是台湾来的“淘金者”，如今为黑道挟持卖春挣钱，金是淘了，却落不到自己手里。刘焕荣向来不近女色，的确是出于同情，这才过去搭话。攀谈起来才知，其老公大有名，乃是台湾十大枪击要犯排行榜上的探花，绰号珍珠呆的梁国恺。梁在与警方激战一夜后弹尽自杀，其情人竟然落到如此地步，刘不由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放到这个叫小支的女子前，醉晃晃地离开了酒店。

第二天去那家酒店时，小支的姐姐大支已等在那里。刘应邀去了她们姐妹的住处，三人交杯换盏间，谈的都是童年趣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很快便相知。刘焕荣于流亡之中平生第一次为了一个女人而陶醉了。1986年1月26日，刘与大支于温柔之乡中被急促的打门声惊醒。刘焕荣轻轻推开紧拥着他的大支：“该来的总是跑不掉的。”这样，刘焕荣因黑道“朋友”的出卖而落入日本警方之手，一个月后被引渡至台湾。

刘的回台是江南命案后的最大新闻。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刘说：“我

不希望我家人以后来看我出庭，他们增加我心里的负担...” “我恨自己，我恨社会！” “不错，我是黑的，不能见光，更极少出现公共场所。但我没有神经病！”

1986年5月，刘焕荣被判处极刑。在走向死刑台时，刘回首自己的职业杀手生涯，不无忏悔地说：“我杀的人都是该杀的黑道老大，只是除了陈正昌、陈南光兄弟，我感到很难过。”

## 九、港澳黑幕

### 1. 香港黑社会

香港黑社会人物常以“洪门人马”自居，其实不然。中国大陆解放前的洪门组织，确实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香港自开埠以来，大陆洪门组织的头脑也由内地辗转抵港，进行活动。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大陆洪门组织已经由“反清复明”的政治组织蜕变为走私贩毒、作奸犯科、欺凌弱小的猖恶势力。而香港更是落入英国殖民者的股掌之中，再加之社会环境、风气习俗的潜移，所以，尽管香港黑社会组织有些表面上因袭“洪门”之名，但是其早已丧失原来洪门组织初期的革命性质，从一开始就定型为香港的黑社会组织。

#### 香港黑社会组织演变

香港黑社会组织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1) 战前阶段(1842—1941)

香港今日英国殖民地的版图格局，是经由中英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强租九龙、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借新界三个历史文件而最终形成的。香港开埠以来，其重要国际地位当数贸易、交通方面了。在本世纪初，香港的出卖劳力者，多数以搬运货物为业，另外还有一些小商小贩等等，几乎都栖居、活动于上环三角码头及湾仔两地。然而，你来我往，长期相处，摩擦与纠纷时有发生，当时的香港政府又管理不善，除非爆出命案，否则一概不问不理，因此，一度情势十分混乱。

当时，一东莞籍小贩由广州至港谋生。以前曾加入广州的黑社会组织“洪胜会”。现在，耳闻目睹此地劳力者聚众斗殴、互相残害，于是发起组织“洪胜会”，以欲解释纠葛。接着，其他行业也纷纷以行业或地区为限，一时间建立起了十多个堂口。不料，这样反而使原来属于个人之间、少数人之间的纠纷酿成堂口之间的争执，发生近十次大械斗，问题日趋严重。香港政府命令警察部门密切监视各堂口活动，并责成其缉凶归案。于是，这些组织便转为秘密活动。直至宣统元年(1909)，在十多个堂口中的“义勇堂”内，有一名绰号为“黑骨仁”的头目发起联合所有堂口和平相处的协议，万一出现纠纷摩擦，则用“讲数”方式解决。如若非打不可，也需指定时间地点，决一雌雄，但却不可泄密给官府。这些协议得到各堂口赞同。于是，在同年端午节，召开了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洪门大会”。大会发起人黑骨仁，原为大陆洪门组织的一支“天宝山”、“碧血堂”中职位不低的“红旗五哥”，所以便把这个堂口联合组织冠之以“洪门”二字，而黑骨仁则被列为香港洪门的“开山祖师”。并且，根据黑骨仁的提议，各堂口名称之前，一律加上“和”字，是取“和为贵”之意，此乃当时所谓的“和”字头黑社会。

在香港，还有一个比“和”字头更早的秘密组织“福与兴”，又名“义兴公司”。但是，由于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替当时中国大陆某一个洪门山头筹措经费，因此，只能说它是中国大陆某一洪门山头的海外筹款部门。香港“义兴公司”向侨胞募捐经费，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该公司成员的固定募捐；另一种是向社会各界的临时募捐。估计“义兴公司”的筹款活动在“和”字头组织诞生之时已经停止。否则，就难以解释宣统元年成立“洪门大会”并无“义兴公司”参与之事。至于后来“福与兴”变成潮帮三大黑社会组织中最有势力的一派，则又另当别论。

自民国初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香港黑社会组织人数最多、经费最足、规模最大的，当推“和安乐”。“和安乐”、在未加上“和”字头之前，称为“安乐堂”，初期成员大多数为茶楼酒馆、街边熟食摊点从业人员。初期的第一辈“开山祖师”缺乏才略，其会员未见多大进展。民国十年（1921）左右，出现了一名“组织天才”，几年内，会员由300多人发展至3000多人，扩大地盘，调整组织，一切会务有声有色，令其他黑社会组织瞠目结舌。此“天才”名叫温贵，习文练武不成，却有指挥、组织之策。在“和安乐”与“和胜堂”冲突之中，他设计瓦解敌方，一举击溃对方主力，使整个油麻地区（当时九龙最繁盛地区）完全处于“和安乐”控制之下。于是，他自己也一举成名，由一个普通会员跃升要职——“白纸扇”。继之，温贵更加施展“抱负”，其一，是划分“和安乐”为十条线，线之下又分为若干堆，堆之下又有若干小头目联络普通会员、遍布九龙、香港、新界，从而形成由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其二，不论会员在业或者失业，一律交纳会费六毫，以此积聚钱财发放高利贷，一时间声势大振，别的堂口的会员纷纷“过底”。在香港历史中出现过两次与黑社会有关的大灾害，一次是日军入侵九龙时，“胜利友”大施烧杀抢掠，另一次是1956年的黑社会大暴动，“和安乐”均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最近十多年来，才渐渐被“十四K”压了下去。

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是一次轰动中外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中华民族气概的充分展现。然而，香港的黑社会却在这次运动之中混水摸鱼，窃取不少利益，组织也随之壮大。当时，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大致有：“和”字头的“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和洪胜”、“和群英”、“和合图”、“和勇义”、“和联胜”、“和合群”、“和合义”……等等；非“和”字头的“福与兴”、“同新和”、“同新义”、“单义”、“联义社”、“联英社”、“新同乐”……等等；还有外来组织统称“粤东”，来自澳门的统称“马交仔”；另外，还有以社会团体之名、为非作歹之实的组织，如“青年社”，“三圣体育会”、“西河体育会”等等。各个组织的人数少则数十人、数百人，多则数千人。几乎都是各据一方，欺凌弱小。而堂门与堂口之间，自然也为了争权夺利不时互相火并。那么，香港黑社会人物究竟是如何发“罢工财”的呢？当时，五卅惨案殃及大陆各地，而港督史塔斯密而不宣，但香港各界同胞早已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此讯，无不热血沸腾，纷纷声援大陆民众，反击香港政府。首先罢工的是香港海员工会，继而，包括电车公司员工在内的各行各业工人、店员，甚至政府雇员、外商雇员、皇仁书院学生、各界商人也纷纷响应，罢工、罢课、罢市使整个香港陷于瘫痪，一部分老弱妇孺纷纷离港。香港政府见状，便调动英军，荷枪实弹，整日巡逻。致使一般市民不敢外出，甚至取水、购物也不能。这时，黑社会人物便蠢蠢而动。湾仔区“单义”人马首先出动，代为挑水，代价每担一元（当时一元钱几乎可购上白米50斤，相当于现在的70—80元），而后其他各区的黑社会人物纷起效尤。以至强行勒索，入室盗窃，更有甚者，不管你是否需要，自动送上门，水到收银，否则就叫人皮开肉绽。所谓代客购物，更含诡计，歹徒们趁军警忙于镇压罢工、疏于治安之机，闯入店主回乡而仅有几人看守的店铺强取豪夺，呼啸而来，满载而去。然后，将抢来之物送至购物者家庭，收取货款，还要加一笔服务费。当时工人失业现象极为普遍，黑社会敞开大门，招兵买马，历时一年多的罢工行动，每个黑社会组织较之以前“大

大壮大”！

30年代初到1941年底香港沦入日军铁蹄之下止，这一时期是香港黑社会的黄金岁月，其主要原因为：黑社会人物和警方已经开始挂钩，使黑社会组织得以逐渐半公开化；警方侦缉手段落后，每遇大案，都要借重黑社会人物作线人，方能破案。这样，黑社会人物的地位大增；当时的市民较之今日比较保守，因而使黑社会人物的活动几乎未受什么阻碍；香港政府未有反黑的机构，法律上也未有惩罚的条款，因而黑社会活动没有什么顾忌；当时的黑社会帮规比较严格，也更讲究义气，组织内外如遇纠纷，尚能通过“讲数”求得解决，因而局面大致还较为“稳定”。基于上述原因，黑社会组织在十年之内得到了“空前发展”，犯罪活动非常活跃，非常普遍，只是方式、方法以及技巧上仍较为陈旧，尚不能引起大的轰动而已。主要罪行除了包庇黄、赌、毒及老千行以外，还有扒、窃、撬、诱、拐、卦、劫等等，有些人居然能选其中一业而终一生，可见，它的收入程度如何了。

### (2) 战时阶段(1941—1945)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圣诞前夕，整个香港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此后的三年零八个月，日本占领军对香港实行军事管制，香港居民苦不堪言。但是，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却为虎作伥，充当走狗。若观下列种种恶行，便可一目了然。其一，在九龙陷落之前，以及香港被围之际，港、九两地均曾受到黑社会人物的打、抢、烧、杀，而沦陷之后，又替日军残害我无辜同胞；其二，香港沦陷后，黑社会组织“福与兴”的一名红棍林满勾结日军宪兵部的中尉军官久宫传一郎（中国名：李志廷），在上环街市附近开设近十家赌场，庄家财源滚滚，其他黑人物也纷纷挂钩牵线，在西环、湾仔、九龙的油麻地、官涌地区，开设赌档；其三，沦陷期间为日军效力最大的黑社会组织，诸如“和安乐”、“和洪胜”、“和利和”、“同新和”以及“福义兴”等等，竟然为了50元军票奖金，出卖潜伏的抗日分子，为了一两烟土，用三个同胞的生命去换取；其四，更有甚者，黑社会人物居然协助日军在湾仔及油麻两地，建立慰安所，任由强盗蹂躏我姐妹同胞，其卑鄙行径，令人发指。

### (3) 战后阶段(1945—?)

战后，香港又回复了英国殖民地的地位。遵照国际法庭指示，处理了诸如林满之类的汉奸罪犯之首领，其余黑社会人物则躲过风头，相安无事；不久，便蠢蠢欲动，重新活跃起来。最先恢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首推“和安乐”，其次是“福与兴”。一年之内所恢复或新兴的拥有会员500名以上的黑社会组织，大致有“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和洪胜”、“和义堂”、“和胜堂”、“和勇义”、“和合图”、“和义和”等和字头的；另外还有非和字头的，如“同新和”、“联英社”、“单义”、“粤东”等等；属于潮州帮的则有“福与兴”、“新义安”等等；战前有一些组织，或被吞并，或渐消失，成为了历史陈迹，至于“十四K”、“敬义”、“马交仔”及青帮等组织，五年后陆续崛起。

此时黑社会组织的活动，除了一些例行罪恶，如盗窃、抢劫、街头骗局及街头赌摊之外，最普遍的莫如收规及包庇娼妓了。所谓收规，即是黑社会人物向市场、街头摊贩索取“保护费”，否则，就藉端闹事，毁坏货物与生财工具，纵火焚烧摊点设施等等。此乃一条生财之路，于是战后黑社会组织厮杀争夺，无不为此。经过一番拼杀，强者生存，划分了各堂口控制地区。

九龙方面：“和安乐”控制旺角地区；“和胜和”控制深水北河街以北地区；“和胜义”控制佐敦道以北油麻地地区；“联英社”控制官涌以至尖沙咀地区；“福与兴”控制土瓜湾以迄九龙城地区。香港方面：“单义”控制湾仔地区；“和合图”控制中环地区；“和胜堂”控制西营盘以迄薄扶林地区；“新义安”控制铜锣湾以迄筲箕湾地区；“同新和”控制湾仔部分及西环部分地区。当然，这种控制是随着力量升降而变化的。

尽管战后黑社会组织在短期内重新设坛立舵，但其阵势远非战前。会员人数虽有所增加，但组织指挥未见得心应手，以致除了“和乐安”、“福与兴”等较为健全的单位，仍然留有“海底”（亦名会员花名册）之外，其他连会员人数都不甚了了。至于会员的忠诚程度则更难以与战前相提并论了。战前的黑社会人物，绝大多数都能做到“打死不报官，刑死不招供；公司有令谕，誓死要服从”的诫条，但战后黑社会人物一旦被警方逮捕，或招供同党，或作线人，堂口首脑也很少有呼云唤雨的无比驱策力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战后黑社会组织——“十四K”在香港的崛起。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攻势已备，南京上海回归人民之日在望，而华南两广地区蒋部惶惶不可终日。在军统头子毛人凤密令下，其部下加紧联络两广各地洪门组织，以日后加以利用，图卷土重来。于是，由葛绍煌在广州再设“洪发山”，重建“内入堂”，时间为1949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地点乃广州市西关宝华路十四号。今天的“十四K”组织，则是由“洪发山”蜕变而来的。广州解放前夕，葛携各堂“香主”等至港，后又转留台湾。但其手下之众在港组成“十四K”，并自恃为“洪门”源宗，以国民党为靠山，与原来的香港黑社会各组织判若仇敌，时发火并。到了60年代初期，手下已达8万名（包425括未经正式手续者）左右。到了70年代初期，其组织竟然拓展至欧美、东南亚各国和日本。至于台湾、澳门或由“十四K”操纵黑社会的组织，势大压人。鉴于其崛起的特殊背景，“十四K”与台湾特务机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连香港政府也在1956年黑社会大暴动之后作如是说。

60年代初期，又有两个组织在港成立。它们是粤帮的“同乐”和潮帮的“义群”。“同乐”是由离开东南亚国家侨居地而获留港的部分华侨青年组成，后来成分也愈来愈复杂，有刑满释放者，有街头摊贩等等，但人数不多，难以与其他组织对抗。另一黑社会组织“义群”，原来是由一群小巴司机为了应付衙门的苛捐杂税而组成，初属“福义兴”、“新义安”人马。他们组成“义群”之后，又推出收租佬直接与衙门贪污分子联系，以免受多重剥削。此乃明智之举，别开生面。衙门方面只要金钱到手，对这个组织的存在也就戳许了。其后，它也就堂而皇之地生存、发展起来了。

香港黑社会组织结构（1）组织人数据统计，直至1978年，在香港仍然有组织、有活动的黑社会组织及其人数，大致如下：

“十四K”：香主为陈仲英、欧标（继任），二路元帅为陈×华，人数约5万人（澳门除外）。“和记”：香主为黄老润，二路主帅为黑鬼棠（绰号）。下属有13个和字头组织：

- “和安乐”：3万人。
- “和胜和”：1.7万人。
- “和胜堂”：5500人。
- “和义堂”：5000人。

“和勇义”：1500人。

“和合图”：8000人。

“和利和”：4000人。

“和胜义”：4000人。

“和洪胜”：1000人。

“和群乐”：500人。

“和群英”：500人。

“和一平”：700人。

“和二平”：400人。

“四大”：香主为沙皮×（绰号），二路元帅为靚坤（绰号）。下属有：

“单义”：1万人。

“同新和”：5000人。

“同乐”：700人。

“同义”：500人。

“联英社”：7000人。

“联群社”：1000人“联义社”：500人。

“联群英”：1000人。

“马交仔”：1000人。

427“潮帮”：香主为能十，二路元帅为老虎仔（绰号）。下属有：“福义兴”2万人。

“新义安”：1.5万人。

“敬义”：3000人。

“义群”：1000人。

总之，上述这些有组织系统的黑社会人数共约19万人。而且，组织不定形的松散人数不计在此内。

香港黑社会组织人数似乎众多，但绝非想象的那样指挥得力、整肃有致，当然，也并不是处于瘫痪状态。基本状况是：第一，具有约束、指挥力量，但较之以前大为逊色了。比如，在战前，如不服从大阿哥命令者，会遭家法处置。而今日，除利益冲突之外，即使大阿哥陷入重围，也无手下拼命相救。第二，早已丧失了“打死不报警、刑死不招供”的严明堂规。在战前，黑社会组织之间发生械斗时有伤亡，损失惨重。但是也有宁肯寻机报仇，而不报警执法的。而今日，一旦被捕，原来威风凛凛的黑道人物，也无不叩首求饶。

（2）组织等级现在的香港黑社会组织与旧时的中国帮会性质已经迥然有别，但是其组织形式仍然前后因袭，未曾改变。

香港黑社会组织中，职司等级分明。这点与大陆以前的洪门帮规大同小异。主要职司等级如下：

香主：又名四八九。

二路元帅：又名四三八。

红棍：又名四二六或十二底。

白纸扇：又名四一五或十底。

草鞋：又名四三二或九底。

四九：即最底层的普通会员。

在这些职司等级中，香主职位为每个字头的最高掌权人，也称大陆元帅。如“十四K”、“和记”、“四大”、“潮帮”，其下属有众多堂口。但这



四个黑社会组织中，每个只能选一名香主，以统辖下属各堂口组织。可见，香主的地位和权力是不可小视的。二路元帅则与之不同，每个堂口均有一名或多名二路元帅。平时如非坐馆，则有职无权，也有多人爱戴的退任坐馆，后被推举为二路元帅的。红棍则为黑社会堂口的打手领班，被推为坐馆者，必具红棍资格。白纸扇乃各堂的军师，每一堂口的内部事务一般由坐馆和揸数处量，而揸数一职非白纸扇不可。一旦遇有对外事务时，白纸扇则“运筹帷幄”，为决一雌雄出谋划策。草鞋乃黑社会组织中的最低职位，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各方联络。剩下的就是四九，也就是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群众。但或有十年以上会龄、如蒙坐馆、揸数提报，也可参加会务谋划或招收门生。

香港黑社会组织等级的升迁制度也是确定的。其一，四九可以升职为草鞋、白纸扇或红棍，但仅能升一项职位，并非按级递升。而且升职之后，几乎是终身任职，曾经坐馆或揸数才可以升任二路元帅或香主。其二，如果某一正式入会的新会员，对堂口有特殊功绩，可以在坐馆保荐之下，不经四九阶段，直接升为鞋、扇、棍，因此被称之为“平地一声雷”。其三，接收临时会员。按照黑社会传统规矩，入会时须经一系列手续、仪式。如：大开香堂时千斤重誓、拜过五祖、初习诗词暗语、列名海底等等，这样，才是正式会员；如只是由某一职员收为门生，口头传授初级诗词暗语便成为会员的，只能称作临时会员，便可称之为挂蓝灯龙。其四，不管是否正式会员，入会者必须向自己的大哥献毛诗（利是红包）一封，其数目须带六字。大哥则须将半数归公，作为堂口经费。但今日，由于堂口办事处不固定，办事员也难见其人，大哥便乐得坐享其“钱”了。而且，入会的规矩是“无事三十六，有事三百六”，即有意加入某一堂口以求避灾躲难的，还得加倍交纳。其五，黑社会会员也有“过底”之允。即由黑组织甲转到黑组织乙，在新旧双方的拜兄同意之下，便进行“过底”仪式。从此，与原堂口脱离一切干系。如遇纠葛，则必须为新堂口效力，不得陈仓暗渡。

### （3）组织暗语

从前的洪门组织，与现在香港的黑社会组织的组织目的完全不同了，前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者则完全蜕变为为非作歹、抢劫民众的恶狼了。然而，由于两者于当朝当政所不屑，贬为非法，因而，在谁敌谁友难以识别之时，便均采用暗语联络，进行活动。香港黑社会组织的暗语基本上因袭了原洪门组织，但由于粤语音韵与普通话有些区别，又加上使用暗语者的即兴创作，所以，现有暗语也就五花八门，说怪不怪了。

香港黑社会人物惯用的暗语（又称背语），据有关人士记载，大致有如下几类：

日用品类：披（衫）、横角（裤）、踩街（鞋）、底横（内裤）、线超（眼镜）、金枝（火柴）、雀（香烟）、盔（帽）、孔明（灯）、飘（船）、莲花（碗）、千张（纸）、毛诗（利是）、锚花（匙羹）、耍花（筷子）、大瓦（被）、轮（电话）、蛋（手表）、黄指（戒指）、青（刀）等等。食品类：毛瓜（猪）、大菜（牛）、摆尾（鱼）、砂（米）、耕砂（食饭）、班莲（饮茶）、青莲（茶叶）、摆横（吸鸦片）、啤灰（吸白粉）、减灰（戒白粉）、玩波仔（吸红丸）、耕罕（吃药）等等。

人称类：老亲或羊牯（非黑社会人物）、花腰（警察）、本（探员）、天牌（父亲）、地牌（母亲）、倏女（女朋友）、倏仔（男朋友）、吉佬（女人）、柳记（狱警）、老表（同门手足）、灰斗（外国人）、金手指（警方

线人)、老道(吸毒者)、孽口仔(戏子)、老记(记者)、老状(律师)、大爷(即老千们专用,所指被骗对象)等等。其他还有:爆江(流血)、受把(坐牢)、一碌(一年)、抹(判案)、过江(渡海)、挂枝(香港)、马交(澳门)、大圈(广州)、开片(打架)、超(看)、爆冷格(入无人之屋行窃)、爆热格(入有人之屋行窃)、墨漆(衣盗)文雀(扒手)、高买(窃取店铺货物)、跳流罕(卖假药)、咬老软(靠女人吃饭)、熬老亲(暂有正当职业)、陀地(本地)、一斤(一百元)、一栋(一千元)、一筒(犯案一次)、狗咬(枪伤)、入册(入狱)、出册(出狱)等等。

另外,香港黑社会组织,还有彼此之间问答的诗词(民称黑话),以揣心迹。比如:经大哥正式收进会门的,必会传授一些普通问答的诗词加手势,此乃“过野”,否则,若遇上内部人物问及时,答非所云,便要换拳头了。因此,要熟诸此道。当遇到别的黑人物盘问时,若问:你是贵公司(或格什)的?就答:我是老歪(因发“和”字的音时口略微歪斜)的。又问:谁是你的大佬(收己为门生的大哥),谁是你的顶爷(开香堂时的坛主)?答:×××是我的大佬,×××是我的顶爷。然后,问者要求答者交出宝、印。宝乃以左手握拳单独竖起中指;印乃以右手的拇指、食指及无名指并在一起。一般是先宝后印。如果答者不服,便可正容回驳:你何德何能,要我交宝交印?若见问者方面人多势众,便只有唯命是从了。至此,如若双方愿意和解,便无事了。若有心挑衅,便会继续盘问风、流、宝、印四首诗词了。风诗云:

说我是风不是风,五色彩旗在斗中。

左边龙虎龟蛇会,右边彪寿合和同。

流诗云:

说我是流不是流,三河合水万年流。

五湖会合三河水,铁锁沉蚊会出头。

宝诗云:

一湾过了又一湾,我家原住五指山。

一心找寻姑嫂庙,左右排来第三间。

印诗云:

若向印头头二四,排成三角订佳期。

结义金兰为表记,同心合力主登基。

到此或止,或继续盘问过五关。所谓“过五关”,乃是右手从肩到掌的五个部分的名称,即:高溪庙、龙岗、长沙湾、二极桥、姑嫂坟。如当被问及时,答者便需以左手拇指和食指作圈状,其余三指伸指,然后将左手搭右手由肩至掌于五个部分。并念出名称。“过五关”中的每关,都有诗一首,但一般盘问多数不需再提诗句,在此也只不过赘述。

总之,要想成为正统的黑社会人物,不仅要熟暗语,精诗词,而且要会手势以及“过五关”。

#### (4) 组织系统与选举

香港黑社会的组织系统,可谓简而全。每一大组织,如上面提到的“十四K”、“和记”、“四大”和“潮帮”等等,均设有香主一名。下属各堂口均设有坐馆一名,揸数一名,另外还有具叔父资格的执事者若干名。这些人等的职责仍是代表本堂与外界交涉,管理内部属员晋职或解释纠葛。坐馆必须具有红棍资格,揸数多数由白纸扇任职,尊称先生。

黑社会组织上述头目的产生方式,美曰“选举”,任期一般为三年。但

是，至于如何选举，则令人啼笑皆非。选香主时，下属各堂口的坐馆和原任香主共聚共饮，酒足饭饱之际，某人提议本届香主名单，若无人反对，便大功告成，当选者如不在场，由卸任香主告知；如有异议，再提再议，直至通过为止。有时由卸任香主介绍推荐下任，事后口头通知于下属会员。坐馆与揸数的产生亦与之相似。坐馆召集堂口中名人，介绍下届坐馆、揸数情况，由到会者通过；如果大家认为原任德高望重，也可连任这两个职务。1956年10月前，香港黑社会组织新旧两任交替，还举行隆重仪式庆贺一番，后因禁止非法组织集会，使无此举了，时有一两次仪式也难以引起什么轰动了。

香港黑社会组织中的香主与坐馆等头面人物，其地位还是令普通会员仰目相看的。但是，时至今日，被称之为“新血”者的，绝大多数是目无规矩的青少年，什么帮习道义，与他何干？所以，头面人物也奈何不得，只好顺其自然，从而内部指挥效能日趋削弱。

香港黑社会组织的骇人罪行

#### (1) 日军侵港前夕的大焚掠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大举侵占了中国大陆的同时，于1941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东南亚一带也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香港岛未能幸免。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军队空炸启德机场、金钟兵房以及太古船坞，步兵在炮火掩护下由深圳向新界挺进，海军也协同作战。到了9日午时，已近九龙市区，港岛危在旦夕。可是，恰在家园倾覆之前，香港黑社会组织头目及其门徒，却密谋蠢动发财，极尽烧杀劫掠之罪恶。

9日下午，大约有660名左右粗壮大汉，在钦州街的一幢楼房天台上聚会，一名削瘦烟容的中年登高疾呼：“各位手足，我们发财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所有花腰都跑到对江去对付架仔了。我们要把握机会，及时出动。各堂口要齐心合力，互相支持，提防羊牯们的反抗。至于我们内部划分地盘，待稍后各堂口再行商议。各位现在如有什么意见赶快提出来，以免延误发财的时间，……。”此乃何许人也？他是“和安乐”的白纸扇梁棠，虽有鸦片烟瘾，但却粗通笔墨，诡计多端。集会者中，有“和安乐”、也有“和洪圣”、“和群英”、“和利和”，还有“和义勇”的人。另外，广州陷落后来港的粤东帮也有两人参加。这些人七嘴八舌，各显高见，或提议抢银行，或提议掠民宅，或提议劫金铺、公司，……。结果，无一人能说服众人，吵成一团。最后还是粤东帮两人之一，绰号四眼球的，讲出了一番颇能服人的道理。所云如下：“虽兵荒马乱，羊牯对于财物还是非常重视的。如果轻敌，或者力量分散，遭遇反抗必伤无疑。”随之，还亮出左臂一处伤痕以示佐记。原来这是当年在广州西关一家世宅抢劫时落下的“光荣”伤疤。众人听罢，纷纷讨教锦囊妙计。于是四眼球得意地说出计策。他以为，一是要集中力量，至少100人为一股；二是要有足够的武器；三是未行之前，必须先划分地盘，免得自相残杀。众人表示赞同，先把地盘划分出来。各堂口推选一人，以抽签方式获得所分地盘。结果，“和安乐”得旺角区，“和洪圣”与“和群英”得深水涉区，“和利和”与“和义勇”得油麻地区，“粤东”帮由于人手少来参加抽签，地盘划分停当，又规定白布缠绕左臂作为识别标志，胜利二字作为口号，故这伙人等后来被称之为“胜利友”。事毕，已是黄昏时分，各路人马便四头奔走联络，集合本堂口帮兄，准备大发国难财了。

历数黑帮罪恶，说来令人发指。首先，“和利和”、“和勇义”两个堂口，共约出动 250 人，在上海街找到两家刀剪店，破门而入，各自找寻适用的架撑——武器，如西瓜刀、牛肉刀和大菜刀。然后，分成五组，进行活动。言明：单独发现财物，归个人所有，集体发现的则见者都有份。而且还商定：不伤人、不劫色。但在抢劫时，就顾不得许多了。如在上海街附近榕树头的某号 4 楼，三名匪徒轮奸一名年仅 13 岁的少女，致使其跳楼自尽。

9 日、10 日，各区警署人员不知何故，无人出勤巡逻，当然若干警员被调往前线协助英军行动为明人所见之外。这样，“胜利友”得以横行肆虐。9 日整晚，黑帮奸、杀、烧、掠，无恶不作，深水涉、旺角、油麻地三个地区，早已混乱至极，惨不忍睹。上海街的金铺集中地，则为重点抢掠目标。其中有一金铺未能疏散，铺主拒绝交出金柜钥匙，被抢劫者乱刀砍死。5 位店员因不知店主钥匙所藏，也被逐一砍死。最后的死者乃是一名 18 岁少年，苦苦求饶，言父母双亡，还有一祖母靠他侍奉，也未能幸免。至于其他的银铺商户及一般居民，其财产损失，或被杀被烧的，简直不计其数。

10 日早晨，黑社会人物已将上述地区洗劫一空，便向南继续发展。起初因南面多数为外籍居民栖息地，因不知底细，不敢贸然动手。可现在，各区已被洗劫殆尽，九龙城区也早被潮帮的福义兴反复洗劫，何况日军已进入九龙市区，再不动手就坐失良机了。于是孤注一掷，向尖沙咀拓展新地盘。这时，许多黑社会以外的地痞无赖或胆大之徒，也纷纷趁火加入打劫行列，和安乐主力率先捣毁九龙粮仓大门，人群蜂拥而入，掠劫大米、砂糖、棉纱、布匹、罐头和洋酒等等。留守员工或伤或死，多达十人。随后，黑社会人物袭击黄埔船坞，原以为会有所得，不料全是机械或钢铁材料，恼羞成怒，一把火烧毁了整座船坞。

接着，匪徒们又向红勘三约的居民点进发。战前的红勘、土瓜湾一带，家道足者甚少。尽管如此，匪徒们仍想水中捞油。他们先把各户人家赶到街中排列成行，点燃一堆易燃物品，然后逼迫居民交出财物。如若不从，就把居民推入火堆活活烧死。据一位目击者张老太太回忆，她自己的一位同胞兄长，就是这样惨死的。还有一位老妇人，为抢回匪徒抛进火中的一领棉絮，扑上前去，歹徒却一把将她推进火堆，可怜老人就这样活活烧死了。

下午，匪徒们烧杀抢掠，前进到九龙城道北帝街附近时，与正在该区烧杀的潮帮人物遭遇，狼虎相斗，大打出手，一场恶战下来，死伤不计其数。晚上，匪徒又回军尖沙咀，这个时候，抢劫的已不仅是所有的黑社会人物了，还有不少地痞无赖。甚至他们的家属，也肩挑手提，大包小裹，趁乱发财。他们都用白布缠左臂，手持锐器，破门而入，喝令屋主蹲下，拳打脚踢。然后胡乱翻腾，寻找值钱的物什。金钱自然不肯放过，甚至连眼镜、发饰等物也要抢去。临走时，乒乒乓乓乱砸一通，扬长而去。洗劫尖沙咀之后，部分匪徒又回军旺角地区，以为还有“漏网之鱼”，再度扫荡。

港岛警察与九龙警察比较起来，尚能就地维持秩序，故而还未促成大乱之势。但是，九龙方面抢劫消息传来，港岛方面的黑社会组织——“和合图”、“单义”两股堂口，也按捺不住，聚众过江。“单义”的一名红棍想出妙计，英军由九龙撤至港岛的铜锣湾及北角，并在此集结以对付日军。而上环以至西环部署甚少，因而有些往来于港、九两地之间的居民。暗想：何不渡海到九龙去发财？于是，11 日上午，他率领两帮人等约 60 余名，胁迫 8 只小船艇，由上环码头渡海到九龙山东街码头登陆，先到钦州街跟“水房”的梁棠

联系，梁棠以为这个顺水人情还是做得的，既然自己已经捷足先登，就让他们再搜刮一次吧，且派出手下协助。于是，再度洗劫又开始了。由于商店堂铺早已被抢劫，这回的目标主要是住户。但是这些住户都是小户人家，平时仅可温饱，省吃俭用也许有几个钱，这时也已补贴家用，哪还有什么节余呢？因而，这帮人物所到之处，抢到的也只是新旧衣服、米油盐茶，甚至日用品也照拿不误。结果，使一些人家家衣食无着。这是匪徒在九龙的最后一次搜刮。因为日军在 12 日黄昏已经攻下市区了。

也就是在这最后一次搜刮中，出乎意料地遭到了一次抵抗。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在今日的大角咀一带，原来是修船工人居住的棚屋集中地，因为破破烂烂，初时的洗劫者不屑一顾。但是工人们仍然提高警惕，由青壮男子组成自卫队保护妇孺，准备一旦万一发事也好反击。恰巧，最后一拨匪徒路经此地，一念之差，总觉得还有些油水可捞，于是呼啸而上。不料，木屋顿开，一下子冲出数十名手执铁具的大汉，挡住来路，恶战一场。这帮乌合之众哪是工人对手，一下子倒下了十多个。12 月 12 日，日军侵占九龙，九龙居民进入更黑暗更悲惨的时代。

## （2）1956 年黑社会双十暴动

1956 年在香港发生的黑社会组织双十大暴动，是由台湾特务一手策划的。自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每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国民党政府是把它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看待的），都以机票、食宿引诱海外同胞赴台观光，港澳地区也对亲蒋社团补助聚餐费、花牌费，并印制大量的青天白日旗，令这些社团四处张贴，以壮门面。继之，亲蒋报纸刊物、大加渲染，讨好蒋家政府。当时香港的涉置区，包括黄大仙、石峡屋和李郑屋村三处，每年 10 月 10 日，都是亲蒋人马活动的重点区，张贴标语、挂旗等。1956 年 10 月 10 日也不例外。早在 8 日，李郑屋村涉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属亲蒋派人士吴某把持）领回不少青天白日旗及若干庆祝补助费，吩咐各位成员加紧布置。当晚每户十面旗，贴到或挂到门外显眼地方。结果，上述三个涉置区未到双十那天，已经是旗山旗海了。9 日午间，又再次在临街楼群墙壁上贴满纸旗、标语、纸串等等，甚至连浴室、公共厕所也照贴不误。

可是，李郑屋村却因挂旗问题，出现了纠葛。10 日上午，涉置区一姓李的职员，看到公共墙壁上张贴着花花绿绿的纸物；认为这与管理条例有悖。于是，通知居民自动拆去，但谁敢应声呢。该职员只好自己动手拆了，然后回到办事处办公去了。可是，当那个居民组织知道此事之后，一个绰号为猪肠粉（“十四 K”分子）的男子，集合三四十人包围了办事处，质询此事，职员解释一番，但未能被接受，人群云集，后来竟达 600 多人。办事处职员见势不妙，忙通电深水涉警署，请求派警维持秩序。20 名警员随后赶到，但发觉实在是警力有限，只能是采取保守态度。滋事分子见状，胆子也大了，由猪肠粉提出条件，限涉置区在 15 分钟内答复，否则采取行动。条件是：重新张贴上纸旗，并加上蒋介石像；燃放价值五百元的爆竹作为认错；李姓职员向蒋介石像三鞠躬道歉；在全港大小报章刊登由滋事分子拟定的道歉启事，不得更改；以纪律处分于撕旗职员。条件苛刻之甚，办事处难以答复。

猪肠粉原来只是一个摆摊卖猪肠粉的，哪有这等精明？细想原委，是那个居民组织的吴某幕后操纵。吴某原来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专门负责海外工作的）的外围人物。在教唆猪肠粉提出条件之后，立即派人打电话向在 × × 戏院开坐的梁 × × 报告。梁 × × 是六组驻港特务头目，公开身

份是出版社副总编辑。梁××获悉情况，立即奔赴现场，与吴某商议计策。岂料事态发生变化。原来涉置区办事处主任，为了息事宁人，竟然答应滋事分子的部分要求。但滋事分子拒不让步。深水涉警署援兵赶到，为首的是位副警司。另外，九龙警察总部也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待命行事。

梁××与吴某，也设立临时指挥部，当梁××获悉官方让步之意后，急令滋事分子要为“国家”争口气，条件不得变更，如有拖延，立即以暴力相对。接着，暴徒们蜂涌而入办事处，冲开警察拦护，见人便打。那位副警司，文即吩咐部属，全力保护 20 多名办事处职员离开。但暴徒们一面纵火焚烧办事处，一面追打警察和职员，直至在永隆街口展开混战，致使警察职员多人受伤，暴徒最后被警方发射的催泪弹驱散。

事已至此，本应告结。但是，梁××却想乘机掀起大浪。还有比梁××更有地位者，乃是军统(六组属于中统系统)派遣在港的头目毕××(少将)。于是，梁××便把事件始末报道上级和毕××。毕××指示，此后此事由军统处理。以后，事态发展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直接与台北方面联系，获得指令。同时，香港警察总部的政治部主任英籍人哥×，也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得知台北驻港特务机构有可能从中策划，为避免事态扩大，便采取种种措施，抽调各区警署人员一部分到九龙总部，并令九龙总部尽量多派警员守护现场，防止暴徒再次集

结。

岂料，台北方面已直接派遣特务前来指挥，利用这个偶发事件做起文章了。10 日当天傍晚，在九龙长沙湾道××号 2 楼屋内，潜伏在港的军统特务陈×阶，作为毕××的心腹助手，又与“十四 K”人马密谈，面授机宜。指出，此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香港方面不敢轻视“右派”力量，台湾方面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了，希望“十四 K”和香港洪门兄弟报效“国家”，把左派打得落花流水，出出这几年的怨气。5 名“十四 K”头目听得眉飞色舞。陈×阶继续指示：由十四 K 联络全港洪门，编成 5 个大队，人数、武器、联络事宜，10 日晚 10 时之前完成；由台湾方面派人指挥，5 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为编号，台北来人分别以孙君、逸君、仙君、先君、生君作为代号；大队召集人仍以“十四 K”人物为主，其他若忠贞可靠亦可，人选得立即通知指定联络人×先生，必要时召集学生参与宣传工作；香港总督葛量洪在度假，署理港督戴维德才智不足，尽可放手大胆干，攻击对象主要是左派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等，力求一举摧毁左派在港实力；斗争区域主要是九龙与新界，香港方面视情况发展而定，尽量不要分散精力；各大队于明日(11 日)午间领取连夜赶印的“国旗”，战斗指挥部暂定为长沙湾球场，……如此如此，陈×阶唾沫飞溅，布置停当。

就在 10 日晚 9 点 30 分，一场大规模的洗劫发生了。一辆消防车被推倒，若干警察及消防员被玻璃瓶、砖头打伤；嘉顿公司十多辆货车被烧毁；新中国货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被砸开门窗，抢劫一空，大发土产公司、学生书店、元×参茸行、益丰食品公司均遭洗劫；周生生金铺被毁坏，担保险库坚不可摧；暴徒围攻九龙警察总部、旺角警署和九龙交通部，警察关上大门，采取保守态势。

11 日凌晨，受害地区逐渐扩展至旺角、长沙湾以及整个深水涉区。11 日早晨 8 点，暴徒们分别集合，多者二千，少则三百，长沙湾球场，更是人头攒动。球场内外还有约二百左右的骨干分子臂缠白布到处巡逻。一面青天

白日巨旗不知何时树在球场中央。可能整个九龙地区的黑社会组织都已接到通知，编成若干大队。军统特务陈×阶，也到处驱车指挥。上午，暴徒们首先攻占了中建国货公司、龙门冰室、雪山冰室、×祥匹布店、益群食品公司……等，掠烧一空。警察却不敢单独行动，只能百人方队在远处向暴徒施放催泪弹。

同时，台湾方面又派出7名特务来港，致使暴乱形势更加恶化。一是凡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10元或10元以上代价购得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方可能行。一位佩戴名贵金表的车主竟被诈取1000元。有些车辆一路驶过，竟然被勒索十一次之多。二是发放特别通行证给他们的同路人以及有特殊身份的人。三是整个北九龙地区的商户被暴徒强行勒索，言之支持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如若不“捐助”，抄家灭族则有之。少则100元，多则竟达5000元。如长沙湾道一个五金店，因挂一幅毛泽东像，被勒索5000元，还强迫店主在门口跪罚半小时。“捐助”之后，发给暗码纸旗贴在显眼处，据说便无人敢来骚扰了！四是围攻香岛中学、嘉顿公司和宝×纱厂、南×纱厂、东×酱油厂，揪打左派职工，勒索巨款。至于葵湾闹市所有商户均遭劫掠，极少幸免。五是酝酿成了轰动中外的惨剧，即焚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同坐的汽车，司机当场死亡，参赞夫妇均负重伤入医院抢救，但参赞夫人终因医治无效，在第三天死亡。

10月11日由早到晚，九龙半岛被烧杀抢掠，已无半寸净土。据统计，被洗劫焚烧的工厂、学校、工会、商店不下300家，死伤人数到11日下午5点，已过300人。至于参加这次暴乱的人数，除了乘机混水摸鱼的居民之外，各堂口黑社会人物竟达3万人之多。台北方面，则大加赞赏，鼓励暴徒为“护旗”战斗到底。但却回避这场事变与台湾的联系。

下午3时，港府召开高级紧急会议。署理港督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并调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戒严令明言：由11日晚上7时30分起至12日午10时止，整个九龙半岛将实施宵禁。参与者将指挥部由长沙湾球场移至下葵涌的一处民宅，筹划下步密谋。主要事件有：一是洗劫三×布厂、联×兴漂染厂以及一家工会宿舍，二是血洗荃湾，杀死居民50多人，被强暴的妇女有60来名，伤者不计其数，至于财产损失，则难以估量；三是攻占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人员伤亡数名。但是，香港政府逐渐控制了局面。

10月13日，周恩来总理约见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严正指出，在九龙的中国居民，其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的残杀劫掠下遭受重大伤亡损失，特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关注。对于香港英国当局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国民党特务分子策划的暴乱，以保障中国居民的生命财产，提出严重抗议。强烈要求香港英国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制裁国民党特务分子，切实保护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中国政府附属机构和企业。同时，英国政府应对上述问题予以答复。中国政府保留在以后提出要求的权利，周总理这番话，指明了这次暴动的性质，斥责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的丑恶行径和香港英国当局的软弱立场，果断地表示了中国的态度。

在中国政府压力之下，港府加快步骤进行大搜捕，自13日晚至16日解除戒严令，共拘捕人数达5300余人。当然，真正的黑社会人物确实不少，但也不敢肯定没有无辜市民受牵连。但港督葛量洪否认国民党策划、指挥暴动，而且竟然指责周总理对港府的措施不当的批评为“干预内政”，把这场暴乱说成是香港“难民”对“左派”的报复。由此，港府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反

抗议”。香港英国当局之所以持这种立场，应该联系 1956 年的国际局势加以解析。当时英国与美国是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伙伴，而英国视美国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美国当然庇护台湾当局，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因而，香港英国政府怎敢指逆盟主之意，抨击台湾呢？徐此之外，港英当局也有从港岛的安全、稳定考虑的因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港岛居民何以能接受？

## 2. 澳门黑社会

位于珠江口西侧的澳门，原属我国广东省香山县，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者借口要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鸦片战争后；便不断扩大范围，终在光绪十三年（1887）进行强占。历史为证，虽然她比香港更早地落入殖民者的股掌，但是，血浓于水，澳门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各种社会的、文化的联系是无法斩断的。

澳门的黑社会组织，较之香港，也同样有着悠长的历史。在清朝康熙年间，隐迹于澳门普济禅院的大汕和尚，以居住地为联络点，奔走省、澳，进行反清密谋活动。然而壮志未酬却被捕、放逐，手下也就四散了。但是，凭心而论，它只能算作秘密组织，而不是澳门黑社会组织之源。澳门真正的黑社会组织，应该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置时算起。

中英鸦片战争，归根结底是因英国殖民者将鸦片贩入我国，牟取暴利，荼毒我国民而引起。当时，由于香港并未开埠，英殖民者的东印度公司便以澳门为转运站，与大陆进行鸦片贸易。日常的转运工作，如上货、卸货、包装、存仓、转手……等等，均雇用华人，大约有 600 人之多。靠这个工作谋生的人，时为争夺权益和地盘发生纠纷。一华籍管工林阿发（中山人）便组织一个名为“友联”的团体，其目的是为公司效力、控制和盘剥工人。有此为证：凡加入“友联馆”者，须交纳相当于工资收入 1/10 的会费，以求保障。这对于劳力者，无疑数额巨大，难以支付。但是林阿发有洋人撑腰，一般工人奈何不得，只得忍痛割舍这辛苦血汗钱。又一中山翠微人，名为陈光，见利眼红，随起效仿，组织了“友乐馆”，其目的与“友联馆”毫无二致，但手段却高它一筹，只是谁愿助谁助地征集会费。但是在堂口内开设赌点，从中抽头取利。结果，劳力者的血汗钱，每月一发薪，在瞬间输个精光，然后又向堂口借支下月工钱，外加 15% 的利率，利高创常理之最了。工人常年累月，负债重重，为求生计只得加入抢劫盗窃之列了。两个堂口一旦形成，便互不相让，招兵买马，常有因摩擦而生的流血械斗，澳门黑社会组织就这样产生了。

另外，当时产生的另一堂口——“利庐”，也是一个黑社会组织。鸦片战争之后，卖猪仔成为澳门的新兴职业。言之卖猪仔实则是将一批批的华工劳工卖到外埠之意。所谓外埠，大抵是南洋、秘鲁、巴西、古巴，后来甚至卖到英、美等国。猪仔分为自愿和被骗两种。所谓卖，即签订定期劳工契约。19 世纪 40 年代，澳门的卖猪仔业兴兴旺旺。于是，当时的一位卖猪仔头目李七斤，凭借势力，在红窗门街设立据点，挂了块“利庐”的招牌，统辖其分布在澳门各个角落的马仔近百人，指挥他们物色猪仔、方法是：在街头巷尾的赌场借钱给赌者，只要年轻力壮，就可以来借。赢了，加五还借；输了，只好去当猪仔。为了看管这些猪仔，“利庐”便招揽一班流氓无赖充当打手。除了在赌场物色对象之外，他们还还对初来澳门的陌生者，威逼利诱，强行押解下船，把他卖掉。

上述三个黑社会组织“友联”、“友乐”和“利庐”，实乃澳门黑帮的



开山之祖。直至今日，当地的黑社会组织，仍沿用“友联”和“利庐”的堂口名称，足见其深远影响。至于是否有因袭传脉，则无法有明确证据。

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间，澳门的黑社会组织势力逐渐壮大。一方面，澳门的嫖赌“事业”发展，财源滚滚；可是另一方面却贫穷复加，腐败枯朽。葡国当局只知横征暴敛，对民计民生毫不关心，使澳门成为一个纯消费城市，一个完全的殖民地。

这些，无疑为黑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20年代初，这个人口只有18.4万人的港市已有黑社会堂四十多个了。它们是：“友联”、“友乐”、“同义”、“家义”、“联英社”、“友和”、“利庐”、“尚义堂”、“群英”、“合义”、“黄馆”等等。此时澳门黑社会人物谋生之道主要有：受雇于赌场作护场；或者在烟格、娼寮

等地方作跑腿；或者行骗、夜盗、扒手、拐带小童、偷晒晾衣物；或者在船上街头贩卖假药；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黑社会人

物在澳门还有一大特殊作角需要提及，这就是，他们有时竟会以街坊地保的身份，替人排解纠纷。此乃何因？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在当时却确曾出现。这是因为，当时的澳门政府，除了钱之外，对其他诸事全无兴趣；警察乃葡人或印巴人，对华人习俗、解事方式难以理解；澳门民风也一贯较为保守，遇到邻里纠纷很少投诉，往往两方或多方各不相让。这时，人们认为黑社会人物起码是跑过江湖的，见多识广，便请他们出来

评理论据。结果还真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服，于是，给予利是一封算作酬谢。当时各个黑社会堂口的人数，多少不等，最多的“友联”达近千人，最少的“家乐”仅百余人。除1929年“利庐”与“友联”固争夺港澳客轮“泉州号”的码头地盘而厮杀之外，尚能和平共处。1941年香港沦陷，澳门无事，因而人口骤然增加，香港广州的黑社会人物至澳停留，原来宁静的日子不见了，偷、抢、打、杀司空见惯，再加上各国的间谍活动、冒险人物的走私偷税、交战方面买卖物资军火，情况复杂起来了。

自1956年香港黑社会大暴动之后，香港黑社会人物被押解出境，大批头目选择了澳门为押解地，从而在澳门黑社会中产生了喧宾夺主的效果。原来的澳门黑社会组织，其名称、性质、活动范围数十年来没有多大变化。另有一些以体育团体为名的黑社会组织，表面公开，内里却奉行黑社会组织那一套（如暗语及诗词手势等等），还是能约束下面弟子，不无事生非，除非别人上门撒野，那决不手软。此外，还有一些类似黑社会组织，但却没有黑社会活动的人氏，如八区仔之类。八区仔乃指中山县第八区的同乡而言。侨居澳门的中山县籍人士最多，其中又以八区为首，这些人排外、团结，形成一股势力，但一般有家有业，甚至财资丰厚。他们不欺凌弱小，但若与外来势力发生纠纷，又敢于起来反抗。八区仔轰动之事乃是扑杀“十四K”双花红棍余洪的壮举。1956年香港双十大暴动失败，随着香港黑社会组织头目来澳门居住，原来在香港风靡一时的“十四K”、“和安乐”、“和胜义”三个堂口一年之后相继成立。之所以这三个堂口能在澳门成立，主要是因为从香港押解来澳的绝大多数属于这三个单位，而且头脑人物居多；别的单位来澳人贝甚少，也是无名之辈，难成气候。刚开始，人地两生，要生存发展并非易事，并且是被香港政府终身押解出境

447的。但后来，他们都拿到了澳门身份证，可以旅游身份去香港，也

无心再返港居住。因此，在澳门成立了堂口。澳门黑社会组织既保守又薄弱，见状只好屈从，使“过江龙”迅速在澳门崛起。这个结果也是在双方对峙、较量过后才形成的。当时，在三大外来势力设坛立舵之初，也发生过不少冲突，诸如 1958 年白眼塘的“水房”与“利庐”之战，1961 年司打口的“同义”与“胜义”之战，都是本地黑人物抵制外来势力的恶战。“过江龙”无路可走，背水一战，把本地各堂口杀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此后，三大外来黑组织便取而代之了。

“十四 K”、“水房”、“胜义”在澳门扎根之后，便开始扩展力量。恰值 60 年代中期，青少年反叛心理强烈，趋向新潮，甚至连生活单一的水上居民，也恋上这种势头，以自己为黑道人物为荣。因而，这三个堂口，吸收了不少新血。”与此同时，若干较小规模的新组织也纷纷出现。如“三巴堂”、“新义”等等，虽然组织弱小，也无严格帮规，但能量颇大，能把澳门搅得天翻地覆。澳门的法律又从属葡国，凡 17 岁以下少年，除非犯有恶罪，一般的法庭不能拒绝保释；拘留不能超过若干小时；勒索、抢劫款项不超过 30 元者，不能以刑事案起诉。这就为那些年少的黑道人物提供了作乱的机会。

澳门黑社会组织的数目为 20 多个，人数至少有 1.4 万人。“十四 K”居首位，4000 人；“和安乐”3006 人；“和胜义”2000 人；新产生的组织 1000 人；原有的本地各堂口共约 4000 人左右。这些黑道人物究竟如何谋生呢？大致分三类：一类为本澳门的黑人物，多数有家有业；二类由青少年组成的“三巴堂”、“新义”等堂口人物，或学生、或渔家子弟、或阔少依仗家庭吃喝玩乐；真正以黑社会身份谋生的，也就是外来势力“十四 K”、“和安乐”、“和胜义”等第三类人。第三类人的谋生，不外乎偷、抢、窃、劫、骗，还有赌、黄、毒三样。前面已对香港黑社会人物的谋生作过介绍，而澳门黑社会中的外来势力主要来自香港，所以在此也不再多费笔墨了。

